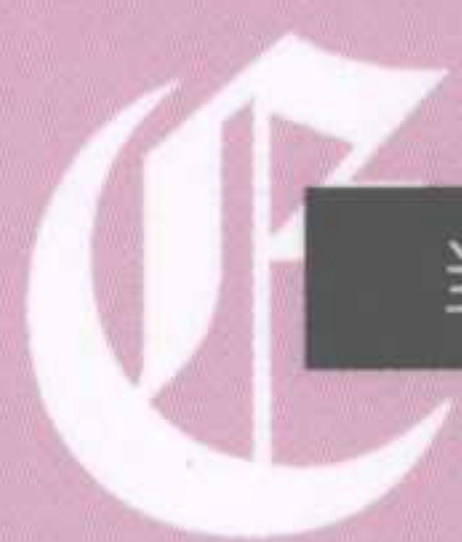


主编 [美] 高 柏 执行主编 甄志宏 冯秋石




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经济意识形态与 日本产业政策

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

[美] 高 柏 著 安 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获1998年度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泽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奖

这本书将是对现代日本发展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它将实质性地深化关于日本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它关于思想的作用，关于各种思想的源流如何塑造了日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分析具有高度的原创性。

至今还没有人在关于思想和意识形态如何塑造发展取向型国家的分析中，达到过这种深度。也从来没有人分析日本人自己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如何考虑他们的经济发展，具有日本特点的实用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外部环境挑战的敏感如何影响他们的决策和制度时，达到了高柏这样的深度。

——肯尼思·派尔，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

高柏这本书是关于那些在战后日本真正地指导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思想家和战略家的第一个认真的研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是我们在理论上理解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世界上最重要的力量均衡转移时的关键。高柏这部充满智慧的书，有力地削弱了西方经济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用他们的模型解释日本个案的努力。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意义的书，它对那些已经忘记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的人们将是一个震撼。

——查玛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的作者

上架建议：社会学·经济学

ISBN 978-7-208-07560-3



9 787208 075603 >

定价 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主编 [美] 高 柏 执行主编 甄志宏 冯秋石



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经济意识形态与 日本产业政策 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

[美] 高 柏 著 安 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美)高柏(Gao, B.)著;安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书名原文: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ISBN 978-7-208-07560-3

I. 经… II. ①高…②安… III. 产业政策-研究-日本-1931~1965 IV. F1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338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当代经济社会学丛书 ·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

——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

[美]高柏 著

安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341,000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60-3/F·1707

定价 38.00 元

缩略语表

xiii

CMC	经营协议会	JCED	日本经济同友会
CPA	内阁企划厅	LDP	自由民主党
CPB	内阁企划局	MCI	商工省
CRB	内阁资源局	MITI	通产省
CSB	内阁调查局	NIDP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
EPA	经济企划厅	NPRA	国策研究会
ESB	经济安定本部	RFB	复兴金融金库
ESS	经济与科学局	SCAP	盟军最高司令部
GATT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SIS	产业政策小组
GHQ	占领军总部	SRA	昭和研究会
ICIS	产业结构调研委员会	SSCMA	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日本人名用法注释

xiv

本书中日本人名在随文出现时,按日本习惯以姓居前名居后;在引用日本人的文献时,如是日文文献则姓居前;如是英文文献,则名居前。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 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代总序)

一套学术丛书的序言通常要对其涉及领域的理论作一个全面的梳理,为读者提供一个大致线索。由于这套丛书要分批出,而现在不可能全部决定后续选材,我将不遵循一般丛书序言的写法把各本书的内容分别加以提示,而主要讨论这些著作共享的经济社会学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的基本特点、三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以及它们对中国目前经济的急剧制度性变迁的意义。毋庸赘言,这些讨论将基于编者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属一家之言。其目的是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同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是美国经济社会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又可以分为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这两个学派在学术界的影响都不仅限于经济社会学,甚至也不仅限于社会学,而是跨学科的。

组织制度学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组织社会学。它有很强的美国本土学术范式的特点。历史制度学派则明显受到关于欧洲政治经济研究的影响。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一直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对立物在发展和演变。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均采用理性行为的基本假设,都把理性视为单个的行动主体拥有的,先验于任何制度的一个外在的属性。换言之,制度构成对行动主体策略行为而言的一个场景或者游戏规则,它约束行动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但是,行动主体在制度代表的游戏规则下仍然可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通常将行动主体的选择偏好作为假设来处理,很

少关心选择偏好的来源。这种理性行为的假设与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起,构成了建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的基本要素。与此相对,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共同的特征是,否认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先验的、外在的理性假设,拒绝它们采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摒弃它们建构超越具体时空条件限制的“大理论”的追求,追求中程的理论解释。由此可见,这两派在关于如何建构社会科学理论方面有着系统的和本质上的分歧。

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关于理性行为基本假设的批评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类的许多行为无法用理性行为假设来分析。组织制度学派强调人的行为经常不受功利主义的驱动,而是在强制、模仿以及规范的压力下,更多地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或是认知方面的原因而趋同(Meyer and Rowan, 1977; DiMaggio and Powell, 1983)。另一个层面是理性行为本身的选择偏好来自制度,而不是一种先验的、外在的存在。制度化的理性神话与制度本身的规范都以内生的形式,建构理性行为的选择偏好(DiMaggio and Power 1991; Thelen and Steinmo, 1992; Hall and Soskice, 2003)。

组织制度学派最本质的特征是通过人的认知来解释制度。组织制度学派把制度定义为“能约束行动并提供秩序的共享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既限制行动主体追求最佳结果的企图和能力,又为一些自身利益受到通行的奖惩体制保护的社会集团提供特权”(DiMaggio and Powell, 1991:11)。组织制度学派通过微观层面个体的认知特点,解释宏观层面制度化过程中的趋同现象。它强调,在影响微观层面个体行动的因素中,认知与情感和价值一起,代表着帕森斯文化三维中的一极。价值一极代表着理性的判断,而认知代表的则是在情感和价值方面完全中立的分类、常规、语言文字以及图式等,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日常知识。组织制度学派认为,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人们总是运用他们的这种常识性知识来理解现状。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制度不是将一个先验的价值存在内化给个体,而是一个在个体互动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产物。换言之,所谓的制度无非是“行动主体做为群体在内部成员之间共享的关于习惯性行为的类型化”(DiMaggio and Powell, 1991:22)。这样一种认知因素影响下的行动,无法用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理性来解释。

在组织制度学派从组织社会学的传统领域向经济社会学发展的过程中,它对

早期的单独重视研究非营利部门中的非理性趋同的范式做出一个重大修正,开始直接研究营利部门,即所谓的直接受市场力量驱动的企业趋同行为。它开始重视利益以及竞争等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理论侧重的经典理性行为建构过程中的社会因素。正像“文化工具箱”的比喻显示的那样,对于组织制度学派而言,经济生活中的行动主体在界定自身的利益与目标和制定实现目标的策略时,总是从所在的文化与制度环境中寻找资源(Swidler, 1986)。这一重要的修正,对扩大组织制度学派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影响居功至伟。它打开了一扇通往研究经济生活中理性的社会建构这一新研究方向的大门。

虽然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都重视制度,但是它们的侧重点有明显的不同。与组织制度学派重视在情感与价值方面完全中立的认知因素相对,历史制度学派更重视涉及价值判断的规范的作用。历史制度学派认为,行动主体关于利益和目标的界定是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理性与制度是不可分割的(Thelen, 1999)。历史制度学派指出,理性只能是具体的,而不是像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张的那样,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之前就界定一个先验的选择偏好。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制度性因素,直接塑造行动主体关于目标和利益的界定(Lindberg, Campbell and Hollingsworth, 1990:6)。与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把利益处理成一个假设不同,历史制度学派把行动主体如何界定利益作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因变量。它认为,除非我们了解具体的制度性环境,否则行动主体的行为受自身利益驱动的假设是十分空洞的。历史制度学派并不否认行动主体可以追求实现其目标的策略,但是强调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才能揭示他们试图将什么样具体的利益最大化,以及为什么重视一些目标而不重视另一些目标(Thelen and Steinmo, 1991:9)。

与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采用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反,组织制度学派最感兴趣的特性是,“无法被还原成个人属性和动机的集结或者直接后果的超越个人的分析单位”(DiMaggio and Powell, 1991:8)。它认为,尽管人们经常面临选择,但是他们总是借鉴他人在相似情景下的经验,并以社会上通行的行为准则为参照系。组织制度学派以场域为分析单位。它认为,宏观层面的制度不是单个的、追求私利的个人的累加。恰恰相反,单个的个人行为总是受到集结层面的他人行为的影响。组织制度学派用吉登斯提出的结构化这一概念来说明这种影响。结构

化过程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体或者单个的组织在一个场域内的互动大幅度增加。第二，场域内部开始出现个体之间或者组织间的统治结构或者联盟。第三，场域中各个个体或者组织发出和接受的信息量大幅度增加。第四，同一场域里的个体或者单个组织之间，彼此都发展出对对方存在的明确认识。在这样一个结构化的过程中，场域中共享的类型化后的规则体系，而不是个体先验的理性存在，是影响个体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场域取代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成为组织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单位(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经济学也好，理性选择理论也好，均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它们主张，在宏观层面上以集结形式出现的结果，必须从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的策略行为与互动来理解。与此相反，历史制度学派或者是从制度的层面上推导出个体利益，或者是对集结层面上的利益直接进行分析，而不讨论个体的策略行为如何形成这种集结(Thelen, 1999:377)。正因为如此，历史制度学派采用的分析单位一般多是像政党、工会以及产业团体等集结层面上的行动主体。作为历史制度学派的一个新发展，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范式以行动主体为其分析框架的中心。这个行动主体可以是个人或单个的企业，也可以是生产者团体或者政府。尽管它的分析框架赋予企业以更重要的地位，与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同，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范式是从联系中来把握企业的，这种联系既包括雇主与雇员、股东与管理者的关系，也包括企业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会制约企业的策略选择。承认行动主体的战略互动对结果有影响，更加凸显历史制度学派一贯主张的那些直接影响这种战略互动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Hall and Soskice, 2003:5-7)。

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都重视建构“大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对旧的、描述式的和缺少分析的旧制度学派研究范式的一个大的修正。行为主义认为，单纯地列出各种详细的制度性结构，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政治经济行为，社会科学研究更应该重视非正式的权力分配、态度以及行为对结果的影响(Thelen, 1999)。经济学开始重视建立基于假设的普遍适用的数理模型，政治学与社会学则摒弃注重各国制度特点的旧的制度分析，开始发展在跨国比较分析中可以广泛应用的，并以大规模的统计分析为基础的概念和变量。这样一种学术范式催生了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重视超越各国政治经济制度之上

的相似倾向,并主张趋同论。尽管行为主义的范式有许多的积极影响,它的一个主要弱点是大大地限制了社会科学分析的范围。虽然行为主义本身重视个人和团体的特点、态度以及行为,但它经常忽略行为发生场地的许多重要因素,并且无法回答它本身以前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政治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的态度、行为以及资源的分配,在各国之间有巨大的差异(Thelen and Steinmo, 1991:4-5)。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里应该算是与经济社会学最有可能对话的分支了。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依然是试图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理论,只不过它试图用以交易成本体现的效率来代替以投入产出体现的效率而已。而且,新制度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规范性的理论,它与经济社会学重视实证性的理论,重视各国经济制度之间巨大差异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

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石油危机期间,各发达国家不同的应对以及它们后来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对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严重挑战,并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制度学派的发展。历史制度学派抛弃了原来现代化理论采用的传统和现代性等普遍适用的一般性概念。它开始发现像强政府、弱政府、发展指向型国家以及规制性国家,这些可以捕捉发达国家之间多样性的概念,追求例如公团主义、政策网络以及政党结构等具有中程解释力的变量,并注意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各行动主体的动机,以及限制他们面临的策略选择。作为普遍适用的大理论的对立物,历史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侧重能反映各国差异的制度。与旧的制度学派不同,历史制度学派重视制度对行动主体目标的影响,以及一国权力和资源在不同的行动主体之间的分配(Thelen and Steinmo, 1991:6)。作为一种中程的分析性概念,这些制度能通过对行动主体的制约,为各国之间政治经济的差异提供一种具体的解释。

尽管组织制度学派没有直接讨论中程理论的问题,而且有时候还注重全球性的趋同现象,但其本身的分析框架决定了它能更好地提供中程的解释。组织制度学派的分析单位为场域。场域永远是一个受时空条件限制的具体存在。为了解释一个产业或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组织制度学派的分析必须对具体的场域特点及其演变历史进行研究。与此同时,组织制度学派注重文化在认知方面的作用,而文化只能是具体的文化。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组织制度学派的理论就必然是一种中程的社会科学理论。

理性的社会建构

组织制度学派强调理性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而认知因素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前边提到,当组织制度学派从组织社会学向经济社会学扩展时由早期的单纯注重非理性的行为向注重理性行为的社会建构转变。迪马吉奥曾经把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关注的制度对理性的影响形式作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影响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文化构架经济,即特定文化环境下使用的常识性分类、文字、图示和关于代理的概念,以及关于技术、技巧的定义直接决定如何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对经济而言是内在的,在分析上是不可分离的,它提供的理解是行动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基础。另一种是文化规范经济,即特定的文化环境下占主导地位规范、价值及常规限制经济活动的形式与范围。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对经济而言是外在的,在分析上是可分离的,它对单个的行动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可以做那些,不可以做那些有明确的约束(DiMaggio, 1994:28-29)。

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一般认为,由于工具性制度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明晰的,在分析工具性制度时没有必要关心阐释的作用。因此,任何具有明确工具性的东西不具有文化上的特征(Dobbin, 1994)。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的现实性是一元的,先验、普遍的经济规律主宰着世界,经济学则是将这些规律的细节挖掘出来的实践。在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看来,以上观点在现实中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矛盾,即虽然许多人主张所有的工具性制度受一套同样的经济规律驱动,不同国家的工具性制度却总是呈现出很大的区别(Dobbin, 2008:7)。

组织制度学派认为,人类的行动有主观上的意义。意义代表的是行动主体关于因果关系的认识,没有任何领域的行动只是单纯地顺从无需分析的客观现实。当行动主体对行动的意图达成集体的理解时,行动就会变成惯习,而惯习则是制度的基础。社会科学家只有通过理解行动的主观目的,领悟行动主体对于行动与目的之间因果关系的理解,才能解释行动(Dobbin, 2008:7)。经济行为中的理性是现象学的。它意味着行动主体总是从经验中把握意义。意义是理解一切行动包括理性行为的根本。意义又有明确的跨国差异。因此,理性的建构不仅是社会的,它也是文化的。

在操作层面,组织制度学派与历史制度学派都重视意识形态、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对理性社会建构的作用。二者均从政策范式的角度入手,剖析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特征。政策范式直接影响决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并规定他们的角色。它既包括实施政策的实践,也包括政府关于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的理解(Dobbin, 2008:9-10)。通过政策范式,政府不仅提供了经济主体借以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们独立判断的能力。通过影响经济主体接受对情况的解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结果的控制(Gao, 1997)。

一般而言,现有的文献比较重视在社会建构政策范式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思想的来源,这些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思想与利益集团的关系,这些意识形态、经济理论和思想的代理人,以及这些代理人与国家权力和主要利益集团的关系。政策范式直接将意识形态代表的意义,或者经济思想代表的目的—手段之间关系的理解等认知因素,与产业政策和制度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

意识形态通过影响政治话语来影响政策范式。“政策制定离不开流行的思想观念等环境:这里面包括对社会性质与经济性质的集体共有概念,关于政府的适当角色、若干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以往政策经验的集体记忆。所有这些理念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这种政治话语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描述政策的语言和对政策进行评判的条件。”(Hall, 1989:383)虽然30年代中期诞生的凯恩斯理论为大萧条代表的市场失灵提出了解决方案,它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并没有占统治地位,也没有成为当时各国政策范式的理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大批受凯恩斯经济学影响的经济学家进入政府部门,并采用了各种受这一理论影响的政策。在战后,凯恩斯经济学主宰了影响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主流政治话语(Hall, 1989)。

政治文化对产业政策范式有重大影响。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影响过政治秩序的各种制度性逻辑,经常被用来作为建立经济秩序和进步的手段。美国政体将权力置于众多的自治共同体政府,而联邦一级的政治体系则缺少统治权。受此影响,美国将经济生活的决定权分配给市场。法国则相反,将权力置于中央政府,规定唯有中央政府有权组织制定经济秩序和确定国家的重大目标。因此,法国的政府官僚一直在经济治理中占主导地位。英国政体置权力于精英个体,保护公司不受王权与政府官僚的影响。它先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后来则通过积极的保

护,使其免于市场和政治力量的干涉(Dobbin, 1994)。

经济学家经常扮演新政策范式代理人的重要角色,尽管经济学家的学术背景很重要,但由于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总是有互相冲突的不同经济思想与理论,经济学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经常成为决定哪些理论或思想能最终影响政策范式的重要因素。比如,在日本战后对产业政策范式有最大影响的一批经济学家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受的教育,都信奉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而没有人信哈耶克。这样一种独特的学术背景是日本发展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与日本战后的主要政治家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经常担任他们的主要智囊。因此,他们的经济思想与政策理念经常通过国家权力的放大,变为主导国家政策范式的纲领性原则。这正是为什么日本走上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Gao, 1997)。换言之,国家结构可以直接影响他们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能否影响政策制定,以及影响的形式(Weir and Skocpol, 1985)。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状况对政策范式也有影响。在拉美特别是墨西哥,到了80年代,在美国受教育的一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归国之后,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参与国家管理。当债务危机开始后,这些人开始取代战后一代主张进口替代的老经济学家,主张以美国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要求释放市场力量的经济政策范式。与此同时,在拉美的许多国家,经济学界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向美国式教育靠拢,很多大学的经济学系成为留美的预备训练部。其结果是不仅仅在实践层面,而且在思想和理论的层面也发生变化。不仅仅这些国家的政策范式发生变化,连思考政策的制度化了的手段和方法也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是影响拉美国家采用“华盛顿共识”政策范式的重要因素(Babb, 2001:11-12)。

国家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对经济而言是一个外在的存在。它可以帮助资本积累,它可以干扰、破坏或加速资本积累。但是它无法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组织的形式和经济活动的协调。政府可以有强有弱,但是它很少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变革性力量(Weiss, 1988, 引自 Lindberg and Campbell, 1991:356)。对于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而言,“政治并不是凌驾于经济之上,它直接渗透在经济结构中”(Weiss, 1988:162, 转引自 Lindberg and Campbell, 1991:357)。

组织制度学派认为,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一个互动的、不可分割的过程。技术进步和竞争使得市场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是,维持它在市场中与竞争对手、供应商以及雇员之间关系的稳定。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一直处于非常波动的状态,交换的各方为解决这种不稳定性,最终总是将企业推向国家。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建立稳定的市场,都需要国家来制定产权结构、治理结构、交换规则和控制理念。国家可以理解成由一系列政策领域组成的场域。每个场域均构成政治行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方面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制定并执行旨在为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提供稳定的规则与治理结构的政策。在这层意义上而言,市场建设离不开国家建设。国家在创造市场稳定性的作用时,少则体现在允许企业使用各种治理机制去处理竞争和冲突,多则通过直接干预市场行为以达到稳定的目的(Fligstein, 2003:chapter 1)。

对于历史制度学派而言,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治理机制的选择来构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治理模式直接受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与权力分配的影响。无论是国家的行动,还是国家制度的形式,都可以制约经济行动主体的策略行为和权力。国家既可以影响选择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组织来治理经济,也可以影响双边和多边的交换形式。国家既可以影响经济生活中资源和信息的生产和配置,又可以通过操纵产权约束经济行动主体的行为(Campbell and Lindberg, 1991:361)。

国家既是一个行动主体,也是一个结构。

作为行动主体的国家经常被认为拥有自主权。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上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以自己的政策来维护民族利益。在很多场合,这样一个国家被作为与市场完全相对的概念来使用。然而,在实际的分析案例中,这种简单地把国家与市场相对的做法局限性很大。它使得我们无法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区别加以概念化。比如,在比较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以日本与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发展主义时,这种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就不是很有用。这些国家既有市场经济,也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取代市场,而是利用各种非市场治理机制来限制市场、补充市场(Gao, 1997)。换言之,国家“不仅在一个整体中塑造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塑造市民社会内部的许多重要关系”(Stepan, 引自 Gao, 1997:8)。

作为结构,国家为经济行动主体提供一个政治舞台。这个政治舞台向各个利

益集团提供不同的制度性机会。因此,这些不同的利益团体对国家制定政策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国家又是一个组织配置。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上,历史制度学派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观点有所不同。在组织制度学派看来,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对国家职能的需求(Fligstein, 2003)。而在历史制度学派看来,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权的分离,以及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在管理权限方面的争夺,经常可以直接导致经济部门治理结构的不稳定。同时,国家对一国经济中资源的配置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对企业的策略选择和经济行动主体在互动中的相对机会至关重要(Lindberg and Campbell, 1991:358-360)。

国家制度的不同对经济治理模式有重大影响。在历史上,以英美为代表的共同法系的传统与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传统,对这些国家现代宪制的形成有深远影响,宪制的不同又是不同经济治理模式的重要的制度性条件。

共同法系的传统崇尚自由和人权等根本性理念。在这些国家中,权利是靠私人来强化的。法律依靠受害者本人和他的律师来管理社会。服从法律的激励机制是依靠国家的强力,迫使违法者对其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损害做出赔偿。在共同法系里,法律解决的技巧是首先考虑法官的判决,而且法官的判决是至高无上的。在受共同法系传统影响的国家,法律发展的一部分是通过司法部门以往通过的案例判决对未来判决有约束力这一积累的形式实现的。这部分法律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些国家的传统中,司法部门不仅同时拥有一定的立法权,而且还有司法审查的制度,审理国家立法部门通过的法律和行政部门采用的政策是否违宪。在现代国家三权分立的制度性安排中,法官可以通过司法审查的过程,以违宪的名义推翻立法。由于这个制度性安排,这些国家的行政部门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权力较小。尤其是在美国,行政系统的权利直接受到司法系统的制衡。在这样的宪制里,任何行政部门主张或实践的非市场治理结构都可能受到个人或单个的公司通过司法系统以违宪的名义进行挑战(Gao, 2004)。

相反,继承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对公法与私法有明确的区分。国家的角色不仅仅是保护私人的权利,更重要的考虑是保护公共利益。其结果是很多私法里的根本性概念不得被弱化。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解决的技巧是首先考虑立法,法典是法律的最终依据,立法者的判断不允许司法系统的干预。在受大陆法系传统影响的国家,法律一概由立法部门制定。因此,国会的政治过程直接影响法律

的制定。司法部门的权力和职责与共同法系国家相比要小得多,没有任何立法权。大陆法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大都没有司法审查的制度。行政部门在这些国家拥有很强的权力,它不但在立法过程中经常是具体法案的起草者,而且还经常作为司法系统的替代,调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当法律受较强的政治因素影响和行政部门有较大的裁量权时,个人与企业的自由就必然受到较多的约束。因此,在继承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中反映个体利益的市场空间小于继承共同法系传统的国家(Gao, 2004)。这就是为什么通常讲英语的共同法系国家经常被归类于自由市场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经常被归类于协调市场国家。

非市场治理机制

由于历史制度学派一贯主张在集结的层面理解利益,它自然看重产业或部门层面的治理结构。与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微观层面的单个行动主体来把握市场行为不同,历史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为了开发、生产和营销其产品和服务,必然要卷入产业中的社会交换关系网络(Campbell, Lindberg and Hollingsworth, 1991:5-6)。因此,产业的治理结构就是在集结层面为管理这些关系而作出的制度性安排。在这点上,历史制度学派的观点与网络学派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制度学派关于治理的概念,虽然以个体利益与社会网络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它从集结的层面来把握单个企业或企业网络,并强调通过公共的制度性安排,以治理结构的形式来维持个体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与此相对,网络理论以个体的利益为前提。虽然同一网络其他个体的存在可以对一个个体的利益进行约束,但是这种约束是非正式的。网络的公共性质与治理结构相比要弱很多。

最近的资本主义多样性文献进一步把非市场治理机制在经济中的作用作为判断市场经济类型的标准。这类文献以企业为其核心概念,但是从企业的社会关系方面来把握企业。它认为,企业为了组织生产必须处理与工会的关系,管理者与股东的关系,技能养成与教育的关系,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处理内部激励机制的问题。这类文献主张,如果把一国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处理这些关系的方式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一种是自由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协调市场经济。作为理想类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被经济学文献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企业一般依赖市场竞争与正式的契约去规定各种社会关系;生产者与

消费者均根据市场价格来调整供给和需求；市场在很多方面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协调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工具。而另一个理想类型的协调市场经济则经常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这种经济形态中，企业更多地依赖非市场机制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建构其各自的强项。这些非市场机制通常要涉及更多的不完全契约或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契约，依靠网络内部交换信息的监督机制，并更多地依靠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来打造企业的竞争优势。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有很大的区别。在自由市场经济里，市场制度鼓励短期关系和高度竞争。这种经济形态也有一个鼓励正式的、相对完整的契约的法律系统。它也允许企业通过兼并的形式，将原本是外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成内部的隶属关系，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协调(Hall and Soskice, 2003:8)。

前边提到，非市场治理机制与国家的政治结构有很强的相关性。非市场治理机制有深厚的欧洲大陆的传统。这与欧洲国家对上一次全球化大潮兴起的挑战的回应有着直接的关系。德国在19世纪中叶的20年里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到了19世纪70年代，德国开始面临经济萧条。由此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在德国社会导致了要求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强大政治压力。德国政府积极支持卡特尔，它把卡特尔作为一个低成本获得私人企业信息，并影响私人企业行为的手段。同时，由于卡特尔在德国的重化工业里占统治地位，德国政府也把卡特尔作为实现自身扩张国际影响和加强军事力量的工具。等到上一次全球化逆转期时，非市场机制更是成为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治理结构。纳粹上台之后，在全国按行业和地区组织了强制性的产业团体。这是法西斯主义在回应全球化逆转时与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最大的区别(Gao, 1997, 2004; Gerber, 200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市场治理机制并没有随着盟军占领下的民主化而消失，而是演化成所谓“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这个“社会规制的市场经济”非常关注各种社会势力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体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间及产业部门间，而且也体现在大小企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本土联邦德国人与大量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之间。这种社会平衡是依靠一系列的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实现的：工会参与企业的管理及总经理的选择；银行与企业建立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高度组织化的市民社会不仅有得到承认的权利以及代表这种权利的利益团体，而且有自我管理的能力(Streeck and Yamamura, 2003:12)。

日本的情况也很相似。1897年建立的社会政策学会全面地继承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其宣言中,日本社会政策协会公开宣告,“我们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因为极度自私的动机和过度的自由竞争将会加深贫富差距。我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破坏现存经济制度,并消灭资产阶级,而这一目的将会扰乱国家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信条是维持私有经济体制,我们将会在这一认识框架内,通过个人努力和政府力量来避免阶级冲突,寻求社会和谐(Sumitani,转引自 Gao, 1997:61)。在上一轮全球化逆转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经济理念的影响下,日本的非市场治理机制发展十分迅速:财阀以康采恩的形式在多个工业领域整合生产过程,强制性卡特尔后来发展成强制性产业协会,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有一个融资的主银行,国家既不允许工人罢工也不允许企业解雇,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开始建立较长期的稳定交换关系。这些都打破了以市场为主的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在战后,这些非市场治理机制在新的民主政体与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以改头换面的形式继续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与德国一起成为与英美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Gao, 1997, 2001)。

以上讨论的是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的三个自变量在静态状态下的基本逻辑。在讨论它们今天对中国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还要加进一个动态的变量,即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中,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关注的三个自变量,即理性的社会建构、国家与非市场治理结构,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一个纵向的角度回溯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职能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各发达国家中,在上一轮全球化大潮在20世纪初逆转之前,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主要扮演的是界定并维护产权的角色。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各国的政府在战争动员的过程中开始直接控制资源配置。这一趋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变得更为明显。等到工业国先后在1929—1933年间经历大萧条时,各国政府更是开始公开支持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减少市场力量对社会的恶性冲击。第二,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过程中以钟摆的形式运动这一角度来看,在全球化的上升期,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总是大行其道,成为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主要思潮。而到了逆转的阶段,主张政府干预,限制市

场力量的意识形态则占上风。同样的道理,在全球化的上升期,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必然受到挑战,非市场治理机制也必然被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而在全球化的逆转阶段,国家与非市场治理机制则经常被认为是控制市场力量负面影响的有效手段。第三,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条所描述的三个变量随着全球化的变化而变化的共同趋势,这种趋势却不会导致彻底趋同的局面。这是因为,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在其演化的历史过程中总是趋于一些选择偏好,而抵制另外一些选择偏好。尽管由于结构性的压力或者认知方面的变化,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呈现变化的趋势,但是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逻辑不同,自由市场经济在释放市场力量成为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范式时,走的步子要远远大于协调市场经济,而协调市场经济在保护社会成为全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政策范式时,走的步子要远远大于自由市场经济。

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从钟摆的一极开始向方向相反的另一极回摆。这种回摆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金融扩张后,出现一场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大增加。第二,发达国家的政策范式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这种回摆将对自由贸易政策有巨大冲击。换言之,支撑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都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年里的转型是整个全球化过程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步子走得最大的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这个阶段恰恰是全球化的上升期。从一个历史的观点看,全球化的过程自70年代初从钟摆运动的一极向另一极回摆,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在全球化的大旗下,各国政府纷纷通过私有化、自由化以及规制缓和的措施,来打破原来为保护社会而建立的种种制度,以便实现释放市场力量的目标。在这个阶段里,中国理性社会建构的核心是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释放市场力量,全面参与全球化这一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在这样一种认知基础下,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不仅积极地转变自身在经济治理中的干预方式,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减少自身干预经济的范围。一方面,中央集权开始向地方分权转变。另一方面,在许多经济治理机制中,传统的政府角色开始被市场取代。

为了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政府在改革的过程中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乃至养老等保护社会的责任方面大大减少,并把这些负担转嫁给个人,而把公共投资集中在与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基础设施上。在改革开放的政策范式下,非市场治理机制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并没有很大的空间。中国人眼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非市场治理机制直到近年来,在关于与民主化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政治话语中刚刚开始出现。

理性的社会建构在 21 世纪初的中国开始面临全新的外部环境:西方国家不仅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也要求中国将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保护主义正在迅速成为一种倾向。在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中国将如何建构自身的竞争优势?人们对原来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经济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受西方影响的主流经济学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评。中国正在经历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本身的巨大变化,更是在认知层面上理性的社会建构方面发生的深刻转变。这种正在建构下的新理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打破过去主流经济学以效率作为唯一的视角来关注经济,以 GDP 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人们开始认识到经济的确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引入社会的变量。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等新的经济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这些变化的全新认识。这种认识对经济社会学而言有两层含义:第一,正像经济增长的提法已经被经济发展取代一样,经济生活中效率只是诸种目标中的一个。这并不是说效率不再重要,而是说既然人们在经济目标上的排序是被社会地建构的,这种排序就受特定的时空条件制约。当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发展生产力时,效率可以是首要目标。但是,当转向社会保护时,首要目标就可能是公平,而非效率了。第二,经济生活不仅仅是依靠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或者是社会网络就可以治理的。代表着集结层面的公共利益的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目前经济社会学需要大力研究的重点。

世界银行曾经在 1997 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里,列出一个国家的最低限度职能、中级职能以及积极职能。国家最低限度职能包括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和保护穷人。公共物品除了国防、法制、产权及宏观经济政策管理之外,还必须包括公共健康。而保护穷人的措施则包括反贫困项目和灾难救助。国家的中级职能包括通过

支持教育和保护环境解决外部性问题, 规制水、电、煤气、电话的供应以及反垄断, 通过提供保险、规制金融业和提供消费者保护来解决信息不对称, 以及通过提供具有再分配性质的退休金、家庭补助和失业保险来提供社会保障。国家的积极职能则包括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 以及进行财产上的再分配(引自 Fukuyama, 2004:8-9)。

按照这些标准,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与世界银行的标准相比处于一个倒置的状态。中国的各级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产业集群等方面做得远远超过许多国家。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球化的上升期, 这种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进行干预, 在西方被广泛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的。然而, 到了今天, 中国政府的这种干预使得中国在国际竞争压力下的产业升级换代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打破了过去依附理论和世界系统理论时代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必然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的定论。

另一方面在 90 年代的改革过程中, 政府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这个基本职能方面全面撤退, 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个人。这种做法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的并存。因此, 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一直到 2003 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 中国政府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 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在最近的几年里, 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如果政府不增加公共物品的提供, 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 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 那么, 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 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转为内需驱动。至今为止, 中国政府在行使其中级职能方面, 还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不仅国有垄断企业的霸王条款经常成为消费者抱怨的对象, 在为基础教育投资、反垄断、规制银行业、提供社会保障方面, 也有巨大的改善空间。这些都要求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对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案。

非市场治理机制是中国人最不熟悉的领域。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 中国是在 20 世纪中由一个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的政治经济形态, 通过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个巨大的变化代表着在上一次全球化出现逆转时, 中国在人类社会三种对应模式里的选择。作出这个选择的部分原因在于, 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市民社会的发育十分落后。

非市场治理机制是一个中国目前必须要大力研究的领域, 它在探索中国未来

的国家与社会在经济生活中的关系时十分重要。中国过去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或者是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全面禁止某些经济行为,或者是这种禁止一旦放松,无数的企业便会在没有任何协调的状态下一拥而上,马上将市场上的局面变成过度竞争。德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利用卡特尔来应对企业之间的过度竞争。而日本在20世纪初面临与中国相似的局面时,依靠的是政府支持下的产业行会。这些做法是通过竞争中的合作,而不是一味的自杀性恶性竞争来解决市场中的集体行动的困境(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ction)。最近,在中国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温州的产业协会在应诉国外反倾销调查时,还是中国的钢铁业在回应铁矿石价格谈判时,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协调参与者之间的利益。

政府与非市场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经济治理结构的一个关键。在西方协调市场经济中,政府一方面支持非市场治理机制,鼓励私人企业的自律性,并为这种自律提供一定的自治空间。政府也经常把这些非市场治理机制作为实施公共政策的工具。对解决市场失败的问题而言,非市场治理机制是政府进行直接管制的一个替代。另一方面在协调市场经济里,政府也必须监督非市场治理机制,以确保非市场治理机制不会侵犯公共利益。非市场治理机制经常意味着企业之间采取共同行为。如果政府不加以严密的监督,私人企业很可能利用这些机制,并以公共的名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自由市场经济一般而言有较强的反垄断传统,不允许企业之间有共同行为,特别是就价格采取共同行为。与此相反,协调市场经济一般都依靠非市场治理机制,并且政府与这些机制的关系十分紧密。但是,政府与这些机制关系紧密,决不意味着政府只是一味地维护企业的利益。这些非市场治理机制具有公器的性质,必须受政府与公共舆论的监督。

劳资关系是另外一个非市场治理机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目前中国选择的方式是,在一个高度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中,通过国家的直接立法来保护工人的权益。这已经引起资方的强烈不满,许多企业纷纷重新签订劳动合同,以便逃避有关条款的限制。这个立法的初衷显然是好的。但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还可以有其他的办法。比如,协调市场经济通常依靠工会的力量来维护雇员的利益。英美的工会以产业为单位,而日本的工会则以企业为单位。这种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一方面仍然可以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谈判的结果在各

企业之间又会有较大的差别。换言之,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的利益,又可以照顾到产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尽管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在过去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企业员工就业机会的稳定性与美国相比还是要强得多。

自主创新也离不开非市场治理机制的支撑。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时的融资渠道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美国主要依赖发行股票和债券,而日本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银行。美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强调股东对管理者的有效管理,股东的利益至上。美国上市公司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是个人。个人股东关心的是他们持有的股票价格是否上涨。在这样一种体制中,在新兴产业进行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大笔投资和与此相应的巨大风险,经常使股东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应运而生。与此相对,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主要依靠来自银行的贷款,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与美国相比更重视长期的合作。在企业技术创新时,银行显然比个人股东更加有耐心。

在改革与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学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变成显学,承担了解释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发展的使命。在西方国家,尤其在英美,主流经济学为自身设限,一味地追求数学模型,把大量重大的、与现实有关的经济题材留给了经济社会学。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则能意识到离开制度分析,西方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现实,他们很早就开始大力提倡制度经济学。这样一来,受制度经济学影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展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包括经济社会学,反而自我设限,只研究经济学剩下的一些社会题目,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配角,专注于应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释放市场力量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这决不是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不值得关注。恰恰相反,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着改革与开放的成败。与改革有关的产权问题以及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与开放有关的农民工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问题的出现本身,恰恰是由于单纯地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观点,左右了政府的决策而造成的结果。如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这些政策潜在的社会学意义给予足够的关注,很多问题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可以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过去这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新趋势。原有的学科如何应对这种新环境成为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正像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是有本土和

民族特征的文化才能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一样,在跨学科研究大行其道的时代,越是跨出原有学科的局限,以原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入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讨论在原有的学术分工中属于另一学科的问题,才越能显示出存在的意义。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生产和交换,还是消费与分配,都不是只有经济学才能研究的。经济社会学对这些问题都能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时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使我们对这个转型的理解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

在本丛书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杜克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许多帮助。特别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为本丛书第一批书出版时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提供了经费。我们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高 柏

2008年4月于美国杜克大学

参考文献

- Babb, Sarah. 2001. *Managing Mexico: 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1994. "Culture and Economy." pp. 27-57 in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edited by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47-160.
-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W.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pp. 1-38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Study*, edited by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bbin, Frank. 1994. *Forging Industry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ligstein, Neil. 2001. *The Architecture of Markets: An Economic Sociology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t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2004.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ao, Bai. 1997.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o, Bai. 2001.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o, Bai. 2004. "The State and the Associational Order of the Economy: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artels and Trade Associations in Japan, 1931 to 1945." pp. 43-73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Economy*, edited by Frank Dobbi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erber, David J. 2001. *Law and 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Protecting Prometheu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1989.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nd Davi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dberg, Leon N. and John L Campbell. 1991. "The Stat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pp. 356-395 in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edited by John L. Campbel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dberg, Leon N., John L Campbell and J Rogers Hollingsworth. 1991.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pp. 3-34 in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edited by John L. Campbel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John W. and Brian Rowe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340-363.
- Streeck, Wolfgang and Kozo Yamamura. 2003. "Introduction: Convergence or Diversity?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pp. 1-50 in *The End of Diversity? Prospects for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edited by Kozo Yamamura and Wolfgang Streec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epan, Alfred. 1978.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mitani, Mikio. 1986. "Sōron: keizaigaku kakubunya no hatt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Various Fields." pp. 111-142 in *Tōkyō daigaku kaizai gakubu gojūnenshi*, edited by Tōkyō Daigaku Kaizai Gakub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Swild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273-286.
- Thelen, Kathleen. 1999.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69-404.
- Thelen, Kathleen and Sven Steinmo. 199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p. 1-32 in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edited by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r, Margaret and Theda Skocpol. 1985.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p. 107-163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edited by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Linda. 1988. *Creating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Small Business since 1945*.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中文版序言：新发展主义与 古典发展主义的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选择博士论文的题目时,罗兹曼教授曾经建议我做—个中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我最初的论文开题报告打算比较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日本50年代初从战时的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回归。但是,当我于1989年10月去日本做论文的前期调研时,见到的几乎所有日本学者都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没有可比性。当时,我还不甘心。等到1990年7月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正式开始做论文研究,广泛地接触日文文献时,我很快地认识到日本与中国当代问题的可比性可能真的会成为我论文的一大障碍。时间的限制不容我多想,我马上对原来的设计作较大的改动,集中研究日本部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当年这一研究的成果。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中日之间的可比性已经变得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对美国与日本学术范式之间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美国的社会科学注重理论建构,围绕着几个变量就可以把看来差异性很大的两个国家放在一起分析。这种比较分析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和发展理论。日本的社会科学则更强调事实的挖掘和认定。因此,与美国相比,日本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分析要少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比还是不可比与其是说取决于被比较的对象,不如说取决于研究者比较的目的。过于注重细节就很难把两个国家进行比较,因为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有许多的不同。只有从理论出发,我们才可以找出比较的意义。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贸易总额或者外汇储备,中国都已经变成一个与日本比肩的经济大国。中国模式的成功已经是不证自明。更重要的是,尽管在发展经济,鼓励出口,以

及产业升级换代的强烈意愿方面与日本模式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是中国模式代表的新发展主义在实现发展目的的手段上与日本模式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这种情形下,将日本与中国进行比较在理论上就变得很有意义。

在这个中文版序言里,我把日本模式与中国模式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了却一桩当年没能实现的心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这种比较对我们认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的重要转型会有很大的启发。经过30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度的发展,取得了十分惊人的成绩。2007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2500美元。但是,与此同时,这个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且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这些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这对中国的未来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把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并分析这两种不同发展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对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会有很大的帮助。

简言之,中国模式代表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模式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二者对待市场的态度以及有关的制度性安排。这两种模式的产生显示一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时点对模式的特点有重要影响。从经济全球化的时空条件来看,日本模式诞生于历史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阶段以及战后初期第二次浪潮初始阶段,它侧重于限制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而中国模式则诞生于全球化第二次浪潮迅速发展阶段,它更注重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结果是中国模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表现出远远超过日本模式的活力。但是,如果这一轮全球化发生逆转,中国模式要面临比日本模式更为严峻的局面,因为日本模式就是在回应全球化逆转的挑战过程中形成的。

一、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

在西方的社会科学文献里,关于东亚发展主义的讨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20多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以日本为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如下: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产业与国内市场,不鼓励外资进入,同时积极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第二,在产业层面上以产业行会、卡特尔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治理机制来协调经济主体的生产过

程,避免过度竞争。第三,努力建立内生的创新体系,进行独立自主的研发并创立自主品牌,以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高附加值产品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第四,在培养国家竞争力时政府不是指定特定的企业去一味扶植,而是通过“寡占竞争”^[1]的机制来选择。第五,重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平衡,通过实现经济平等来扩大内需,并促进从阶级社会向民族社会的过渡。^[2]第六,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重视协调而轻视监控。单个的企业和银行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可以十分有效地进行协调,交易成本很低。但是,与此同时日本企业治理中的代理人成本特别高。由于企业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股东基本上无法监督管理者,银行也基本上无法有效地监督这个企业。第七,以牺牲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为代价追求政治稳定^[3](Gao, 1997, 2001; Gerlach, 1992; Johnson, 1982; Murakami, 1996; Tilton, 1996; Uriu, 1997)。

日本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强调生产过程的协调能力。日本模式是在战后初期和6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代表的国际金融体制,以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制下发展出来的。在这个特定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日本政府用扩张型的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用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它主管各个产业的官僚机构经常对产业实行保护性的、护送舰队式的管理,以保证私营企业顺利成长。在对待银行的投资风险方面,美国政府注重事件发生后(ex post)的处理。它向每个银行账户提供10万美元的保险,但并不对私人银行的日常事务进行干涉。与此相反,日本政府注重事件发生前(ex ante)的防范。因此,大藏省对私人银行的日常运作严加干涉。在护送船团政策下,为了减少银行业的竞争,大藏省严格控制新银行的产生。政府也一直用各种产业政策大力促进出口。通产省十分重视战略产业中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它通过竞争寡占(competitive oligopolies)的方式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扶植数个而不是一两个大企业。在中间制度的层面上,日本模式首先依靠间接金融为企业融资。美国企业靠企业在股票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进行融资,而日本企业则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在50年代的企业融资银行贷款所占比例的国际比较中,美国为5.8%,英国为4.3%,联邦德国为18.8%,意大利为12.4%。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企业银行贷款在1958—1974年期间高达68%—83.3%(两角良彦,1963)。每一个日本企业都有一个主银行为它服务。主银行指向一个企业提供最大额贷款的银行。主银行通常持有该

企业的股票,并在理论上为向该企业贷款的其他银行进行所谓的委托监督(delegated monitoring),即代替这些银行对该企业的财会健全进行监督。另外一个机制是相互持股。相互持股本来是防止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被恶意收购的企业策略。1950年,日本上市公司股东的60.3%为个人,23.7%为机构。到了1973年,个人股东的比例下降32.7%,而机构股东的比例则上升到60.4%。最后一个机制是日本各大企业集团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采取所谓的大而全的一体化投资战略(the one-set investment strategy),即在所有的新兴战略产业里全面投资以占领未来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在企业的层面上是靠终生雇佣制来维持。终生雇佣制对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将管理的优先目标从为股东获得更多的利润转向公司全体成员的生存。总体而言,日本模式的协调功能特别强,而监控功能特别弱(Gao, 2004)。

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

我把中国发展模式称为新发展主义。这个新发展主义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相比更为大胆地引进市场力量。它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大胆地吸引外资。自从199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外资吸入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吸引了5600多亿美元的外资。在2003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就已经与日本在整个战后期间吸引的外资存量相差无几。第二,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进口国,而日本只是第六大进口国。第三,中国经济中没有像日本那样多的非市场治理形式。虽然计划经济的惯性导致的行政干预仍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但是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最重要的治理机制。第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大规模的国际生产分工。建立自主创新机制直到最近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侧重点。第五,中国经济中过度竞争的现象比日本还要严重,企业之间经常进行不惜代价的竞争。与此同时,在个别产业,垄断现象又十分严重。第六,中国在企业治理的层面上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尽管各自的制度性安排不同,但是在重视协调轻视监控这一点上很相像。第七,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相比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为了追求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经常敢于冒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中国新发展主义运作的方式与日本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我把

中国模式依赖的国际经济秩序称为“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高柏,2004a)。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大的两个特征是固定汇率和初期的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的汇率一直是固定的。中国官方的说法虽然把它称之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种说法却与国际上通用的说法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说法中浮动汇率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本身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变动的事实。而国际上通用的浮动汇率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汇率的形成机制,浮动汇率指的是由市场需求直接决定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价值。从国际上通用的这一概念来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当年日本面临的很相似。至今为止,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短期资本仍然无法合法地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一点也与日本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情形相似。在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积极地吸引外资,靠外资来带动出口,并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与日本在经济高度增长期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带动经济增长。这一点在中国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十分明显。另外一个中国特色是,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在进行投资方面进行激烈的竞争。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大胆地引进市场的力量,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的社会不稳定的容忍度比日本要大得多。像大规模企业职工下岗这种事在日本是很难想象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的企业始终没有大量解雇工人,它宁可在经济升级换代方面十分缓慢。中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大不一样的另外一点是参加国际分工的基础。中国参加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全球分工,积极进行加工贸易。中国的加工贸易经常占中国贸易总额的5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是在给外国企业加工零部件,或者进口他们生产的零部件进行组装。中国在这样一种国际分工中承担的是劳动力密集部分的生产。这与日本模式注重依靠内生的创新机制,发展独立的品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在企业治理的问题上,中国与日本倒是有相似的地方。尤其在国有企业里监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结果是三角债发展得很厉害。中国和日本也一样有所谓“过度竞争”的问题。过度竞争在日本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和企业的关系特别紧密,在中国则既涉及产权的问题,也涉及政府的政策问题。比方说,在90年代初期我们有所谓的“安定团结贷款”。为了预防国有企业出事儿,经常提供贷款以保证这些企业能够继续生存,而不管这些企业的财政是否健全。中国新发展

主义的结果是一个世界工厂的出现。

三、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的新发展主义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各有利弊。在资本形成方面,日本模式完全依靠内生的资本;而中国模式基本上是内生和外来并取。外资在中国的资本形成方面在2004年大概占17%左右(Huang, 2003:7);而在日本,外资在资本形成方面所占比例连1%都不到,它主要依靠本国的金融体制,把国内的储蓄有效地转化成产业资本,进行投资来发展经济;中国的金融体制则比较脆弱,虽然连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积累大量的财富,却不能有效地转化成产业资本,而必须要依赖外资来进行投资。

在对待国际市场的态度以及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上,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承担劳动密集部分的生产。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而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究发明的技术。在贸易和GDP的比例方面,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中国在2004年已经达到70%以上。中国模式中GDP的增长严重地依赖对外贸易。在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上,中国与日本都是高低并存。日本作为自然资源极度缺乏的国家,对外部的资源依赖性很大。但是与此同时,日本对资源的利用与中国相比却更为有效。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行节省能源的政策。日本今天在能源利用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据统计,在2004年,中国大概创造了相当于世界GDP总值的6%,但却使用了当年世界钢铁与水泥产量的1/3。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在重大外部条件变化下的抗风险能力很不相同。日本模式的抗风险能力比中国要高很多。这里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有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即使是在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的出口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日本仍然能够依靠自己的品牌,在世界上占据着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经历了十数载的低迷,在21世纪初日本仍然能够依靠制造超薄的大屏幕高分辨率电视、电气混合汽车以及数码相机,彻底战胜了这一次发达工业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挑战。虽然德国在过去也是一个工匠国家,其制造业十分强大,但在这次转型中德国人却没有顶住,开始向东欧大量外包它的生产过程。

日本至今既能保持自己技术创新的能力,又能依靠把大部分的生产过程留在国内,从而支持其规模经济效益(后藤,2005)。反过来看中国,靠廉价劳动力支持的比较优势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条件下很快就会消失。

两种不同的模式导致的经济后果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可以从外资在一国经济中的地位看得很清楚。

与日本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优势是什么呢?从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来,中国实行了大胆的外资自由化。其结果是外资在中国有了一个十分迅速的发展。这个势头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更为明显。与外资的发展相对应,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十分迅速。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57%都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GDP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在2004年已达72%。这些事实显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是依靠外资推动的外贸增长来支持的。

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将中国经济变成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经济。这反映在中国的贸易GDP依存度在2004年高达72%,而日本在2002年却只有18.9%。仅就进口而言,2002年日本的进口GDP依存度只有8.9%,而中国则有33.8%,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比日本经济开放得多。同时,虽然在2004年中国是排在日本之后的第四大出口国,却同时是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进口国。而日本只排在第六。这也表明,日本经济的运行是依靠其巨大的内需支持。而中国的内需刺激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则比日本要小得多。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刚刚完成的一个大型调查,无论是对研究外资的专家而言,还是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都是在2005—2006年期间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并且中国作为第一名要高出第二名至少20个百分点以上。这表明中国模式在积极吸引外资、利用外资、促进生产要素与外国资本相结合方面做得相当成功。更多的外资要来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将继续存在。

即使从产业升级换代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开放性也有十分明显的优势。联合国贸发会议2005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跨国公司选择研发全球化的第三首选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关于未来的投资场所的调查表明,61.8%的跨国公司 will 把中国作为研发全球化的首选地。中国将超过美国和英国。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又经过良

好训练的工程师从事研发工作；第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跨国公司的研发全球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已经在本国市场研发出来的产品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进行调整。这部分的研究只能到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市场来做。现在已经有近700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研发部门。

在全球化的大趋向中，生产的全球化早已经深入进行，而研发的全球化也已经开始。同时另一大趋势是物流的全球化，即全球采购。从2002年起，以上海为首，中国大概已有十几个城市制定了建立全球采购物流中心城市的大型规划。目前中国在全球跨国公司采购总额里只占不到1%，很多专家认为既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中的份额至少要占5%。换言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还有更大的潜力。

以上这些事实表明，与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体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地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模式的软肋主要体现在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和对创造出来的财富的分配方面。以2003年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占有率有统治地位。中国汽车的自有品牌在本国市场的占有率还很低。中国模式的另一大弱点是财富的分配。由于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基础是生产要素，即廉价劳动力，而跨国公司则拥有品牌的知识产权，所以他们拿走利润的大部分。据统计，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资本大概占中国的资本总额的30%。他们以30%的资本却占有了50%的股份，并拿走了70%的利润（高辉清，2005）。如下面显示的那样，中国商业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指出，自从1992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出现一个严重的差距，国内生产总值包括所有在中国境内进行的生产活动的价值，包括跨国公司，包括中国公司，而国民收入却只包括中国公司。这意味着在90年代中，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发展成果的很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给拿走了，因为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

四、产生古典发展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全球化时空条件

从国际因素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化对中国代表的新发展主义和日

本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西方文献通常认为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发生在1870年到1913年。它于1914年金本位垮台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开始逆转。从此以后一路下走,中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和英国意识到,如果没有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就无法促进经济发展。在他们的主导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诞生。在以这两个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保障下,全球GDP和全球贸易量的比例开始上升。到了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浮动汇率并开始实现金融自由化,使资本可以大举跨国流动,对外投资迅速增加(高柏,2004)。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期形成的古典发展主义是一种在全球化第一次浪潮发生逆转时以及在第二次浪潮刚刚兴起时出现的。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新发展主义则是在全球化第二次大潮迅速发展时期形成的。

这两种时空条件的区别对两种不同模式的形成有极为重大的影响。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面临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30年代至60年代的日本流行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总体战争理论、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思想、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论(Gao, 1997)。这些社会科学理论变得十分流行,这一事实反应的是在全球化大潮发生逆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困境的条件下,人们对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持有的普遍怀疑。而到了70年代末期,适应全球化迅速上升期释放市场力量的需要,强调资源配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显学,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变成有极大影响力的主流话语(Babb, 200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理论与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衰和经济全球化的周期有着十分重要的相关性。在全球化大潮的下降期有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因此市场力量被认为是魔鬼,社会科学的理论注重的是如何约束它,而不是把它释放出来。到了战后的第二次全球化大潮的初始上升期,各国仍然处于限制市场力量的努力的惯性中,它们为此建立了种种的制度和机制。日本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反映出来的不是如何依靠市场力量和释放市场力量,而是如何依靠非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协调。而中国的新发展主义的模式产生于经济全球化大潮的迅速上升期。在这个时期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释放市场力量。因此,新古

典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要理解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区别,我们必须分析在过去的30年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发生的巨大变化。当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最终产品。在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的企业无法造出有国际竞争力的最终产品,该国则无法参与国际贸易。正像本书揭示的那样,当时日本人明确地认识到,离开国际贸易,日本经济将无法迅速增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日本人不遗余力地打造本国的创新体系。日本模式中的各种制度性安排都是为了加强在创新过程中的协调而演化出来的。到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局面已经完全不同。如今国际贸易中分工的基础已经以生产要素为主。这种分工的基础极大地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他们可以以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就可以了。这在过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导致跨国公司企业内贸易量的迅速发展。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企业内贸易,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之间的贸易,已经占了全球贸易的50%以上。正是因为有了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才可以只凭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模式形成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以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的出现是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推动力的变化连在一起的。在五六十年代,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受产品周期的影响。任何一种产品的演进过程都是有周期的,有创新能力的跨国公司在最初发展出新产品时根本不想对外投资,它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赚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但是等生产这种产品的技术到了标准化的时代,很多国家的企业就都可以生产这种产品了。技术一旦进入标准化时代就很成熟了,掌握起来很容易。这样一来,有廉价劳动力或者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的企业就可以开始生产这种产品,并对原来发明这个产品的公司形成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形下,该公司如果在外国进行投资,就地生产该产品以占据当地市场,可以防止国际竞争者的出现(Vernon, 1971)。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还有大量以攫取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依附理论产生在拉美的根本原因。当跨国公司到拉丁美洲攫取那里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也被“被动锁定”,即被锁定在一个国际分工

体系中的低附加值部分赚不了任何钱。但是到了中国模式形成的时期，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追求生产效率，分工经济和价值链成为投资的主要目的(Porter, 1998/1985)。对中国来说，通过引进外资，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在没有建成有效的内生的创新机制之前，就可以推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这就是中国模式产生的重要的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导致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很不相同的重要原因。在日本模式形成的时代，外资与外贸是互相替代的，有了外资就没有贸易。因为一旦外资进来，就地生产，就地贩卖，也就没有进行贸易的必要了。在中国模式形成的时代，二者的关系则是互相促进。因为当外资进来以后，它只是要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让你生产一个部件，或者让你组装，剩下的零部件跨国公司必须从其他国家进口，这样一来，外资就促进了国际贸易。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日本模式形成的时代，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在搞进口替代，保护国内市场。所以，日本模式中的非市场机制一点也不稀奇。在中国模式形成的过去的20年间，发展中国家则是在争相鼓励出口，实行投资自由化。自从90年代初期以来，鼓励外资的政策性变化的数目远远超过限制外资的政策性变化的数目。换言之，吸引外资是过去这十几年里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调查，在未来数年中，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对外投资的专家们，以及各国吸引外资的机构，都认为对外投资在国际上的份额要进一步增加。不仅如此，2005—2006年和2004年相比，世界上更多的政府表示要做更大的努力来吸引外资。这表明靠吸引外资来推动外贸和推动经济的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一个政策范式，大多数国家在努力争取进一步取得外资。中国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多，而且在未来也会取得不少。但是，像前面的数据显示的那样，中国模式在国内市场外资的占有率，以及外资介绍进来后创造的财富的分配方面，有严重的弱点，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五、中国新发展主义的本国历史渊源

与国际根源紧密相连，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的兴起也有着深刻的国内根

源。我曾经指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与全球化经济浪潮的起伏有极强的历史同时代性(高柏,2005)。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文革”结束为止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全球化经济浪潮的涨落,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两大主要的传统。一个是在19世纪后半期,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兴起时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对外开放的传统,另外一个则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于20世纪30年代逆转后,中国以选择社会主义来回应大萧条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失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时代为代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让我们看一下在操作层面上这两大传统有何不同。

在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一般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代表的是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开放的传统,尽管这种开放是在以列强代表的外力压迫下开始和实现的。而到了毛泽东时代,除了香港地区留下一个小小的贸易窗口与资本主义保留了十分有限的贸易之外,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面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则是基本封闭的。

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与洋务运动时代开始的趋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外国资本从洋务运动时期开始进入中国。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以后,外资进入中国“合法化”。以前也有许多外资,但是清朝在法律上从来不承认。《马关条约》正式承认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一直在不断提高。据1936年的一个统计,外资在当时中国几个重要的产业里,如航运、煤矿和铁矿石等所占的比例从66%到99%不等(Hou, 1965:128)。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开放是与当年洋务时代那个开放的传统有相似的地方。当然,必须指出,现在的外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和当年无法相比,而且中国现在是一个强盛的主权国家,这一点和20世纪3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有质的不同。但是,我们单就中国在对待外国资本的态度上而言,改革开放时代与洋务运动时代更为接近。

在对待技术的态度上,洋务运动时代讲的是买洋枪洋炮。当时所谓的现代化,尤其是军事现代化,基本上是靠买来实现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则是依靠独立自主的研发。两弹一星就是当时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创新体系开发出来的典型产品。在改革开放时代,洋品牌一直在中国市场上占主导地位。我们又似乎在向洋务运动时代的传统回归。然而,从2004年以来,尤其是从关于汽车产业自主

品牌的大辩论以来,中国现在关于自主品牌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在2005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已经明确地通过了创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基本原则。从这些事实上来看,中国政府的政策范式正在从洋务运动代表的开放传统向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重新发扬毛泽东时代自主创新传统的方向转变,自主创新将成为中国未来产业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政府对待各类企业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洋务运动时代,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地位一直高于民族资本。到了毛泽东时代,我们实行国有化,私人民族资本仍然受到歧视。官本位的理念从洋务运动时代开始一直持续下来。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受到的歧视仍然十分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国内近年来一直在讨论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和民营企业经常面临的非国民待遇。然而,正如华为、中兴以及吉利等一批企业所显示的那样,民营企业在中国恰恰经常是进行独立自主研发的重要力量。由于民营企业经常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很多选择先变成在外国注册的公司,然后再变成在中国经商的外资。

在产业政策和政府采购的关系上,在洋务运动时代,清朝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造不如买,洋枪洋炮都是买来的。到了毛泽东时代这一点彻底地发生了变化。然而,最近几大有关产业政策的辩论显示出,许多政府部门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从政府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来对待政府采购。比如,与京沪高铁相关的高速机车,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出中华之星,最后硬是被放弃不要,或是要买德国的磁悬浮,或是要买日本的新干线。这种高速机车的制造是一个能够带动几个产业同时发展的重要项目,如果换在日本或者韩国,很难想象它们的政府在本国企业能够生产的条件下非要买外国产品。“运十”是另外一个例子。当年尼克松访华时坐的波音707被中国人看见了,毛泽东下令中国也一定要搞大型商用飞机。当时中国上马的“运十”只比欧洲上马的空中客车晚两年。到1979年中国已经做出了样机并成功地六次飞到拉萨。1986年也是因为区区3000万元人民币的试验用的预算,硬是给拉下了马。当时选择与美国的麦道公司合作,因为它许诺帮助中国在20年内能够独立制造自我品牌。时至今日,中国只能给人家作极为有限的零部件,同时要花大量的外汇去买外国产品。这种事情在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古典发展主义模式中根本不会有出现的可能。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的新发展主义模式中有不少类似洋务运动传统的

因素在发挥影响。然而,洋务运动代表的开放传统决不是一无是处的。我们在讨论建立自主创新体系的时候要避免将它变成一种泛道德论的说教。中国的新发展主义固然有它自己的缺点,但它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力引进外资带来了工作机会与生产技术;参与全球生产体系将中国的利益与其他大国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减少了对抗的风险;它使中国得以在没有完善的经济制度之前,就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优异成绩。我们在讨论这两个传统时不应该简单地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去看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传统固然经常会发生碰撞,甚至激烈的冲突,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个方向不同的传统也为中华民族应对全球化潮涨潮落的大变局作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性准备。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条件下,一个多样性的社会永远比一个单一性社会更有生存能力。

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日本经验

中国拥有两大不同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优势。美国的组织生态学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有太强的同质性,这个社会适应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能力必然很低。这是因为,同质性的组织集群有较高的密度。在给定的外部资源条件下,密度越高,同质组织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在竞争中生存的可能性越小。同理,如果一个社会有大量的彼此之间异质的组织存在,它们都有自己独领风骚的密度较小的组织生态,这个社会就会有较大的活力。方向相反的传统的存在为中国应对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变化提供了有力的内生意识形态和制度方面的资源。这一点从中国在过去的30年的历史中显示得很清楚。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把洋务运动代表的对外开放传统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发扬光大。在国内近几年里新自由主义似乎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词汇。许多人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果提出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那就变成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殊不知,西方人认为,1978年底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才是世界上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先驱,它既早于1979年5月上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采用的限制工会力量,摆脱长期滞胀局面的新政策,也早于1979年7月保罗·沃克尔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后采用的反通货膨

胀的新金融政策,更早于1980年罗纳德·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采用的规制缓和以及金融自由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标志性政策(Harvey, 2005:1)。这些事实显示,当时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认识到,全球化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国如果不进行积极的变革就要落后。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从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回摆时,都会支持新自由主义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基本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重新评价洋务运动,使这个传统作为民族振兴的一种遗产为完成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服务。中国共产党在70年代末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释放市场力量,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就无法率领中国人民在全球化的上升期领世界风气之先,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

在最近这次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时,中国又一次成为这一世界新潮流的领导者。从2003年起,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建立和谐社会,实现自主创新的口号,并把它作为中国政府新的政策范式。反观世界上其他国家,美国虽然在2004年开始有人从理论上质疑全球化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Samuelson, 2004),但是直到2008年反省自由贸易才成为总统大选的主要政治议题。日本直到2007年小泉纯一郎下台才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负面效果。而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在政策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采取许多积极措施,在医疗、教育、“三农”、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加强保护社会,在回应这个全球化新潮流方面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的转型中,日本经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日本战后发展模式代表的理性的社会建构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扬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大卫·李嘉图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比较优势理论,确立了以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竞争优势理念。正像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发表之前,日本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就已经在实践有关的财政政策一样,日本的产业政策从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的建立国家竞争优势的实践,远远早于80年代迈克尔·波特有关理论的发表。从日本理性的深层结构来看,战后产业政策代表的经济理念抛弃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自马歇尔以来所重视的资源配置的效率 and 规模经济,而追求亚当·斯密最初主张的经济组织的效率和分工与专业化经济(高柏,2007)。

首先,由于日本重视技术创新,很早就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过渡,日本必须

要发展出能够支持创新的内生制度体系。企业的融资必须打破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因为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支持创新经常是风险很高的行为,它既不符合股东的利益,也不符合银行的利益。正是由于日本建立了企业集团,并确立了主银行与企业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同时又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银行之间的相互持股等种种制度性安排,日本的企业才得以获得稳定的源源不断的支持创新的资金。

其次,为了支持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质量,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把分配制度、就业制度与创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实行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型工资对企业而言极不合算,因为只有随着经济状况调节雇佣政策对企业最有利。然而,如果技术创新的后果就意味着失业,日本的工会根本不会全心全意支持企业的创新。经济学家中山伊智郎为日本生产率本部提出的生产率运动三原则较好地解决了创新与分配的矛盾。这是日本在战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保护社会的政策范式下为提高经济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合作的效率发明的最天才的制度性安排。

在以上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在过去30年的实践是对日本经济发展模式体现的经济理念的扬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追求的是较为彻底的资源配置效率的原则。与日本模式比较,中国模式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微观的制度层面,外资与合资企业依靠国外合作方提供一系列有关的制度性支持。而众多的本土企业则缺乏创新体制,也没有创新意识和手段,经常是单纯地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同时单纯地依靠压低产品价格进行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并不是完全没有创新。像奇瑞、华为、中兴以及阿里巴巴等少数企业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代表。而另外的中国企业也能够通过对国外产品进行局部的模仿改造,并通过加强零部件的通用性来提高规模经济(藤本新宅,2006)。然而,由于一个内生的创新体系的支持,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创新还远远无法支持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的创立。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帮助。

同时,日本模式中通过改变饼的切法而把饼做大的智慧,对于中国目前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范式的努力有极大的启发。不注意解决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不大幅度增加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国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而不实现这个转变,中国在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

或者全球化出现逆转的情况下,就会遇到重大的危机。

注释

- [1] “寡占”和“垄断”在英文里是意义相对的两个词汇。垄断意味着在一个产品市场里只有一家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寡占则指在一个产品市场里有几家大企业进行实力相近的竞争。
- [2] 战后初期,日本的劳资矛盾特别激烈,工人运动经常导致大规模的罢工。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全力解决劳资的冲突问题。到了60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已经确立了所谓的日本企业管理的“三大法宝”,即终生雇工制、年工序列型工资,以及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这些制度性安排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 [3] 日本虽然在汽车和家电等产业特别有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保留着效率极低但能维持大量就业的产业部门。在日本的城市里有很多所谓的家庭企业,他们维持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与美国不同,日本的经济结构不是以旧代新,而是纳新蓄旧,以图保证就业。

高 柏

2008年3月于美国杜克大学

参考文献

- 高柏,2004a,《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战略与管理》第1期。
- ,2004b,《日本的经济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5,《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社会学研究》第4期。
- 高辉清,2005,《警惕外资带来的虚假繁荣》,《亚洲周刊》10月6日。
- 后藤康浩,2005,《日本的制造业:它的实力和可能性》, *United Leader's Review*. 9至11月季刊。
- 贾永轩、常春,2001,《跨国汽车公司逐鹿中国汽车市场》,《汽车工业研究》第12期, <http://www. sovey. com/webrefer/kg. htm>
- 姜铎,2004/1997,《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原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李瀛,2004,《丰田能超过大众通用么?》,《北京现代商报》, <http://www. bjbusiness. com. cn/20040323/car3378. htm>
-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5,世界投资报告2005:跨国公司与研发国际化。
- 两角良彦,1963,《产业统制论——通产省的一视点》,两角良彦等,《产业体制再编成》,东京:春秋社。
- 王志乐编,2005,《2005 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周刊钻石,1984a,《日本经济中外资企业所占地位》,《在日外资企业读本》专刊。
- 周刊钻石,1984b,《在日外资收益状况》,《在日外资企业读本》专刊。
- Babb, Sarah 2001, *Managing Mexico: Economists From Nationalism to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ao, Bai 1997, *Economic Ideology and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Developmentalism from 1931 to 1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lach, Michael 1992, *Allied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u, Chi-ming 1965,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ang, Yasheng 2003,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akami, Yasusuke 1996, *An Anti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A Vision for A New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r, Michael 1998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Tilton, Mark 1996, *Restricted Trade: Cartels in Japan's Basic Materials Indus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UNCTAD 2005a,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R & D*. <http://www.unctad.org>.

—2005b. *FDI Prospects: 2005—2008* <http://www.unctad.org>

Uriu, Robert 1997, *Troubled Industries: Confronting Economic Change in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ernon, Raymond 1971,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World Bank Group.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4*. <http://www.worldbank.org>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WTO World Trade 2003*. <http://www.wto.org>

鸣 谢

在我写作本书的六年中,很多人给过我鼓励、忠告和支持。其中,我最为感激的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论文指导小组的四位导师,他们是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以及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这几位老师不仅从各个方面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还在我论文写作的不同阶段向我伸出援手。在我选择本书这一主题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后,马里乌斯·詹森立刻就意识到它对日本研究领域的潜在价值。此后,他不断在精神上给我以鼓励,在学术上给我以支持。自我1987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起,吉尔伯特·罗兹曼就一直在激发我的研究兴趣。他对国际研究有丰富经验,他所给出的建议不仅使我在思考问题时少走了弯路,而且使我把重点放在了收集第一手资料上。后来证明,这种做法十分有益,它一方面让我逐渐熟悉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实证材料。马里乌斯·詹森和吉尔伯特·罗兹曼还帮助我争取到研究资助,使这一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在我构思博士论文的分析框架时,弗兰克·道宾引领我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他给我开列的书目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同时,他还不断指点我,提高我的分析技巧。在我的博士论文进入关键阶段时,保罗·迪马吉奥来到普林斯顿大学,他凭借个人深厚的专业素养,不仅帮助我区分了几个重要概念,还从将来正式出版的角度对我的论文架构提出了建议。罗兹曼和迪马吉奥也都从编辑角度给我提出了详尽意见。1992年秋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为谢尔顿·加容(Sheldon Garon)做助教的经历,也使我有机会更多地学习当代日本的历史。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梅格·麦基恩(Meg McKean)、约翰·迈耶(John Meyer)、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山村耕造(Kozo Yamamura)和维维安·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分别读过我反复修改的各版手稿,有的还为书稿写过评论。我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良多。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四位匿名评审人,其中两位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两位是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我感谢他们颇有助益的建议。

任何实地考察工作,尤其是在外国进行实地考察,没有该国学者和友人的帮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此我要感谢东京经济大学的竹前荣治(Takemae Eiji)和东京大学的原田纯孝(Harada Sumitaka),感谢他们在我客居日本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作为我的导师给我的慷慨支持。我还要感谢横滨国立大学的天川晃(Amakawa Akira)和一桥大学的中村正则(Nakamura Masanori),他们在我一边进行一项关于日本反垄断政策的研究一边对本稿进行修订的时候曾给予我帮助。我还要向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横滨国立大学国际商务与法学院以及一桥大学经济学系的教职员们致谢。我在这些机构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他们为我提供了研究上的支持和使用图书馆的便利。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光田明正(Mitsuda Akimasa)、大藏省的坂井健(Sakai Ken)、产经新闻华盛顿分局(the Washington Bureau of Sankei Shinbun)的汤浅博(Yuasa Hiroshi)以及东京经济大学的华东明(Hua Dongming)专门为我安排了几次与日本学者及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的见面机会。经济企划厅的吉川淳(Yoshikawa Jun)和小盐隆士(Oshio Takashi)为我提供了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的资料。大来佐武郎(Ōkita Saburō),本书的一位研究对象,不仅拨冗接受我的采访,还帮助我从其他地方获得资料,并把我引荐给其他学者。花时间与我交谈并就日本政治经济提出各种洞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我对日本的理解的人士还有:东京大学的原朗(Hara Akira)、井出嘉宪(Ide Yoshinori)、冈崎哲二(Okazaki Tetsuji)以及馆龙一郎(Tachi Ryūichir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金森久雄(Kanamori Hisao);横滨国立大学的天川晃(Amakawa Akira)、来生新(Kisugi Shin)以及宫崎义一(Miyazaki Yoshikazu),还有东京经济大学的富塚文太郎(Tomizuka Fumitarō)。昭和研究会的前职员酒井三郎(Sakai Saburō)对该研究会的活动以及该会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信息。日本兴业银行的阿部恭子(Abe Kyōko)提供了关于下村治(Shimomura Osamu)的资料。另外,从与伊藤俊三(Itō Yoshizō)每周一次、持续达一年的讨论中,我获得了关于日本政治与经济

的许多真知灼见。伊藤俊三曾在日本最重要的政府经济部门中任职。在对文稿进行最后修订时,我与中村正则的频繁讨论使我获益良多。中村正则是对当代日本经济体制的起源进行论战的主要人物。当然,所有这些人士都不必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负责。

xi

本书初稿的某些部分已经提交给以下学术会议或学术单位:日本战后占领史学会大会、1995年社会科学史学会芝加哥年会、1995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美国社会学学会年会、横滨国立大学国际商业与法律学院、东京经济大学、横滨战后占领史研究学会、杜克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京都日本研究国际会议、1994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洛杉矶年会、1994年夏威夷中西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的中国学者年会、1994年波士顿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普林斯顿大学区域研究会议、1991年日本国际东方学会议年会以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研究学会。我感谢与会者的评议。

本书还从以下机构获得了资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提供了1987—1990年连续三年的大学研究员资金;1990年7月到1991年8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提供了博士论文研究资金;1991—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研究学会提供了两年奖学金。1989年末,我前往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前期研究,这项研究是由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和区域研究委员会提供的资助。我还得到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和艺术与科学委员会提供的一笔研究经费。这些经费虽然为数不多,但也部分负担了我修订本书的费用。最后,我衷心感谢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事们,尤其是系主任肯尼思·兰德(Kenneth Land),在我进入杜克大学的第一学年,他减少了我的教学工作量,使我有时间完成本书。

我还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部的编辑伊丽莎白·尼尔(Elizabeth Neal),在我写作本书期间,她给我以支持和信心,版面编辑海伦·格林伯格(Helen Greenberg)也对我的思想表述多有改善。最后,我要感谢制作编辑路易斯·卡拉布罗(Louise Calabro),她使整个出版过程非常顺畅,拉尔夫·艾伦(Raphael Allen)和丹娜·泽勒(Danna Zeller)也对我的博士论文手稿的前两章进行了编辑加工,她们的友谊让我对普林斯顿的生活充满了温暖的回忆。

xii

我也非常感谢日本研究学会,他们慨允我使用我发表在《日本研究学报》(*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第20卷第1期(1994年冬)第115—153页上的文

章《有泽广巳及其经济管理理论》(*Arisawa Hiromi and His Theory for a Managed Economy*)。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杨红秋,她本人也是一名社会学家,她一直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并总是给我提出一针见血的批评。另外,在我的学术生涯里,她给我的精神支持一直是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克服所有困难的主要动力。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本书是我们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一起生活期间那些幸福日子的一个产物。在本书最后定稿时,我的儿子迈克尔参与了竞争,他想先于本书问世,最后他赢了。本书最后一稿完成时,他已经满月了。

作者简介

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著作《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于20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在纽约出版，并荣获1998年度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有泽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奖。

目 录

缩略语表	/ 1	vii
日本人名用法注释	/ 1	
第 1 章 导论	/ 1	
第 2 章 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 15	
第 3 章 管制经济	/ 54	
第 4 章 优先生产	/ 96	
第 5 章 促进出口	/ 138	
第 6 章 高增长与自由化	/ 178	
第 7 章 经济理性的制度环境	/ 220	
跋:历史视角中的日本发展主义	/ 235	
英文参考文献	/ 242	
日文参考文献	/ 256	
索引	/ 284	
译后记	/ 301	

第 1 章 导 论

改变现代历史进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半个世纪了。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之际,日本人反复提出并试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现在的生活?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Noguchi Yukio, 1995)这样写道:“对日本经济而言,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他认为,即使在 50 年后的今天,日本经济不论是制度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仍在按“1940 年体制”运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体制对战前日本经济而言是一个异质(*ishitsu*)的怪胎。这一体制过分强调生产排斥竞争,导致了一种“制度耗竭”,而这正是使日本经济动荡的“日本病”的一个主要症状。但资深官员榊原英资(Sakakibara Eisuke, 1995)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不应把当今的日本资本主义视作一个怪胎,而应将其视为与欧洲资本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比肩的模式,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的大变革中演化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三种独特模式之一。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所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并非唯一地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主义全都超越了自由放任阶段,进入了国家干预的新时代。这一过程产生了法国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美国的新政。这些国家当今的经济制度仍然反映着发生于数十年前的这场变革。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消费者主权”或“完全竞争”来把日本资本主义说成是一个异质的怪胎,而应该从比较的视角来研究这一历史性的变革。

1

野口悠纪雄与榊原英资所言都有一定的道理。的确,起源于 1931—1945 年并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现在正在窒息着日本经济,而不是为它提供支撑。尽管在冷战期间人们有意不承认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差异,但与此同时,日本战时的遗产使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走上了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发

2

展道路,成了能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模式,也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未解答的问题:1931—1945年日本的经济体制在制度与意识形态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战时的遗产为什么在战后会被继承?在谈到战后与战时的连续性时,应该如何认识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盟军占领当局导入的民主改革的影响,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换言之,当今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是简单地从战时继承下来的呢,还是在战后吸收了一些新的因素?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吸收的这些新因素是什么?

本书将直接讨论这些问题,并描绘出从大萧条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日本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关于一个后发展国家如何创造财富的一套独特的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产生的过程,并讨论其在战后的演变。本书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视角来论证,在这些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指导下,1931—1945年间政府的政策创新与日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如何使日本资本主义大大地偏离了1930年前的模式(本书第三章将讨论1931—1945年间发生的变化为什么可以视为大大偏离了1930年之前的模式)。此外,本书还将论及:很多战时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在经历战后民主改革后被保存下来并得到加强,用来应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济危机;这些意识形态与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冷战时期的形势及50年代全球性的技术革命,并在60年代贸易与资本投资的自由化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有三个重要因素使得日本战时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在战后时期得以延续。首先,作为一个严重依赖贸易的国家,要以一个民族国家的姿态对世界体系的变化作出反应,日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当日本感觉到有外在的威胁(如冷战和贸易与资本投资的自由化)时,便会重新使用战时全国动员的做法,只是使用的目的不同。其次,从1931—1965年的这段时间内,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这些运动增强了以集体生存为目标的政策的合法性,而压低了个体的价值。意识形态不仅影响了公众对各种经济思想的判断,也改变了经济学家们对形势的看法。结果,在“民族利益”的号召下采取的很多做法造成和强化了当今日本经济体制中的问题。第三,政府以及政府—商界关系中的既得利益往往限制了在产业政策上可以采取的手段。尽管某些新的经济思想改变了政治行为主体认识自身利益和制定战略的方式,但仅靠这些政治行为主体并不能决定政策选择,经济思想必须在政

界与商界精英的支持下才能增强自己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力。

日本式资本主义跟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有何不同以及其差异的根源何在,是日本研究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此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认真过。在苏联与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解体之前,西方集团一直承受着在意识形态方面保持团结的巨大压力。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93:54)曾说:“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只有一个上帝,他就住在美国,尽管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德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前景看好的国家教会*。”由于这一原因,日本研究长期都是一个边缘化学科,被认为与美国的经济、政治与学术的主流无关。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的经济势力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扩张,日本研究突然“变得不再无关紧要”(Steinhoff, 1993),这对西方的社会科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即便如此,集中于对日本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差异的研究,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或妖魔化日本的研究。按约翰逊(Johnson, 1988)的说法,到了8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理论的主要流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能对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就作出合理的解释,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一场“理论危机”。在论及这一危机的严重性时,艾伦·布林德写道:“总而言之,靠吮吸西方经济学的乳汁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几乎每一件事都做错了。这样不断出错,按理说应该让日本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日本经济的发展却似乎装上了永动机。那么,日本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美国式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始于亚当·斯密的一个宏大理论的基础上的,而日本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一个与此相当的理论。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理论,以能制定出明智的对日经济政策。日本人自己更关心结果而非概念阐释,所以我们也许得自己来建立这样的理论”(Alan Blinder, 1990:21)。

然而,此后世界上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惊人巨变,动摇和分裂了学术界试图建立严肃的日本式资本主义理论的努力。面对这些巨变,有的人认为建立这种理论的任务不那么重要了。首先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即苏联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解体,弗朗西斯·福山在预测这一巨变对我们未来的影响时说道:

* 国家教会:在这里是比喻具有本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译者注

西方自由民主制最终的胜利凯旋在其终结处似乎又回到了一个循环的出发点。……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并非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过去,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也即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作为人类发展的最终形式被普遍接受(Francis Fukuyama, 1989:3-4)。

福山的观点想要说的是:在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更遑论日本式资本主义)均已退出历史舞台之际,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堪与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相抗衡的意识形态。

其次,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停滞,日本那似乎所向披靡的竞争力突然下滑了。在一些战略性产业,尤其是汽车、计算机与软件业,很多日本公司失去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而美国公司则东山再起。此外,日本曾受到广泛称赞的终身雇佣制与年资薪金制也出了问题;面对经济萧条的压力,很多声望卓著的日本公司开始解雇职员。西方对此作出的反应差不多可以用一片欢呼来形容。英国著名的商业刊物《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1994)出版了一期题为“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增刊,其中有文章说道:“日本采用的做法与制度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才会获得成功,但这些做法与制度有很多生来就是过时的。”该刊宣称:成功已经使日本的体制过时了,这一点即使是曾经宣扬这一体制的人也是这样看的;日本正在向西方的体制趋同。

然而,实际情况比福山与《经济学家》说的要更为严峻。相比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在关于“经济体制应该如何运行”这个问题上,各国的制度化了的理念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有可能威胁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和谐。实际上,不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制度上,资本主义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是铁板一块。“由于它们共同的敌人已成为历史,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就其各自的体制孰优孰劣发生摩擦”(Neff, 1993)。比较资本主义正在取代比较社会主义,这已成为冷战后时代学术研究的首要课题。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官员出于各种政治上的考虑,在理论问题上一般都尽量避免卷入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但在90年代,政府官员变得非常敢言,竭力捍卫日本经济制度的合法性。榊原英资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统治世界的新古典或新美国的资本主义观,似乎已过了它的鼎盛期。……后社会主义时代也可能会成为

一个后自由放任的时代”(Eisuke Sakakibara, 1993:v)。这种态度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按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他的三位顾问的说法,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再也不能被称为是普世性的了,因为基于市场经济但又允许政府积极干预的发展主义正在东亚扩展开来。这两种市场经济之间能否达成妥协,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态(Nakasone, Murakami, Satō and Nishibe, 1992:168)。有论者提出,由于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各国的资本主义的确有所不同,而且将来也仍会如此。既然如此,各国“必须在某些方面相互包容。在有的情况下,这种包容可能会采取对自由放任原则加以修正的形式”(Sakakibara, 1993:vi)。戴维·威廉斯断言,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当日本及东亚相当多的国家被迫遵从这一新的共识之时,历史才有可能终结。在此情形出现之前,无论东欧发生什么,世界都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终结”(David Williams, 1994:xiv)。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93)警告道:在冷战后时代,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主要是文化上的原因,因为不同的文明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制度化的信念与价值体系不会轻易消失。随着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交往的增多,人们的文化意识将会加强;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文明的碰撞”。

6

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了很多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进一步突出了由经济意识形态的差异带来的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在刚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苏联与东欧国家都奉行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试图用休克疗法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休克疗法没能实现其目标,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发现,日本管制经济的经验非常可贵。另外,许多东亚新兴国家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都将日本的发展战略视为当代经济成功的秘诀。更有甚者,《商业周刊》(1994年专刊:32)在一篇题为《21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产业如何在新兴全球经济中竞争》的特别报道中称:

遍布东欧和东南亚国家的日本人,如各省大臣、智囊团成员和大学教师,都在向当地渴望得到指点的政府官员兜售日本经济模式。尚未受到西方媒体注意的这种传教工作做得很大,而且在今后几年里,会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这种暗中劝说的结果是:许多国家至少会吸取日本产业政策上的某些教训,比如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及对出口的重视等。其结果将是:世界或许不会全盘接受极端信奉市场而不是政府

干预的新古典美国式资本主义。

7 在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国际经济中,日本式资本主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许多国家进行效仿,所以,日本产业政策和商业战略的理论基础确实值得认真研究。这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课题,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仅仅因为我们不喜欢,就故意忽略其间的差异,只能使我们放弃认真的努力,从而无法为未来的国际经济构建一个更好的框架。用意识形态上的主张来替换对现实的客观分析是这种努力的主要障碍。

本书致力于从以下几方面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已有文献作出贡献。

第一,转变日本产业政策分析的重心。重心将从传统的以政治势力为中心,即从关注谁赢得政策制定的斗争的结构性分析,转变到注重产业政策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治理结构的制度性分析。

自从查默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提出了发展导向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理论之后,许多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研究将政府政策是否受到私营部门的影响或抵制作为研究重点。讨论中,二分法的焦点,即政府、非市场治理结构和市场的关系,一直集中在政府与其他二者的关系上,但是,私营部门究竟是代表非市场治理结构或市场本身,则常常不甚清楚。这些研究固然加深了我们对私营部门在政策制定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理解,然而,正如戴维·威廉斯(David Williams, 1994:194)所指出的那样,发展导向国家是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一种宏观理论。这一理论部分基于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对比。因此,专注于日本决策圈内部冲突的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不能替代在国家层面上对日本资本主义与其西方同伴之间制度性差异的讨论。

8 在本书中,我将政府—市场两分法的分析重点从国家转向市场。我认为发展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如何受到私营部门的钳制,而在于市场是如何通过政府与非市场治理结构而组织起来的。随着经济的增长,私营部门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又经常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消除外国公司与日本市场间的壁垒,在很多情况下,非市场管理组织已经直接替代了行政管制(bureaucratic control)。但是,从历史上看,非市场组织主要是通过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实践发展起来的。治理结构涉及一种

机制,即相互依赖的经济行为人为了组织自己的交易,为了解决使经济活动能够继续下去而产生的问题所采用的机制。在这一社会关系组合中,市场只是一种治理结构,其重要性按照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不同而不同。责任义务网、等级制、监测与推销网络,以及贸易交往都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Lindberg, Campbell and Hollingsworth, 1991:5-6)。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这些机制构成了“社会规制的庞大领域,可以调节和塑造微观经济选择的社会安排……[以及]包括嵌入在宏大的社会结构中的所有个体经济行为方式”(Block, 1990:42)。另外,政府在发展非市场治理结构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按照列昂·N. 林德伯格和约翰·L. 坎贝尔(Leon N. Lindberg and John L. Campbell, 1991)的说法,政府不仅仅通过对资源配置的直接管制来影响经济管理,而且还通过设立经济活动的规则,通过推进更为成熟和更为规范的治理结构的发展,来限定组织形式的范围,以达成经济发展目标。正如阿尔弗雷德·斯特潘所说,政府不仅试图“构建在一个国家内市民社会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而且试图构建市民社会中许多重要的关系”(Alfred Stepan, 1978:xii)。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我要进一步指出,非市场治理结构的发展直接产生于产业政策的政治。政府常常试图通过行政管制来限制市场力量,私营部门则费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非市场治理结构作为一种政治妥协的产物而非常流行,它不仅帮助私营部门抵制直接的行政管制,而且也帮助政府为达成政策目标而限制市场力量。我在本书中重点讨论的是私营部门与政府在日本经济治理结构的制度化演变中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在政策制定中谁战胜谁的问题。私营部门确实常常与政府发生冲突,但并不总是抵制组织市场的理念。私营部门关心的是能否由它本身来组建市场,以及什么样的体制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发展政治学中,关于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冲突,需要讨论的常常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组织市场,而不是是否应该组织市场。

第二,本书重点强调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在日本经济体制的制度化演变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思想和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

思想和意识形态在当代政治学中极为重要,按照彼得·霍尔(Peter Hall, 1989:383)的说法,政策制定离不开流行的思想观念的影响:

这里面包括对社会性质与经济性质的集体共有概念,关于政府的适

当的角色、若干共同的政治理想以及已往政策经验的集体记忆。所有这些理念集中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这种政治话语提供了在政治舞台上描述政策的语言,以及对政策进行评判的条件。

虽然思想和意识形态并非驱动现代政治的唯一力量,但是,“有关利益与政策之间的因果关联的信念起码与利益本身的性质是同样重要的”(Goldstein, 1993:237)。因此,思想和意识形态对政府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阿图尔·科里(Atul Kohli, 1994)指出,迄今为止,对发展导向国家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一个政府落实其政策目标的能力上,而不是集中在这些政策目标的来源上。阿图尔·科里相信,未来关于发展导向国家的研究显然会集中在“发展目标如何成了优先考虑的政治”上。我认真地应用这一观点,将经济观念放在日本产业政策分析的核心位置。这样一来,就将发展导向国家从自变量变成了因变量。我将考察日本政府所制定的发展规划是如何受到现代政治的塑造的,以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思想与意识形态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10 思想与意识形态不仅影响政策的制定,也表达了在产业政策的政治中逐渐形成的制度所具有的含义。一方面,这些思想和意识形态是主观的,它们既不是对一种既成事实进行分析后得到的一组抽象物和摹本,也不是一套纯功利主义计算的原则。确切地说,思想与意识形态是一种符号工具,一种“文化工具”和“世界架构”。经济主体在努力为这一世俗世界创建一种秩序的过程中,通过这些工具来发现、阐述和表达自己生命的意义(Block, 1990; Gudeman, 1986; Swidler, 1986)。另一方面,理性含义(即萌芽状态中的制度性规则)是真实而具体的,它反映的是经济主体的现实逻辑,即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把握自己的关系的逻辑,而不是对任何现有文化规则礼节性遵奉的结果。只有在各方通过政治过程接受理性含义之后,理性含义才能成为制度性规则。与其后来的“高度理性化的神话”相比,这些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包含的含义缺少那种宗教仪式般的力量(Meyer and Rowan, 1977),所以它反映了形成制度和再生产模式的政治势力结构,同时它也解释了经济主体决定接受某种特定实践作为他们公认的“产业文化”范式(Dobbin, 1994; Dyson, 1983)。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没有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日本经验,而把重点放在考察日本人自身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 1969:6)曾

经指出：“经济学家提出假说是采取设问的方式：‘如果我处在那个地位，我应该做什么？’随后还要加上这样的限定：‘如果我是那种人，’……我们只有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像什么人时才能开始猜测”。约瑟夫·熊彼特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他讨论过理论家运用自己所建模型来研究他人的经济行为：

就其自身而言，模型并不说明现实或任何人的实际行为或理性。尤为重要的是，即使模型符合任何人的行为，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分析的那个人的目的完全与分析过程相同，更何况他达成这一目的的过程了……除了是极为简单和极为普遍的人类行为模式之外，要想理解一个目的、评价一种手段的合理性，常常需要分析人士“使他自己”脱离他自己的时代和社会地位，而设身处地地思维。有时候，他还必须将自己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之中(Swedberg, 1991b:321, 325)。

我想说明，日本人在经济发展的每个转折关头，其理解形势、制定策略、争取合法性的方式，以及他们彼此面对和面对结构性变化的方式，都强烈地影响产业政策的目标，并影响推行产业政策时衍生出的经济制度。因此，我们可以从上述种种方式中，更好地揭示出隐藏在日本产业政策中的经济理论基础及日本经济制度的本质。

11

第三，本书意在突出动态演化过程对理解现代经济制度历史的重要性。

彼得·伯格和托马斯·拉克曼指出：“制度总是有自己的历史，制度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不理解制度产生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一种制度”(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 1966:54-55)。正因为如此，保罗·迪马吉奥和斯蒂芬·克拉斯纳都指出，适宜于制度建立之后的因果关系，不一定适宜于制度建立之初或正经历剧烈变化的时期(Paul DiMaggio, 1988; Stephan Krasner, 1984)。因此，只有“动态分析才能把握经济中的制度形成问题”(Swedberg and Granovetter, 1992b:19)。另外，制度不会以渐进的方式演化，而通常以断裂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的形式演化(Krasner, 1984)。当既有实践因危机而遭受质疑，经济主体就会急切地寻求新的解决方法，这时，新的实践就会作为对急剧的结构变化的反应而被制度化(Dobbin, 1994; Krasner, 1984; Weir and Skocpol, 1985)。正如冈崎哲二所说，作为多种制度互补的均衡，经济体系依据的是一种路径依赖(Okazaki Tetsuji, 1993:97-98)。在历史上，当一场危机刺激各种制度发生变化时，制度将会转换到一个在本质上与前一种制度不同的新的均衡点。即使刺激制

度重组的大震荡(great shock)在历史上消失之后,重新形成的经济体系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按照自己的惯性向前推进。

我支持新韦伯主义的立场,即人们只能期望历史地发现和解释特定的转变模式和转变过程(Lindberg, Campbell and Hollingsworth, 1991:4)。我重新阐述了卡尔·波兰尼的观点(Karl Polanyi, [1944]1957),波兰尼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政视为三种各具特点的模式,他将这三种模式视为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失灵和国际经济失序,以及国与国之间武力相向的反应。按照波兰尼的说法,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力量和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他们有补给支持者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僵局提出另一种解决方案。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面临着与所有工业化国家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继承了属于自己国家特有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迥异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Woolf, 1968:142)。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具有丰富的经济含义。从经济上讲,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种战争动员体系,而且也是对许多自由资本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修正。正是这样一种战时体系,使得1931—1945年间的日本资本主义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并使日本经济在战后环境中转变成另一种发展模式。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日本的经济体系仍然是法西斯主义,而是说如果不考虑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对1931—1945年间的日本经济与它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传统经济不可逆转的背离,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给出充分的解释。

法西斯主义一直被认为是用来解释1931—1945年间日本政治的不恰当的概念(Duus and Okimoto, 1979)。但我们现在谈及的比较资本主义却为这一概念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我们可以将20世纪30年代视为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上,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共同进行的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不仅反映出它们在独一无二的产业化道路上产生的压力和矛盾,而且也体现出它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重要修正。正是这种修正,在随后的岁月中形成了现在这些经济模式的发展轨迹。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分析类型,代表的是20世纪30年代一种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重组范式,这一范式又导致了战后各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本书中,我将法西斯主义作为有强烈发展导向的日本经济体制复兴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概念而给1931—1945年间的日本经济贴

上标签。我在这里不使用传统的、主要强调政治的法西斯主义定义,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一概念的基本经济原则进行讨论。

13

虽然1931—1945年间日本发展主义的兴起是受到法西斯主义影响的,但其战后的演变却是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的。第一个方面是进行土地改革、颁布新劳动法、解散财阀(*Zaibatsu*),以及制定防止日本对外宣战、民主化日本经济并削弱其军事成分的新宪法。第二个方面是1949年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重新连接起来的“道奇计划”(Dodge plan)的实施,以及20世纪60年代贸易与资本投资的自由化,后者迫使日本开放了国内市场,并将日本经济从具有强烈行政管制特点的内向型经济转变成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的政府与私营企业家领导的外向型经济。第三个方面是冷战期间美国利用日本牵制共产主义的政策,使日本保留了许多战时制度,比如政府行政管制机构和主办银行制等。总体而言,美国霸权并没有将日本经济转变为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相反,却使最初产生于法西斯主义的各种战时经济发展因素,与一种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贸易体制相融合。换言之,日本经济体制虽然被迫去适应新环境,却仍然保留了自己的发展主义的本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66)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作为一种政治体系的法西斯主义可以与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共存。我则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日本在1931—1945年间作为经济体系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政策创新和制度发展,在经历了某种调适后可以在战后与民主政体共存。此外,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化模式,这种经济体制在和平时代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

第四,本书通过研究日本产业政策和经济制度中反映出的发展主义的制度化理念,推动对比较资本主义的研究。本书的研究表明,尽管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有的甚至是本质的变化,但发展主义本身却存在某些连续性。我在书中证明,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在分析单元、选择偏好及分析手段上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正统观念迥然不同,而且在某些基本的经济假设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日本发展主义致力于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产业化问题,考虑的是如何将产业政策作为首要的优先政策来加强国民生产。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发展主义有三项基本原则,每项基本原则都有一些既定的手段予以支持。第一项基本原则是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经济。这项原则试图依靠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建立起一套最

14

佳产业结构(*sangyō kōzō*),以便在国际贸易中为日本经济找到一个利益最大化的位置。第二项基本原则是抑制过度竞争(*kado kyōsō*)。这项原则试图在战略性产业中有效地集中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秩序。第三项基本原则是摒弃企业管理中的课利动机。在日本管理体制的支持下设计这一原则,从而意在用公司的短期利润来换取工会的合作,调动生产力(*seisansei*)。这三项原则最初是1931—1945年间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在日本经济体制中制度化的。战后日本经济制度和国家目标发生了变化,尽管这些原则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但它们依然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础。

作为一种经济意识形态,日本的发展主义从来都不是纯粹日本的东西。从20世纪30—60年代,某些西方经济思想对日本产业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theory of total war*)之外,卡尔·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都被日本有选择地借鉴过来,并根据本土的情况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这些思想孕育出日本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三种特殊范式:1931—1945年间的管制经济范式、20世纪50年代推动出口的范式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和自由化范式。正如现代日本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日本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西方个人主义经济学的天敌,也不存在持续而渐进地侵蚀日本民族文化或价值观的因素。在特定的条件下,西方经济理论与日本本土价值观都可以对日本现代经济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一旦这些条件消失,便没有什么理念能够永久保持。

此外,日本资本主义与其盎格鲁—撒克逊“胞生兄弟”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日本发展主义是在一个对什么是理性的国民经济(*nation's economy*)不断进行重新定义的动态过程中演化而来的。尽管战时遗产为日本战后经济准备好了发展总纲,但战后的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也同样很重要。这些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在许多重要方面的改善甚至超过了战时体制,并将日本发展主义从战争时期的军事型(*military version*)转变为和平时期的贸易型。除此而外,日本发展主义仅仅概括了一种人类经验(*human experience*),这种人类经验受到现代日本历史的时空限制。这里所做的每种选择都有一定的副作用,都需要社会成本。由于结构条件和国际环境急剧变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还运行良好的要素已经成了目前日本经济运行的主要障碍,并面临着沉重的变革压力。

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8:112)曾经评论道:“研究日本产业政策时,对思想史的依赖一点也不少于对经济‘科学’的依赖。从日本产业政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吸取很多教训,但这些教训必须先从思想和历史的语境中脱离和抽象出来。”现代日本经济思想既丰富又复杂,为了揭示这些思想,我将重点集中在1931—1965年间相关的日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一般公众就重要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政治争论。这些争论最初出现在学术期刊、商业杂志、报纸、政府文件和各类书籍中。本书研究的重点之所以放在1931—1965年间,是因为这一时期是日本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对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应而出现的日本发展主义,受到了战后民主改革的挑战。然而,受20世纪50年代促进出口和60年代贸易与资本投资自由化的推动,战时遗产也被改进以适应新的环境。尽管日本发展主义这一体系的长处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还未能被西方所认识,但它从军事型向贸易型的转变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基本完成。在宏观层面上,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经济中时常所扮演的角色迥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在经济领域是以一个重要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同时,它还具有极强的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在微观层面上,与其西方胞生兄弟以劳资冲突为特征的管理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式管理强调的是相互合作的劳资关系(cooperative labor relation)。在中观层面上,由占领当局支持的民主改革暂时中止后,战前财阀重组形成了关联公司集团(*keiretsu*);企业集团则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在市场竞争中大显身手。

16

本书是以纵向和横向两种方法组织起来的。纵向上,我在每一章都首先介绍了每一时期的一般历史背景。接着又对需要解释的因变量,即对反映这一时期政府产业政策中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制度性演变进行描述。然后,我通过对这一因变量的分析,来追溯日本的世界观、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政策制定中的主要经济思想以及当前政府与政企关系的结构等。横向上,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跨越不同时期的演变的连续性上。读者通过阅读每一实证篇章中的相关部分,就能把握某一具体的侧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演变的。

本书只限于解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日本产业政策的产生以及日本经济制度性的变迁。我并不考虑日本经济奇迹是否是由这些思想引发的,也不考虑日本发展主义是否比新古典经济学更为合理。我认为,日本发展主义是一种与

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学竞争的思想。在我描述哪些方面是合理的时候,我并没有采用任何与日本人所采用的标准迥异的检验标准。

17 在第二章中,我讨论了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静态和动态特征。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是实证的章节,每一章讨论一个主题。在这几章中,我一一举证了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间的演化,我的叙述主要围绕着日本产业政策中的三个范式,重点集中在四个不同的政策项目上。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阐述1931—1945年间以及1946—1949年间,日本产业政策中管制经济的政策范式。通过分析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部分,即管制经济思想的出现,我在第三章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作为一种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经济模式,日本发展主义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什么是日本发展主义的军事本质?第四章主要解释由占领军当局着手的民主改革是如何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日本的经济体制,而其他一些战时遗产又是如何存留下来的。

第五章讨论了在20世纪50年代促进出口的政策范式下,日本发展主义如何将自己从为军事服务转向为贸易服务。我解释了日本产业政策的重心为什么从政府对宏观层面上的物资分配的控制效率,转向微观层面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我还指出,在战后占领期间中止了的产业组织和劳资关系,是如何在新的国家目标下复活的。

我在第六章进一步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和自由化时期,日本人所强调的一国生产力是如何从产业层面扩展到整个经济中的。我还要说明的是,当代日本经济治理结构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

在第七章,我从总体上讨论了日本案例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

后记主要在考虑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发展主义的命运的基础上,探讨历史是如何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做出新的评价的。这一讨论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主义在处理两次石油危机时所赢得的胜利,以及80年代因《广场协议》而导致的日元升值;第二部分通过讨论泡沫经济的破灭和日本经济今天面临的挑战,来揭示日本发展主义黑暗的一面。

第 2 章 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直到最近,英语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忽视对支撑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意识形态进行讨论(不过派尔除外,可参见 Pyle, 1974)。人们普遍相信,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几乎没有学术基础。不仅北美的学者普遍知道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不研究日本式经济,甚至连日本研究方面的专家都相信,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在日本的高增长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满足于斋藤精一郎(Saito Seiichiro, 1981:298)的说法:“日本经济的繁荣和日本经济学的荒芜之间存在让人失望的反差”。

从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对日本的发展施加任何显著的影响这一点而言,上述看法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学术界人士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以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 1896—1988)、中山伊知郎(Nakayama Ichiro, 1898—1980)和东畑精一(Tobata Seiichi, 1899—1983)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经济学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受教育的,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这些经济学家,帮助这个国家建立了一套紧急程序,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并在 20 世纪 30—60 年代的国际压力下,以及国内动乱的环境中,为日本的产业政策构建了理论框架。他们所提出的、反映在具有连续性的政府政策中的主要观点,构成了日本经济学家金森久雄(Kanamori Hisao, 1985:127)所谓的“实践派经济学”(Jissen-ha)——这是日本产业政策逻辑体系的核心。实践派经济学有自己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其与日本经济学界的两个主要派别——*marukei*(马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 *kinkei*(近经,即现代经济学,其中包括所有自“边际革命”以来建立的、除德国历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区分开来(Hayasaka, Masamura, Takeyama, Hamaguchi, Shibata and Hoshino, 1974:14-15)。实

实践派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观点。实践派经济学的核心成员是一批日本学界精英。其中,有泽广巳曾是日本学士院院长,中山伊知郎和都留重人都担任过一桥大学的校长。然而,他们之所以广为人知,却是因为他们与政界高层的密切联系,以及他们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战后的日本,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曾被称为“御三家”(Gosanke)。在日本历史上,御三家是德川家族的三个分支,而德川家族则是幕府(*bakufu*)的主要支持者。“御三家”这一称谓表明了这三位经济学家在政府政策的制定中的重要性。它暗示着,作为日本政府咨询委员会领袖,在设计经济政策时,他们三人从多方面起着理论引导作用。

有些经济学家甚至直接就在政府机构中工作。比如,都留重人(Tsuru Shigeto)是一名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担任经济安定本部次官。石桥湛山(Ishibashi Tanzan),经济评论家,成了职业政客,并当上了大藏大臣、通产省大臣,并最终出任首相,获得了将他本人的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本书特别关注另一批经济学家,即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Kanchō*),其代表人物是大来佐武郎,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早期在政府任职的稻叶秀三(Inaba Hidezō);20世纪50—60年代后期的后藤誉之助(Gotō Yonosuke),以及出任过池田勇人(Ikeda Shigeto)首相的首席经济顾问的下村治。作为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日常职责包括进行经济调查和制定长期计划,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高度程序化的行政工作。但是,在一些特殊的结构条件下,他们的远见、智慧和果敢,使他们像现代志士(*shishi*)那样,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影响(Komiya and Yamamura, 1981; Ōkita, 1990)。

20 这些经济学家对国家的贡献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无法轻易地将他们的名字与战后日本经济的整个历史分离开来。例如,在讨论20世纪4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时,没有人能忽视倾斜生产方式及其设计者有泽广巳。任何一部关于战后日本劳资关系的著作都一定会注意到生产率本部和中央劳动委员会。中山伊知郎就是生产率本部副会长,也是中央劳动委员会会长,并为生产率运动设立了著名的三原则,而生产率运动对于日本劳资关系的稳定和日本管理的制度化非常关键。如果没有高增长之父下村治的话,日本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高增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意义。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Komiya Ryūtarō, 1986:

22)指出的,“直到1965年前后,主要由通产省执行的日本产业政策,都是基于这一代学者所建立的思想基础。”为表彰他们的巨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接近尾声时,日本政府授予“御三家”的每位成员一等旭日大绶章(the Order of the Rising Sun)。这是日本公民可能享有的最高荣誉,一般只有那些年逾七旬的人才有可能被考虑,只有为数很少的日本人获得过这种荣誉。遗憾的是,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件,似乎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日本研究专家的注意。西方甚至都没有人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对这三位经济学家表示这么崇高的敬意。

产业政策范式

实践派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反映在20世纪30—60年代他们对日本产业政策三个范式的贡献中。

在分析日本发展主义时,有两个原因使产业政策范式成为一个重要的范畴。首先,在关于产业政策的政治讨论中,范式代表着一种权威,或者是主导观点。正如著名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Keizai Kikakuchō, 1960:171)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经济计划以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制度为基础。经济计划并不为各个经济领域确定详细目标,然后再通过内聚力来实现目标,经济计划仅仅是提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但是,反映在政策范式中的一般原则却更为重要。正如佐和隆光(Sawa Takamitsu, 1984)所说,一般原则实质上是日本政治家、产业界人士和普通公众借以理解经济的框架,是这些经济主体借以形成其预期的基础。通过产业政策范式,日本政府不仅给日本人提供了“看问题的方式”,也使他们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换句话说,政府不仅形成了经济主体借以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剥夺了他们独立判断的能力。由于使经济主体接受了“对情况的解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对结果的控制,因为“对问题的解释决定了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性质”(Jacobsen, 1995:292)。结果,这些范式既反映了各个时期政府的智慧,也反映了它的认识局限性,从而揭示出日本发展主义的历史特性。正如本书所表明的,日本政府的统治通常反映在其通过产业政策为日本经济设定程序的能力上。政府最初制定的政策经常被修改,许多政策由于政治对抗而未能如愿执行。但是不管怎样,这些政策范式在引导日本经济的制度建设以增强国家竞争力上是成功的。

其次,政策范式直接将意识形态与产业政策、制度发展联系起来。从定义上说,政策范式涉及经济制度以及关于经济与政治如何相互关联的思想(Samuels, 1994)。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 1994:19)指出:“政策范式是由以政策形式表示的实施计划和以政府行为原则形式表示的达成目的的手段所组成的。它们通过创造和维持经济主体的特殊行为模式,并通过将模式比拟为效率来强化产业文化。”通过强调政策范式,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发展主义与盎格鲁—撒克逊式发展主义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制度上,而且也表现在理论层面。我认为,这种理论层面的差异才是根本的不同:思想并不总能体现在政策中,也并不是每个政策都能由政策范式来解释。尽管如此,思想通常会为每一种政策创新和制度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主要动力。正因为这些原因,我甘冒忽略各项政策间的具体差异之险,重点研究那些支持和引导日本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

22 强调日本产业政策范式的研究不同于那些强调经济现实历史分期的研究。例如,尽管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高增长,但高增长本身却直到60年代才成为了政府政策范式。同样,稳定劳资关系的努力在促进出口和技术创新的范式下于1955年就已经开始。但是对于许多分析家来说,它对于日本管理的影响直到70年代末才日渐彰显。从这种意义上说,政策范式反映的是时间,即经济主体改变他们的理论依据的时间。政策变化及其对具体的经济现实发挥效应之间存在一个时滞。

对日本关于20世纪30—60年代间产业政策的一般原则辩论的详细检讨,揭示了三个迥异的政策范式:从30年代初期持续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以及在1946—1949年间实施的管制经济;在50年代居统治地位的促进出口;以及占据了60年代日本经济政策核心地位的高增长和自由化。

管制经济

1931—1945年间的管制经济范式代表着日本产业政策中的军事型发展主义。管制经济是日本资本主义史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日本经济与1930年前的经济实践有了重大的背离。当大萧条加剧了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冲突时,日本采用了军国主义作为应对措施。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发动了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41年,日本又开始了与美国的正面对抗。以发展主义的军事观

点来看,经济就是国防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发生了激烈的制度重组。受德国总体战争理论的影响,管制经济的思想体系类似于传统的重商主义学说,视财富为获得军事力量的基本手段,同时将军事力量视为获得财富的重要手段(Williams, 1994)。

日本管制经济出现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即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为了对抗大萧条而强化政府干预之际。因此,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中理解日本管制经济的历史意义。依据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944]1957:132)的说法,资本主义的演进是由两个作用力完全相反的运动推动的:

23

一个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经济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建立自我约束的市场,这要依靠工商业阶层的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要运用自由放任政策和自由贸易的方法;另一个是社会保护原则,社会保护以保护人、自然以及生产组织为目标,它依靠那些最直接受市场有害行为影响的人们的各种支持——主要(但并非唯一的)是工人和地主阶级——同时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联盟和其他干预工具等方法。

波兰尼认为,“保护性的反向运动不是外在的;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秩序生命力的基本要素”(Block, 1990:39)。在20世纪30年代的反向运动中,政府成为主要角色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政府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出现的过程中,接着是在法西斯主义时期和世界大战期间市场社会的瓦解过程中。依据波兰尼的说法,自我约束市场的出现并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有意采用重商主义政策的副产品。虽然反向运动是自发的而非计划的,是社会所有部门对市场毁灭性冲击的反映,但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都在19世纪末通过了关于公众健康、工厂条件、社会保险、贸易联盟和公用事业的干预主义立法(尽管这些立法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一反向运动除了成功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外,也导致了20世纪更严重的经济失调,而这一失调又激起了更强烈的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出现(Polanyi, [1944]1957)。

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市场停止运作时,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见证了保护性对抗运动,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政的出现,仅仅在放弃自由放任原则上相类似”(Polanyi, [1944]1957:224)。国家干预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所有工业化

24

国家都陷入了空前动荡。那么,法西斯主义所特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对1931—1945年间日本管制经济的影响可在三大意识形态领域得到确认,这种影响导致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制度性转变。

首先,经济被赋予了战略意义。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正是20世纪30年代自我约束市场的失灵导致了国家干预的出现。1914年金本位制的崩溃对国际政治具有直接的影响,因为“一旦世界经济崩溃,基于世界经济的权力均势就无法保持平衡”(Polanyi, [1944]1957:4)。像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日本人也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冲突。总体战争理论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胜败并不仅仅是由战场上的战斗力量直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制造武器的工业力量所决定的……为了生存[国家必须]利用各种经济工具,投入所有可以使用的物资,战斗到最后一分钟”(Arisawa, 1934:18; 80-81)。这一理论深刻地改变了日本人的经济思维。在管制经济的意识形态中,经济目标并非源自经济角度,而是源自政治角度。换句话说,经济本身不再是目标,而是国际政治中民族国家的一种工具(Tōa Keizai Chōsakyoku, 1935:23)。与20世纪30年代英美自由资本主义实施的、以战胜大萧条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干预相比较,日本的国家干预类似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干预,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为即将发生的战争作准备的战略措施。为了确保军需产品,这三个国家都对重化工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关注。

经济战略观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2: 33)指出:

实际上,早在明治时期,产业政策就初具雏形,但直到20世纪,日本政府才渐渐改变了原先在国内经济(如果不算那些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话)中实行的干预政策,转为实行为期约三十年的自由开放政策。

25 大萧条和战争动员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以“经济参谋本部”(economic general staff)的面目出现。为了促进生产,并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日本不仅着手制定长期计划,还抓紧了对资源配置的控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来确保军需品行业资本和原料的供给。1938年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法使政府官员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们甚至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打造管制经济。从那时起,政府行政部门无须与国会商量即可直接向私营部门发布法令。这种做法对战后日本经济有着长期

持续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发表的若干新研究成果都一再证实,“日本经济的掌舵人一直是大藏省和通产省的官员,而不是私营企业”(Kobayashi, Okazaki, Yonekura and NHK, 1995: 3; 参见 Kobayashi, 1995; Nakamura, [1978]1993; Noguchi, 1995; Okazaki and Okuno, 1993b)。

其次,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试图约束市场力量,但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思想体系有共同之处的日本管制经济意识形态,却有着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影响的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这种思想排斥经济人假设,个人自由和私人财产所有权也受到了与“经济实力、独立、[以及]军事力量”(Woolf, 1968:128)有关的民族利益的挑战。在意识形态上,法西斯主义的目标是:

通过简化社会结构,消除作为社会商品配置和分配的主要方式的市场机制,来建立一种调整资本家的逐利动机和工人阶级追逐工资动机的社会秩序。他们希望通过制度改革来达到社会和谐与意见一致,这一社会改革是以更高的集体目标的名义,而不是通过呼吁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来抑制和改变个人的物质享乐主义动机(Duus and Okimoto, 1979:69-70)。

正如纳撒尼尔·S. 普雷斯顿(Nathaniel S. Preston, 1967:210)所指出的:

法西斯主义对于经济秩序的控制,最终证明是为了非经济的目的,甚至是反经济的目的。由于将军事力量视为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一直从属于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性的需要,而不是目标本身。至少从1935年开始,法西斯主义就将军事准备置于首要地位。

为了限制市场力量,政府鼓励非市场治理结构的发展,例如卡特尔、统制会和主银行制度。在大萧条前,卡特尔在日本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Haley, 1991; Takahashi, 1993);统制会也并不存在;与现在占90%的间接融资相比,当时的间接融资仅占整个资本供给的30%左右(Okazaki, 1993)。大萧条期间,日本政府发起了一项产业合理化运动。为了防止私营企业破产以达到减轻政府经济负担的目的,政府在每个行业内都建立了卡特尔来控制产量。1931年,政府又通过了《重要产业统制法》。依据这项法律,当一个产业中有2/3的企业加入了卡特尔时,政府就有权迫使其余的企业遵守由该卡特尔制定的协议。如果一项卡特尔协议与

“公共利益”相抵触,政府可以修改或删除这一条款。20世纪30年代,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产业法,这些法律使每一个产业的所有商业活动都受制于政府法令。这标志着一直持续至今的严格的政府管制的开始。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行业协会法规》,从而使20多个产业建立了统制会。政府赋予这些统制会以行政权力,但权力由私营部门操纵。统制会不仅有权决定产量、产品品种和生产方法,也有权决定交易条件、价格、合伙人和交易时间。同时,他们还有权决定利润、红利和奖金(Nakamura, 1974a:97-101, 128-133)。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资金供给,主银行制度逐渐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主银行制度扩展到了非军事工业中(Okazaki, 1993; Teranishi, 1993a)。这些非市场治理结构的发展表明,日本政府不仅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也鼓励制约市场力量的非政府治理结构的发展,并将之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在战时民族主义的压力下,私营部门不得不向政府妥协,接受政府的监督,以免受到更严厉政府干预。

为反对利润原则,政府对私人公司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按照冈崎哲二(见Kobayashi, Okazaki, Yonekura and NHK, 1995:18-19)的说法,在管制经济发展前,日本的经济体系“迥异于它现在的形式……工作职位与终身雇用是两码事。股东的资金回报和经理人的奖金具有优先获取权。现在,这种在企业内部为了再投资而实行的保留利润的做法,已根本不存在。”战争期间,随着政府加强对商业活动的控制,利润原则受到严峻挑战。政府管制不仅表现在引导资金流入军事工业,还延伸到私营企业中,延伸到限制股东财产权中。不断增加的间接融资和政府机构对红利的管制,给了经理人很大的自主权。在侵华战争爆发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行政法规,企业不能调动工人的工作岗位;雇员的起点工资也被置于政府的管制下,且所有雇员的工资每年都会一起提高(Kobayashi *et al.*, 1995; Naguchi, 1995; Otaka, 1993)。与此同时,所有公司中都建立了产业报国会。1937年后,白领和蓝领工人都同时成为同一个产业报国会的成员。正如S. J. 沃尔夫(S. J. Woolf, 1968:137)所指出的,“法西斯主义所独有的消除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冲突的企图,与资本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都接受的阶级观念形成了鲜明对照。”

再次,日本管制经济的意识形态,既有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地方,也有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倾向,代表了另外一种针对保护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反向运动,它不遗余力地反对自由主义同样的激

烈立场,也反对与之竞争的另一种革命倾向——社会主义。这一趋势“既是反革命的,也是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沃尔夫(Woolf, 1968:129, 136)指出:

尽管法西斯左翼偶尔也抗议大资本家和在外地主(absentee landowners)*,但法西斯主义很快就放弃了任何改变现存经济力量结构的激进想法,反而力图使现存结构为自己带有政治意图的经济目的服务……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原因,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政府几乎都没有将产业国有化的想法,……法西斯主义政策更愿意将产业保持在私人手中,并确保其按照国家的“需要”行事。

28

在日本,这一特征源于其施行的产业政策。政府部门主张并坚持的是直接管制,但是,由于经济形势的制约和私营部门的抵制,许多政策措施都有所修改甚至失灵。1931—1945年间日本发展主义的崛起并不是平平静静的;发展主义的转变过程一直充满了抵抗和冲突(Hara, 1995c)。因此,与苏联采取的社会主义方案相比较,日本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并没有采取财产国有化的形式;管制经济的运行仍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但是,不管如何不完善,与美国的新政相比较,日本政府通过直接的政府机构干预和非市场治理结构,建立了一种更强大的管制经济体制,1931—1945年间日本发展主义出现的这一特征,具有某些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出口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促进出口范式,代表着日本发展主义从军事型向贸易型过渡的起始。在经过自由资本主义一系列民主改革而确立的新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国际环境制约下,战时体制中的各种因素开始重组,发展主义的贸易观开始出现。尽管如此,日本政界还没有普遍接受这一观点,这一观点依然与激进的政治进程相冲突。与强烈的内向型的管制经济不同,促进出口的范式是积极外向型的。但是,这种外向型并不是国际性的,而是民族主义的。外向型的目的是通过实施重大战略而加入国际竞争,从而增强国家力量。

首先,经济战略观依然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这次它服务于新的国家目标。

29

* 在外地主,指居住外乡而在本乡收租的地主。——译者注

由于新宪法第九款禁止日本拥有对外宣战的权力,它改变了日本经济的目标。正如三和良一(Hara and Miwa, 1992:422-423)所指出的,尽管战时和战后,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都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特征,但在战时是集中于武器的生产,战后是集中于民用商品的生产。和平宪法将日本的国家目标从“富国强兵”变成了“富国,但不强兵”,国力的基础也从军事力量转变成了财富(亦见于 Yamamura, 1967)。

然而,经济依然被视为战略性的。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了,首相吉田茂(Pyle, 1992:21)却坚持认为:“一个战败的民族,通过分析和利用世界强国间不断转换的关系,可以抑制因战败而招致的损失,并能赢得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主义联盟(即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俄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的解散,为日本提供了极好的调整机会。面对冷战环境,吉田茂为日本设计了一项重大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站在美国一方,以换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同时,集中日本的资源致力于经济增长,并使国防支出最小化。但是,这项经济民族主义战略却遭到了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的共同挑战,保守政党提出重整军队并修改宪法,革新政党则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

20世纪50年代,重化工业的发展在日本产业政策中依然占据重中之重的优先地位。尽管这些行业不再专门致力于生产武器,人们依然将重化工业视为产业经济结构的基础或战略组成部分,并相信这种产业结构会使日本的国际贸易利益最大化。正如“出口还是死亡”这一口号所表明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促进出口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日本的经济思想对比较优势的经典定义进行了修正:比较优势这个术语不再意味着大自然赐予了一个经济体丰富的资源或廉价劳动力,而是意味着增加产品价值,从而能在国际贸易中为国家带来更多收益的生产技术。尽管日本在当时并不拥有这种比较优势,但这种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在50年代构建国家力量时,生产技术被认为是日本替代军事力量的唯一选择。尽管对日本的国家安全来说,技术一直拥有战略意义,但在50年代日本的经济思想中,技术却有着重中之重的首要地位。其原因是,在认识到美国的技术发展成就后,许多日本人得出结论,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就是源于技术竞争上的失败。

在这一政策范式中,政府改变了它的干预方法。在战争期间,日本产业政策的最终目标是支持军事,政府直接控制着物资的分配和价格,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机构的管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所取代。在占领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这个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49年实施道奇计划后,政府虽然还在控制经济,但却是通过组织市场竞争来实施控制。政府废止了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管制,并将对贷款的控制从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因此,市场重新发挥了作用。在管制经济中国家曾极力保护的私营企业也被迫重新进入了市场,并不得不靠自身来确保资本和物资的供给,以及营销渠道的畅通(Kobayashi, 1995:238)。从1950年开始,“反对竞争”的原则变成了限制“过度竞争”。

其次,以约束市场竞争和反对利润挂帅为标志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在占领期间受到强烈挑战后,又开始以新的形式出现。尽管与管制经济相比较,人们将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经济称为自由经济(*Juyū Keizai*),但它却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大为不同。

20世纪40年代末,财阀(*Zaibatsu*)的解体和《反垄断法》的通过鼓励了市场竞争。然而,为了促进出口,政府两次修正《反垄断法》,以便为产业重组提供合法依据。因为实施了民主政治改革,加之与战前时期相比战后市场竞争的秩序更加不稳定,所以,战前那种有权控制其子公司资本和人事的持股类公司并未恢复(Hara, 1995c:91)。然而,尽管如此,曾被1947年《反垄断法》禁止的交叉持股和人事交换,又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以三菱和三井为代表的前财阀公司,在占领期间暂时解体后,又开始重组为关联公司集团。这些关联网络以大商业银行为中心,在生产厂商进行的技术转换和生产设备投资中,为他们提供可靠的融资。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通过在战略性行业中强化政府规制来限制战略性行业的市场竞争。为了培育日本战略性企业的竞争力,政府继续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为了促进出口,政府也对外汇进行控制。最后,自大萧条以来一直是日本产业政策中重要工具的特特尔,在1947年被宣布为非法后,重新又被用来克服经济衰退和促进合理化。在管制经济中,这些非市场治理结构的功能是抵御大萧条和阻止市场力量扰乱军品行业的国家生产目标。20世纪50年代,非市场治理结构的功能又被用来阻止市场力量分散资本供给,以便培育日本公司的竞争力,以及维护高速增长条件下的产业秩序。

这样,日本企业的管理又一次抛弃了利润原则。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合理化运动中,利润原则对产业策略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而大量解雇工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汇集于日本经济同友会(*Nihon Keizai Dōyūkai*)的商界进步领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发起了生产率运动,目的是将工会也纳入他们的促进出口方案中。为了在生产技术上获得比较优势,一些大公司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抉择。正如短期成本—效益分析中所度量的那样,他们开始放弃以短期成本收益分析为标志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资源配置的效率曾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作为交换,他们想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中获得员工的合作;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同意了工会提供工作保障和增加工资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商界领袖们从战略意义上倡导和谐的传统价值,以缓和32 管理层和员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里一直是冲突之源。工人的反应多种多样,大多数工会依然持怀疑态度,但也有1/3的工会决定与管理部門合作。工人运动中主张与管理部門进行政治斗争的所谓高野实(*Takano Minoru*)路线,被强调通过温和的罢工来获取经济利益的太田薰-岩井章路线所取代(*Nakamura, 1995a: 37-38*)。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劳资矛盾的这一解决措施才被人们普遍接受。正如1960年的三池罢工(*Miike Strike*)所表明的,一场重要的全国范围的劳资争议即将来临。尽管如此,生产率运动仍然是劳资关系开始走向稳定的标志。

依据冈崎哲二的说法(*Kobayashi et al., 1995: 126*),放弃利润原则部分是受到了民主政治改革的影响。在战争末期,日本的管理还存在回到战前传统的可能。然而,财阀的解体却破坏了战前公司体制的核心部分。在财阀家族的成员被从管理位置上赶下来之后,管理权终于实现了与所有权的分离。因此,那些为保护自身利益与政府进行斗争的资本家,被新一代的经理人所取代,雇员的主权也随之确立。由于受到主银行体系的支持,这些管理人员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他们开始积极地在长期投资中参与竞争。此外,在土地改革和劳动改革使日本社会民主化后,平等成了家喻户晓的理念。人们普遍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确保工作保障和增加年薪的战时做法,仍然是非常可取的(*Sakakibara, 1990*)。

再者,在20世纪50年代,反共产主义的倾向仍在持续。战后民主政治改革并没有触及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随着政府行政官员所有主要对手的倒台,占领当局不得不依赖日本政府来打理行政。此外,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引发的空前经济危机和物资短缺需要强有力的领导,20世纪40年代末,政府力量得到大大增强。尽

管如此,日本政府仍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了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行政管制,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提升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政府没有摒弃市场,但却打算将竞争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这是日本发展主义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如果不考虑这一方面,就不能准确地解释日本经济的实力。

33

20世纪30年代,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一样,也在试图割裂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间的联系,目的在于降低其易受外部干扰的脆弱性,将国民经济和国内价格同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隔离开来(Woolf, 1968)。这种内部导向导致了既通过政府的行政机构,又通过非市场治理结构来控制资源配置的倾向。但是,通过道奇计划的实施,日本经济重新与国际市场接轨后,日本经济的存亡将最终由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来决定。为了提升竞争力,日本政府不得不利用市场功能。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政府行政官员在经济中的权力一直都很强大。但从1950年开始,日本政府已经改变了策略,从原来的替代市场转为组织市场。

高速增长和自由化

20世纪6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中高速增长和自由化的范式表明,为适应将日本经济从封闭式国内市场转变成开放式国内市场的自由贸易体制的出现,日本发展主义产生了重大变化。

在战后重建的第一个10年中,日本和许多西方国家都经受了美元短缺之苦。为了平衡国际收支,这些国家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美国开始推动贸易自由化,在国际经济中,一种新的受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出现了。由于日本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按照要求,日本必须开放进口,开放外汇管理。

在这种政策范式下,日本发展主义最终完成了向贸易型的转变。

首先,经济战略观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世纪50年代,吉田茂的民族主义经济策略未能在日本获得统一认识。重组军队和修改宪法的提议吸引了国民的注意,这最终导致了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在《日本安保条约》延期问题上的冲突。池田勇人当选首相后,采纳了“从政治向经济转移”的方针。由保守的自民党领导的政府采取了贸易的高增长和自由化范式,以便将普通公众的注意力从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转移开去。这个方案有效地击退了革新政党的势力,使发展进程

34

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强调的是提升战略性行业中日本企业的竞争力。相反,在60年代,对国家生产力的理解进一步延伸到了整体经济的高增长率上。政府的目标不仅是保持经济增长或根据市场波动对经济进行调整,而且要获得高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这种政策范式下,宏观财政政策直接与产业政策挂钩,政府预算和公共支出被认为是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政府积极增加公共支出以促进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福利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快速转向重化工业来提升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高速增长政策使日本的发展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有了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逐渐对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国家政策产生了影响。尽管这种经济学的应用经常超出对市场波动的短期调整,但总的来说,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策目标基本上就是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或经济增长。但是,在日本,宏观财政政策却被直接用于维持高速增长、提升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加强国际贸易中的国家竞争力。这些区别说明,西方经济思想在进入日本政策制定过程时,常常会以“发展的”方式被应用。

35

经济战略观进一步反映了政府要将整个国家整合成一种新产业体制(*shinsangyō taisei*)的努力。为了迫使日本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投资自由化,自由资本主义又一次界定了国际经济的规则。对此,日本无力拒绝,只能接受。日本国内市场向外国公司开放,也在日本的经济思想中激起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外国产品的进口一直控制在日本政府手中。尽管促进出口的范式已经表明了一种积极的外向性,但其重心却是将日本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而不允许外国产品在日本国内市场上进行竞争。贸易和资本投资的自由化在当时被视为“黑船的第二次来临”^[1]，“黑船的来临”是超乎任何威胁的外部威胁,正是这一外部威胁最终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许多日本人都不敢确定,日本企业能否在家门口与外国公司的竞争中存活下来。为了应对这次挑战,通产省的官员们明确提出通过重振战时传统来进行新的国家动员。

其次,日本通过产业重组来限制市场竞争,以达到增强规模经济的目的。有人提出,外国企业在资本上的优势增强了其规模经济,所以外国企业可以降低价格。为了与外国公司竞争,日本公司不得不组成一个产业体制,这一产业体制不仅要协调资本投资并梳理好每一行业的分配系统,也要鼓励日本大公司进行兼并

以扩大规模经济。虽然所有这些措施都与《反垄断法》相抵触,但是在政府的支持下,这些措施仍然被执行。因此,关联公司集团成了新一轮发展的主角,并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重要角色。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基于社会关系的商业合同(relational contracting)这一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竞争,尤其限制了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

与此同时,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内工会为特色的日本管理制度,在日本大公司中最终制度化了。20世纪50年代,尽管一些日本商界领袖开始通过生产率运动来稳定劳资关系,但管理和劳工双方所采取的对抗性策略的影响依然很强,并且双方都对生产率运动有相当大的抵制和怀疑。1960年,因为煤炭业已成为夕阳产业,三井公司打算解雇三池煤矿中的6000多名工人,从而引发了三池罢工。罢工期间,微观层面上的对抗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冲突。三池罢工成了战后日本劳资关系的转折点。尽管这场冲突以工会的失败而告终,但迫使政府、商界领袖和工会审视自己所采取的对抗策略。工会已经意识到,全国范围和行业范围的冲突并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会决定充分融入到生产率运动中去。管理层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冲突策略的巨大成本。1963年,由于劳工市场首次变得有利于供给一方,管理层也失去了制衡工会的砝码。为了保证劳动的供给,终身雇佣制被制度化。日本政府曾经将劳资纠纷视为公共安全問題,但现在政府意识到,要想在没有严重社会动乱的情况下维持高速增长,就必须将劳资关系视为一项社会政策议题。

36

再次,在这一政策范式下,日本经济经历了一个私人治理模式日渐重要和政府行政权力日益没落的过程。日本经济管理中私人治理模式的确立,不仅反映出限制市场竞争的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持续性,也反映出反对政府直接管制的反共产主义倾向的持续性。这种发展是建立新产业体制的政治过程中的直接产物。当时,通产省提出了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这项提议可使政府有权监督商业银行的所有贷款(Calder, 1994)。通产省的这一提议被认为是直接行政管制的复兴,因此遭到了大商业银行的强烈反对。为抵制通产省的行政管制,私营企业提出了独立调整的建议。最终,通产省制定《促进指定产业特别措施法》的努力受阻,而由私营企业提出的通过非市场和非政府治理结构进行独立调整的提议,成为应对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投资挑战的重要手段。

37

日本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借助这一解决措施,政府和私营企业的分工得到了重新定义。从那时候起,日本政府在经济干预中开始更多地依赖行政引导。与此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反垄断法。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增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政府鼓励大公司通过兼并进行进一步的产业重组。由于得到政府支持,自由化政策范式下的产业重组导致了非市场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也使日本国内市场的保护私有化了。因此,不仅关联公司集团成了国际竞争中的重要角色,而且各种对市场的社会规制,如行业协会和谈合^[2],也都起到阻止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的作用。因此,尽管日本的国内市场是开放的,但市场依然受到履行基于社会关系之上的横向和纵向的商业合同的企业联盟的严密保护。

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发展主义从军事型向贸易型的转换已经基本完成。尽管战时经济体制的许多原始成分已在表面上有了改变,但1931—1945年间建立的一般原则却依然存在。通产省的年轻官员天谷直弘在20世纪60年代初评论说(Amaya, Komiya and Sakamoto, 1962:71-72):

战后,美国和欧洲用源于19世纪的社会经济政策取代了战时政策。因此,欧美战后经济的运行方式只是采取了回到战前传统的形式。相反,日本从未恢复它的战前传统形式。日本产生了一些全新的、迥然不同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了战时经济的强烈影响。尽管整个经济都认可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但市场却垂直地划分开来……与美国和欧洲有着高度横向流动性的市场不同,日本市场被垂直划分成了几个市场,而且每个市场都由一家商业银行挑头……基于这些社会条件,政府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

天谷直弘的说法也许需要一些限定条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美国留下了许多东西,例如社会保障体制、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军工体系和国家科学政策等。不管怎样,与日本的情况相比,支配美国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受战争的影响还没有严重到日本那种程度。

产业化经济学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验针锋相

对。村上泰亮(Murakami Yasusuke, 1992)曾在对发展主义的精彩分析中指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强调市场的均衡,将产业化视为资本主义的扩展,并将日本产业政策视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变体。相反,日本的发展主义体现的是“产业化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致力于解释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何在动态过程中创造财富。理论上,日本发展主义主张基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但是,这个经济体制是有国家工业化(人均产量的持续增长)这一目标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理论体系不仅从长期观点出发,认可政府在市场干预(这是将日本发展主义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的地方,后者致力于短期干预),而且鼓励经济中非市场治理结构如行业协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以此来制约市场力量。

依据村上泰亮(Murakami, 1992)的说法,日本发展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关于边际成本的假设上分歧严重。新古典经济学基于边际成本递增的假设,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在边际成本递增时,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并达到均衡。这个假设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必不可少。但是,战后的现实却是以边际成本递减为特征的,这不仅是因为规模经济(在生产达到资本和设备完全发挥的水平之前)的原因,也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如何建立制度来刺激由边际成本递减带来的经济增长,对每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边际成本递减最早是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琼·罗宾逊认识到的,但在战后却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忽略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罗·罗默才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相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一直是力图在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各样的制度来刺激经济增长。考虑到经济思维上的这种不同,村上泰亮总结道,在战后的国际竞争中发展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是毫不奇怪的(Nakasone *et al.*, 1992: 204-206)。这一点不仅是日本发展主义的重要特征,而且也是其他东亚发展主义的重要特征。国家为了刺激经济,就要经常干预经济。在许多情况下,对经济的干预是通过非政府机构达成的。

39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与日本发展主义的另一个根本区别涉及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在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经济与政治事务是分开的,经济的运行与政治意识形态无涉。相反,日本的发展主义却直接承认产业化和民族主义间的不可分割性,这不仅是因为作为财富和实力基础的产业化自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是日本的

国家目标(Samuels, 1994),而且还因为产业化目标一直受到源于冷战期间民族主义的重大政治战略的支持(Pyle, 199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841]1985:119, 126)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济思想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作过区分。他认为,对前者来说,经济是没有国界的。李斯特认为,作为一门“教授全人类怎样获得繁荣的科学”,古典经济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把那些并不存在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条件”。与此不同的是,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使某一特定国家(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繁荣、文明和实力的科学”。村上泰亮(Murakami, 1992:6)指出,在这一层意义上而言,日本发展主义是重商主义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延伸。日本发展主义将民族国家视为政治经济的基本单位,这种观点通常会对议会民主施加某些制约。正因为这种民族主义的特征,日本经济思想体系确实不是那种“将人类行为当作目的和可选择的稀有工具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研究”的“纯科学”(Robbins, 1935);反之,它是“商业逻辑”和“共同体意识形态”的一种整合,或者如托马斯·罗伦(Thomas Rohlen, 1974)指出的那样,是两者之间的混合物。

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

日本经济思想体系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日本发展主义则摒弃方法论个人主义。

按照有泽广巳、东畑精一和中山伊知郎(Arisawa Hiromi, Tobata Seiichi and Nakayama Ichirō, 1960)的观点,经济不是自然赐予的,而是人类运作的结果。而且,人类并不是以私营企业或居民户的形式来打理经济,而是以大规模的团体聚集形式,比如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来打理经济。“将经济理解为自然赐予的这种想法,排除了主观实体的概念”,因此,西方经济学一直贬低国家的作用,没有把与经济打交道的集体行为主体看成一个与个体行为主体概念相当的实体。即使在考虑集体行为主体时,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也非常抽象。许多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制定了经济计划,这些计划既不是由“绝对的上帝”,也不是由“看不见的手”来实施的,而是由一群以政府名义来工作的人实施的。但是,如果不理解政府的角色,就不能解释现代经济的运行。通产省前副大臣两角良彦(Morozumi Yoshihiko, 1966:17)曾说:“产业政策只能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根据可用资源来考虑。

产业政策中诸如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问题,都不能脱离主权国家共存的前提条件来考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查默斯·约翰逊就曾提醒我们注意日本产业政策的这一特征。在仔细推敲了罗伯特·S.尾崎(Robert Ozaki)的论点后,约翰逊(Johnson, 1982:26)指出:“由于民族主义被理解为国家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所以日本产业政策是对“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尽管日本产业政策的民族主义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引发了若干重要的研究。通过对日本外交策略的分析,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 1992)揭示了日本经济民族主义的基础。理查德·塞缪尔斯在他关于日本国防工业的研究中(Richard Samuels, 1994),阐述了引导日本产业政策的“技术—民族主义”。戴维·威廉斯(David Williams, 1994)则干脆称日本产业政策是一种“新重商主义”的实践。

41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资本主义是由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个人主义文化土壤培育起来的。与之不同的是,日本的产业化是对19世纪中期由西方威胁所引发的民族危机的过激反应。从一开始,日本产业化就意在达到三个集体目标:“殖产兴业”(Shokusan Kōgyō)、“富国强兵”(fukoku kyōhei)以及“文明开化”(bunmei kai-ka)。日本的产业化不以改进个人经济福祉的愿望为动力,而受增强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的欲望所驱动。在日本,产业化是一种移植或模仿,这种移植或模仿并不包括自由放任的精神(mindset)。即使是明治维新后个人主义和公民社会的西方观念被引入日本,这些观念的传播也常常受到日本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且人们常将这些观念与其最初的文化背景分离开,再根据日本的环境加以修正。尽管日本人可以清楚地区分国家与个人以及社会与个人,但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或者按日本人的说法,对kan[官]和min[民]的区分)颇感困惑。不仅政府对民的界定前后不一,甚至连19世纪8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经常犯糊涂,“将拿破仑混同于亚伯拉罕·林肯,或者将将军、官员与激昂的雄辩的议员相混淆”(Gluck, 1985:63)。当“社会”概念最初引入日本时,被译成了“群组”(group of fellows),而且更有人常常将其解释为“政府”。尽管最初的西方社会主义在其思想体系中接受了个人主义,但明治维新后,社会主义概念引入日本后变成了取代个人主义的理论。对日本人来说,社会一词听起来非常熟悉,因为社会是一个集体,而个人听起来却非常激进,因为个人主义经常被等同于自私。在这样一种社

42

会环境下,西方古典经济学坚持的自由竞争思想,就经常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相混淆(Arisawa and Tamanoi, 1973)。

在“大正民主”时期,日本经济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导向面临着巨大挑战。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日本经历了一个高速工业化过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成为远东强国之一。由于私营企业的实力及其政治代表——政党达到了一个高峰,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观点也在广泛传播,而且影响日增。尽管由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强烈影响,西方经济自由思想没有完全战胜其他观点,但是在政治演讲中赞成股东盈利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声音,比此前或之后都更具影响力。

日本法西斯主义导致现代日本经济思想把国家民族作为分析单位,其原因有二。第一,西蒙·赖克(Simon Reich, 1990:40)指出:“与共产党政权不同,法西斯政府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调门和内容上都是民族主义性质的。”这个思想体系运用共有的历史和血缘关系,重新解释不同社会阶级的关系;比如所有日本人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天皇则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在法西斯的经济思想中,经济是有国界的,政府对外资和内企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在国内,人们应该为公共利益而工作,并使军需产品的产量最大化;同时,还必须制止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意识形态意在培养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95)所说的将一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高度信任(high trust),并对外保持距离。第二,民族国家是战争动员的基本单位,在管制经济中,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直接来自于“国防国家”的理论(Kokubō Kokka)。据饭岛伴士(Iijima Banshi, 1941:202-203)所述,“国防国家”是能够进行全面战争的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政府为了防卫,可以动员一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尽其所能进行战斗;即使在和平时期,政府也可以组织常常受到日常生活需要所驱使的国民力量,并在必要时,将这股力量转入战争。

即使在战争结束之后,这种想法仍在持续,原通产省企业局局长佐桥滋(Sahashi Shigeru,引自 Tsūsanshō, vol. 10, 1990b:52)在贸易自由化前夕提到:

过去有《全国总动员法》,为了战争政府可以通过高压或自上而下的方式动员一切力量。为了使日本成为一流国家中的一流国家,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全国总动员法》,尽管它的形式可能与战时有所不同。如果没有《全国总动员法》来凝聚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人们将会主张并从事

他们自己喜好的事情,日本也将因此而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力量的基础从军事力量变成了财富,民族国家依然是分析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单位。1967年,在关于外资自由化的辩论中,有泽广巳(Arisawa, 1967: 270)写道:“没有经济独立,日本就不会有政治和外交独立。在我们考虑日本人民的幸福与和平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可以作出独立判断的基础”。负责起草政策建议书以应对当时自由化挑战的通产省官员两角良彦(Morozumi Yoshihiko, 1966: 7-8)声称,通产省建立新产业体制的努力,“可能会被当成‘违背国际社会理念的民族主义而受到批评’。但是,这种观点不是一种假想,而是一种现实,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以主权民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世界中”。因此,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 1994: 340)才说:“国家创新体系可以在不牺牲其完整性的条件下融入全球经济。实际上,日本的科学和技术网络一直以强化民族主义的方式与国际相联系。国际网络既不会消除民族体系的意义,也不会减弱技术创新的动机。”

44

生产导向

强烈的生产导向是日本发展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在微观层面上,这一假设是以股东盈利以及各个雇员的工资、闲暇和其他经济收益来衡量的;在宏观层面上,效用最大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消费者的利益来衡量的。而且,效用可能是在短期内最大化的。但是,在日本,体现效用最大化原则的这些措施,一直在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中被其他优先目标弄得无足轻重。简言之,日本人对国家生产力的偏好,反映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58: 10)指出的解决经济发展困境的极端状况:“为了获得更高的人均收入,就必须减少当前消费;为了得到更多的闲暇,必须更严格地安排工作……因此,发展的张力,与其说是已知利润与成本间的张力,不如说是目标与关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无知和误解之间的张力。”

在管制经济中,为战争动员而实现生产最大化被认为是一种公共利益,而私人公司追求利润以及公民个人的消费,则被认为是自私的。战后初期,人们也提出过相同的观点,当时认为,国家能从经济危机中存活的唯一办法,就是生产的最大化。公司利润和对劳动平均分配经济福利相比,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最安全的目

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利润原则曾经短时间卷土重来,但很快就被对生产技术的偏好所取代。20世纪60年代,对生产的偏好又扩展到宏观层面的高增长上,甚至还超过了其他宏观上应考虑的事情,如环境保护和消费者利益等。依据传统的理解,驱使个人和国家赚钱的动力是花钱,而且国家的生产水平将决定它的消费水平。但在日本,消费水平和生产水平却极不相干。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消费者承受的国内价格远远高于任何其他主要工业国的消费者,日本工人的工作时间也仍然长于类似国家工人的工作时间。鉴于日本今天的财富,过度强调生产已不能再用来解释是对贫困或后发展的反应了,而只能是一种不同的经济基本理性的结果,即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 1991:118)所称的生产者经济学。

生产者经济学与消费者导向型经济理论不同,后者视消费为最终商品,而生产者经济学反映的是“一种人类常见的建立和隶属一个帝国并征服邻邦帝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欲望”(Thurow, 1991:118)。在这个体系中,经济人被政治人所取代,政治人进行经济活动的动力是集体的而非个体的。这种经济观点至少可追溯到由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发展观。按照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观点,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是彼此冲突的。生产是国家力量的基础,消费只会削弱这种力量。李斯特指出(List, [1841]1985:133, 144-145):

能积累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拥有财富,即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没有能生产出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话,他就会越来越穷。一个人可以是穷人,但是,如果他拥有可以生产出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话,他就会成为富人。因此,生产财富的能力远比财富本身重要;因为它不仅保证所有物以及已经获得的财富的增加,而且还会保证对已失去的财富的补充。个人如此,整个国家更是如此(国家是不能仅靠租金来过日子的)……国家必须牺牲和放弃一定量的实物财产,来达到获得文化、技术和联合生产的能力;它必须牺牲一些眼前利益以确保其未来收益……如果……保护性关税使价值有所牺牲,却使生产力有所增长,那么它不仅会使国家的物质财富在量上大为增长,而且一旦发生战争,也可以保证本国工业的独立地位。通过工业独立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内繁荣,国家可以顺利地进行对外贸易,扩展其航运业;这将增加它的文明程度,完善它的国内制度,并增强它的对外力量。

是什么使日本人采用了生产者经济学？理查德·塞缪尔斯(Richard Samuels, 1994:ix)认为,是一种每天都刺激着成百万日本人的“不安全”感——一种“普遍焦虑”。我还想指出,这种“普遍焦虑”因1931—1945年战争期间日本人普遍存在的民族危机和外部威胁而被放大,这种情况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在经济目标上的最终偏好。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就有一种必须赶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压力。然而,尽管德国历史学派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生产导向并没有在日本发展主义中占据独大的地位。日本经济思想中的不安全感是有国界的,如果不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就不能对这种感觉作出恰当的理解和解释。日本人迫于这种要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压力,把经济思想的分析单位从个体和社会阶级变成了民族国家;此外,其目的偏好也从个人消费和股东利益转向了国家的生产能力。

管制经济的实践动摇了日本经济思想中正统的自由放任和个人主义的根基。国家利用战争总动员令,迫使私营公司遵循新的经济伦理。依据这一伦理,公益原则代替了利润原则,私营公司将支持重中之重的国家军需品生产,并把它看成是自己的责任(Ryū, 1939)。在管制经济思想中,为军需品生产进行总动员被视为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事。因此,“所有军火需求都应按军事指挥官的要求得到满足,所有平民的需求都应被限制到最小范围”(Arisawa, 1934:80-81)。必须压缩消费,才能实现强制储蓄。而且,在军需品生产中,生产本身就具有最高优先权;生产成本则是次要的问题。

这种目的偏好并不单纯是经济的,而且还是政治的。正如昭和研究会为近卫文麿(Konoe)首相的“新秩序”准备的一份文件中所解释的那样,“战争期间,促进生产是头等紧要的目标,应该在国内通过经济手段来达成。但是,基于利润原则的自由放任经济难以将经济规律与经济伦理整合起来。因此,为了使内部整合成为可能,就必须抑制自由放任经济的利润原则”(参见 Sakai, 1979:346)。这一新的经济伦理“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禁止在经济活动中将利润和个人利益置于首位”(Arisawa, 1937b:8-9)。战后初期,当日本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物资短缺时,优先生产取向得以强化。

战后,日本的不安全感或普遍焦虑并没有消失。国家危机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战后日本的经济意识形态中,这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出口或是死亡”的口号

中得到反映,也被20世纪60年代贸易和资本投资自由化期间,第二次黑船即将来临的看法所证实。面对这些可以感知的危机,战时为了集体生存而牺牲其他需求以增强国家生产力的做法,被继承下来,并统治了日本经济几十年。

在20世纪50年代促进出口的经济范式中,日本产业在国家生产力上的重心,从目标转移到了手段——即从生产的数量转移到了质量和技术。因为重化工业产品是国际贸易中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所以日本公司积极地在生产设备和技术转移上进行投资,忽视商业企业经营中的短期盈利。他们认为,重化工业中的实际知识、生产技术和新产品的发展,需要时间和精力。在国际竞争中,这些产业中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达到规模经济后才能实现(Itō, Kiyono, Okuno and Suzumura, 1988:104-105)。

48 20世纪60年代,自由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外部压力被认为是对日本经济的巨大威胁。在这种环境下,高增长范式将日本人对国家生产力的理解,从产业层面拓展到了整体经济层面。1961年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表明,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目标,基本上是通过几个战略性行业中的大企业来提升国家竞争力。但到了1960年,技术创新已经延伸到了日本的中小企业之中。为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国外产品竞争,日本必须改进基础设施,并通过进一步向重化工业转移来升级产业结构,促进贸易,以及开发人力资本、科学和技术。正如下村治(Shimomura Osamu, 1962)所说,日本的高增长并不简单地意味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应该说,日本的高增长暗示着,通过使生产过程合理化和对生产设备投资,带来了生产率的实际提高。一旦产业结构升级,日本就能够加强出口能力,并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经济战略观

为了提升国家生产力,日本发展主义确立了三项总原则,每项原则都用特定的手段予以支持。

第一个原则是战略性经济观。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视为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控制的自然体系,并且假定供给和需求将自动达到均衡。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将经济视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人类可以干预甚或操纵其运行。产业化是一项社会工程——可以目标明确地追赶西方的集体努力过程,是可以计划和支持的过

程(Fallows, 1994)。这种经济观可用提升产业结构(*Sangyō Kōzō no Kōdoka*)的观念来说明。按照查默斯·约翰逊的说法,产业结构一直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产业结构涉及“国民总产出中农业、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在制造业中涉及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在产业中还涉及劳动密集度和知识密集度的比例”(Chalmers Johnson, 1982:28)。这一概念显示着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对经济的战略性干预,来使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最大化。

49

《1949年国际贸易和产业白皮书》描述了产业结构的这一逻辑。白皮书提出,日本经济在其国土范围内是“不完备的”,因为日本本国资源很少,因此,只要有一天离开进口,日本都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经济。正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必须出口,这样才能增加进口所需的资金;不走向海外,就不能完成日本经济的生产循环。白皮书指出,“没有对外贸易,国内生产和就业将会萎缩,从而导致极短的经济周期。其结果,我们就不能维持合理的国民生活水平。”古典经济理论强调通过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与此不同的是,据伊藤元重(Itō Monoshige)及其同事的说法,日本产业政策重在通过产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日本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的多少,取决于日本与其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结构,也就是说,要由日本进出口的种类和数量来决定。反过来,贸易结构又是由日本的产业结构决定的,而产业结构依赖于技术、生产设备和生产要素禀赋。”虽然理想的产业结构眼下并不存在,但我们应该去想,应该去做(Itō *et al.*, 1988:34-35)。

产业结构是日本产业政策中的首要概念,是大萧条和昭和初期战争动员的产物。这一概念在经济与国防关系的讨论中变得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工业国家进行的国民动员,极大地拓展了日本人对现代战争的理解。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经济思想中居主导地位的总体战争理论,强调的是战争和经济间的密切联系。*Kōgi Kokubō*[广义的“国防”]就是其主要观点。面对终将发生的与别国的军事冲突,经济从和平时期向战时的转变成了重中之重。为了动员整个经济为战争做准备,德国和日本政府按照其对军需品生产的重要性的认识,将产业和公司分为不同的等级,然后对在国防上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和产业,在资源分配中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从这一意义上说,产业结构的概念阐述的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如何从战略上对经济进行定位。

50

产业结构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它主张重化工业的发

展。俗话说“没有军需品行业，只有军需品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整个日本国民经济组织成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军需品生产体系。民用品生产向军需品生产的转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自然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转换则是通过政府计划强制实施的。当时的说法是：

没有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和现代化学工业，没有金属行业中的先进技术和精密加工的培训，一国经济将完全没有生产先进武器的基础……如果没有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就不可能构建日本军需品生产体系(Arisawa, 1937b:72)。

第二，产业结构的概念主张国家进行战略干预。受战争动员压力的驱使，日本没有时间等待市场力量对国家推动经济向重化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作出反应。为实施管制经济，政府不得不强行控制物资分配。正如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 1937c:1-2)所指出的，在紧急情况下，

已经不可能简单地依靠企业家的主动性来实现目标了。现在，政府必须行使自己的权利，并直接承担起在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在准战争(semi-war)状况下，国家必须用高压来领导经济。这就是管制经济的真谛。

提升产业结构的战时行为给战后日本经济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 1949c:85-86)评论道：

51

[战时]提升产业结构的驱动力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体对独立的技术开发的需要；[战后]产业结构必须根据比较成本来进行调整。不过，在产业结构的提升过程中获得的工厂设备、熟练技术和训练有素的员工是不会消失的，它们还可以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意义上而言，提升产业结构可被看作是战争遗产中仅存的好处。

战后时代，尽管人们相信国家力量的基础已经从军事转向了贸易，构成产业结构基础的经济战略观却依然具有影响。首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的资本非常有限。人们认为，为了将金融资源集中于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仍然有必要实施区别对待的政策。其次，即使在和平时期，重化工业对日本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重化工业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们在国际贸易中比别的产业具有更多的附加值。战时在机械、化学和运输业形成的生产力，为战后重化工

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再次,尽管国家干预的形式随时间而改变,但战争期间积累起来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依然是引导经济发展的强有力工具。20世纪60年代后,私营部门在决定日本经济的方向上获得了更多权力。尽管美国的分析家在评估日本经济中政府扮演的角色时看法不一,比如有人称其为计划理性(Johnson, 1982),有人称其为技术民族主义(Samuels, 1994),有人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Calder, 1994),但他们一致认为,日本提升产业结构的做法不同于自由放任经济中提升产业结构的做法。也就是说,不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谁最重要,日本的经济主体依然会为了获得国际竞争力而对经济进行战略性的、有目的的干预,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日本在贸易中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仍然不被视为自然赐予的东西,而是被看成社会工程的对象。

有组织的竞争

日本发展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是防止过度竞争(*Kado Kyōsō no haijo*),或者说是有组织的竞争。依照正统的或是自由资本主义的观点,“从定义上看,竞争是有益的,因为它会排除定价高的生产者。排除定价高的生产者是一件好事,因为更有效率的生产者会使消费者得到更便宜的货品”(Fallows, 1994:183-184)。但是,日本人却不是这样看待竞争的。两角良彦(Morozumi Yoshihiko, 1966:61)说,如果竞争过度,“竞争中,国民经济的损失[可能]超过收益。”他说,当无数小企业在市场上彼此竞争时,他们的收益会下降,且整个行业的资本回报可能会是负数。更重要的是,过度竞争会使资本和劳动超过需要而集中在一个行业;最后,竞争不可能为日本经济创造最有效率的生产体系。过度竞争的观点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尽管竞争会不可避免地创造摩擦和浪费,但要从市场上消除无效率的公司,把资源从已变得毫无竞争力的行业转移出去,这些社会成本又是必要的(Itō *et al.*, 1998)。但是,在日本发展主义那里,生产技术被认为是使日本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日本必须扩大重化工业中的企业规模。其理由是,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数量巨大的资本,而且,国家必须加强公司在研究和开发、投资以及合作上的整合,以创建具有适度规模经济,并可参与战略性行业国家竞争的公司。因此,防止过度竞争的观念,反映了政府在一国经济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以提升产业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的意愿。这个观

念涉及一种价值评判：市场竞争常常会超过经济主体的希望水平，因此必须加以制约。

限制竞争的原则出现于1931—1945年间，当时日本人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据商工省前高级官员吉野信次所说，尽管竞争激励了现代产业的发展，但“各种各样不好的东西也逐渐出现……坚持绝对的自由不可能把产业界从当前的混乱中拯救出来。产业需要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和一种有效的控制手段”（引自 Johnson, 1982:108）。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用统制会取代了卡特尔，当时有议论说：

过去的卡特尔是为促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而建立的。因此，它们反对为了国家利益或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牺牲自身利益……此外，作为一个联盟，它们经常按照集体决策、机会平等和法律依据来行事。[他们不会]根据国家优先的原则来执行管制经济。正因为这些原因，统制会不得不采用领导者原则（Shōkō Gyōsei Kenkyūkai, 1942:20）。

在战后的日本，由日本政府采取的反过度竞争措施，致使日本经济中出现了两个制度性设置：政府规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

政府规制（state regulation）的含义与查默斯·约翰逊的管制型政府（regulatory state）的含义截然不同；约翰逊使用管制型政府这一术语是相对于发展导向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而言的。在管制型政府，例如美国政府，其规制强调的是竞争原则。相反，在发展导向型政府那里，规制决定的是允许多少竞争；使用过度竞争（excessive competition）这一术语则与减少各行业中的竞争需求相联系。官员们认为，如果“一个行业由少数几家公司组成，且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又是稳定的，它们的排名，即销售、盈利和雇员数量等因素都不发生变动”，那么这种状态就是理想状态（Komiya, 1988:11）。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中还有11 000多条规制条款在起作用。正如小宫隆太郎所指出的，政府规制的广泛使用导致了主管部门体制（Genkyōku system）的出现。在这种体制下，“那些其辖下某家企业做砸了的部局、处或者科，都希望该行业仍然能够有秩序、有组织，没有任何大的波动出现”（Komiya Ryūtarō, 1988:11）。

有几种非市场机制在治理着经济。按照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 1987）的说法，关联公司集团在日本包括两种形式的基于社会关系的商业合同。关联合约是指，主要的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共同分担困难时期的损失，共享景气时期的收益；

合约认可等级关系,认可与此相应的盈利分配和相应的风险承担;禁止实力较强的一方利用讨价还价的优势,来减少萧条期的订货或增强工人之间的竞争。大公司只在消费市场上以及在开发新的消费产品时才相互竞争。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他们维持着“稳定的”、“负责的”合作关系(Dore, 1987:175-178)。在这种合作关系中,价值和情感维系着责任与义务,所以,交易可能无法反映市场的价格信号。在日本经济中,卡特尔是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一种合法的企业共同行为,而且各种不同的行业协会在价格调整、行业价格形成、优先交易权、市场与大买主价格以及对日资海外企业产品的偏向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Tilton, 1996)。依据韦伯学派的分析方法,这些非市场机制是“一种基于强烈的集体共同目的的有效行为管制”,这种管制在降低经济交易的不确定性中,排除了“局外人”(Bendix, 1960:65)。这样,一种冷冰冰的“商业逻辑”就在贸易伙伴相互信任的文化表象背后发挥着作用,而看起来已经达到无私状态的日本人,实际上正在努力实现完全理性的目标(Ouchi, 1981:85)。由于过度的政府管制和关联公司集团的作用,由于日本许多经济部门中缺乏竞争,日本的消费品价格极高,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极为困难。撤销管制和反垄断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心议题。

54

然而,认为日本经济中不存在任何竞争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日本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通常如概念本身所表述的那样,是一种过度竞争),企业家精神一直都是日本国家竞争力的驱动力。然而,日本的竞争却从来都不是自由放任的竞争。防止过度竞争的原则意味着日本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只能在政府界定的范围内竞争。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竞争才是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在日本政府确定了战略性产业之后,政府在最初阶段就是通过实施进口关税和进口限制,并通过给日本公司提供低息贷款来阻止外国企业的竞争。而日本公司间的竞争则极为激烈,因为所有公司都打算在已具备高增长潜势的行业中分得一杯羹(Murakami, 1992),这就导致了过度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规制和行政引导,限制每个行业中的竞争类型和程度,从而形成了政府干预。这些机制通常并不允许中小规模的企业与大公司进行横向竞争;相反,他们将这些公司组织成一个等级体系,在这一等级体系中,小企业是作为一种支持性力量而非竞争性力量来为大企业工作的。不论是通过减少竞争者的数量以避免过度竞争,还是通过在资源配置中采用区别对待的政策为一些竞争者提供优惠待遇,二者的目的都是组织市

55

场,而不是替代市场。这一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政策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将日本发展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对外国公司来说,限制竞争有一个直接含义。有泽广巳(Morozumi Yoshihiko, 1966:115)曾经说过:“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需要实施反倾销关税来阻止外国垄断者的倾销行为。我们也需要有种种对策来对抗其他国家采用的国际经济政策。”在日本发展主义思想中,外国投资被认为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有人认为,和平时期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已不再只与国防和军火相关了。它还包括“外国资本通过利用自己支配市场的力量,在经济交易中强加不利条件,并采取损害日本经济利益的行动”(Morozumi, 1966:135)。尽管外资自由化被视为不可避免,但人们却相信,日本必须保护自身,以避免外国资本控制有很大增长潜力且最为盈利的行业,从而给自己带来危险。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日本就可能沦为经济殖民地。如果沦为经济殖民地,大多数利润将会为外国公司获取,日本也不能独立地实施产业化(Arisawa, 1967)。

56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限制竞争的做法不仅在资源配置上无效,而且也不公平,因为对市场竞争的约束会导致垄断。但是,日本发展主义却认为,这一问题与提升产业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相关。有泽广巳曾经证明,国家生产力和消费者利益间的冲突是正常的。他承认,大企业和垄断资本总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还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要国家政策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也就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积累国家生产力的努力通常是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仅国家利益,而且任何公平的政策,对日本经济来说都会是一把双刃剑。无条件地强调公平政策,诸如严格的反垄断政策,将会使国家失去自身的国际竞争力(Arisawa Hiromi, 1967:274)。

许多分析家认为,这种亲大企业的政策造成了经济的不平等,即造成了二元结构(*nijū kōzō*),也就是代表现代工业的大企业和代表前现代工业的中小企业共存的局面。然而,在日本发展主义中,这种二元结构对产业化来说,既是一个阻碍,也是一种优势。一方面,二元结构可能会加剧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间资本和资源的竞争,这种情形将会降低规模经济,并削弱日本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它可以将大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与中小企业的廉价劳动力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共同与国外竞争者竞争。同时,由于大中小企业都加入到国际竞争中,这种结构可以将

经济发展的成果惠泽社会各个阶层。

反利润原则

发展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是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反利润原则。这一原则在提升生产率(*seisansei no kōjō*)的观念中得到反映。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顶级专家是中山伊知郎。根据他的说法,生产率涉及投入产出间的效率关系,但强调的却是劳动。从长期来看,生产率可直接归因于创新: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技术的采用、新资源和新市场的发现以及企业的合理化。生产的提升会刺激经济增长并提升产业结构。然而,从短期看,生产率会直接受到劳动的影响,因为生产率与价格、工资和分配密切相关(Nakayama Ichiro, [1956]1972,卷14:270-319)。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以企业内工会为标志的日本式管理,是一种促进生产率的制度,这一制度主要通过确定谁拥有公司,以及权利、责任、收益、风险和信息等如何在隶属于公司的各方之间分配来促进生产率的(Ozaki, 1988:834)。

57

在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中,金融市场起着主要作用,个人股票持有者通过金融市场获取收益,劳动力市场则可以使雇员改善自己的收入和其他经济福利。相反,在日本资本主义中,这两个市场都微不足道:金融市场没有为股东收益最大化提供机会(Aoki, 1989; Dore, 1973, 1987; Thurow, 1992);同时,劳动力市场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作用也不大,尽管近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Dore, 1973, 1987; Ouchi, 1981; Vogel, 1979)。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 1991:125)指出,在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中,企业管理目标的优先顺序是,股东居首,顾客消费者次之,雇员最后。在日本资本主义中,这一顺序是倒过来的。在日本,盎格鲁—撒克逊式企业体系被认为是极不合理的,理由是:

它赋予资本家的权力太大,使资本家可以控制其所拥有的整个公司的命运。相对于全体公司员工来说,资本家在人数上只是极少数,是典型的不参与公司生产活动的局外人,且他们持有的股份的价值也经常只是公司全部资产价值的一小部分(Ozaki, 1988:834)。

就业稳定被认为对提升生产率非常重要,因为现代经济常常会在提升生产率与就业之间难以调和。有效地组织物资和劳动意味着,同样的产出可以通过较少的投入进行生产,而同样的投入可以创造更多的产出。换句话说,采用先进的生产技

术会将部分工人赶出生产过程,因而产生失业问题。但是,日本的管理却通过终身雇佣制同时达到了这两个目标。

58 生产率的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战争动员中逐渐形成的。20世纪40年代末,由民主改革者发起的提高劳动力运动引起生产率概念的混乱。50年代末,生产率概念在生产率运动中得到了制度化。战争期间构成了当代日本管理的所有三个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都已存在。“对人力资源的控制”在《全国总动员法》中占了七个条款。1941年10月,所有年龄在16—40岁的日本男性和年龄在16—25岁的未婚日本女性,都必须按规定由国家登记他们的“职业能力”。因为军需品生产的迅速增加使熟练工人极为短缺,所以国家推出各种培训。为了确保劳动配置符合战争动员的需要,政府控制就业市场,并禁止工人在公司间跳槽。这种做法大大鼓励了终身雇佣制的实施。正如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 1985:275)所指出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和军需品行业的生产成本,国家也开始采用所谓的生计工资了,“生计工资是随着年龄、资历和逐渐增加的家庭责任而自动增长的工资,这种工资能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物质需求。”同时,国家明令禁止工会的所有活动,且所有工会都被迫加入了由公司构成的产业报国会(*Sangyō Hōkoku Renmei*)。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产业报国会的首要使命就是提高生产率。

从意识形态上讲,这一过程是由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河内一男(Ōkōchi Kazuo)提出的。大河内一男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与法西斯主义所主张的强制平等(compulsory equality)结合了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认为,“为了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很有必要进行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改革”(Takabatake, 1960:204)。为了动员日本工人进入管制经济的政府项目,就必须改善劳动力的工作状况。如果没有保护和培训劳动力的社会政策,资本就不能够维持再生产周期。这并不是针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宣言,而是经济的内在逻辑。大河内一男认为,私营公司在商业运行中的利润原则,是战争动员令的主要障碍。按照利润原则,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须尽可能少地支付工人工资。山内之靖(Yamanouchi, 1995a:11-12)从另一个略有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同一个问题。他认为,在为总体战争动员所有人力资源的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存在是最大的政治障碍。因此,无论日本还是德国的法西斯运动,都要通过国家强制来制造平等,以使这些社会群体

59

在本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中承担起他们的政治责任。

战后,日本人对生产率概念的理解与在生产技术中建立比较优势的计划紧密相关。随着民主改革期间工人运动的出现,以及20世纪40年代末合理化运动中管理层实施的大规模解雇,战时遗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受到了强烈挑战。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式管理又死灰复燃,并且走上了制度化道路。战时关于生产率的想法认为,生产率是战争总动员所必需的。在日本经济面临促进出口的强大压力时,新的关于生产率的想法更强调工人在吸收新的生产技术和提升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当时,日本公司正面临着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 1994:137)所称的“增长瓶颈”,即学习——“获得使产品具有市场价值的知识”——和监管——“交易双方决定如何从学习中获益,并按双方同意的标准进行分配”——之间的“增长瓶颈”。如果不给工人提供工作保障并增加其工资,日本公司就不会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上获得工人的合作。

日本企业是怎样解决学习和监管间的矛盾的呢?他们接受了由生产率本部副会长中山伊知郎提出的生产率运动三原则。第一,提高生产率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就业,政府和企业必须作出各种努力来防止失业。第二,管理层必须根据各家公司的实际状况,向工人咨询如何提高生产率。第三,提高生产率所创造的收益,必须在管理层和工人间公平地分配(Nakayama, [1956]1972)。尽管这三条原则意味着劳资关系的改善,但它们并不是对传统的和谐价值的一种礼仪式的确认,而是对管理层和工人关系实实在在的合理化。由于采用了这些原则,日本企业得以通过分享由生产技术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从而使管理层和劳工间的内部冲突外部化,并将公司内相互竞争的“利益分配同盟”(Olson, 1982)转变为与其他公司竞争的“合作生产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讲,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以增加价值创造的方式”,帮助日本企业在企业和工人间分配经济福利(Lazonick, 1991: 70)。结果,日本企业在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增强。村上泰亮曾经用一个更宽泛的分析框架对此展开讨论。他认为,在发展主义中,政府必须用一个覆盖面较宽的收入政策为其产业政策作补充,其原因是私营企业间的竞争并不一定会给市场带来和谐的均衡,发展主义将会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为了维持发展导向计划,必须制定出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制度。否则,这些发展计划或许会被政治的不稳定所破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收入平等和工作保障才成为

两个重要议题(Murakami, 1994:183, 196-200)。

日本发展主义的理论基础

日本发展主义的理论根源可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明治维新后,随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日本出现,德国历史学派是第一种在日本被制度化的经济学观点。在日本学术界和政府政策制定中,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曾经在几十年中占据着主导地位(Pyle, 1974)。

明治维新以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日本出现。据杉原四郎所说(Sugihara Shiro, 1990:10-11, 16), 1868年以前没有什么经济学的书传入日本。*Rangaku* [兰学]的主要学科是军事、医疗、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明治维新以后,由政府发起的经济发展计划使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成为一个时髦。在19世纪70年代的“人权运动”中,日本翻译了许多英国古典学派的著作。到1882年时,日本的高等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已引进了大约2200本经济学著作,其中多数是英国经济理论著作。从卷数上看,受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影响的亨利·福西特的书位居第一。杉原四郎还指出,19世纪80年代,在日本政府决定依据德国模式构建其政治制度后,“全力引进的是作为德国社会科学基石的德国经济学。同时,英国经济学以及所有英国保守派社会科学的影响一起式微了。”

1897年,社会政策联盟建立。这是首家全国性的经济学学术团体,也是德国历史学派在日本的主要代表。该学会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公开宣言中,表达了他们的思想立场:

我们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因为极度自私的动机和过度的自由竞争。将会加深贫富差距。我们也反对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破坏现存经济制度,并消灭资产阶级,而这一目的将会扰乱国家发展的进程。我们的信条是维持私有经济体制,我们将会在这一认识框架内,通过个人努力和政府力量来避免阶级冲突,寻求社会和谐(Sumitani, 1986:115)。

从明治中期开始,贯穿整个大正时期,德国历史学派思想一直都是政府和学术界的主导思想(Pyle, 1974)。

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表明的,1931—1945年间,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是日本产

业政策的主导思想。今天任何一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中都没有这一理论,但是,它对于管制经济兴起的影响却要大于任何经济理论。

从20世纪30—60年代,正如三个连续的产业政策范式所显示的,日本发展主义受到西方经济学中三大思想家的启发:他们是卡尔·马克思、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体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计划经济的概念与德国的总体战理论一起,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管制经济的思想基础;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和企业家精神为50年代的管理改革提供了主旨;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则为60年代的高增长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除去将在下面的实证章节中进行详细分析外,这里要解释日本经济学家怎样受这三位经济学巨擘的启发,构建出他们自己的分析框架。有两件事可以说明日本经济学界如何看待这三位经济学巨人对日本的重要性。第一,1983年,日本经济学家隆重纪念了这三位曾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伟大思想家的百年诞辰或忌辰。卡尔·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分别出生于1883年2月8日和6月5日。日本的两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东洋经济》(*Tōyō Keizai*)和《经济学家》(*Ekonomisuto*),各出版了一期特刊来表示他们对这几位伟大导师的崇敬。据都留重人说,这几位思想家对日本经济学家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凯恩斯是一位与权力和财富紧密相关的知识贵族;熊彼特是一位有着孤独灵魂且孤芳自赏的博学者;而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并拥有令人惊异的预测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眼光”(Tsuru, 1983a:1)。实践派经济学家从马克思那儿学习到经验数据对经济分析的重要性;从熊彼特那里了解到经济理论的局限性;从凯恩斯那里知道经济学怎样才能具有明显的民族性(Tsuru, 1983b:117-119)。

第二,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对实践派经济学的影响,在其政策导向中清晰可辨。1967年,当时经济奇迹已经成为现实,《东洋经济新报》社(*Toyo Keizai Shinposha*)对八位杰出的日本经济学家进行了一系列采访,请他们谈谈对日本经济的总体看法,这八位是: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都留重人、下村治、大内兵卫(*Ōuchi Hyoe*)、高桥龟吉(*Takahashi Kamekichi*)和堀江重人(*Horie Shigeo*) (本书对这八位中的大多数人都进行了讨论)。后来,采访人小泉明试图将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分为三类:以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以约翰·

63 梅纳德·凯恩斯为代表的混合型经济,和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他发现这八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倾向不是与凯恩斯相似,就是与马克思相似,没有人赞成哈耶克,尽管那时候哈耶克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这一代日本经济学家喜欢的是动态的熊彼特,而不是静态的哈耶克。另一位采访人宫崎义一指出,这些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或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加上长期的熊彼特经济学主张,或是短期的凯恩斯主义加上长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Koizumi and Miyazaki, 1967b:313-318)。当然,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的思想与实践派经济学融合之后,就不再是用变量和归纳进行充分表述的、完整或全面的经济理论了,而成了一个综合各种适应于本地情况的不同观点的混合物。

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理论中到底有些什么特殊因素启发了不同时期日本发展主义的政策范式呢?

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经济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玉野井芳郎(Tamanoi Yoshiro)评论说:“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的唯一的外国理论……不仅在战前,就是在今天,也仍在日本知识界发挥着巨大影响。在此意义上,人们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讨论现代日本”(Arisawa and Tamanoi, 1973:62)。许多实践派经济学家都认同马克思主义在经济计划方面的想法,但同时,他们在某些重要方面又不同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例如,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国际主义相比,有泽广巳的看法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它强调在民族国家间,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间的竞争中,增强日本的竞争力。相应地,这种观点强调基于技术的生产力,强调大企业在创新中的作用,而不是强调生产关系,也不将大企业作为垄断资本的代表来对待。而且,有泽广巳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要避免阶级冲突,就要提倡管理层和劳工的合作,尤其在国家处于危机中时,更要如此。

64 熊彼特在日本的声誉要高于在其他任何国家。在日本,他的创新观念不再是理解经济增长动力的学术概念,而是“提升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增强日本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的实际策略。后藤誉之助曾解释他在《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所介绍的熊彼特创新观念的含义。他说:“依据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涉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组织和新市场的创造。在这本《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创新的含义被进一步拓宽,它意味着日本经济结构的现代化”(Gotō, 1956:14)。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日本的应用,不像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那样,是作为调整市场波动的宏观经济政策,或是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政策,而是为了满足自由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国际挑战的需要,作为引导私营企业创新的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而加以应用的。下村治(Shimomura Osamu, 1967:168)曾就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含义,对福利国家和日本发展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应用,

并不仅仅局限于需要有效需求的场合。如果是那样的话,发展的问题就会混同于充分就业的问题。发展的本质在于创新。发展是由提高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和启发人们的创造力来支持的。简言之,它的目标是为新的、更高的生产率铺平道路。

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 1994)指出,为维持经济增长而倡导长期政府干预,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但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因为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经济中,这显得太激进了。然而,日本经济却有着政府干预的长期传统,所以这一观点才在日本广受好评。

经济思想的另一种传统

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家巨大的经济挑战。然而,来自日本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挑战却是思想上的,因为日本发展主义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分庭抗礼(Pyle, 1974)。

村上泰亮(Murakami, 1992, Vol. 2:143)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本主义作为其研究对象,但其概念本身却与历史无关。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将产业化作为其研究对象,其概念是历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点实际上放在全部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调查其事实,揭示其真相。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强调日本产业化中生产、分配、交换,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消耗的具体过程。日本发展主义反对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规律无所不在的说法,坚持经济理论的相对性。这个观点与凡勃伦(Veblen)的主张一致。凡勃伦认为,因为经济生活状况极易发生变化,所以经济学是一门演进的科学。从学术定义上讲,大多数实践派经济学家不是属于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Marukei)就是属于现代经济学(Kinkei),但在政策问题上,他们都克服了单一经济信条的思想约束,有选择地借鉴有用的东西。

从方法论上讲,新古典经济学通过逻辑的和数学的演绎推导出经济法则,但忽视现存社会中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民族性特征,以及与经济体系有关的跨文化的资料(Schneider, 1974:23)。一旦通过思辨推出了逻辑原则,这些逻辑原则就成了“产生”或演绎出其他社会的“资料”和“事实”的公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就是由这种方法推导出的派生物和万能物(Gudeman, 1986:32)。相反,实践派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都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其基础是对经济现实的实证研究,关注的是日本经济所面临的当下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解释的是作为个人行为集体的宏观经济现象。在这种意义上,佐和隆光(Sawa Takamitsu; [1982]1989:17)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19世纪出现的物理学帝国主义(physics imperialism)的影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物理学中的原子化方法相似。相反,日本发展主义是从制度上看待经济现象的,强调的是民族国家怎样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增加财富,而提高生产力则要利用国家产业政策、商业网络和日本式管理。

66

最后,新古典经济学家宣称不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们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对具体产业相对价值的评价持中立立场。相反,日本发展主义则视经济为具有道德标准的社会体系。因此,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父)约翰·尼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所描述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特征,是对日本发展主义代表性观点的精确总结:

该学派明确说自己具有道德;它将政治经济学视为高度伦理性的,视为与人类生活最重要的问题相关。这门科学不仅要阐明推动经济活动的动机;也必须掂量和比较它们在道德方面的价值。它必须确定一个适当的生产和福利分配的标准,这样才能满足公平和道义的要求。它必须树立一个涉及学术、道德和物质生活诸方面的经济发展的理想;它必须讨论方法和手段——例如强化合理的动机,传播工业生活中合理的风俗和习惯,以及政府的直接干预——并通过这些来实现(Keynes, [1917] 1984:80)。

以上的分析阐述了现代日本经济思想中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这些经济思

想启发了日本的产业政策。在接下来的实证章节中,我将论证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观点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演进的,我要证明,历史环境中的哪些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些变化。

注释

- [1] 1853年,美国的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准将率领四艘(黑色)战船到达了日本,要求美国船舰能进入日本港口。这件事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危机,并最终导致了明治维新。今天,黑船通常被作为一种隐喻,借指重要的外部挑战,尤其是指外国要求开放日本市场的做法。
- [2] 谈合(Dangō),指对政府建设项目提交报价前,由竞争者确定价格的行为。

第 3 章 管制经济

在鹤见俊辅(Tsurumi Shunsuke)所谓的“十五年战争”期间,管制经济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范式。这一时期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而截止期是1945年8月15日,即日本向盟军投降日。1931—1945年这一时期,“历史服从于社会变化;国家的命运与它们在制度转换中的作用相联”(Polanyi, [1944]1957:28)。作为对大萧条的回应,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政这三股“全新的力量”,写下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在此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强烈地影响着它战后的发展。

在描述这一时期对战后日本历史的重要意义时,伊藤隆(Itō Takashi, 1976:16-20)指出,如果不考虑这15年来的经历,就不能很好地解释战后日本历史的许多特殊现象。中村隆英(Nakamura Takafusa, 1974a:164)写道:“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直接控制物资和货币的体制几乎消失殆尽。然而,它的许多变体却作为战争的遗产被保留了下来,并构成了当今经济制度的基础。”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2)认为,这个基础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日本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按照小宫隆太郎(Ryūtarō Komiya, 1986:23)所说,有过那段经历的日本经济学家,“都在有意无意中受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及其战时经济控制的影响。他们认为,政府必须实施强势领导,制定计划,引导并规制整个产业活动中私营部门的活动。”

日本最近出版的研究报告强调,1931—1945年对当今日本经济体制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重要意义。冈崎哲二和奥野正宽(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1993b:ii-iii)甚至有些夸张地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日本经济基本上是盎格鲁—撒克逊式古典市场经济形态……这种古典经济体系现在转

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日本式’经济体系。具体而言,当代经济体制源自为战争动员而创造出来的‘总体战争体制’。”野口悠纪雄(Noguchi Yukio, 1995)也说,日本经济是在战争期间变得“陌生的”。今天的日本经济仍然靠战争体制运行,战争遗产的延续不仅反映在制度中,而且反映在经济原则中。强调生产和反对竞争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两个重要原则。

那么,日本资本主义脱离其1930年前的做法的动力是什么呢?考虑到世界资本主义大转变这一共同历史经验,我们应该将日本的经历作为类似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历来对待,还是应该将它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在本章中,我将证明,尽管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大萧条,但日本对大萧条的回应却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法西斯主义相同。

日本学者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时,法西斯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这一议题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法西斯主义被认为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集中在它的演进和结构上。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一时,很多研究开始集中探讨日本现代经济政策是怎样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60年代的争论主要针对战前和战后的联系。到了70年代,日本学术界把注意力扩展到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gendai shihon shugiron*)一直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Hara, 1982:3-4)。20世纪90年代以前,与现代性相比,法西斯主义基本上被认为是非理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内之靖(Yamanouchi Yasushi)及其合作者认为总体战争理论对现代社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法西斯主义和新政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梳理成一个相互一致的理论(Hooks and Jussaume, 1995; Prinz, 1995; Yamanouchi, 1995a)。山内之靖对法西斯主义的不同方面作了两种区分。第一,法西斯主义在外部对其他种族群体采取了种族歧视政策,但在内部,却打算消除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距(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也要考虑国内事务的压力)。第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以武力统治世界——当然是非理性的。尽管如此,为了实现这个非理性目标,法西斯的行动方案却采取了许多合理的措施。为了动员其国民投身征服世界的行动,法西斯政权试图通过强制性平等(*Gleichschaltung*)和合理化社会,来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的相互排斥(Yamanouchi, 1995a:11-12)。

在英语文献中,人们一直拒绝将法西斯主义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用来解

释 1931—1945 年间日本政治的本质。人们普遍认为,“法西斯或许是整个政治图景的一部分,但只有极少部分在政治领域通行”(Duus and Okimoto, 1979:67)。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形相比,日本法西斯主义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对最高领袖的狂热崇拜。但是,日本法西斯主义重点进行了土地改革,军职人员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Maruyama, 1967)。然而,正如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 1991:334)所指出的,拒绝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来分析 1931—1945 年的日本历史,反映了“一种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一种显而易见的唯名论”。戈登(Gordon, 1991:335)认为,我们并不是要从德国和意大利那里获取一种标准尺度,我们应该强调“评价新政权及其所采用的共同方案的共同理念”。法西斯主义作为“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出现在不同国家的共同历史进程中,或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提供许多重大启示。正如西蒙·赖克(Simon Reich, 1990)所证明的,那些经历过法西斯政体的国家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之处不仅当时就有,而且在战后的经济政策中也存在。通过强调有限多元主义的幸存而否认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实际上是无视受法西斯主义强烈影响的重要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变化。我不想采用“僵化的历史分期法”或“有关正常发展模式的武断假设”(Duus and Okimoto, 1979:65)(二者都会导致对历史进行简单定性的观点),我宁愿将法西斯主义作为在 1931—1945 年间影响日本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一个重要变量。

70 在本章中,我首先考察 1931—1945 年间日本经济的治理是怎样脱离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的轨道的。我并不认为这个时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变化与 1930 年前没有任何关系,我所要强调的是变化本身的重要性。政府作为重要角色出现在经济舞台上,是在大萧条的余殃以及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和其他国家出现日益紧张的国际关系之际。在这种环境下,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创新,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政府不仅大力强化其计划能力,还实施了对资源配置的严密控制。受政府产业政策的影响,产业组织也在 1931—1945 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要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开始对经济实施管制,政府只能倚重非政府机构来控制经济。卡特尔、统制会、主银行制度、分包和产业报国会,都成了约束市场力量的机制。制度和思想意识的重大转变,表明了日本产业政策中发展主义的崛起。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是怎样对这种转变产生影响的呢?我将在一个宽广的历史环境中描述法西斯主义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首先,日本与西方国家会不

可避免地发生武力冲突的观点,催生了经济战略观的出现。日本人相信,在大萧条之后的国际经济中,集团经济(*bloc economy*)的趋势正在替代自由贸易趋势,其结果必然加剧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受到了西方列强的种族歧视。日本迟早都会为了重新确定国际秩序而卷入与西方国家的全面战争中。为了准备全面战争,日本必须围绕国防来组织整个经济。

其次,为了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挑战,日本出现了两次民族主义运动,这就将日本经济意识形态的分析单位从个人和社会阶层转变为民族国家。由前共产党人发起的转向运动(*tenkō*)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和阶级斗争的主张,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国家革新(*kokka kakushin*)运动向代表自由放任原则的个人主义发起了全面攻势,公共利益取代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成为重点,而且民族国家成为分析形势和制定经济战略的唯一合适角度。

再次,通过智囊团——联系学术界与高层政界的特殊渠道——外国经济思想的传播强烈影响了1931—1945年间日本政府政策的制定。德国的总体战争(*der totale krieg*)理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践,以及美国的新政,都得到了认真的研究,这些都为管制经济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大萧条期间的经济困境使日本人相信,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了。因为个体经济主体会依照利润原则来行事,所以,市场就不能为战争动员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必须为达到这个目标承担领导责任。

最后,在管制经济中演化的制度,做为产业政策的政治产物,受到了政府结构和政府与商界关系的制约。加强政府协调政策的能力,遭到了植根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政府各部门本位主义的强烈抵制。尽管做出了努力,政府直到1943年才得以将计划权收归中央,并由单一的官僚机构来实施经济管理。同时,尽管政府已经获得了控制经济的大权,但由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反共产主义的倾向的支持,私营部门依然阻止了政府的一些激进政策行为,例如对利润的控制,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及给予管理人员正式地位的努力。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日本政府在经济干预中的能力已远胜于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了。

非常时期

危机是政策创新之父。日本产业政策中的管制经济范式出现在20世纪20年

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混乱时期。依据安藤良雄(Ando Yoshio, 1987: 403)的说法,管制经济有两个互不相同却相互关联的来源:应付大萧条的政策措施和战争总动员令。日本称这一时期为 *hijoji*[非常时期]。正如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 1976:19)所描述的:

72

在政治史中,昭和时代的第一个10年(1926—1935)是一个充满恐怖和政变的时代,从满洲(中国东北三省)的战火开始,日本迅速迈向了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路。在经济史中,昭和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以“五·一五事变”和“九·一八事变”为背景,日本经历了从“金融恐慌”和“昭和危机”向恶性通货膨胀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迅速转变。

日本非常时期的到来要比其他国家大萧条的到来早两年。从1927年3月中旬开始,日本的银行经历了一场挤兑风暴,其后果是,在两个月内有31家银行破产。1928年,政府实施了《银行法》,目的是通过减少小银行来使日本的银行体系合理化。其结果是,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和第一劝业银行成为“五大”金融机构。为了紧缩财政并减少国家债务,田中内阁的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还解除了黄金出口禁令。但是,这样一来,他在一个不合适的时机向国际市场开放了日本经济。当西方发生大萧条时,大萧条的影响连同井上准之助的紧缩政策,使日本陷入了昭和危机。1929—1931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18%;出口下降了47%;居民消费下降了17%;工厂和设备投资下降了31%;制造业的资本盈利率从1929年的5%下降到了1931年的1%;股票市场也随之崩溃。如果我们将1921年1月的市场平均值设为100,那么,1930年的平均股票价格则仅仅是44.6。由于市场失灵,使失业人数从原先估计的200万人上升到了300万人。政府不得不在城市工业区创立了卡特尔和托拉斯来应付市场失灵(Arisawa, 1976:53-54)(日本没有这一时期真实可信的数据)。

经济困难时期劳工纠纷也多了起来。1930年,195 805名日本工人被卷入了2 289件纠纷中,且81 329名工人参加了906次罢工。在农村,1931年农业、林业和渔业的净产出仅相当于1929年净产出的57%。许多农民不得不将女儿卖出去做妓女,处境艰难的村庄中,1/4的年轻女孩都被卖掉了;村公所甚至成了卖淫交易的场所。

国家是怎样应对这场空前危机的呢?作为对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孤立处境

73

的回应,1918—1921年间,日本开始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努力为亚洲的军事冲突做准备。之后,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又将其政策变为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并作出了一系列承诺:第一,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和政权的完整;第二,给中国提供最自由和最充分的机会,以促成中国政府发展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政府;第三,运用自己的影响在中国国内促进所有国家平等的工商业机会;第四,不利用在中国的有利条件来寻求剥夺友邦国民或市民权利的特权或优先权,禁止鼓励有损于友邦国家安全的行为(Crowley, 1966:28-29)。然而,在华盛顿会议上建立的海军现状维持了短暂和平后,日本军队渐渐相信,受到约束的军事力量并不能让日本保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那时,中国的爱国主义运动和苏联军队在远东的出现,被视为对日本利益的真实威胁。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采取了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政策,明确宣布中国东北三省和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田中内阁声称:“如果动乱传播到中国东北三省和蒙古,并危及日本在这些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利益,不管危险发端于哪里,帝国政府必须准备与这些威胁作战”(Crowley, 1966:32)。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挑起了“九·一八事变”,目的是通过扩张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军事力量来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尽管这次事变是由一小群激进的军官干的,但对于国家的影响却意义深远。这次事变把日本带进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不仅与它所侵略的中国,也与在东亚有巨大利益的西方列强。日本被指责为侵略者,并受到世界的排斥。因为日本强烈地反对国际联盟的干预,日本也就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孤立。1933年,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所谓的“满洲国”,并在一番调查后否决了日本的提案,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最终,日本因发动了两场战争而犯下了严重错误:1937年对中国的战争以及1941年对美国的战争。

74

这些军事冲突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首先,军费支出的迅速增加导致了巨大的政府债务。日本政府的军费支出,在1931年,也即“九·一八事变”那年,总计达14 770亿日元;1932年为19 500亿日元;1933年为22 550亿日元;1934年为21 630亿日元;1935年为22 060亿日元;1936年为22 820亿日元;1937年为34 520亿日元(Rengō Jōhōsha, 1938:170)。其次,军费支出的巨大预算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日本的国际收支。1932年日本的贸易赤字是6 700万日元;1933年为8 500万日元;1934年为14 200万日元;1935年为1 500万日元;1936年为13 100万日元;1937年的赤字则攀升到了63 600万日元(Rengō Jōhōsha, 1938:203)。因

为这些压力的存在,如何在宏观层面上配置有限的资源以及如何促进生产以求在战争中生存下来,成了日本政府面临的最严峻的政策问题。

管制经济方案

由于大萧条破坏了自由放任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得到了强化。这些趋势一起构成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957)所谓现代经济的巨变,这一巨变不仅导致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管制经济的出现,也导致了美国的新政和苏联的计划经济。日本管制经济的实施代表了日本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分离,这一分离使日本出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体制。通过产业重组,政府和非市场机制变成了组织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市场功能:这里不仅仅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功能,也包括生产和消费品市场的功能。

管制经济的演进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931—1937年,以《重要产业统制法》的通过为开端。在这一阶段,“政府力图避免在管制经济中行使权力。作为代替方案,它力图通过行业自主的管理活动,并依赖企业家在经济控制中的主动性来实现其目标,通过对私营部门的保护和援助,达到管制经济的目的”(Arisawa, 1937a:1)。1937年,日本军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政府于1938年制定了《全国总动员法》,开始对经济实行直接控制。有泽广巳指出(1937a:1-2):“在这一新阶段,管制经济的目标已经不同了。单纯依赖企业家的主动性已经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了。政府必须运用其权力,并直接承担经济活动中的领导责任。在准战争状态下,政府必须强制性地指导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能否像野口悠纪雄(Noguchi, 1995)以及冈崎哲二和奥野正宽(Okazaki and Okuno, 1993)建议的那样,将1930年前的日本经济归类为自由资本主义呢?答案是不能。1930年前的日本经济中,由地主支配的农业占有很大比重,日本在很多方面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等级化的产业部门则由财阀主宰,财阀公司的成员主要以家族关系为基础,而且极端排外(Nakamura, 1995a;1995b)。此外,作为工业化的后起之秀,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在政府建设、经济思想、社会政策以及技术与国家安全的观念上,都受到德国的强烈影响(Johnson, 1982; Pyle, 1974,

1989; Samuels, 1994)。日本选择了德国模式来替代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这种选择不仅是为了“富国”、“强兵”,而且是为了维持对工业社会的稳健控制。从很多方面来看,1931—1945年间发展主义的出现,应该被理解为前1930年时期的延伸。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1931—1945年间日本经济发生的剧变与前1930年时期的关系呢?我认为,1931—1945年间的制度重组可以看成是一次巨大的跳跃。尽管这次跳跃仍是沿着先前的方向,但跳跃的幅度大,所以起点与终点截然不同。正是1931—1945年间的特殊历史环境,即空前的危机、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转变。分析导致日本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产业化过程,显然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这里我想要强调的,并不是当代日本经济的每个因素是否都源自1931—1945年间,而是在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何种重要变化。如果不把1931—1945年间与前1930年时期区分开来,讨论1931—1945年间和战后时期的连续性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将战后日本经济的治理结构与前1930年时期的治理结构进行比较。

76

1931—1945年间,日本经济的治理方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政府的出现是管制经济中最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德国的历程相似(Johnson, 1982; Reich, 1990)。尽管政府干预在日本产业化中有悠久的传统,但产业政策的系统实践却直到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期才开始(Johnson, 1982)。在1931—1945年间,政府行政官员在政策制定中取得了比政客和商界领袖更大的权力。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普遍认为腐败的政客和自私的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因此,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势力迅速下降。截止到1941年,所有党派都被迫解散(Berger, 1977)。相反,革新派官员(*kakushin kanryō*)——产业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和实施者——变成新的政治力量。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产业政策与战争动员紧密相关,所以行政官员受到了军队的大力支持。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法,赋予政府官僚机构巨大的权力。全国总动员法的特点是高度抽象的总原则。它赋予政府官员制定详细策略的权力,以便借助行政命令,在无须经过国会同意的情况下,来指导管制经济。这就是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所定义的“非常时期大权”(*hijō daiken*)的直接应用。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日本的最高统治权属于天皇。在战争和其他军事突发事件出现时,天皇有权

通过军队(而不是政府)直接向全日本人民发布命令。正如《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1条所规定的,在战争时期和国家非常时期,日本公民的任何权利都不能妨碍天皇权力的行使。而且,正如安藤良雄(Ando Yoshio, 1987:75-76)指出的那样:“考虑到管制经济的行政管理和技术,行政官员手上的实际权力实质上已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范围。”

77 制定战略性计划是经济参谋本部的主要任务。日本政府力图集中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能力,尽管没有完全获得成功。1935年,在冈田启介(okada keisuke)内阁的领导下,日本政府设立了内阁调查局(CSB, *naikaku chōsakyoku*)。1937年初,内阁调查局被内阁企划厅(CPA, *naikaku kikakuchō*)取代。1937年,随着日本军队扩大了对华侵略,近卫内阁整合内阁企划厅和内阁资源建立了内阁企划院(CPB, *naikaku kikakuin*)。这些称为国策机关(*kokusaku kikan*)的机构负责为政府制定长期政策,并由首相直接领导。这些机构的官员是根据政府的立场而不是从各个部的立场来制定政策的。但是,由于受到政府内敌对势力,例如大藏省的强烈抵制,这些机构的功能被限制在政策制定而非政策执行上。1943年,当太平洋战争的失败看起来已不可避免时,日本政府终于将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功能集中到军需省这一个机构中。但是,即使在这个部门中,也存在着陆军和海军的分歧。不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政府制定政策和协调政策的能力已大大改善。

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府干预基本采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形式,与之不同的是,法西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一直扩展到了微观层面(Reich, 1990)。全国总动员意味着“为了战时(包括任何相当于战争的事件)的国家安全,为了最有效地动员国家力量,就要控制并利用人力和物资”(Yomiuri Shinbunsha, 1971:211)。为促进生产而制定长期战略计划的实践是在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领导下,由日本军队通过“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Nichiman Zaisei Keizai Kenkyūkai)发起的。后来,商工省也兼起了制定计划的责任。长期计划制定人员敦促日本发展重化工业,为增强日本的进口能力而促进出口,并考虑到日益临近的日本对外关系危机,为了尽快促进生产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侵华战争爆发后,内阁企划院开始为总动员制定年度计划。由于日本的自然资源少,而且日本经济严重依赖贸易,所以这些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日本有限的国际收支能力内,保证满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

战争期间对军需品的巨大需求。在这些计划中,政府为各个行业设定的配额取决于允许进口的数量。通过制定和执行这些计划,政府完全控制了部门和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政府通常根据各个行业或部门对战争动员的价值来设定优先顺序。军事需求总是拥有最高优先权,而日常生活的民用需求则排在最后(Tanaka, 1975:21)。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成了日本政府在战后采取的一种最基本的政策工具。

78

这个时期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干预也采取了国有化管理的形式,例如电力行业就是这样。奥村喜和男(Okumura Kiwao, [1966]1972)回忆说,电力行业在大萧条期间遭受了重创,五家垄断企业对电力的过度供给引起了电力行业的混乱。由于国家安全成了首要问题,政府在1938年对电力行业实施国有化管理,尽管所有权依然是私有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电力的分配权也被政府掌握。战争期间,政府还在行业中创建公团(*kōdan*)。公团与国民的日常生活,例如运输、食品生产、农业发展和住房等紧密相关,它们属于政府资本,并由政府直接管理。公团的建立是为了维持战争期间的社会稳定(Arisawa, 1976:203)。

为了实现战略性目标,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来抑制市场力量。这些努力都是通过政府规制和非政府机制来进行的。

通过对管制经济严加整治,政府开始控制私营公司的商业活动。根据中村隆英(Nakamura Takafusa, 1974a:55-57)的说法,这些整治涵盖了经济活动的所有重要方面。在人力资源方面,政府不仅具有从公民个人和公司为有需求的企业选派人员的权力,还具有就雇佣条件、解雇、工资和解决纠纷向雇主发布命令的权力。政府还控制着生产资料的生产、修复、分配和交换。它有权对进口和出口设立限制和禁令,并有权决定征税和免税。在商业运行方面,政府可以发布命令限制或禁止建立新公司、增加资本、实施兼并、改变公司性质,以及发行股票和分发红利。此外,政府还能通过金融机构来控制资本投资。在商业组织方面,政府可以发布指令,与私营部门就经济控制的条件达成协议,还可发布命令为执行管制经济而组织行业协会。最后,政府有权控制市场价格——这里不仅包括消费品本身的价格,也包括这些产品的海运、保险、出租和加工的价格。

79

由于来自商界的强烈抵制,日本政府实施的管制经济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即使是在政府部门中,集中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努力,也未能完全压倒强大的

部门本位主义。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与1930年相比,日本政府已建立起更强大的经济控制权。

非市场机制也成为管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吉野信次(Yoshino Shinji, 1966)的说法,20世纪30年代初期,卡特尔被商工省(MCI)看成是减轻大萧条对日本经济破坏效应的唯一途径。依据1931年制定的《重要产业统制法》(*jūyō sangyō tōseihō*),当一个行业中一半以上的公司加入了卡特尔,政府就有权迫使其余的公司遵守该卡特尔就生产、销售和价格所达成的协议。同时,为了在合理化运动中增强中小型公司的效率,商工省尽了很大努力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进行标准化。当侵华战争爆发时,与军需品有关的需求快速增加;这使日本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了危机,并反过来加速了通货膨胀。宫岛英昭(Miyajima Hideaki, 1987:103)认为,从那时起,政府不仅把那些没有卡特尔的行业组织起来,还直接全面干预那些以前由私营公司独立制定的生产和定价政策。太平洋战争前夕,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协会令》,这项法规的出现导致了20多个统制会的建立。80 在与官员们进行的决定由谁来操控统制会的斗争中,私营部门获得了胜利。政府把行政权力交给了统制会,这些统制会又由私营部门操控。统制会不仅有权决定生产数量、产品种类和生产方式,还有权决定交易期限、产品价格、交易伙伴和交易时机。统制会也有权决定利润、红利和奖金(Nakamura, 1974a:97-101, 128-133)。表面上,这些统制会是在私营部门的控制之下,但由于控制统制会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自于政府机构(Andō, 1987:416-417),它们实际上受政府控制,这与德国的经验非常相似。

主银行制度也在管制经济中发展起来,这一制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公司的融资来源,也为企业集团围绕主银行进行自我管理打下了基础。1937年后,私营企业资本的主要来源从通过股票买卖的直接融资转向了通过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到1944年,资本总供给中股票的比率从1937年的35.5%下降到了6.1%,而银行贷款的比率却从1937年的31.9%上升到了90.9%(Teranishi, 1993a:79)。1944年伊始,政府为每个军工企业配了一家银行,作为其主要的资本供给方。这种结构就是战后关联公司集团的起源。由于有间接融资的支持,经理们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日本的商业运作中,评估利益与效率的时间单位被大大延长。同时,管制经济的主导思想就是反对商业运行中的利润原则,坚持公共利益的重要性。

在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功能大部分被战争动员中的行政官员统制所取代后,对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公司来说,微观层面上的效率问题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最后,由于公司经常不顾成本而强调产量,管制经济变得日益没有效率。

分包是管制经济条件下日本产业组织的又一重要发展。在共同努力以增强国家生产能力的过程中,分包成了组织各种经济要素的一种重要方式。1940年,80%的日本公司雇用人数为5人或少于5人,且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仅有7.4%;97%的公司雇用人数少于30人,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是27.1%(Ueda Hirofumi, 1987:200)。为了更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提高国家生产力,日本政府采取了 *tenhaigyō* [转移或关闭企业] 的政策,迫使无效的中小型企业退出生产,尤其是在机床和电子工业行业,中小企业组成与军工生产相关的企业,与大企业一起从事生产。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推动。在太平洋战争中,大公司的生产能力已远远落后于军品的需求。政府文件显示,“随着当前战争的发展,战略性行业更需要组织起来。为了最大化生产能力,必须进一步推动集团的发展”(Ueda, 1987:210)。

81

在政府的强制干预下,这时的劳资关系十分稳定。然而,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2)和安藤良雄(Andō Yoshio, 1987)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动员国家资源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经常在资本家和工人利益冲突间充当缓冲调解人。大河内一男(Ōkōchi Kazuo, 1970:97)的研究表明,产业报国会重视雇员在工作场所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将雇员视为人力资源和成功秘诀。受增强国家生产力这一目的的驱动,这些联盟渐渐成了管制经济中配置、动员、赡养和培训工人的一套系统。这项遗产对战后日本管理的制度化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从1931—1945年,政府对劳资关系的控制,揭示了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方面:为国家计划而动员工人,政府必须要在分配中提供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工人只有相信自己的利益在国家计划中有所反映,才会支持增强国家生产力的目标。否则,即使在强制之下,工人也不可能与政府合作。

全国总动员法赋予了政府从私营部门中选拔军需公司(*gunju kaisha*)的权力。在军品企业中,主要经理人会获得生产责任者(*seisan sekininsha*)的官方身份,但是没有报酬,且所有雇员都成了生产担当者(*seisan dantōsha*)。军需会社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生产责任者的命令;任何违背命令的人都要受到法律的惩

82

罚。在战争结束前,政府已将 600 多个公司定为军需公司。根据中村隆英(Nakamura Takafusa, 1974a:133)的说法,“私营企业制度被改成了具有指挥系统的生产体系。它由‘责任者’和‘担当者’组成,并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看起来,这一体系像一个有着等级制度的军事机构,所有人都被分成了军长、师长、旅长和团长。”在年度总动员计划中,这些军品企业在获取资源方面通常拥有优先权。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政府认定钢铁、煤炭、轻金属、造船和航空为五大战略性行业,并将这些行业的行政管理权从每个省划拨了出来,直接赋予了首相(Arisawa, 1976:204-206)。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管制经济中有两个因素与美国的自由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尽相同。第一,日本产业政策的目标与美国不同,但却与苏联类似。苏联的世界观是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二分法为主,而日本的世界观则以其他列强对日本的种族歧视为主。他们二者都相信,国际冲突最终会导致民族国家间直接的军事冲突,因此必须实施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国家生产力来支持战争,为战争做准备。相反,美国经济政策的目标被限制在就业、垄断和规制问题上,尽管新政的拥护者相信“国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是联邦政府应介入市场以保护公共利益”(Brinkley, 1989:89)。第二,实现目标的方式将日本的管制经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区分开来。在苏联,政府将所有行业国有化,并为每个企业制定强制性计划。相反,在日本,尽管政府干预也得到了很大加强,但管制经济的运行依然依赖于私人所有制。这两种对立的方法,不论是在战时的军事冲突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经济竞争中都十分重要。苏联经济向重化工业的迅速转型,以及行之有效的政府计划,对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相反,德国和日本所选择的经济体制却未能在战争中为本国的胜利提供有效支持。不过,经过一定的调整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体系在和平时期显示出巨大威力,而社会主义体系在经济发展中却逐渐失去了活力。

集团经济趋势

1931—1945 年日本经济体制这一巨变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我认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制定转变策略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西斯主义计划经济战略观有别于新政,它直接源自日本对当时世界体系的看法。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

日本人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已陷入了混乱。日本人相信,大国间在殖民地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激烈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集团经济的出现。

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之间依照比较优势原则来进行生产,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市场运转得相对较好。但这种国际分工却被战争破坏了。正如20世纪30年代商工省副大臣吉野信次所指出的(Yoshino Shinji, 1930:1):

由于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卷入了战争,全球市场上原料的供需平衡遭到破坏,国际商业交易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全世界都经受着物资短缺。在那些直接卷入战争的国家中,对各种军需品的需求正日益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国家应该在一国之内生产所有必需资料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理论,在各国广为流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经济建立了秩序。与之不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却是混乱,原因在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本国的产业。依据近卫文磨内阁的私人智囊团——昭和研究会(SRA)的一篇研究报告,当时是英国最先建立了互惠贸易体制。随后,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都力图在特定区域获得特权。这种行为不仅使其他工业化国家进入市场更加困难,而且加剧了后发展国家间争夺市场的竞争(Shōwa Kenkyūkai, 1939:18-19)。日本人认为,当一个国家垄断了某种商品的生产后,国际和平就可能会受到威胁(Yoshino, 1930:16-17, 78)。

84

根据生命线(*seimeisen*)理论,如果不能依靠其自身领土范围之外的巨大区域,以殖民地形式为宗主国提供资源、劳动和市场的话,宗主国的经济就不能存活。生命线理论在日本的兴起可追溯到明治时期,这一理论主张:

每个国家都应该在其领土范围内或处于其控制下的地区,获取自己的所有基本需要,并尽可能在这一地区寻找自己的市场。这是一种限制在一国影响范围之外从事贸易的趋势,是一种避免在对外结算中使用黄金或第三国货币的趋势……未来的对外贸易将只是维持和发展国家自身的经济范围的一种手段,是国家政策的一项基本功能(Sugimori, 1940:967-968)。

在这种集团经济的新时代,日本应该怎样行动呢?日本经济联盟外务署副署

长鲇沢严(Ayusawa Iwao, 1940:801-802)认为,排斥外国产品而保护本国市场的欧洲经济民族主义,是“不经济”、“不安全”和“低效的”。鲇沢严声称,这种经济民族主义是对“非人性的欧洲战争”的直接解释。他论证道,作为一种确保安全、秩序和和平的体制,区域主义不失为较好的选择。它不像国际联盟那样企图在全世界同时实现上述目标,而只是想在美洲、亚洲、西方或者东方等三四个区域中成功。内阁资源局负责人松井春雄(Matsui Haruo, 1938:251)说,“我们并不反对经济的国际性,我们也不否认任何经济都会融入全球经济的必然性。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在集团经济的趋势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强调的是经济自给自足原则,而且一直在实施计划经济。”

具体而言,日本倡导由日本领导的区域经济集团。有人认为,因为日本的自然资源很少,所以经济不能独立运行。因此,对日本来说,建立一个将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内地、朝鲜和中国台湾置于其控制下的经济集团十分重要,东亚的资源对日本经济非常关键。这些资源包括朝鲜的煤、铁、铝、镁、棉花和木材;中国东北三省的铁、煤、铝、黄金、工业用盐以及农产品;中国东北的煤、棉花、盐、木材和肉类。中日战争爆发后,松井(Matsui, 1938:254)就说过,日本期望将中国东北三省和蒙古发展为工业原料和燃料的供应基地,并同时将它们培育为日本产品的市场。他还建议,日本必须努力将这些地区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经济集团,通过在集团内有效地配置资源,可以进一步增强日本经济。为实现这个目标,松井(Matsui, 1938:250, 258)进一步建议,日本应该利用经济计划在区域内建立分工,为了更有效地动员那里的资本、劳动、技术和更有效地进行管理,应该将管制经济的实践扩展到整个区域。作为创建区域经济综合体的具体措施,日本应该与中国东北三省和中国内地签订商业条约,使关税、商业组织和金融与货币体系更为协调。

1941年,在近卫文麿内阁的领导下,力图建立日本主导下的经济集团的想法,最终导致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政策提案的出台。这个提案的核心是亚洲主义。用立宪政友会会长久原房之助(Kuhara Fusanosuke)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在东亚驱除西方的影响,并为亚洲人建立一种区域性生活,使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Okada Tadahiko, 1940:970)。在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倡议者昭和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马场修一(Baba Shūichi)指出,尽管在当时国际混乱的局面下,这种地区秩序对日本和亚洲而言,被认为是一种“合理选择”,因为它确立了“一个防御

和发展的区域主义”，日本军队却将日本视为亚洲的领导者，并将“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视为日本帝国的使命(Baba Shūichi, 1969)。按照大竹英雄的说法，为了在20世纪30年代实践这一理论，不论日本还是德国，都选择了依靠军事力量和强制掠夺。他们敢于冒险直接投身于与老牌大国的军事冲突中(Ōtake, 1992:49)。

作为种族歧视牺牲品的大国

村上泰亮在关于日本发展主义的分析中(Murakami Yasusuke, 1992)指出，民族主义一直是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它遭到了历史上某些激进观点的否定。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说的，在日本发展主义中，民族主义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那么，民族主义在管制经济中起了什么作用？民族主义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又有什么含义？

1931—1945年，日本产业政策的民族主义含义主要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受到西方列强的种族歧视。为了讨回公道，日本不得不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来为最终的军事冲突做准备。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就采用“富国强兵”的口号作为自己的国家政策，他们认为，日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将由其军事力量决定。相应地，日本参与国际经济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军事扩张。1895年，日本在赢得中日甲午战争后，把中国台湾变成它的第一个殖民地；1910年，日本又将朝鲜拓为殖民地；1905年，日本打败在东亚的最大西方势力俄国，并在中国东北和华北获得了许多特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与美、英和俄一道成为在中国势力最大的四强。1931年，日本军队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从此加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首次为后发展地区提出了民族自立原则。之后，国际联盟主张用这一原则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然而，日本人却不相信西方国家会真正遵循这个原则。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姉崎正治(Masaharu Anesaki, 1921:144-145)说：

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对西方国家国际道德行为的普遍不信任……有些日本人问：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合法吗？美国对菲律宾群岛的占领难道就没有军事的考虑吗？一段时间以来，远东不一直是国际竞争

的受害者吗？日本的合法要求不是常常受到打击吗？这些看法，不管是有根有据的，还是猜测的，或者是出于别有用心者的灌输，反正在日本人中间相当流行。因此，人们常会一针见血地问道：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道德觉悟怎么转变得如此之快，好像他们确实是代表了和平与正义，在为弱小民族的自由而反对德国的侵略？

日本军队的少壮军官挑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舆论狂热支持日军的行为。按照所谓日本的逻辑，它的军队没做错任何事情，因为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经济的生命线，而且“四强的共同目标就是获取在中国的特权地位”（Crowley, 1966:3-4）。当日本的侵略激起强烈的国际抗议时，日本人却把整个事件说成是针对白人种族歧视的抗争（Ogata, 1969）。日本人相信，日本作为几大强权之一，有理由拥有与西方列强一样的平等地位：日本已经赢得了对华战争，日本已经打败了这个以往东亚唯一的强国；它又击败了俄国这个“拥有最强大军队的最强大的白人国家”；日本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口工业品，并且是用本国船只来运输这些工业品；日本仿效西方国家，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来使国内制度现代化；而且，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日本政治家大隈重信（Shigenobu Ōkuma, 1921: 169-170）说道：“有些白人将日本的发展视为对其权利的不正当侵犯，他们要么煽动对日本作为非白人的种族偏见，要么计划组织一个白人国家联盟来保证白人至上主义永存。”对日本人来说，主张在中国事务上的自主原则，只是阻止日本在中国获利的西方策略而已。田中都吉（Tokichi tanaka, 1933:376-377）声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能够承担在中国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后果，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相对来说微不足道，也不是其生存的必要因素。日本则没有幸运到可以置其邻国4亿人的命运而不顾的地步。”

88

尽管日本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强调种族平等的主题，但它只主张将国际事务中的种族平等应用于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而不应用于日本与其亚洲邻国的关系中。所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运用了双重标准。日本认为自己是个大国，而其他亚洲国家则无足轻重。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立作太郎（Sakutarō Tachi, 1934: 574, 581-582）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会议和华盛顿会议上两次担任日本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他在一篇冗长的文章中宣称：

门户开放政策的初衷是通过形成主要强国的影响和势力范围，来确

保非中国人的其他国家公民在中国各地的商业事务中得到平等对待……由于在涉及门户开放原则的各种关系中,中国并未被视为直接参与方。根据各种条约中体现的这一原则,由中国自己提出先前它与某些强国签订的条款中所规定的权利和特权的有效性问题的,是不可能的,除非提到的这些条约附有包含这种意义的条款。

鮎沢严遵循同样的逻辑提出,国际联盟的建立是对“民主的不幸滥用”,因为它赋予了“所有国家平等的投票权,而不管它们是否具有政治或经济的重要性,也不管它们是10多亿人口的大国,还是只拥有几百万居民的微小的政治单位”(Ayusawa Iwao, 1940:800)。这些说法显示,日本人一直标榜的日本打算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诡辩。

感觉自己受到种族歧视的想法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全国战争动员。日本政治家近卫文麿(Yomiuri Shinbunsha, 1971, Vol. 16:10-11)在1931—1945年间曾两次担任首相,他认为列强可以划分为富国和穷国(the haves and have-nots),对权力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是国际冲突的最终根源。“只要国际上存在不公正,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列强间在东亚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日本和西方国家间的战争,要么是与苏联和英国,要么是与美国。为了争取在东亚的利益,日本人必须为不久的将来所要进行的全面战争做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与美国的新政相比较,日本对大萧条的回应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战略取向。从这种意义上讲,过时的门罗主义和自主原则,以及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观念,构成了日本思想观念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导致了1931—1945年间军事型发展主义的出现。

89

转向(Tenkō)

为动员整个国家支持战争,主张国家利益至上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打败1930年前在日本经济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两主要的敌对观点:主张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倡导个体股东利益的自由放任主义。作为对日本国内和国际危机的反应,日本出现了两次民族主义运动,这使日本经济思想的分析单位从个体和社会阶层转向了民族国家。在这一转向运动中,前共产主义者宣称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信条,转而信奉土生土长的天皇制的政治价值观。在国家革新运动中(*kokka kakushin undō*),右翼激进分子对视单个资

本家的利益为最高特权的自由放任信条发起了强大攻势。右翼敦促日本政府,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罪恶,政府必须在经济中发挥支配作用。日本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杰出学者山口靖(Yamaguchi Yasushi, 1979:140-152)指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19世纪末欧洲政治思想中两大主题——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合流的结果。我认为,在日本,转向运动标志着由社会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因为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都不再被视为主要问题了),而国家革新运动则标志着日本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迅速转变。随着公共利益取代个人利益,由于出现了既反资本主义、又反共产主义倾向的管制经济思想意识,这两次运动都对日本发展主义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转向运动是对日本共产主义影响力的一个强烈反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济学中极具影响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主张成了分析日本经济现实的有力框架。依据这种观点,对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实质剥削,而这种剥削,最终会导致日本民族走向革命。转向运动开始于1933年,当时,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北挑起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日本国内充满了焦躁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日本公众对军队的行为给予了强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两名被囚的日本共产党领袖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1933年6月8日发布公告,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的行为震惊了整个国家,并受到了他们的同志们的争先效仿。在一个月內,加入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未判刑政治犯的30%(1370个中的415个)和已判刑政治犯的34%(393人中的133人),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了悔悟。到第三年底,只有26%的人(438人中的114人)还保持着他们最初的政治信仰(Tsurumi, 1982:10-11)。从那时起,只要日本的军事行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就会出现一波转向浪潮。

除了伴随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转向运动外,还出现了另外两次转向高峰:一次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另一次是在1941年,时值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初,转向运动发生在政治上信奉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政治行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共产党党员中。后来转向运动又扩展到只在学术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中,这些人包括民族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学术思想。最后,转向运动扫荡了“所有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意识,包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Maruyama, 1982:119)。

转向运动将前共产党人思想中的分析单位,从阶级变为民族国家。根据日本警方的一份报告,有 31.9%的政治犯宣称,“作为大和民族一员的觉醒”,是他们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要动机(Tsurumi, 1982:12)。在锅山贞亲宣布他的转向之后,他告诉众多媒体,当他了解到日本已退出国际联盟时,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悲剧中。当他意识到日本正在遭遇更大的危险时,他感到他的心已经从工人阶级回到了自己隶属的民族。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的失败会导致该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假设是错误的。锅山贞亲说,“一旦进入战争,来自敌人的子弹会杀死任何一个它所击中的人,而不管谁是资本家,谁是工人;子弹不认人,也不管他是苏联人,还是中国人”(Iriye, Furutani, Yamazaki and Takagi, 1984:539)。同样的变化显然也发生在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小泉信三身上,尽管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他都持强烈的国际主义信仰。正如他的战时日记所表明的,他已经“对日本之外的人视而不见”,只关心本民族(Tsurumi, 1982:17-18)。当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被许多日本共产主义者认为是对像日本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因为帝国主义倾向于依据各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来划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则在一国之内依据阶层来划分人民。日本共产主义者感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所包含的国际主义理念不能回答日本的民族独立问题。而且,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析,现在更适用于分析国际的情况,而不适用于分析一国的情况。一种“不允许以阶级斗争的统一道德标准为前提的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Hoston, 1983:106)更适合日本的情况。转向运动代表着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修正欧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其适应本国环境的一种努力,寻找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工具”以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中调和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Hoston, 1983)。民族主义者的转向逻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会与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甚至军队一起频繁参与政策制定的线索,还帮助我们理解当民族处于外部压力之下时,日本人为什么能够超越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内冲突来形成民族主义。

92

转向运动对日本的工人运动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侵华战争爆发后,左翼工会立刻变成了保守派。右翼的全日本劳动组合总同盟(*zennihon rōdō sōdōmei*)甚至发表了一篇《关于停止罢工的公开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们宣布:

日本人民现在正为了忠于国家而牺牲他们的生命,而工人阶级也正与本国工业家合作,合作的基础是他们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时产生的正确意识。作为非常时期战斗在工业前沿的战士,我们深知我们的任务是保护国家的后方基地……基于以上的信念,展望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就工人运动宣布以下原则:第一,在此期间我们要寻求和平与道德的冲突解决方式,并期盼全面暂停产业罢工;第二,为了促进后方的军火生产并保证工业的稳定,我们建议在各产业立即建立包括政府官员和市民在内的行业合作委员会;第三,我们强烈要求对工人的组织权利予以法律承认,在当前和未来的国策中,立即实现国家对产业和工人的控制。在帝国军队的将士们不分贵贱地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时,我们也全心全意地希望,在国内产业界,没有一个工人会工作懈怠,也没有一个资本家会追逐私利(Ōkōchi, 1971:82-83)。

93 鹤见俊辅(Shunsuke Tsurumi, 1982)指出,转向的根源是日本人的褊狭心理,这种心理源于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个特征一直是“日本经验的潜在特征”和“日本思想的自明之理”。由于日本人认为,日本已经成了世界大国之一,因此,这种褊狭心理曾一度在国际主义环境中,被追求现代性的热情压制下来。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讨论中盛行的是对个人和阶级利益的主张。然而,一旦国家卷入了国际冲突,这种褊狭心理就会重新复活。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国家,因为“无论对错,它都是我的祖国”。受这种心理的驱使,在政治讨论中,除了民族国家这一分析单位外,任何分析单位都失去了合法性。日本共产主义者以前相信,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途径。但是,当这些观念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时,日本共产主义者就认为,这些概念不再具有合法性。结果,这些共产主义者将他们的参照系从唯物主义框架转向了道德伦理框架,在道德伦理框架内,家庭、社会和国家享有至高的优先权(Johnson, 1990 [1964])。

国家革新运动

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革新运动反映了日本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逐渐破坏了日本人经济思想中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合法性,并且为宣传国家

利益扫清了道路,为约束市场力量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国家革新运动批判的主要目标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有人认为,“日本的社会体系并不完整,只有一小部分且享有特权的阶级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劳苦大众则身陷苦难之中,他们只能与严重的不平等作斗争”(Fujisawa, 1932:443)。一涉及社会阶层间经济不平等的问题,国家革新运动的积极分子就对商界领袖和政治家们特别愤怒。他们认为,“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政客、财阀和一小撮享有特权的群体都堕落成了腐败分子。他们与政党合谋,追求一己私利和欲望,根本不理睬国防,而且将政府弄得一团糟”(Marshall, 1967:104)。

国家革新运动有两组主要的支持者:由少壮派军官构成的右翼激进分子,他们是削弱旧制度的破坏力量;另一组是革新派官员(*kakushin kanryō*),他们是构建管制经济新制度的建设性力量(Hata, 1983:112-113)。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青年军官是出于强烈抗议乡村地区的快速工业化而介入政治生活的,乡村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加剧了不同经济部门间的社会冲突。传统上,乡村地区一直是日本军队征募兵员的主要来源,且乡村地区在大萧条中也经历了极大的经济苦难。因而,一些青年军官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极为不满。正是这种反对意识引发了1932年的一系列恐怖分子的暗杀行为,暗杀的主要目标是政客和商界领袖。1932年2月,前大藏大臣及民主党领袖井上准之助被刺杀;3月,三井财阀的领袖团琢磨被刺杀;5月,一群青年军官冲入犬养毅首相的家里,将其射杀。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赢得选举的政党能够自己出面组阁的时代已经结束。右翼激进分子的这些刺杀行为,动摇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基础,为革新派官员们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

革新派官员是管制经济的主要代表,尽管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各有不同,但他们却有着一些共同特征。他们大多数人都对德国知之甚详,许多人还有在中国东北三省从事计划经济的经验,所有人都在早期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Hata, 1983:124)。此外,这些革新派官员还有着强烈的技术官僚的倾向。他们不仅精于制定计划,也有能力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在政治活动中,因为政党中年长政客跟不上最新的发展,也不能理解年轻一代的需要,因此,经常是他们在操纵政策的制定(Kawahara, 1979:10)。当时的危机也为这些官员创造了机遇。他们还能使其他

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相信,日本无论在国际事务还是在国内事务中,都已进入民族危机的时代。这一时代需要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而这些技能是政客们所不具备的(Berger, 1977:32)。

95 马克思主义和国家革新运动思想的关系非常微妙。国家革新运动的左翼与马克思主义者对日本现实的批判有共同之处。正如内阁调查署(CSB)的一位官员正木千冬(Masagi Chifuyu)在被指控有共产主义倾向并于1941年被捕后向法庭所报告的那样,内阁调查署官员一直在批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罪恶。他们强烈主张管制经济,并支持独裁政治。尽管内阁调查署并没有正式认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该署的官员们却很赞同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了发展管制经济理论,内阁调查署的官员们试图将苏联计划经济的做法和纳粹经济的做法结合起来(Ōtake, 1981:103)。

然而,国家革新运动的右翼却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解决方案。他们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视社会为基于自私自利的一种机制,这与自由放任的理论没什么不同。“如果因其伦理缺陷,我们打算推翻资本主义的话,”藤泽近雄说(Fujisawa, 1932:447),“我们也应该扼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孕育出来并影响了我们的。”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解决方式的一种替代,国家革新运动的右派主张,日本可以采取

切实可行的东方理想主义。因为日本帝国是一个大家庭,其人民因为密切的血缘关系而结成了牢固的精神统一体。因此,可以将社会视为一个基于道德和家庭体系的合作组织。这一统一体与欧洲国家和美国截然不同,欧美的民族国家是被组织起来满足人民的合理需求的……与西方国家主张个人自由和平等原则不同,日本依赖于父母之爱和兄弟姐妹间的深厚感情。与对自由和平等的理性需求相比较,这些感情更深且更持久。尽管在平常时期,这些感情蛰伏于人民的心中,但在民族危急时刻,却能清楚地彰显出来(Fujisawa, 1932:448-449)。

国家革新运动中的左派和右派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都赞成政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领导地位。作为“一名革新派代表”,笠信太郎(Ryu Shintaro)说道,“政府是唯一能够挑战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而且,“严格的政府管制可以为了国家福利而修正资本主义”(Fletcher, 1982)。以北一辉为代表的右翼,通过直接倡

导国家社会主义而将这种观点推进了一步。北一辉认为,国家应该限制私有财富,并且应该将重要产业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Fletcher, 1982:51)。尽管许多日本人早年都受到民主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却使许多日本人转向依靠政府来“打破当前的僵局”。

96

在国家革新运动的思想意识中,自由资本主义和日本管制经济间的选择,实际上是西方价值观和日本本土价值观之间的文化选择。始于明治维新的推行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受到重新审视。有人说,“由于明治时代以来不加鉴别地引入西方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不顾家庭和睦的做法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国民的意识”(Fujisawa, 1932:449)。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政界和商界的领袖也在鼓励新的社会动机和价值标准的传播。……工商业的发展本身也在帮助传播物质理想,我们的文明摄入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因素”(Fujisawa, 1932:444)。有人提出,真正的危险在于,当时的日本已经完全被资本主义在精神上的唯利是图所控制。藤泽近雄说,这一问题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彻底废除这种社会制度。在日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几乎没有西方自由思想的容身之地。因此,当人们要制约市场力量时,日本人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本土价值观。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本土价值观经常会与产业化进程发生冲突,产业化进程的时断时续和周期性的兴衰正说明了这一点。

从“经济人”到“职能人”

向管制经济的转变不仅仅被解释成一种文化选择,人们还把它看成是现代性与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种对抗。伊藤隆曾指出,“学者们通常过分强调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半封建性质’和‘非理性’,却没有注意到由‘改革势力’所倡导的关于产业合理化的讨论和对策。”阿伏拉汉·巴凯(Avraham Barkai, 1990:103-104)也注意到,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纳粹党员为寻找德国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忘情于书山,其中,亚当·缪勒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吸引了纳粹党及其合作者的注意。纳粹的经济原则被认为是“传统的德国国家经济观”的实现,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理想”被认为是“德国经济理论最显著特征”的复苏。

97

在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对社会政策的主张可以替代自由资本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不断增长的阶级意识以及产业化

过程中的社会动乱。社会政策学会的创立者金井延(Kanai Noburu)已经认识到民族主义和经济平等的关系,并认为“防止出现社会问题是外交成功的先决条件”(Pyle, 1974:144)。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日本政府于1911年通过了《工厂法》,并在世纪之初开始倡导乡村改革运动(Pyle, 1989)。但是,经过大正民主,社会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更加自由化了。有些政府官员和政客打算通过立法来建立产业秩序,通过组织工会以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劳动纠纷已越来越多(Garon, 1987)。

1931—1945年,社会政策再次转向保守。然而,人们却认为,这次的保守倾向具有现代性。在对与战争动员相关的社会政策作了重新阐述之后,人们相信,社会政策是解决民族主义和不同社会阶层内经济平等问题的关键。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昭和研究会重要成员大河内一男说,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政策,总资本将不能“维持再生产的秩序”。这种社会政策是“资本家消除资本主义体系内所包含的矛盾的一种努力”。因为个别资本家通常追求个人利益,不会支持社会政策的采用,政府必须代表总资本的利益采取行动(Ōkōchi Kazuo, 1941)。大河内一男进一步指出,社会政策的经济伦理不能通过外力引入,只能靠经济本身的需求引入([1942]1969a:99, 414-415)。

98

大河内一男将社会政策与战争动员紧密联系起来。他摒弃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概念,而提出了新的“功能人”概念,并以此来描述管制经济中个人的作用。大河内一男认为,管制经济中的生产不是由个人对利润的追求来维持,而是由他们对国家利益的支持来维持的。作为管制经济体反映政府意志的组成部分,个人应具有明确的社会功能意识。亚当·斯密假设,经济人以利润为行为动机,市场由“看不见的手”无意识地进行引导。相反,以功能人的社会意识为基础的“责任伦理”,则直接与政府促进国民生产力的计划相关(Ōkōchi, [1942]1969a: 421, 424)。在大河内一男的论证中,社会政策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社会政策的不再仅仅是防止产业化引致的社会极度分裂,而且还要在民族危急的时刻团结日本人民,动员工人阶级投入战争。大河内一男的理论以强制性平等为特点,在战争期间关于政府劳动政策的辩论中,正是这一点极大地增强了大河内一男理论的合法性和说服力。

大河内一男的理论在战后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些人认为,依据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束缚时,社会变革才会发生。因此,在资本主义危机期间和战争期间,发展重化工业乃至军事工业中的生产力,是进步之举。“迫于压力,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心转向了‘生产力理论’。理论重点既不是阶级和剥削,也不是反战运动,而是利用战争作为‘先决条件’,在探讨生产关系的过程中促进生产”(Uchida, 1948:39)。然而,其他一些人却强烈质疑这一理论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尽管战争期间这一理论批评了政府政策,主张为工人阶级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却没有指责战争本身。相反,该理论表明了“与战场上的战士们相同的果决,以及为进行战争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府制度的公开意图”(Takabatake, 1960:206)。山内之靖在最近一份对战争动员和现代性关系的分析报告中(Yamanouchi Yasushi, 1995a:35-38)指出,战争动员体制在“历史地构建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河内一男认为,社会分配和劳工的生活资料是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部分;他还认为,工人的家庭生活具有公共意义,结果,家庭生活就不再被视为与政府和市民社会相背离的私人问题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民主制度的重要信条,即社会平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战时制度的社会化确定下来,福利政府可被理解为战争政府的同义语。

99

管制经济的理念

在管制经济的政府政策形成过程中,经济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自由放任学说因大萧条而受到怀疑时,日本人开始从各种途径寻求新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向西方国家寻求借鉴。来自不同途径的各种元素共同构成了管制经济的内在逻辑。

德国总体战争理论是管制经济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它赋予经济以战略意义。总体战争理论认为,最近的世界大战已见证了先进武器的大规模生产,例如基于技术进步和先进产业组织发展的飞机、坦克和潜艇等。以铁路、汽车和电报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得建立和使用强大的军事武装力量成为可能。因此战争可以在世界范围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就能成为空前的大战。在这种条件下,陆军和海军的组织,以及他们的装备和战略,显然都将依赖于生产水平和国家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大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战争的技术方面,也包括社会和政治方面(Mori, 1933:3-4)。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世界上 66.3% 的陆地、88.1% 的人口、85.6% 的贸易、83.4% 的船只以及 84.4% 的铁路陷入战争。“在世界大战中,战争影响极其巨大,战争成本高得惊人,且需要大量军火来支持战争。所以,全行业的总动员很有必要”(Arisawa, 1934:54)。

100 要准备总体战争,重化工业是关键行业,因为重化工业与武器生产直接相关。考虑到与其他大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军事冲突,吉野信次(Yoshino Shinji, 1930:141-142)认为,即使在和平时期,日本也必须通过发展基于重化工业的国防导向经济来增强其军事生产力。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 1949c:72)指出:“没有重机械、汽车、拖拉机和现代化学工业,没有金属生产和精密制造的先进技术,一国经济就完全没有生产先进武器的基础……如果不迅速升级产业结构,日本的军品生产组织化就不可能实现。”

为了维持总体战争,从战略目的来配置国家资源,就成了管制经济关注的重点。早在 20 世纪第二个 10 年的中期,日本军队就开始制定战争动员计划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军队仅仅是在政府预算中谋取利益,很少就经济政策发表意见。然而,这种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剧烈变化。1915 年,受德国经验的启发,军事地理部门的负责人、后来担任首相的小矶国昭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帝国的国防资源》。在书中,小矶及其幕僚从平民和军人两方面估计了战争所需要的食物、布料和其他物资的总量。他们也估计了战争对国内生产的影响,并提出了多种促进生产和保证资源的方法(Katō, 1979)。20 世纪 30 年代内阁资源局的负责人松井春雄,则深受他的老师、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近塚喜平治的影响。近塚喜平治说过,要想繁荣,日本必须培植并维持国内资源的开发。国家资源总动员不必局限于战争,还可用于经济发展(Yomiuri Shinbunsha, 1971, Vol. 16:152)。“对于战略性行业的国防产业”,必须由国家通过资源配置的区别对待政策予以支持。

101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有人提出必须抑制市场力量。抑制市场力量的原则最初源自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松井春雄(Matsui Haruo, 1934)声称,19 世纪的欧洲经济思想始于对政府的轻视,但却终于对政府的尊重。到了 19 世纪末,“最好的政府就是无为而治的政府”这一信条,已经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卡尔·罗德贝尔图斯与费迪南·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所替代。从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问题,也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前提。

资深官员吉野信次(Yoshino Shinji, 1930:102-103)说,从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日本必须合理化其产业结构,并通过建立卡特尔来消除行业内中小企业的过度竞争。在这个意义上说,公平竞争并不是讨论的议题,因为为了国民经济必须牺牲某些私营企业的利益。尾高慎(Suetaka Shin, 1936:25-26)写道,自由放任学说认为,社会阶层间利益冲突的平衡,可以由看不见的手来达成;然而实际上,当自由放任原则起作用时,这种冲突并不能轻易达到平衡。由看不见的手来达到生产率最大化,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这些冲突必须通过政府管制来缓和。在民族国家之间发生对峙的时代,当需要保证军品生产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管制经济力图依据总体战争理论来修正自由资本主义时,以公共利益替代个人盈利是另一个重要主张。有人提出,为了支持战争,政府必须控制公司的盈利,并将公司所有权与管理层相分离,给予经理人正式地位(Arisawa, 1937c; Ryū, 1939)。“社会功能和资本所有权的分离”,被认为是最终导致民族资本主义的趋势——用有泽广巳的话说:“对经济的控制越强,越接近民族资本主义”(Arisawa, 1937b:212)。公益(*kōeki*)成了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最优先的考虑。依据昭和研究会于1941年设计的近卫文磨经济“新秩序”方案,公共利益不是外在于经济的道德诉求,而是管制经济运行的“内在”先决条件。这份报告说,如果每位经济行为人都视公共利益为最高利益的话,所有经济活动都会促进生产,由此扩大的生产将会使全社会受益。

在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与对生产的考虑直接相关。依据公共利益原则,私营企业的利益应该受到限制;商业运行原则应该从企业利润向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功能和效用转移。由于管制经济思想的目标是提升国家的生产力,所以有人提出,公共利益不会剥夺企业利润,而是要求企业将其利润花在再生产上。换句话说,企业利润必须被限制在一个具体的水平上,且盈余必须被直接用于再生产(Sakai, 1979:367-368)。在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私营企业的财产权被定义为“伴随着责任的有限支配权”。这就意味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企业不再将私人股东的利润作为其目标。企业是将满足国内全体公民的福祉作为终极目标。”这种财产权与自由资本主义所承认的“资本家独裁”的“绝对支配权”是截然不同的(Kojima, 1938:81)。

为规划总体战争,政府的领导在管制经济的产业重组中成为最重要的手段。

经济参谋本部(*keizai sanbō honbu*)是日本人用来描述管制经济中政府角色的简单说法。有人说,为了支持战争,有必要动员所有“枪炮后面的力量”,这一力量不仅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还包括能增强国家为军事目的而顺利协调国民经济所有元素的组织技能。松井春雄(Matsui Haruo, 1938:35)声称:“现代战争绝不仅仅是依靠军事力量,更多地是依靠国家的整体实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变得愈发重要。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必须对国内资源的使用进行全面计划和组织。”另一名重要的革新派官员和田博雄说:“现代政府的特性在于它对国民经济的强势干预……如果我们依赖于资本家的自主管理来从事管制经济,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政府开始负责实施真正全面的、一致的、积极有效的管制经济时,问题才有希望得到解决”(见 Ōtake, 1981:132)。有泽广巳(Arisawa Hiromi, 1934:117)认为:“就像一支军队由少数几个战士迅速发展为拥有上百万训练有素的士兵那样,为了制定计划和发布命令,产业的发展也需要组织化。对计划和执行的监管权,应该赋予完全了解商业和生产,并能够担任这一战场指挥者的重任的专家。”

103 有泽广巳主张,为了在总体战争中存活下来,政府必须“使用各种经济工具,动员所有可用的物资战斗到最后一刻”。

然而,在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关于政府的角色定位有一些相互对立的观点。尾高慎(Suetaka Shin, 1936:26-27)说:“我们要谨记,管制经济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它并不完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赞成资本主义制度,并为了它的运行而消除它们的问题。”小岛精一(Kojima Seiichi, 1938:2, 80)指出,德国的产业控制是基于领导原则,它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一方面,它反对强调私有个体盈利的自由放任原则,主张公共利益的优先权;另一方面,它并不像社会主义那样,剥夺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而是尊重私人所有权。指责纳粹对于经济的控制过于官僚化,完全是对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俄国的不同性质社会制度的巨大误解。在宫崎正义起草的促进国家生产力的长期计划中,他建议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类型的管理方法。依据这项计划,电力、飞机和武器行业应该采用苏联模式,实行国有化;石油、煤炭、钢铁、汽车和化学工业应该采用德国和意大利模式,在行业内达成协议;其他行业也可以以这类协议为基础,再加上政府的行政引导。有人说,为了最好地动员现有制度为这一目的服务,日本政府应该依靠私营部门的自我管理,同时强化政府的控制,使之为国家目标服务(Koba-

yashi, 1995)。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政界的智囊团

国外经济思想对政府产业政策中管制经济范式之形成产生的影响,是通过学术界和政府间的牢固联系来实现的。因为管制经济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其规划远远超出了政府的能力。此外,正如早先提到的,深深扎根在政府部门中的本位主义,是政策整体协调的严重障碍(官僚机构本位主义的影响会在本章稍后讨论)。出于政府政策协调的迫切需要,为帮助政治家提出新思想和政策建议,智囊团出现了。通过学术精英和政治精英间的特殊联系,少数经济学家的思想在政治上产生了影响,并使得学术理论作用于政策制定。在日本,智囊团成员的这些活动被认为是专家政治的开端,在日本战后史中,专家政治(brain politics)时隐时现,每逢转折时期便发挥重要作用(Kaminishi, 1985)。

104

在同样具备连接思想与政治功能的几个机构中,由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和宫崎正义创立的智囊团,在中日战争爆发前为日本政府设计重要策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石原莞尔是日本军队中最著名的战略家。他相信,日本最终会与美国发生激烈的军事冲突,为了给这一冲突做准备,日本必须全面提升国家生产力。而要提升国家生产力,日本必须控制中国,以获取必要的资源。基于这一信念,在他担任关东军参谋时,直接策划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宫崎正义是“满洲铁路研究部”苏维埃分部的头目。事变后,他造访了关东军,并与关东军讨论了他想建立一个研究机构的计划,这一机构负责组织计划如何根据日本的国家战略来经营“满洲经济”。结果,“南满铁路经济调查会”(Mantsu keizai chōsakai)成立了,宫崎正义成了该委员会第一科的负责人。1933年,石原莞尔成为参谋本部军事行动分部的负责人,负责规划与经济有关的长期战略。上任后,他立即授权宫崎正义建立“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Nichiman zaisei keizai kenkyūkai),为即将到来的与美国的冲突,策划日本的重大的战略。这个研究会得到东京帝国大学一些经济学家的帮助,其中包括经济学系的系主任 Hijikata Seibi,以及东畑精一和古贺英正(Koga Hidemasa),这个机构共资助了27项关于强化国家干预、关于其他工业国家政府计划的研究项目(Kobayashi, 1995; Peattie, 1975)。

1936年,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促使宫崎正义及其同事为日本谋

105

划了一个重大战略,这一战略包括两个各自独立又互为相关的计划:一个是关于中国东北三省的计划,另一个是关于日本的计划。关于中国东北三省的计划于1937年开始执行。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日本政府派遣了以岸信介为首的许多文官精英来到中国东北三省。为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做准备,石原莞尔和宫崎正义梦想通过10年的“和平”来提升日本国家生产力,但这一梦想因中日战争的爆发破灭了。不管怎样,正如查默斯·约翰逊等人已经证明的那样,在中国东北三省进行的管制经济的实验,训练了一批日后回到日本实施管制经济的官员(Johnson, 1982; Kobayashi, 1984, 1995; Nakamura Takafusa, 1974a, [1978]1933)。中日战争开始时,日本政府计划的核心被迫从提升和积聚国家生产力,转向为支持战争而动员国家资源。然而,为提升国力计划进行的制度改革,还是用在战争上了。

1937年后,内阁企划厅(CPB)成了策划管制经济的主要角色。内阁企划厅的前身是日本政府的两个智囊团:内阁调查局(CSB)和内阁企划局(CPA)。内阁调查署、内阁企划院和内阁企划厅都是研究国策(*kokusaku*)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许多官员也是私人智囊团成员,例如成立于1933年的昭和研究会和国策研究会(NPRA),是知识分子、记者、政客、文官、商界领袖和军官们讨论新的政策议题的场所。由于内阁企划厅中的文官主要负责策划政府管制经济项目,所以,他们在这些智囊团中所学到的东西立刻在政策中得到了反映。此外,智囊团中的政府官员已经超越了日本政府内部官员个人的界限,因此有助于培育对形势和政策措施的集体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智囊团是形成管制经济范式的思想领袖。

太平洋战争前夕,昭和研究会在制定近卫新秩序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研究会是由后藤隆之助为近卫文麿公爵创立的私人智囊团。在1932年6月到1933年5月间,后藤隆之助赴欧美作了为期一年的旅行。在柏林,他聆听了希特勒向集会人群发表的演说;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庆祝会的典礼上他见到了斯大林;在美国,他目睹了罗斯福为新政的游说(Sakai, 1979:11)。这些经历使他确信,日本也迫切需要进行全面改革。后藤隆之助返回日本后,拜访了近卫,他和近卫曾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同窗。近卫和后藤都持这样的看法,即当时日本政府中权力下放的政策制定模式,无法迅速对时代的迫切需要做出反应。他们同意成立一个智囊团来研究国策,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政策的制定需要一个理论基础(Showa Dōjinkai, 1968:7)。

昭和研究会成员的身份表明了学会的导向。昭和研究会成员经历了几个阶段。根据马场修一(Baba Shūichi, 1969:117-124)的分析,昭和研究会开始是由一群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15人中有13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有7人是教授,没有一人是政府官员)。但到了1935年3月,昭和研究会成员的身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常设委员会的15位成员中,只保留了5位最初的会员,10位新成员中包括4位著名的革新派官员以及3位马克思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与原来的那些人相比,这群人中有10人在其大学时代都经历了“日本政治和学术史上的混乱时代,而大正民主制向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转变就在这个时代”(Baba, 1969:121)。这种经历对理解昭和研究会理论导向非常重要。截止到1936年11月,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中,革新派官员占据了主导地位,在34名官员中占到15名。其他成员包括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还有日本最有影响的经济杂志之一《东洋经济新报》的记者,以及一些有政治倾向的商界领袖。昭和研究会的影响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了反映,即它的许多成员还在一些重要的政府机构——例如内阁调查局——担任顾问或资深调查人员,影响了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的几名重要人物,包括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和大来佐武郎等,都参加过昭和研究会的活动。

20世纪30年代末期,昭和研究会为建立经济新秩序制定了系统的政策提案。该提案主张,政府应该控制私有企业的利润,将资本与管理分离开来,给予经理人正式地位。它还号召要从“利润导向”向“生产导向”转移。有泽广巳对制定该提案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时候,他还不是昭和研究会的正式成员,他因为与一群马克思主义者从事与共产主义有关的活动而被捕,从狱中释放后,他受昭和研究会的秘密委托进行这项研究。在有泽广巳写出提案的初稿后,负责昭和研究会经济部的一名经济评论员笠信太郎,在草案中加入了昭和研究会几次内部讨论提出的建议,而最终完成了提案。昭和研究会的提案得到了内阁企划厅官员的回应,他们在1940年9月提出的《新经济秩序纲要》中,表达了完全一致的政策倾向(Gao, 1994; Sakai, 1979)。

107

管制经济的思想来源

在日本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德国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在20世纪

30年代对管制经济的讨论中,德国经验被视为最重要的参照系。据马克·R.皮蒂(Mark R. Peattie, 1975)的考证,20世纪20年代初,石原莞尔在德国待了三年,他每周都与德国总参谋部的前官员进行讨论,并深入研究欧洲军事史。石原莞尔早先对短期战争和长期战争所作的区分,不仅得到了大量历史研究案例的证实,也得到了汉斯·德尔布鲁克(Hans Delbruck)战略理论的证实。汉斯·德尔布鲁克的战略理论对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进行了区分。日本总体战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石原莞尔对决定性战争和持久性战争的区分。决定性战争的目的是通过战场的总攻来摧毁敌人;而在持久性战争中,最终的胜利将不仅要靠军事力量,还要靠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来决定。日本经济参谋本部的构想也是基于德国模式。松井春雄于1934年出版了《论经济参谋本部》,在书中,他比较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英国和美国负责战争动员的机构。他认为,德国的经验最适合日本,因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是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能够成功动员其国家资源的原因。松井后来成了内阁调查局的首席经济学家,稍后又成了内阁资源局的负责人。

108

法西斯主义思想在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并不是管制经济唯一的思想来源。日本人会为了同一个目的四处汲取营养。对日本发展主义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修正是指在强调计划的同时,排除了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主张。“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对发展主义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动员工人阶级加入政府政策中的民族主义项目,以支持社会政策的采纳作为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中,努力调整或改革经济制度的不合理因素。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战后又再度出现。日本人还对政治的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区分。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提倡针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直接行动。相反,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学术讨论中的一种分析框架。尽管转向运动导致支持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走向灭亡,但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在革新派官员中依然很有影响。革新派官员不仅相信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分析,还相信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他们在为管制经济政策寻找理论基础时,这些官员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前内阁调查局高级官员、后为内阁企划院高级官员的和田博雄,就曾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巴枯宁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考茨基的《农业问题》和列宁

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Ōtake, 1981:69-70)。内阁企划厅的官员们甚至组织了一个团队来研究《资本论》。1941年,这个团队成员因被控有共产主义倾向而遭逮捕。

除马克思主义外,苏联实施计划经济的经验引起了日本政府制定计划人员的特别关注。曾经为中国东北三省和日本起草了两份重要的促进生产力计划的宫崎正义,就是一名俄国问题专家。他留学彼得堡大学期间,亲眼目睹了俄国革命。1917年毕业后,宫崎正义加入了“南满铁路”,成为“南满铁路研究部”苏联分部的负责人。1923年,他在苏联待了4个月,收集苏联经济的材料,深入研究了苏联当时采取的新经济政策。据小林英夫(Kobayashi Hideo, 1995:53)说,日本在俄国革命后跟踪俄国形势的俄国问题专家,总共不超过10人,而宫崎正义是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宫崎正义领导下,到1925年,“南满铁路研究部”已经收集了3万多部关于苏联经济的书籍和其他资料,这使“南满铁路局”成了亚洲关于苏联研究的重要中心。宫崎正义雇佣了许多日本人和俄国人来研究这些材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日文。截止到1931年,他们已经在日本翻译和出版了83卷关于苏联经济的书。宫崎正义对苏联政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印象深刻。按照这个计划,1928—1933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将会增加5.4倍,而工业产量将会增加2.1倍。此外,该计划的重点在重工业。如果这个计划获得了成功,苏联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Kobayashi, 1995:63-64)。后来,宫崎正义估计,苏联在10年内就达到了德国、法国、美国 and 英国平均用了58年才完成的任务。宫崎正义从苏联经济政策中鉴别出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后来都应用到了中国东北三省和日本的管制经济中(Kobayashi, 1995:95-96)。对苏联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的。内阁调查局设立了一个苏联部来研究苏联经济,该部有20名官员,由一名陆军少校领导。日本官员研究苏联经济有两个原因。第一,苏联被视为靠近中国东北三省的主要军事对手。因为苏联通过长期政府计划已迅速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日本军队产生了强大压力。第二,当日本政府开始实施国家资源总动员推动生产时,不同经济部门和行业间的宏观平衡开始出现问题。因此,日本官员相信,苏联实施计划经济的经验是一种重要的参考(Yomiuri Shinbunsha, 1972, Vol. 17:49-50)。

109

当时美国的新政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新政中的一大成就,成为1938年日本在电力行业进行国有化管理的模式。那时,日本官员

110

主要关心的是组织形式,即用来实施诸如新政之类重要项目的组织形式。为了研究新政政策,内阁企划院和后来的内阁企划厅进口了北美出版的所有重要商业杂志,并收集了多卷《美国政府便览》。在制定电力行业国有化的政策时,该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奥村喜和男被派往海外,用18个月时间来研究西方国家是怎样管理他们的电力行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动员国家电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和英国输电网系统,成为日本的发展模式(Okumura, 1966)。

设立国家政策机构的冲突

20世纪30年代,尽管政府干预是日本经济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议题,但进一步增强这种能力的努力却面临着两种制度性障碍:政府机构内削弱国家政策制定和协调能力的强烈的本位主义,以及私营部门对政府干预的强烈抵制。

政府集中政策制定权力的意图,激起了一系列针对“国家政策机构”的政治斗争。20世纪30年代,内阁(尤其是首相)制定和协调政策的权力,是重要议题之一,政府行政部门的本位主义被认为是限制政府能力的主要障碍。据昭和研究会的思想领袖、20世纪30年代深具影响的学者蜡山政道说,部门本位主义的根源是明治时期建立的内阁制,内阁制以平衡各寡头统治集团间的权力为努力方向。蜡山政道曾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做过研究,他指出,

关于明治时期政治历史的许多书刊都以内阁的两种政治功能为研究重点,一种是作为藩系统一权力的场所,一种是这一派系在国会与政党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几乎没有作品研究内阁作为中央行政机构的功能。内阁一方面是制定和执行与国务有关的政策的机构,另一方面是具有管理各省功能的协调机构(Rōyama Masamichi, [1936] 1965:127)。

根据蜡山政道的分析,本位主义是1889年“帝国宪法”中功能安排的矛盾产物。一方面,这部宪法赋予首相控制各部门的权力。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承认各个部门直接协助天皇的权力。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最高权力是授予天皇的,所有政府机关——政府各省、军队、枢密院、帝国内务省以及国会——都对天皇负责。这种安排强化了各省的权力,因为宪法给予各省以“服务国家”的名义和按自己利益行事的权力。因此,蜡山政道(Rōyama, [1936]1965:131-132)认为,政府机

构的本位主义,从制度上讲是由1889年“帝国宪法”赋予的。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尽管《大日本帝国宪法》表面上赋予了首相很大的权力,但它未能让首相有一个在其直接控制下的行政机构。结果,首相只能是“内阁发言人”,而本位主义却逐渐在权力下放和各省的独立管理过程中得到了强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明治维新后政府建立了对社会的有效管制,但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却未能将政府机构的政治权力集中起来。

《大日本帝国宪法》界定的政府机构,以垂直的中央集权和横向的权力下放的共存为标志。那时候,各省大臣对于接近天皇拥有同等的权力,使他们能以线性方式来发展其私人网络。官员们像一棵树那样盘根错节,天皇就在树的顶端。同时,政府要进行横向的政策协调却非常困难,因为各省、厅或科都经常对对手的决定使用否决权。尽管各省大臣都是内阁成员,但每位大臣都把自己看作“一个省的头儿”,代表的是自己那个领域的利益(Ide, 1982:252-253)。戈登·M.贝格尔(Gordon M. Berger, 1977:233)评论道:“尽管1868年后日本相当平稳地从江户时期幕府和藩的半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移,但直到1940年,日本领导人还是认为这一政治整合过程尚未完成。”安藤良雄(Ando Yoshio, 1987:77)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建设没有从制度上完成权力的中央集权,也未能消除以多重政治中心和政府机构的独立管理为特征的本位主义。

112

尽管经济参谋本部的建立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执行管制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这一观念的落实却遇到了强大的制度壁垒。第一,制定国家政策需要越过各个省的行政管理界限,需要若干机构的协调与合作。这个目标与根深蒂固的管辖权之争(*nawabari arasoi*)的传统相抵触。为保护和提升自己的利益,每个政府机构都力图把自己的部门政策转变为国家政策。甚至连有些革新派官员在关于国家政策的讨论中,也维护他们本部门的利益。第二,那时候,政府机构中没有设立协调机构;许多革新派官员认为,建立一个新机构是增强政府政策制定权力最有效的方式。尽管这样,任何一项建立新机构的行动,都面临强烈的抵抗,因为它这样做威胁到了现有机构的权力。当时内阁调查局的官员们就打算接管大藏省的预算权,他们说,他们是在为首相制定国家政策,就应该有权决定如何花费这些钱。然而,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他们却被大藏省打败了。而且,在1937年内阁企

划厅建立前,陆军也提议要建立一个更有权力的经济参谋本部,并打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这项动议却受到海军和其他机构的阻挠,因为新机构的计划权会与各省的行政管理权冲突,尤其是与大藏省的预算权冲突(Ide, 1982:118)。最后,内阁企划厅被确定为全国动员总务办公室,未能获得优于各省的地位。

113

20世纪30年代,反对本位主义影响的另一项努力是,减少参与最终重要决策的内阁大臣的人数,并改变他们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昭和研究会在为近卫内阁新秩序所作的提案中建议,大臣们应该将他们作为政府机构行政管理者的角色,与他们作为负责政策协调的内阁成员的角色分开来;应该削减他们的行政管理功能,而强化他们的政策协调功能;同时,制定协调政策的内阁大臣应减少到六人,才更为有效。昭和研究会还建议,首相应该直接控制内阁总务厅和内阁企划厅。前者将负责各省间的协调,并有权为各省不同管理职位选拔人才和提拔人才;后者负责为国家经济制定全面政策。为了增强改革效果,内阁企划厅应该接管现在由大藏省预算厅控制的政府预算权;这样才能从政府的角度来规划预算,而不是只从各省的角度来规划预算。为了更快地使政府政策合法化,还应该合并内阁法务局(Sakai, 1979:121-126)。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建立了“五相会议”(gosō kai-gi)制度;在这一制度中,重要决定是由首相、外务相、陆军相、海军相和大藏相做出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与20世纪30年代前相比,政府制定和协调政策的能力已大大增强。尽管如此,由谁来负责依然是日本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其中,卡雷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 1989:5)就指出,日本的政治智囊们依然要在共享权力的半自治群体中寻找平衡,“没有人最终负责”。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日本政客依然认为增强首相的权力是一个迫切问题。

围绕着“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114

对管制经济的制约也有来自私营部门的强烈抵制。产业政策的政治主张对那些从事管制经济的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两种情况——对企业管制的斗争和主银行制度的演进——显示出政府在管制经济中地位的上升并不是以单一路径,而是由与政治主张有关的各种经济主体的共同作用形成的。私营部门未能抵御管制经济总的发展方向的原因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侵华战争以及与西方国家

日益紧张的关系,为政府官员和军队提供了实施管制经济的强大的合法性。尽管如此,私营部门还是阻止了政府官员们提出的一些激进政策主张。相反,政府官员们在1938年成功地制定了《全国总动员法》,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经济的权力。然而,行政官员却未能获得独立控制经济的权力,他们不得不依靠非政府治理机构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管制经济既有反资本主义的一面,也有反共产主义的一面的原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军队强迫政府通过了一部《全国总动员法》。在《全国总动员法》于1938年1月上呈国会时,这份由内阁企划厅起草的《全国总动员法》受到了各政党的强烈抵制。主要的批评意见是,这部法令将决定如何实施管制经济的全部权力都交给了政府行政官员,这种做法将会取消国会的立法权,使国会立法权名存实亡。民政党(*minseitō*)和立宪政友会(*sei'yūkai*)都指控该提案与宪法相矛盾,赋予了行政官员太多权力,同时也没有对该法令在战时和平时的使用作出明确区分。他们主张,政府控制经济的范围应当受到法律的界定。政府官员回答说,没有人可以预测战争中会发生什么;因此对每件事情进行明确界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国会听证过程中,一系列事件迫使各政党改变了他们在这问题上的立场。首先,民政党和立宪政友会的总部被右翼激进分子占领。其次,支持这项提案的社会大众党(*Shadaitō*)领导人遭到一群激进分子的攻击,这些激进分子指控他对这项拥护社会主义的提案表示了赞成。再次,在听证过程中,一名军官对向他提问的国会议员开了枪。该法案最终未作任何重大修改而获得了通过(Yomiuri Shinbunsha, 1971, Vol. 16:150-276)。

尽管如此,1941年,私营部门还是成功地阻止了昭和研究会和内阁企划厅提出的激进的经济新秩序提案。当时,德国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4月对挪威的侵略和6月对法国的占领),而日本军队正打算趁此机会占领东南亚。军官和革新派官员们认为,德国的胜利直接源自它的政治制度。他们认为德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的极权主义和计划经济;而英国和法国之所以遇到了麻烦,是因为它们的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使然。自由主义不会帮助日本赢得战争和国际竞争;自由主义必须被极权主义所取代。

昭和研究会和内阁企划厅为近卫内阁新秩序准备的提案中,主张政府对企业的盈利进行直接控制,主张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并赋予经理人正式地位,以确保

管制经济的有效性。按照这些文件的说法,旧的经济管制是“外部”和“自上而下”的管制:即在宏观层面上控制资源分配,在微观层面上却未能控制住生产体系。结果,私营企业既不会在没有得到足够的利润时停止生产,也不会为了降低成本以获取更大利润而节约劳动和物资,而且这种控制也造成了生产资料 and 外汇的黑市。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就失去了重要意义。只要企业是由盈利原则驱动,管制经济就不能顺利运行。因此,商业哲学必须从盈利原则转变为生产原则,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必须加以修正。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该提案进一步主张,政府应该将生产而非股东盈利,作为产业政策中的首要选择。必要时,政府应当将制造业国有化,或是建立混合型经济。在这种体系下,企业经理才能成为公仆,他们对股东的唯一责任,就是保证由政府确定的定量盈利。企业经理首先应当承担对政府的义务;对他们行为的评价,主要应当基于他们对生产的贡献(Sakai, 1979)。

116 尽管昭和研究会和内阁企划厅的这一提案得到了知识分子和革新派官员的好评,却受到了商界领袖和“精神右派”(Seishin-uha)组成的联合阵线的严厉批判和反对。有七个全国行业协会发表了公开声明,从两个方面攻击昭和研究会的提案。第一,日本经济最迫切的任务是提升产量。因此,政府不应采取任何激烈的、会动摇现存经济制度基础并因而可能降低产量的改变。对利润的追求不一定与国家利益相悖,也不应受到指责。而且,为了达到刺激生产的目,政府应当鼓励企业去追求利润。第二,日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日本精神”,不是自由放任原则。与管制经济有关的国家政策,也应当遵循这种精神。对私营企业利润的直接政府管制不会促进生产,因为它会偏离日本人经营商业的道路。所有权和管理权不应当分离,私营企业的经理也不应当由政府来任命。就算政府管制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也应当由商人自己来执行。借助内务省中的联盟,商界领袖们成功地阻止了这次行动。内阁企划厅中的一些革新派官员,包括策划新秩序的和田博雄和稻叶秀三,后来被指控参与了[共产党]活动而遭到逮捕。为了逃避可能的清洗行动,昭和研究会中负责制定议案的笠信太郎去了欧洲。最终,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新秩序政策(Gao, 1994)。昭和研究会议案和内阁企划厅计划中的“将资本与管理相分离,以及将利润优先改为生产优先”的说法被修改成了:“企业是包括资本、管理和劳动在内的有机整体。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它的活动应当

遵循国家的全面计划,同时,也应当以经理人和主动管理的创造性及责任感为基础。”

在管制经济中,主银行制度的演进是各种政治势力如何共同塑造政府干预的又一例证。为了在财政上支持侵华战争,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开始了对资本供给的控制。1937年9月,政府通过了《临时资金调整法》;1939年通过了《公司分红和融资条例》;1940年又通过了《银行资本条例》。任何一家资本总额超过20万日元的公司,都要服从《公司分红和融资条例》的规定。这项条例以1937年12月和1938年11月的分红率作为标准比率,任何一家想要向股东支付更高红利的公司,都必须申请政府的批准。从1939年4月到1940年10月,在130个提升分红率的申请中,只有50个获得批准。这种做法使1940—1941年间的股票市场价格急剧下降(Okazaki, 1933:110-111)。战争期间为军品行业融资,意味着巨额利润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为了降低风险,1937—1941年间,银行业出现了130个贷款辛迪加,并主动成立了多边金融机构,对单一项目进行集体投资。政府则将这些贷款辛迪加改变成合作投资集团。1941年8月,合作投资集团由10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产业银行和5家最大的信托基金组成。1942年5月,合作投资集团又改为全国金融统制会。1937—1941年间的辛迪加贷款,仅占参与辛迪加贷款的这些银行贷款总额的14%。相反,在国家金融统制会创立后,国家金融统制会控制了大部分的资本供给。1940年3月,实施《军品行业法》时,政府就规定对联合融资实行直接管制。根据该法,总数为600家的军需品企业的运营,如果收到了来自政府机构的命令,就无须得到股东的批准,甚至可以拒绝向股东提供管理信息。通过这些行动,银行失去了对公司的监督作用,而经理们的自主性迅速增加了(Okazaki, 1933; Teranishi, 1993a, 1993b)。

117

结论

在本章中,笔者描述了日本资本主义在1931—1945年间的巨变。在这一时期,当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多数特征都已出现。政府成了经济参谋本部,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大大增强。同时,各种各样约束市场力量的治理结构,以及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标志的当代日本管理的雏形也发展起来。在管制经济创立前,这些制度的许多因素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在1931—1945年间,这些

118

因素却从制度上重组为统一的经济体制。尽管所有主要的工业国家都遭遇了大萧条,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却探索出了一种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相同的模式。

在这一巨变的背后,有一整套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出于对民族国家之间爆发总体战争的预见,管制经济的意识形态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经济的。为了支持军事冒险,具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产业政策将把生产放在最优先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这种产业政策表现出以约束市场竞争和反对利润原则为特征的、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同时,由于受到工商企业界和意识形态约束的强烈抵制,这一思想体系也有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倾向。从各种来源汲取养分的管制经济思想意识,不仅塑造了1931—1945年间日本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的框架,也从长远角度为日本发展主义设计出了一般性原则。

这次转变的动力,即民族主义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考虑到大萧条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民族国家间的军事冲突,考虑到日本必须为总体战争做准备,民族—国家成了经济思维中的分析单位。在日本现代史中,当国家承受强大国际压力之际,共产主义者抛弃了他们建立在阶级斗争和世界主义信仰上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到了管理层和政府一边。同时,人们还强烈反对对个人利益和股东利益的诉求。转向运动和国家革新运动,从两个不同的方面阻止了日本经济朝更具社会主义特点的经济或更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将日本推向了第三个方向。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变得模糊。在管制经济的战略框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法西斯主义及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共存。在为战争做准备时,军方甚至雇用了有参与共产主义活动嫌疑的有泽广巳(Gao, 1994; Sakai, 1979)。战后被视为激进分子的几个人,如有泽广巳、和田博雄和笠信太郎,其个人情况都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可能因参加共产主义活动而被捕或起诉;另一方面,他们为近卫内阁起草的方案,甚至要比军方的方案更为激进。因此,仅依据他们活动的某一方面来对这些复杂人物进行归类,未免失之简单。

而且,管制经济的发展是由产业政策活动中的政治合力打造而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约束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政府未能建立完全的、直接的行政官员控制体系,其原因在于,军方、企业和官员们对管制经济的态度相当复杂。军方支持由政府官员实施的控制,也力图使国民经济军事化。尽管如此,军

方领导者也意识到,没有企业的支持,他们的目标就不会实现。因此,他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原则。尽管官员们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并主张计划经济的必要性,但他们却不敢彻底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商界领袖们会利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反共产主义因素来发起反攻。相反,私营部门没有反对管制经济的借口,因为支持战争在当时被视为国家的最高优先目标;因此,他们在1938年与政府官员进行的关于《全国总动员法》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然而,为了保护他们在管制经济中的利益,私营部门还是坚持,管制经济应该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运行(Asanuma in Kawahara, 1979:38)。由于给一批激进官员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私营部门发起的反击获得了成功。

管制经济的实践导致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经济体系的诞生,这一经济体系在很多方面都明显背离了正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正如很久以前大河内一男(Ōkōchi Kazuo, 1949:189-190)所指出的那样,战时经济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的正常生活,浪费了数量巨大的物资和人类生命,但也刺激了军需品的生产,改变了经济的结构。更重要的是,战时经济对资本主义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人为地缩短了资本主义制度跳跃式发展的进程。因此,战时经济作为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战前经济与战后经济连贯发展中的一环,对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尽管这一经济体制是为了战争而创造出来的,但却对经济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即使战争结束后,这一影响依然存在。

第4章 优先生产

在1946—1949年间,日本的产业政策仍然以管制经济范式为主导。尽管战时经济体制的许多因素都因占领当局的民主改革而受到严峻挑战,为了给战后重建的工业提供基本的物资,日本政府采取将人力、财力和物资资源集中于煤炭、钢铁和化肥产业的倾斜生产方式(keisha seisan hoshiki),对于将战时遗产转化为战后经济体制大有助益。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揭开了日本历史的新篇章。与德国一样,日本也经历了一场由占领当局掀起的民主改革风暴。那么,这些改革对战后日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长久以来,很多人都将1945年看成是“新日本的诞辰”(Noguchi, 1995),看成是所有事情都有可能重新开始的“新纪元”(Fallows, 1994: 120)。在学术讨论中,由山田盛太郎(Yamada Moritaro)提出的非连续观点渐渐占了上风。山田认为,战后的民主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日本的经济周期已不再靠军国主义和殖民地来维持,土地改革消除了地主阶级,经济生产的重心已由纺织业转向了重化工业(Ōishi, 1947)。山田的这一观点不仅在日本,甚至在德国都有深远影响。正如西蒙·赖克(Simon Reich, 1990: 4)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在战后经济增长中所取得的惊人成就被人们形容为“像是自焚再生的不死鸟”,这只不死鸟与德国在黑暗谷底的经历毫无联系。

20世纪60年代,这种历史观点在日本开始受到质疑。大内力(Ōuchi Tsutomu)坚持认为,自1931年以来,日本经济所发生的改变,都是由所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推动的,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构成了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和原型。许多战后改革,例如土地改革和财阀的解体,都反映出日本早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的政府政策和趋势。1945年之前,因为存在多种

政治障碍,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的变化尚不成熟。战后的民主改革消除了这些障碍,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Ōishi, 1974)。从20世纪70年代起,有关连续性的争论,已由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转向了战争期间(1937—1945)与战后的连续性。中村隆英(Nakamura Takafusa, [1978]1993)指出,“战前和战后不能跳过战争期间而联系起来。许多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和习俗都产生于战争期间,并在战后得以延续。尽管当初并不是以长远眼光建立了这一切,但它们最终确立了战后的企业、产业组织及生活方式的形态。”

20世纪90年代,围绕这两种不同观点所展开的争论变得空前的激烈。

山内之靖(Yamanouchi Yasushi, 1995a)指出,法西斯主义时期的现代日本历史被视为一段反常的历史,因为它使日本在大正时期一直持续的民主进程突然中断,一个基于非理性的极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强权政体,使日本卷入了一场阻碍其现代化进程的战争。但实际上,总体战争计划却大大改变了日本的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使日本社会步入了现代化轨道。野口悠纪雄(Noguchi Yukio, 1995)与由冈崎哲二和奥野正弘领导的研究小组一道,研究了日本经济体制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机构,包括国家的政府机构、主银行制及日本的管理机构(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1993b)。他们发现,这些机构的主要构成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经常被用来当作检视连续性或非连续性的分界线。然而,原朗(Hara Akira, 1995a)指出,1937—1950年应该被当成连续一贯的时期,因为在这一时期,管制经济并未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道奇计划”的实施才告结束。

对于那些信奉非连续性观点的人来说,连续性的观点忽视了一些基本的变化,即在占领时期就已经发生的变化。原朗(Hara Akira, 1995a)声称,战后的民主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和财阀的解体,都大大改变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此外,新的结构体系又极大地改变了政府财政的性质。通过缩减在国防方面的公共支出,日本经济不再具有任何军国主义色彩。中村正则(Nakamura Masanori, 1995b:64)指出,野口悠纪雄“1940年体系”的提法,对战后改革和战后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而引起的日本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尽管战争期间和战后存在的一些相同点有目共睹,但这些受不同结构制约的共同点对经济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那么,这个认识上的巨大分歧是从何而来的呢?大石嘉一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他指出,在过去的争论中,两派对立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衡量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概念。山田盛太郎的非连续性观点强调的是经济结构;相反,大内力的连续性观点则集中讨论经济体制(Oishi, 1974:86)。方法论上的这种差异对后续的研究影响巨大。在持续进行的关于当代日本经济体制起源的讨论中,双方在概念上仍有很大分歧。当今关于连续性的讨论继承了大内力的传统,把现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制度变迁看成一个持续和连贯的过程。相反,关于非连续性的观点遵循的是山田盛太郎的概念,强调的是战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因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其标准上的大相径庭以及所强调的经济面的差异,任何一方的讨论都不能看作涵盖了整个经济。由于我在本书中集中讨论的是日本经济体制的制度变革,因此对我来说,战时遗产的连续性比其非连续性更为重要。尽管如此,研究自由资本主义如何影响战时遗产的存在,仍然很有意义。

124 在本章中,我首先要展示 1946—1949 年的复杂形势。一方面,战时体制的许多构成要素都受到战后民主改革的严峻挑战:军国主义的势力几乎完全被消除;秘密警察也被废除;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使地主阶级不复存在;财阀也遭解体;工会取得了罢工的权利;国民教育体制做了改革;日本妇女也有了选举权。这些改革中的多数做法都是不可逆转的,它们为日本政府实践产业政策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尽管发展的方向早已存在,但必须按照不同的规则来运行。

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对经济的管制进一步加强,为了战胜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管制经济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人事安排。因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日本发展主义的演进,本章将集中研究为什么日本在 1946—1949 年间经历了民主改革的剧变后,战时经济体制的许多主要机构仍被保留了下来。

第一,经济战略观仍然存在。非军国主义化改变了日本的国家目标,政府产业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再是如何支持总体战争。然而,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物资严重短缺引发的经济困难,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仍是一个急迫的问题,因此,在整个国家的产业政策中,生产仍然处于优先地位。受到占领军总部(GHQ)支持的政府被迫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整合方面进一步集中权力,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安定本部(*Keizai antei hombu*)。在资源配置方面,日本政府仍然实行区别对待政策:

不仅根据政策把主要的资源分配给战略性行业,而且还控制居民日常消费品的分配(Gao, 1994)。

第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民族主义在平民阶层中的影响大大减弱。政府在倾斜生产方式中坚持国家利益的主张,遭到由于战后民主改革而迅速复苏的个人主义和阶级意识的严厉批评。然而,封闭的自我意识及对占领政策的怀疑,在政策制定圈子中仍颇具影响。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坚信,他们既不能依靠外国的援助,也不能依靠经济重建的市场;在鼓励生产以应对经济危机和战后的重建工作中,政府必须起领导作用。

第三,在这一时期,那些极力主张政府从多方面进行干预的经济学家们,或者与主要政客关系密切,或者与占领当局的重要官员走得很近。倾斜生产方式的设计者、同时也是管制经济政策遗产的主要代表有泽广巳,成了吉田茂首相的首席顾问;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石桥湛山则先后担任大藏大臣和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他对在日本优先生产政策中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贡献极大。哈佛出身的都留重人在经济安定本部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倡导罗斯福新政式的经济政策,并为倾斜生产方式创建分配体制。此外,以和田博雄和稻叶秀三为代表的一批前政府行政官员也在政府机构中掌握大权(Gao, 1994)。

125

第四,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还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它消除了阻碍日本在1931—1945年间盛行的发展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我们可以从政府行政官员管制和企业管理方面得到证据。占领当局的政治改革,消除或者大大减弱了那些能够对政府行政官员制定政策的权力构成挑战的主要政治因素。同时,由于对日本的占领是间接的(这与对德国的直接占领正好相反),占领军总部只能通过日本政府来行使权力。这些因素使政府文官获得了空前的干预经济的权力(Gao, 1994)。大财阀的解体迫使财阀家族卖掉了他们的股票,并从公司中退出,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日本的经济更加民主化。然而,由于财阀的解体,而掌握权力的新一代管理人员很少关注公司的盈利情况,主银行制度的间接融资就使他们拥有极大的自主权。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以反对始于1931—1945年间的利润原则为主要标志(Okazaki, 1993)。

最后,从当代比较资本主义的视角来看,战时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持续,也归因于占领军总部采取的占领政策的性质。第一,占领军总部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

126 日本非军国主义化,而不是把日本经济变为自由资本主义。因此,那些被认为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制度,如地主制度和财阀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而其他制度,如政府行政官员体制、行会及主银行制度等,仍未被触及(Hara and Miwa, 1992: 362 - 364; Noguchi, 1995: 77 - 78)。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山本满(Yamamoto Michiru)指出的那样:“即使没有发生冷战,占领政策也迟早会发生改变”(引自 Noguchi, 1995: 78)。第二,占领军总部的一些官员也深受新政政策的影响,所以在与日本相关的政策中表现出极大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对那些代表管制经济遗产的日本政策制定者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支持。第三,由于冷战,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由制裁转为援助。因此,许多改革,尤其是财阀的解体以及防止法人权限的过度集中,并没有按计划执行。

民主改革与经济危机

1946—1949年间,政府的产业政策陷入了由两种矛盾因素交织形成的一种尴尬处境。一方面,占领当局在1946—1949年间,对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民主改革,这些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出现了许多与战时体制不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物资短缺,日本经济遭受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民主改革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27 第一,非军国主义化及新宪法的采用改变了日本的国家目标。自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一直是日本的国家目标。在15年战争期间,经济一直被赋予战略意义,政府的产业政策一直是战争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38年起,政府一直依赖天皇“在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来掌控经济。在新宪法中,天皇不再享有终极君权,而仅仅是国家的象征。在新宪法第9条中,日本也放弃了拥有军事力量的权力,放弃了与别国的交战权。新宪法在强化国会权力的同时,也限制了政府行政官员的财政决定权。新的财政法限制了政府用于军事目的的政府预算(Hara, 1995a: 93)。这些变化再加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不仅改变了政府产业政策的目标,而且也导致了平民阶层中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急剧下降。

第二,财阀的解体改变了日本企业集团的性质。在这一改革中,所有持股公司都被迫卖出自己的股票:这不仅包括四大主要财阀,如三菱、三井、住友和安田,

也包括11个“新”财阀,如浅野(Asano)、中岛(Nakajima)和古河(Furukawa)。此外,由于禁止公司之间交换高层管理者禁令的实施,56个财阀的家族成员也被迫卖掉了他们手上的股票,并被禁止在自己的公司拥有管理职位。同时,许多商界领袖因为参与战争或与军事集团有瓜葛而被免职。后来的事实证明,财阀的解体并不彻底,因为当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之后,日本只有18家公司被认为拥有过强的经济实力,并被迫分散经营。尽管如此,财阀的解体仍然对日本经济有着长远的影响。比如,财阀解体之后,控股公司被宣告不合法。与财阀比较起来,战后关联公司集团之间的关系要松散得多。

第三,受新政的影响,占领当局在占领之初就表明了支持工会的政策。该政策认为,工会是对抗财阀的有效力量,并且工会也可用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盟军占领军总部从一开始就要求日本政府取消对工人运动的限制,承认工会的权利,并重新修订了劳动保护法和劳动冲突仲裁法。在占领军总部的支持下,拥护社会党的工会联盟于1946年8月1日成立,其成员包括85万名工人和1699个行业工会组织。8月稍后,号称政治中立的日本产业劳工联合会成立,成员达到163万人,覆盖34个行业工会。‘劳动三法,即《劳动基准法》、《劳动组合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的颁布,为战后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尽管亚洲的冷战开始后,占领军总部改变了对日本工会的政策,但受占领军总部最初政策的激发而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仍然大大改变了政治斗争中工会和资方的力量均衡(Masamura, 1985)。

128

第四,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那些先前承受着极高地租的佃农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一点大大刺激了他们生产和投资的热情。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引发了农业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为后来的高速增长打下了基础。

尽管这些巨变产生了许多非连续性因素,但4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仍然要求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据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说法:

在占领的3年中,有两个根本性的但却又背道而驰的主要趋势。一方面是正在上升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产业活动的缓慢复苏。二者之间正酝酿着一场龟兔赛跑。当然,二者事实上是捆绑在一起的。通货膨胀减缓了产业复苏的速度,而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短缺又导致产品价格的螺旋式上升(Cohen, 1949:447)。

生产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短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首先，日本的财富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殆尽。在历时 15 年的总体战争中，日本耗费了所有的能量并赌上了所有的财富。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向盟军投降后，日本人就像从噩梦中醒来一样，突然发现这场战争消耗了自己国家 1/4 的国民财富，其中包括房屋、港口、运河、机械工具、商品、铁路、轮船、车辆、电力、天然气以及下水道设施、电话及其他通讯设备，900 万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Arisawa, 1976:241)。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大大收缩了日本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除了后来占领的领土之外，日本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曾经构成了其战前领土的 44%。因此，日本再也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便宜的原材料、廉价的劳动力和可被控制的市场，用于经济运行的煤炭供应量也大大减少。在 1948 年以前，日本一直被禁止参与国际贸易。再次，日本再也无法从国外获得原材料。成百万计的战俘和平民从海外被遣返回国，使日本的国内需求急剧增长。最后，由于战败，日本的制造设备要么被毁坏，要么使用过度，不得不经历了一场生产不足的危机。如果我们把 1934—1936 年的生产水平看作 100% 的话，1945 年水稻的产量仅为 66.5%，小麦为 76.0%，棉纱为 4.2%，棉纺织品为 1.4%，生丝为 12.8%，煤炭为 58.0%，钢铁为 35.6%，海产品为 44.5% (Tsūsanshō, 1954:35)。如果把 1937 年的生产水平看作 100%，1945 年国民经济的生产水平仅为 37%，1946 年则为 20%，1947 年和 1948 年又分别上升到 25% 和 33% (经济企划厅, 1990a:10)。此外，日本在 1945 年还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歉收，食品短缺成为主要的危机。

恶性通货膨胀是导致当时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另外一个原因。当日本大肆参与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的军事冒险时，政府将大部分财政预算用于军需品的开支。1930 年，军费开支占到整个预算的 32.3%；1937 年，日本扩大了对华侵略，军费开支的比重一度猛增为 69.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军费开支的比重又进一步增至 85.5%。日本政府用数额巨大的公共赤字，支撑了整整 15 年的战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发行了 11 亿日元的国债。从 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日本政府又发行了 980 亿日元的国债。从 1931—1945 年，发行了 991 亿日元的国债。1930 年，日本政府仅有 61 亿日元的公共债务，但到了 1945 年末，公共债务的数额达到了 1 439 亿日元 (Arisawa, 1976:242-243)。巨额的公共债务再加上生产不足，成为战

后初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如果我们把1937年价格水平的指数看作100,日本1945年主要工业部门的批发价格指数为442。该指数在1946年则达到1210,1947年为3860,1948年为10508(经济企划厅,1990a:10)。

倾斜生产方式

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或许是自由资本主义对日本战时格局的一个正面挑战,在经历了这场民主改革的风暴后,日本经济的治理方式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事实上,日本的管制经济并没有毫无中断地一直持续下去。在日本投降之初,政府官员们曾经对管制经济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20日、10月9日和11月15日,先后三次共停止了对19种生产资料和食品的管制。同时,占领当局由于专注于政治改革而无暇干预经济的运行,这些管制放开后,通货膨胀立即加重。杰罗姆·科恩指出,“由于盟军最高司令最初不愿介入经济领域,而连任的日本内阁又力不从心,因而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管制失误。这场失误引发了国家的混乱,也削弱了在其他领域用进口食品和原材料等进行经济复苏的努力”(Cohen, 1947:447)。随着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在占领军总部的巨大压力下,于1946年5月设立了经济安定本部来实施倾斜生产方式。倾斜生产方式意在把战时政府干预经济的遗产运用于战后经济。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优先生产的原理与战时管制经济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在政府产业政策中,二者都把国家的生存作为主要目标,并把推动生产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1946—1949年,日本政府强化干预经济的能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正如羽田几彦所说的那样:“日本政府官员从来没有掌握过比占领期间更大的权力”(引自Johnson, 1982:176)。政府官员在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地位不仅得以延续,甚至还进一步强化。1931—1945年间,政府行政官员在政策制定上的权力还受制于军事领袖和商界领袖。相反,1946—1949年间,这些人不再对行政官员们的权势有任何威胁了。军国主义彻底消失了。许多商界领袖被清肃;财阀的解体大大削弱了商界在政治中的整体力量。同时,一些政府要员,如首相吉田茂和片山哲,在战争期间都没有从政,因此缺少实施管制经济的相应经验。1946—1949年间,唯一能左右政府官员势力的因素就是占领军当局。但因为对日本的占领是间接占领,占领军总部必须依赖政府官员进行各种管理。又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都被说成

是来自占领军总部的命令,这就极大地强化了日本政府官员的势力。尽管日本的政府官员在战争中都卷入很深,但他们在战后的民主改革中仍然能够生存下来。

131

进行战略性规划仍然是政府产业政策的首要原则。从1931—1945年,日本政府中没有一个可以对每个部门发号施令的终极权威,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在决策方面常常无法达成一致。然而,靠着占领军总部的支持,战后的日本政府集中了政策制定权,并能有效地实施其政策。1946年6月设立的经济安定本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作为“经济参谋本部”的梦想。由于拥有“高于单个部的地位”,这一政府机构获得了最大的政策协调权力,经济安定本部长官也拥有对其他大臣发号施令的权威(Keizai Kikakucho, 1964:11-12)。在占领军总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于1947年4月将所有与经济管理相关的计划职能从其他部门转移到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安定本部成为日本政府机构唯一负责政府计划和政策协调的机构;此外,经济安定本部的权力还包括平衡物资、贸易、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及规制价格、金融、运输和建设等。日本政府的各个省都必须执行经济安定本部制定的政策。1947年4月,经济安定本部的规模由5个处扩大到10个局和2个处,下辖48个科以及一个官房长官办公室,其工作人员达到3000多人(Keizai Kikakuchō, 1964:47-48;参见Johnson, 1982)。各个部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争相将自己最优秀的人员推荐到这个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安定本部是日本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政府政策制定机构。经济安定本部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协调上的权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内阁计划署(CPB)和军需省都要大。

132

为了缓解物资短缺,政府把提高煤炭、钢铁和化工部门的产量作为优先发展的目标。日本政府主要依靠两个工具来提高这些行业的产量。一个是关于资源的供给和需求计划,这一计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物资动员年度计划极其相似;另一个是根据《临时物资需求调整法》(*Rinji busshitsu jukyū shōseihō*)对资源配置实施严密的控制。《资源供需暂行调剂法》于1946年10月取代了《全国总动员法》。该法赋予政府分配重要生产资料的权力,为分配物资设定配额的权力,以及限制或阻止使用它们的权力。这两种工具的组合使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管制经济的机制没什么差别(Okazaki, 1995b:276)。为了从财政上支持倾斜生产方式,政府通过复兴金融金库(RFB)为重要的产业部门提供了大额政府贷款。此外,政府规范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标准,限定了私人金融机构为不同工业部门

提供金融支持的优先次序。战时的贷款辛迪加和合作投资仍然得以继续实行,在对重要产业部门进行融资方面,日本银行取代了战时金融统制会的地位(Okazaki, 1995b:276-277)。

尽管战时制度是战后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标,但是以限制市场竞争和反对利润原则为特征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在1946—1949年的日本经济中仍然很明显。

限制市场竞争在倾斜生产方式中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人们认为,如果对竞争没有强硬的限制措施,黑市的投机行为将会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由于物资的严重匮乏,生产也会进一步缩减。这种情况不但会引发社会不稳定,而且会毁掉整个经济。1931—1945年,政府依靠各个产业部门的统制会对资源进行配置。1945年末,政府打算继续依靠这些统制会来管制经济。后来,由于这种想法违背了占领军总部坚决主张的反垄断原则,所以没能实施。然而,统制会却变身为各产业的行会。这些行会仍然协助政府“设定生产配额、协调物资的供给和需求、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担任中介、进行统计以及对各行业部门进行调查”(Okazaki, 1995b:276)。同时,政府还建立了15个公团,通过极其严格的印花税制度(Stamp system)负责物资的调配。

政府的管制不仅影响到生产资料的分配,而且影响到日常生活消费品,如食品、家用燃料、衣服和肥皂等的供给。在这些领域,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管制所取代(Arisawa, 1976:281; Keizai Kikakucho, 1964:57)。按照这样一种体制,经济安定本部在估算出供给量并确定了分配的数额之后,将分配计划再分发给各个省。在经济安定本部计划的基础上,各个省再为每个县的每一消费品行业制定配额。然后,中央政府的各省或地方政府再为注册批发商和零售商制定配额。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禁止对受政府管制的物资进行交易。生产者和分配者都必须把物资卖给那些被指定的购买者。零售商只有在提交了他们从消费者那里收到的印花税(stamp)之后,才能从批发商那里购买到政府设定的配额数量内的物资。批发商在同厂商进行交易时也遵循这一原则(Keizai Kikakuchō, 1964:19-26)。为了更好地实施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管制,经济安定本部任命了349个专职检察官,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调查和揭发诸如囤积物资等经济犯罪行为。经济安定本部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当时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一提到经济安定本部,啼哭的婴儿就会安静下来”(Arisawa, 1976:281)。

1946—1949年,利润原则仍然遭到反对;但现在它与民主有了关系。占领军总部的政策和政府的产业政策都进一步刺激了将公司权力从股东手中转移到雇员手中的趋势。工会组织的发展极大地强化了雇员在公司内的权力。财阀的解体解除了持股企业的监督功能。为了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资本家们不得不缴纳沉重的财产税,该项税收约占日本1946年GNP的1%。由于财产税的29%是以股票形式缴纳的,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股东的权力。同时,为了加速经济民主化,商工省又采取了一项新政策,通过鼓励雇员持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份,以及通过银行而非金融市场对公司进行融资,来达到限制股东权力的目的。受该政策的影响,股东的权利不仅在参与公司管理方面,而且在分红方面都受到了制约(Okazaki, 1993:120-127)。财阀解体后的新一代企业管理人员把雇员当家做主的权利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看作是民主的基础。新成立的日本经济同友会(Nihon Keizai Dōyūkai)的主要成员,甚至把笠信太郎的《日本经济的重组》这一近卫内阁战时经济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宣言,视为与管理相关的最新知识,把它当作集体讨论的教科书(Sakurada and Shikanai, 1983:183-187)。

在占领军总部劳动政策的支持下,劳动组织的比率由战前的3%猛增到1947年的50%左右。许多企业都建立了经营协议会(Keiei Kyōgikai, 缩写CMC),经营协议会也对企业的利润原则起到了限制作用。例如,在钢铁行业,有78%的企业建立了经营协议会,协商的议题从生产、效率、工作条件到福利,以及组织的设计和管理等等(Nishinarita, 1994)。与战时不同的是,战时的反对利润原则是在政府的强迫控制下才得以维持,而战后这一政策的持续,则是因为民主改革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1949年限制公司利润的经验把战时遗产转变成了和平时期的实践。正如我们下一章中要指出的,在道奇计划完成后,随着管理层重新获得权力,利润和效率重新成为企业管理中最为关注的焦点。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动员工会一起为提高劳动效率而努力,日本企业再次放弃了利润原则。

1946—1949年间,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大强化。在1931—1945年间,企业还能阻止那些革新派官员试图控制私人公司利润,以及给予管理人员正式地位的激进议案。同时,政府机构中的地方主义也在破坏政策整合的努力。但在1946—1949年间,占领军总部的压力粉碎了这些阻碍。纵观那个时期,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要向新的方向前进,但管制经济仍然主宰着日本的产业政策。

间接占领是导致管制经济惯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将日本与战后被直接占领的德国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说明一个关键的差别。在这两个国家中,经济危机都使得战时做法在战后一段时间内仍继续发挥作用。但是战时做法在德国的连续性主要是由占领当局完成的,因为占领军当局直接负责占领区的日常管理工作;而在日本,由于对日本是间接占领,管理工作主要是由受监督的日本政府完成的。其结果是,当形势的改变要求政府政策也做出相应改变的时候,集中于英美联合占领区的经济学家独立咨询委员会中的德国经济学家们主张实施激进的分散的经济管理。以阿尔弗雷德·缪勒-阿马克(Alfred Muller-Armack)和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为代表的奥尔多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强调个人的自由。这项政策在德国由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成为主要的推动力(Giersch, Paque and Schmieding, 1992:26-44)。与之相反,由于继承了战时管制经济的日本政府直接对战后经济进行管理,它本身很难推动任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1946—1949年,倾斜生产方式的实施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性制度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Gao, 1994)。

135

由于日本在占领当局统治下经历了一系列的激烈改革,实行倾斜生产方式的环境迥异于1931—1945年间实行管制经济的环境。然而,1946—1949年间日本政府所采用的倾斜生产方式,在把日本经济由1931—1945年间的管制经济转变为战后经济制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倾斜生产方式为在15年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强调政府干预的政策工具和经济制度提供了合法性,并使这些制度和政策工具与政府官僚机构一样在占领时期的剧烈变革中生存下来。正如本章表明的那样,当时人们做了种种努力来改变历史的进程。许多日本人相信,在一个民主的新日本,人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国内外政治经济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管制经济仍然盛行。很长时间以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继续实行管制经济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观察家们开始认识到战时管制经济惯性的强大:战时的某些政策已被认为是今天日本经济所面临的许多主要问题的根源。

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上的杰出贡献

1946—1949年是经济学家参与政府政策制定的黄金时期。在1931—1945年

136

间快速发展起来的政府和经济学家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这种强化不仅体现在参与管制经济政策制定的几名经济学家成了主要政治家的重要顾问,而且体现在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在政府机构中占据要职,将自己的思想直接应用于制定政府政策。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外务省年轻官员大来佐武郎组织的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SSCMFA),并在1946年为日本政府的战后重建提供了第一份蓝图。特别调查委员会是在1945年8月16日开始其研究工作的,这是日本向盟军投降后的第二天。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许多在战后日本极为有名的经济学家。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济学家分为三个不同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包括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代言人,如大内兵卫、有泽广巳、宇野弘藏(Uno kōzō)和山田盛太郎等人。第二个群体由 *Kinkei*[现代经济学家]组成,其中包括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和都留重人。第三个群体则是第一代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其中有稻叶秀三、大来佐武郎和后藤誉之助。第三个群体在政治上非常活跃,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学术界与政府间的联系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在昭和研究会1941年解体前都参加过该会的一系列活动,例如,有泽广巳就为近卫文麿的经济新秩序秘密起草过政策建议;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也曾是昭和研究会的成员。

137

根据这批经济学家为日本战后经济重建拟定的第一份蓝图,战后国际经济将划分成分别由美国和苏联掌控的两大集团。日本将处于一个极为敏感的位置,两大集团的任何一方都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势下,经济的运行不能只依赖自由放任政策。在日本经济进行了民主改革之后,还必须使货币制度和一些基础产业国有化,必须制定经济计划并实施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为增强日本政府的经济规划能力,这些经济学家建议,可以参考苏联的五年计划、美国的新政和英国的战后经济复兴计划。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与东亚经济融为一体,允许在区域内开展以分工为基础的合作;或者是否与中国经济融合,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主要国家。这个委员会也相信,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工业化不仅会减少日本对这些国家轻工产品的出口,而且会增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这也会增加日本从这些国家进口原材料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提出,日本应通过集中发展重化工业以参与国际经济中的分工。为促进贸易的发展,日本必须使自己的技术更新换代。日本只有建立起技术优势,才能向其他

亚洲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在这第一份日本战后重建的蓝图中,日本经济学家已经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的未来战略。他们坚持认为,日本资源稀缺,但却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应该注重发展劳动密集、但又资源节约和质量提高型的技术(Gaimushō, [1946]1990:149-151)。

不久之后,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成了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的主要顾问。这些经济学家和吉田茂之间的关系得以确立,主要是通过吉田茂的岳父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牧野伸显是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之一大久保利通的二儿子。牧野伸显本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先后担任过文部省大臣、农商大臣、外务大臣和内务大臣,还担任过宫内厅长官。早在20世纪30年代,牧野伸显就常常与和田博雄、东畑精一、中山伊知郎及有泽广巳下围棋。这样的交往在战后仍然持续不辍,牧野伸显把这些人看作日本未来的栋梁。1946年初,吉田茂出任币原内阁外务大臣之时,牧野伸显即敦促他就如何进行经济重建,听取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吉田茂与这些经济学家交谈,对这些人印象深刻(Takemi, 1968:106-109)。后来,在他1946年3月成为内阁总理之时,他极力劝说东京大学的农业经济学教授东畑精一出任农业大臣;而后又劝说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内兵卫和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中山伊知郎出任大藏大臣;并让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有泽广巳出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尽管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没有接受吉田茂的邀请,但他们都成了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吉田茂定期在午餐会上与他们见面,商讨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些午餐会上,倾斜生产的想法得以产生。

为了贯彻倾斜生产方式,有泽广巳担任了吉田茂私人智囊团煤炭委员会的领导人。煤炭委员会成员包括稻叶秀三、都留重人、大来佐武郎,以及来自经济安定本部的后藤誉之助,来自日本银行的吉野俊彦,来自大藏省的大岛宽一和商工省的佐藤尚邦(Sato Naokuni)。这个委员会为优先发展计划作了详细的规划。后来,在经济安定本部起草经济复苏的五年计划时,有泽广巳成了负责设计五年计划宏观框架的特别委员会的领导人。受其倾斜生产方式逻辑的影响,五年计划坚持主张,未来的日本经济应侧重于重化工业;这意味着日本将越过由占领军总部设立的限制范围。同时,该项计划表明,政府要再等上两年才能采取严格措施来稳定通货膨胀(Hara, 1990:14)。

担任政府职位是将经济思想传播给政府政策制定者的另一有效途径。经济评论员石桥湛山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哈佛大学上学的学院派经济学家都留重人,均直接担任了政府要职。石桥湛山在吉田茂第一届内阁时期担任过大藏大臣,后出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这些职位使他为倾斜生产方式制定了一系列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都留重人则在和田领导的经济安定本部综合政策协调委员会担任主席,该委员会主要负责政府经济政策的宏观协调。

139 1946—1949年间,日本经济学家能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所谓的战后虚脱(*sengo kyodatsu*),这是一种由于经济危机和政局不稳的加剧而形成的精神打击。在废墟中忍受饥饿并为生存斗争的过程中,许多日本人变得麻木,丧失了使命感,他们不知未来将何去何从。因为这种使命感过去是靠始于明治时期与军事扩张紧密联系的民族主义来维系的(Maruyama, 1951:176)。在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管制经济之后,日本的政府官员们面对激烈的民主改革,不知道是否应该将管制经济继续下去。商界领袖们或者因为财阀的解体而担心自己的未来,因而被摧垮,或者为重建毁于战争的工厂而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或精力去考虑长期计划(Arisawa and Ōkita, 1966:281)。在这种形势下,经济学家们关于战后重建的观点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第二,1946—1949年间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空前严重性,大大超过了政府官员们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日本政府在处理常规工作时的高效率是众所周知的,但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却束手无策。出于这种原因,政治家们不再依赖政府官员而是急于从政府机构之外寻求新的思路。第三,战后日本的民主改革强化了日本知识分子从政的愿望。随着政府对思想控制的放松,知识分子在政策讨论中的影响力陡然增加。第四,发展于战前或战时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及政治家之间的私人关系,为学术界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基础。

孤立于世界的国家

在什么样的学术氛围内管制经济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被继承呢?如果说,民主改革已经深深撼动了这个国家,为什么管制经济还得以继续存在呢?部分原因是因为,尽管在一般的日本人中,民族主义已经不再盛行,但在政策制定圈内却仍

然很有影响。民族主义虽然已不再与军事扩张相关,但在占领期间,却与如何保护日本的民族利益相关。这里有一系列因素,包括对战后复兴的关心、对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挑战的敏感,以及对占领军总部制定的战后重建计划的不信任,都使维护民族利益的意识仍得以保持。战后初期,民族主义导向在三项主张中得以体现:第一,独立实施战后重建;第二,把生产放在国家产业政策中的优先地位;第三,强调重化工业的发展。

140

有泽广巳曾回忆说,1946—1949年是日本仅有的充满“独立精神”和“爱国意识”的时期(Arisawa and Ōkita, 1966:279)。政策制定者共同具有的爱国主义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一项对他们的言论所作的分析揭示出两个因素:一是保护日本经济不受国际市场扰乱的愿望。都留重人主张,“就像经常被提到的那样,所谓的独立意味着要尽快摆脱目前我们正在接受的美国援助(美国援助已经占了日本国民收入的5%—10%),并且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日本实现经济独立就意味着,日本经济将不再随外国经济的动荡而动荡”(引自 Miyazaki, 1985:28)。

第二是对占领政策的愤怒或是不信任(用有泽广巳的话说,是 *uppun*[郁愤])。如有泽广巳所说:

经济重建的提议被占领当局所拒绝,生产设备都被拿走用于战争赔偿,工厂由于受命分散过度集中的经济力量而无法有效运转。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未来将无法做任何事情……我一度感到我们被逼到这样一种地步:没有任何出路,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怀着强烈的愿望要赢得这场斗争(Arisawa and Ōkita, 1966:279)。

这就是有泽广巳坚决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原因。石桥湛山也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在担任大藏大臣之初,他就卷入了与占领军总部的冲突。他强烈要求为日本公司提供战争补偿,并认为占领军总部反对这一主张的行为对日本战后的重建工作来说是令人不快的。增田裕(Masuda Hiroshi, 1988:104-105)研究石桥湛山的著作后指出:“石桥从内心深处对占领当局就不信任,因为他们如果[在日本]干得不好,只要拍屁股走人就行了。”

倾斜生产的思想

141

倾斜生产的思想最初是在1946年7月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的,当时正讨论如

何选择占领军总部同意进口的有限物资以度过经济危机及维持战后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国总动员法》使日本政府有权命令企业生产军火。其结果,这些企业变得负债累累。如果得不到政府的补偿,这些企业以及给他们提供贷款的银行将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大藏大臣石桥湛山为代表的日本政府提议给这些企业支付据估计数额高达 950 亿日元的战争补偿。然而,这一提议却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没有政府的财政补偿,许多私营企业可能破产,因此失业率有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战争补偿可能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经过无数次协商之后,占领军总部最终在 1946 年 7 月拒绝了这项提议(Masuda, 1988:61-74)。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度过随后而来的经济困境,吉田茂首相只能向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求助。麦克阿瑟答应提供一定数量的物品,并让吉田茂先简单列个清单。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权衡哪些是最重要的物品。

在这个背景下,有泽广巳提出了倾斜生产的想法。当吉田茂要求自己的经济顾问确定日本经济最重要的物资时,有泽广巳以及他在吉田茂智囊团中的同僚们列出了钢铁、原油、橡胶、无烟煤以及拖车。这一选择的理由是,进口原油可用于钢铁的生产,钢铁又可以用于改进煤炭的生产。那时候,煤炭是日本国内唯一可获得的能源,因而,煤炭生产对其他行业的生产而言意义重大。有泽广巳(Arisawa, 1948c:69)指出:

我们应该在经济政策中优先考虑煤炭的生产,因为煤炭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可操作的基本能资。所以我们应该在一段时间内围绕煤炭组织经济……即以煤炭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不言而喻,长期实行这一政策既不可靠,也无法维持,又没有必要。但是目前由于某些不可克服的困难和障碍,同时全面刺激生产根本不可能,我们必须在经济计划中选一个侧重点。我们的目的是快速增加基础行业的生产,使之成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转折点。

在有泽广巳看来,倾斜生产计划并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而是战后重建的长久之计。这一战略有三个政策目标。第一,通过刺激生产来克服资源的绝对短缺。第二,当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政府才应该紧缩货币供给以消除恶性通货膨胀。第三,只有当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的 60%之后,政府才可以紧缩货币供给。也只有这样,日本经济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来应对随后到来的稳定恐慌

(*antei kyōkō*, 参见下面的论述)。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稳定和重建是两个重要但又相互矛盾的目标。为了稳定经济,就必须消除通货膨胀。为了消除通货膨胀,政府就必须紧缩货币供给。然而,如果紧缩货币供给,生产就会下降,重建进程就会放缓。因为重建需要资本,但资本的供给会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这又将恶化通货膨胀。有泽广巳意识到了这一困境,但他认为重建比稳定更为重要。实际上,这反映出一种强烈的发展导向。有泽广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稳定经济的历程作了回顾。他指出,政府不应该过早实行紧缩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因为这有可能导致他所谓的稳定恐慌(*antei kyōkō*)。从德国的经验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后,工业生产下降了50%。因此,为了避免这种稳定恐慌,政府应该等到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的60%时,再采用紧缩货币政策(Arisawa and Ōkita, 1966)。根据有泽广巳(Arisawa, 1948b)的理论,消除通货膨胀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通过提高生产来解决物资绝对短缺的问题。只有达到较高的生产水平,才能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资源短缺的问题。

通过与稻叶秀三、山本高行(Yamamoto Takayuki)及商工省其他官员的一系列讨论,有泽广巳将倾斜生产的想法发展成了一项政策主张。吉田茂首相马上成立了煤炭委员会,并交由有泽广巳负责。1946年7月,有泽广巳、稻叶秀三和大来佐武郎开始了对倾斜生产方式的研究。他们设定的目标是,将煤的月产量提高到250万吨,或者年产量提高到3000万吨。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制定了一项全国范围的计划。

143

有泽广巳倾斜生产方式的逻辑思路,是受了马克思主义战时经济再生产理论的启发。根据这一理论,战时经济的显著特点是再生产的持续下降。这一理论由一系列的公式组成: $C+V+M$; $C+V(M-X)$; $C+V$; $C+(V-X)$; $(C-Y)+(V-NX)$ (其中, C 为固定资本; V 为可变资本; M 为剩余价值的生产, X 为可变资本的军用消费量, Y 为固定资本的军用消费量)。在战时经济体制中,军火生产是重中之重。尽管军火生产要消耗大量的资源,但却是与再生产过程没有丝毫关系的纯消费。因此,军火生产不仅占用了民用产品生产的资源,而且也占用了工业用品生产的资源,它会削弱再生产的能力。战争结束后,日本立即停止了军火生产的资源分配。但有泽广巳指出,这些资源并没有导入工业品的生产链,而是进入了消费品的生产链。原因是,由于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

比工业品的生产更有利可图。由于有限的国内资源脱离了工业品的生产,所以再生产会遭遇麻烦,当存货被消耗殆尽时,日本经济就会崩溃。只有实施倾斜生产,不断增加的煤炭供给才能被用于重建整个经济。由于煤炭是日本唯一可获得的能源,所以才从所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最重要的产业(Nakamura and Miyazaki, 1990:160; Shimazaki, 1971:309-311)。

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思想也受到1931—1945年管制经济意识形态的极大影响,而有泽广巳本人就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家之一。

144 第一,有泽广巳仍然以战略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并坚持认为,经济要由国家强力干预。在他看来,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如煤炭、钢铁、化肥等,对战后的重建是必不可少的。有泽广巳(Arisawa, 1948d:79)指出:“在生产不足而产生恐慌的情况下,物资总是全面短缺。即使我们想生产物资,我们也没有可以用来生产的原料。煤炭就是短缺的物资。为了增加煤炭的产量,就需要更多的钢铁,然而要增加钢铁生产,又需要煤炭。这里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里绕圈子,我们就无法找到出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这个循环。”在确定了战略产业之后,政府就必须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努力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提供食物、住房、药品和保健,给予矿工们特殊对待”,并且,“禁止木材、钢铁产品和橡胶的无谓浪费”(Sekitan Shōinkai, [1946]1990b:160)。

第二,有泽广巳始终都把生产放在政府产业政策中最关键的位置。倾斜生产目标超过了均衡和稳定等其他政策目标。倾斜生产方式使大企业大大受益,但也使消费者和中小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倾斜生产方式还产生了不稳定因素,因为它刺激了通货膨胀。但有泽广巳最为关注的是整个经济的存亡,而不是具体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他相信,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食物的绝对短缺以及采矿行业的生产不足。他坚决主张,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促进生产,就像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 1958)曾指出的那样,发展导向型经济的共同特征就是重视经济增长超过经济稳定。

第三,为了达成这一政策目标,有泽广巳声称有必要对市场实行严格控制。他指出,如果国家对资源配置不加以严格控制,市场力量就会把所有有限的国内现存资源都用来生产消费品,因为(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生产消费品有利可图。如果这样的话,日本就没有任何资源可以用于工业品的生产了。国家调控的主要

目的是通过把国内资源集中于一些重要行业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存活。为了限制市场力量,政府应该在经济治理结构中进行必要的组织与制度方面的改革。在政府机构内,应该防止官僚体制的混乱和低效率。政府应该“整合所有相关政府机构,为煤炭生产建立协调机制”,并且,“为了整合政府机构,应该在经济安定本部中设立煤炭委员会,或让煤炭委员会受内阁总理的直接领导”。如果私人煤矿无法完成国家订立的生产计划,“政府应该更换经理人甚至强迫买断其所有权”(Sekitan Shōiinkai, [1946]1990a:87)。有泽广巳认为,煤炭产业的所有权不必遵循资本主义原则。如果私营企业的现行体制制约了产量,可以将它们改变为国营企业(Sekitan Shōiinkai, [1946]1990b:161)。

145

第四,在这种经济中应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当时,俄国和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日本很有影响。在日本的政治话语中,*Sozialisierung*[社会化]的概念非常盛行,这反映出资本力量的减弱,以及人们对国家的不信任。进步力量支持工人阶级参与管理;有些激进者甚至支持基础产业国有化。有泽广巳也认为,工人阶级参与管理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有利于消除私营企业中的封建关系,尽管这种参与离工人阶级的解放还相差甚远(Arisawa, 1948a, 1948b, 1948c, 1948e, 1948f)。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有泽广巳的观点没有表明阶级立场,而“仅仅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的理论思考”,这种思考不得被追究其“历史的责任”(Shimazaki, 1971:314)。

占领军总部和经济安定本部

经济安定本部成立于1946年7月,目的是负责倾斜生产方式。这是日本政府在占领军总部的支持下,集中力量进行政策制定和协调的初次努力。这年年初,占领军总部命令日本政府加紧对市场进行控制,以便与恶性通货膨胀作斗争,因此,日本政府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并赋予它很高的权威。正如本章一开始所说,日本的政府官员对战后马上实施管制经济曾经失去信心,他们打算取消政府管制并重新引进市场的调节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从(1945年)8月到11月,日本政府解除了对食品和生产资料的控制(Arisawa and Ōkita, 1966; Keizai Kikakūchō, 1964:9)。1945年12月26日,占领军总部给日本政府发去备忘录,拒绝日本政府关于结束对价格和日常生活用品分配的管制之提议,并同时强调了国家严格控制

146

资源配置的重要性(Keizai Kikakūchō, 1964:9-10)。1946年1月,在占领军总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以应对经济危机。1946年3月1日,在经济大臣们举行了十多次会谈后,政府决定成立经济安定本部,作为协调各部省的机构。与此同时,占领军总部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1946年)5月17日,占领军总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安定本部职能的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方针有:第一,在政策制定上,经济安定本部的权力应该大于其他各省的权力;第二,经济安定本部应该是一个临时机构;第三,经济安定本部的存在应该不受政局变化的影响,保持其连续性;第四,本部长官有权对内阁大臣发号施令。在5月31日关于经济安定本部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占领军总部的官员指出:

日本的经济危机是由于煤、食物和肥料的短缺,以及纺织业难以获得发展所需资源而引发的,因此需要坚实的计划经济。为了早日结束这场经济危机,我们强烈要求日本的政府机构放弃本位主义传统,在重要的政策议题上进行合作。经济安定本部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设立的,它能在内阁层面对各省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Keizai Kikakūchō, 1964:12)。

然而,经济安定本部的建立并没有马上改善政府政策协调的能力。从1946年8月到1947年6月,由于政府各部门中的本位主义,经济安定本部没能在控制资源分配上发挥有效作用。例如,经济安定本部起草的《应对1946年下半年煤炭危机紧急措施》,就没能将各省都整合到一个政策包中来,只是简单罗列了每个部门的职责(Nakamura and Miyazaki, 1990:12)。1946年10月,煤炭的月产量仅为180万吨。由于胜桂之助领导的经济安定本部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支持倾斜生产方式,吉田茂只好转而求助于有泽广巳领导的煤炭委员会,以寻求解决办法(Nakamura and Miyazaki, 1990:237)。然而,煤炭委员会并非官方机构,它无权控制各省的行为。此外,委员会设定的1947年煤产量达到3000万吨的目标,远远高于商工省设定的1946年2300万吨和1947年2700万吨的目标。政府官员们对首相的私人智囊团企图重新起草他们先前拟定的计划表现出强烈的不满(Miyazaki Masayasu, 1990:16-17)。有泽广巳、稻叶秀三和大来佐武郎都很担心这种局面会延续。1946年10月18日,在煤炭委员会起草的《煤炭增产特别措施》中,他们指出,“必须防止政府机构中的混乱和低效现象”;为促进生产,国家需要

“为煤炭生产建立一个合作体制,以协调所有相关的政府机构;尤其是政府应该在经济安定本部内建立一个煤炭委员会,并使之直接受命于首相,以便指挥各个政府机构”。在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这一问题上,这份文件指出,如果私人煤矿没能完成政府设立的生产目标,“政府应该更换经理人,甚至强迫买断其所有权”。为了促进生产,煤炭产业没必要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管理;如果私人所有权限制了生产,就应该改为公有(Nakamura and Miyazaki, 1990:161)。

宽松的货币政策

受日本政府分散管理的制度结构,以及主要政治家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倾斜生产方式的实施受到阻碍。经济安定本部的前两任长官胜桂之助和石桥湛山以及吉田茂首相,都是赫赫有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他们都对政府直接控制资源调配持怀疑态度,倾向于支持市场力量。那时候,吉田茂本人正专注于政治和外交事务,经济政策方面的事务则推给了石桥湛山。吉田茂曾经回忆说:

148

石桥湛山取消经济管制的主张与我不谋而合。我们相信,应该尽快取消经济管制,让经济自由茁壮成长……石桥湛山认为,当务之急是结束物资短缺的局面,并刺激生产,这是克服通货膨胀的基本途径。如果我们可以有效地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困难。鉴于这是一段困难时期,所以我在每件事情上都信任他。我觉得我应该信任石桥湛山,放手让他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信任是一个用来表述我的立场的词,我别无选择(Youshida, 1957, Vol. 3:182-183)。

先是担任大藏大臣,而后又成为经济安定本部负责人,石桥湛山可以说是当时负责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政治家。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石桥湛山就是日本著名的自由主义者(*jijū shugisha*),他的经济观点综合了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和自由放任学说。在政策问题上,石桥湛山称自己为凯恩斯主义者,并经常自问:“如果凯恩斯现在在日本,他会采用什么政策?”石桥湛山被认为是在日本财政政策中审慎采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第一位日本政治家,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所推行的一些做法与凯恩斯理论也有相通之处(Chō, 1947b:18)。1946年7月25日,石桥湛山在一次著名的国会发言中([1946] 1970:194-196),就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以及政府领导的重要性问题,与有泽广已达

成了一致。石桥湛山也相信,提高煤炭产量是日本战后经济重建中的当务之急,他主张,日本政府应采用一些划时代的措施。不过,他关于日本经济政策的主张和观点,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与有泽广巳产生了重大分歧。

149 第一,与有泽广巳强调政府管制相反,石桥湛山主张依靠市场功能在实施倾斜生产方式上发挥作用。石桥湛山认为,政府应该刺激市场的活力,而不是限制它的作用。按照有泽广巳关于倾斜生产的观点,政府是主角,对物资分配的控制是政府支持倾斜生产方式的主要工具。相反,石桥湛山(Ishibashi, [1951]1972: 207-210)反对政府控制,他认为,对日本这样的穷国来说,经济自由更适合于进行战后经济重建。他认为,正是由于国家掌控了一切,所以管制经济才会在战争期间遭受失败。石桥湛山指出,当前国家应在尽力提高煤炭产量的同时,努力掌控矿产、木材、食品甚至地下资源的分配。然而,对于政府来说,要保证这些物资的供给非常困难。因此,矿工们极有可能对煤炭生产丧失热情。总之,石桥湛山打算利用市场机制来刺激生产。他坚持认为,尽管在市场运行失灵时,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但这种干预的唯一动机应该是创造有效需求。有泽广巳将市场失灵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是从失灵中找出新的解决方案;石桥湛山则坚信市场的活力和私营部门的创造力,认为政府的干预仅可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在石桥湛山看来,市场力量能使日本产业在企业层面上合理化。这不仅是提高重要产业生产的必要途径,而且对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和改善生活水平都有战略意义。由于企业生产的合理化会导致失业,又由于日本战败后大量日本人从海外被遣送回国,所以石桥湛山进一步提出,政府亟须建立一个社会保障体制以解决失业问题。

150 第二,尽管石桥湛山倡导政府干预,但他强调,政府干预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直接管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桥湛山倾斜生产的观点反映出对战后环境的适应。为了促进某些战略产业的生产,同时保持消费市场的稳定,石桥湛山建议,消费价格应维持在当前水平,而生产价格应适当提高,政府应补偿二者间的差价。同时,石桥湛山还指出,政府应通过复兴金融公库(RFB)为私营部门提供资金,因为除此之外,私营部门已不再有任何资金来源。1946年,石桥湛山又指出,“在日本当前这种形势下,政府财政的重中之重,是为人们创造商业机会,使产业复苏,发展成为一个充分就业的国民经济。”政府是否有财政赤字并不是石桥湛山关心的主要问题。他相信,“政府可以有一个看似均衡的财政预算。然而,

只要国内失业人数继续攀升,生产设备没能充分使用,财政预算就不能算是真正健康”(Ishibashi, [1946]1970:190)。按照石桥湛山的说法,只要存在失业人群和闲置的生产要素,政府财政政策的优先考虑对象,就应该是如何为经济重建有效地调动这些要素。石桥湛山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即使在政府预算有赤字或(接下来)赤字上升的情况下,也必须增发货币用于流通”(Ishibashi, [1946]1970:192)。显然,石桥湛山的思想是以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

有泽广巳与其马克思主义同道(尤其是大内兵卫)都认为,通货膨胀是日本经济的最大隐患。因此,他们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敦促日本政府采用紧缩货币政策(Ōuchi, Arisawa, Wakimura, Takahashi and Minobe, 1946, 1949)。在批评石桥湛山的货币政策时,他们反复引证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例子。然而石桥湛山则援引凯恩斯主义的定义,指出真正的通货膨胀根本不存在。尽管某些现象,例如发行了大量的货币、物价和工资在不断上涨等貌似通货膨胀,但只有在充分就业达成后购买力仍上涨的情况下,在所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物资都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真正的通货膨胀。石桥湛山进一步指出,当前日本经济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失业、闲置的生产能力和低生产率。这些情况表明,现在根本没有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就业不足,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通货膨胀(Ishibashi, [1946]1970)。

在石桥湛山的领导下,日本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库(RFB),负责为政府的倾斜生产方式提供资金。为防止宽松货币政策被信奉古典经济学的人颠覆,石桥湛山多次反对占领军总部从日本银行为复兴金融公库选择理事长,因为日本银行雇佣了许多古典经济学家(Yoshida, 1975:116-117)。石桥湛山的宽松货币政策给战后日本经济史的研究留下了争论的话题,人们常常指责这一政策要为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负责。然而,复兴金融公库的许多职员都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指出,无论人们何时谈起战后通货膨胀,都会认为复兴金融公库就是罪魁祸首,然而,复兴金融公库是当时刺激生产的唯一方法。如果生产上不去,通货膨胀就不可能消除,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复兴金融公库的职员也承认,他们采用的财政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当时的资金实在是太短缺了。为了尽快更换工业设备,必须创造新资本。就算复兴金融公库确实引发了一些短期通货膨胀,但它通过刺激生产,在战后重建工作中起了关键作用。1947年3月,由复兴金

融公库提供给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全部贷款的4.2%，但到了1947年9月，该指标就增长为17.6%。从1948年3月到1949年3月，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在24.0%—24.6%。RFB提供的大部分贷款都有日本银行的担保：1947年3月底为94%，1948年3月底为76%，1949年3月底为64%（Shikagui, 1979:161）。日本银行发行的新货币中，有40%流入了复兴金融公库。复兴金融公库提供的贷款是强化生产能力的有力工具。1946年，大部分重建基金都用在了私营企业的日常经营和工资补贴上。复兴金融公库甫一成立，立刻开始为私营企业提供贷款，用于生产所需设备的更新换代。在复兴金融公库提供的全部贷款中，用于生产设备的比例，1947年3月为47.7%，1948年3月为59.0%，1949年3月为69.1%（Shimura, 1976:646-647）。

尽管有泽广巳和石桥湛山在观念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思想在倾斜生产方式中都有体现，并且都强烈影响了日本后来的产业政策。就像下一章中将要表明的，有泽广巳建议政府应该在资源配置中采用区别对待策略的提法，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被用于培植日本战略产业。石桥湛山提出的依靠积极财政政策促进全国生产力的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担任内阁总理时也再次被采用，而且，在20世纪40年代末担任大藏省次长、50年代中期又出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在20世纪60年代出任首相后更是予以大力推行。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桥湛山是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用于改善经济产业结构的先驱，这也是战后日本发展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

和田博雄的经济安定本部

1947年年中，由石桥湛山领导的大藏省得以有效地执行宽松货币政策。其原因首先是大藏省在该政策领域拥有了完全的控制权；其次，石桥湛山在财政政策上的权威受到了吉田茂首相的支持，而他们两人的政策目标是一致的。相反，由胜桂之助领导的经济安定本部却没能成功地在倾斜生产中协调政府各个机构。

正如占领军总部国内事务部政府管理处处长舍伍德·M. 法恩指出的那样：

1947年的重建工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日本政府的组织混乱。尽管ESS[经济与科学局]要建立一个经济协调组织，但是根本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回应。反之，大藏省、通产省和农林省却

常常实施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政策。在几次说服失败以后,盟军总司令指示首相设立一个隶属于内阁的机构来制定基本的经济政策,并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相关活动。这样,1946年8月,一个新的机构——经济安定本部出现了。经济安定本部的职能是规划生产、分配物资,并制定物价及金融政策。各个省只能根据经济安定本部的相关政策和计划发布命令。然而,尽管建立了这个核心的经济权威机构,日本政府还是选择不按照设计的精神来利用这个新机构。经济的政府计划概念以及依靠公共权威而不是私人控制的做法,对执政党来说是不可理解的。直到1947年6月,社会民主党组阁,经济安定本部才经过努力变成了一个计划机构。商界则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来看待这一进展(Fine, 1952: 193-194)。

受制于政府机构的无能及政治家们对自由放任的崇拜,日本政府没能控制好局势,经济形势很快恶化。稻叶秀三甚至预言说,到(1947年)3月底,等所有的物资用完后,日本经济将彻底崩溃。

153

占领军总部决定将日本政府的政策协调能力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947年)2月6日,占领军总部内的经济科学局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建议政府把计划职能以及与管理经济相关的人从各个局转到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安定本部有权为各种经济政策制定计划,而各个省只负责保证计划的执行。经济安定本部不仅可以从政府官员中,而且可以从普通公民中招募成员,同时,为了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经济安定本部还可以扩大自己的规模(Keizai Kikakuchō, 1964: 47-48)。1947年3月22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给日本吉田茂首相的信中指出:

盟军当然没有义务维持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没有责任进口食物来满足日本由于战败而导致的饥荒,更没有责任保证食物供给的公平与有效分配……日本政府必须通过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经济安定本部,尽早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和实施当前所需的各种经济与金融控制(MacArthur, [1947]1982, Vol. 20:518-519)。

在占领军总部和经济形势的巨大压力下,吉田茂内阁放弃了对其政策影响长达一年之久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承认必须给予在经济重建中作为政府领导核心的经济安定本部以更大的权力(Keizai Kikakuchō, 1964: 46)。这是日本政府机构

在制度安排上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在战争期间，革新派官僚努力想实现这一目标，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1947年5月，片山哲成为首相后，任命和田博雄为经济安定本部长官。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和田曾全身心投入管制经济中。因此，当他成为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后，经济安定本部的人事安排更明显地折射出战时遗产的影子。和田博雄把一些高层职位留给了许多前政府官员，这些官员都曾在内阁调查局、内阁企划署和内阁企划厅任过职，有的则在1941年因内阁企划厅事件与和田一起被捕过。胜间田清一当了和田的秘书，佐多忠隆成了金融货币局局长，稻叶秀三则担任经济安定本部官房次长。这些人都有在战时实行管制经济的共同经历，因此，他们都极其支持倾斜生产方式。除了和田这批人之外，还有两位对本书的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在经济安定本业内担任了重要职位：大来佐武郎成为规划局局长，下村治出任物价局局长。

和田博雄领导下的经济安定本部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势力最强大的经济机构。它在政策制定上有充分的自主权，不仅可以独立于社会力量的要求，也不受内阁总理领导权的约束。当时，稻叶秀三在政治上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中立派。在劝说和田博雄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领导职位之前，稻叶秀三要求片山哲答应他两个要求：第一，片山哲作为首相，必须接受经济安定本部做出的任何决策，如果他不同意这一条件，和田将不会接受任命；第二，经济安定本部应该招聘一些非职业官僚来担任高层职位，这些人可以包括来自商界和劳工阶层的代表。片山哲接受了这两个条件(Inaba, 1988:58-59)。

正如先前提到过的那样，和田与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在和田领导的经济安定本部产生之前，有泽广巳就经常与后来是经济安定本部核心成员的一些人谈论如何执行倾斜生产的方式，并最终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947年年初，煤炭委员会已结束了作为吉田茂私人智囊团的使命，但其成员还是经常见面探讨一些政策问题。他们的活动先是转到商工省(MCI)的计划处，商工省的一些官员如山本高行、Tokunaga Hisatsugu及佐藤尚邦也都参与了讨论。4月，他们又迁到稻叶秀三的国民经济研究会，和田本人也在这里参与了讨论。那时，和田还是该会会长，但已经辞掉了吉田茂内阁农业大臣的职务(Sugita, 1989:139-140)。一些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和田领导的经济安定本

部的人事安排。事实上,一些重要职位的安排最初就是由有泽广巳、稻叶秀三、都留重人及大来佐武郎共同决定的,因为在当时,有泽广巳还在考虑是否接受经济安定本部长官的职务任命(Tsuru, 1988b:227)。然而,片山哲本人并不特别推崇有泽广巳;而吉田茂也向他推荐了和田。因此,尽管稻叶秀三和和田本人都反对,该职位最终还是安排给了和田。

155

尽管政府的能力大大增强,但主要还要靠外部的力量才能得以维持。事实上,正是由于占领军总部对许多重要问题都进行直接干预,才保证了倾斜生产方式的展开。在强化政府管制、削弱政府机构中的本位主义方面,最能体现占领军总部的影响力。如果没有占领军总部的支持和倡议,日本政府可能仍然不情愿强化政府管制的力量,也不可能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集中全力,经济安定本部也根本不可能成立。当时,占领军总部的许多官员都受到美国新政的影响。他们相信,政府干预将是日本度过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法。在日本政府无法完成这一任务时,占领军总部就应该直接插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占领军总部实施的占领政策,对于解释战时体系在战后时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生产还是经济平等

都留重人担任了和田领导下的经济安定本部综合政策协调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次长级的职位,负责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协调。都留重人的职位对政策制定影响极大。都留重人本人是出身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了日本。都留重人之所以去美国完成自己的大学教育,是因为他曾参与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学生运动而被他当时所在的高中开除。作为一名左翼分子,都留重人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日本社会的主流。他回到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想亲眼见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他还想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为重建新日本进言献策。都留重人坚信,日本有机会改革其战时经济体制。

都留重人最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割断战时形成的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盘根错节的纽带来实现经济平等。在这一点上,他与有泽广巳不同。有泽广巳强调生产的重要性,并把国民经济的复苏当作最为重要的任务,而都留重人则受美国新政的影响,更为关注如何在不同社会阶层间平均分配经济福利(Miyazaki, 1985:42;

156

Ōtake, 1981:472; Tsuru, 1947b:16)。在战时管制经济中,政府为了支持战争,把大部分资源都投入到由大企业掌控的军需产业。由于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些企业获得了市场的垄断地位,并通过参与政府赞助的项目获取了巨额利润。战后初期,这种机制在日本仍然继续奏效。在日本政府启动倾斜生产方式之时,大企业在资源分配上获得了极其优惠的待遇,其中包括复兴金融公库的优先融资,以及在生产资源分配上的优先权。受益于分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他们在黑市上获利丰厚。

都留重人反对依靠大企业来执行倾斜生产方式。他指出,大企业的盈利状况对收入、进而对消费价格都有一系列影响。这个涉及收入和消费价格的恶性循环是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那些继续实行战时物资分配管制的公司,常常也是腐败的集中地。都留重人相信,这种状况对那些努力工作的普通工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断言,即使倾斜生产方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政府继续容忍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或通过黑市获取高额利润,日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悲惨的现实,即“诚实的人会被认为是傻子;努力工作的人会遭受损失”。

157 尽管都留重人并没有主张需要马上进行一次改革来推翻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他提倡实行一种循序渐进的制度改革。都留重人很支持倾斜生产的想法,但不提倡在管制经济背景下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他指出,那些认为政策和政府规制及不断加大的惩罚力度能打压黑市的想法是错误的。要稳定经济形势,就得对黑市和垄断利润实行更严格的政策,或者对垄断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改革。他指出:“为了建立一种在长期内多劳多得的经济体制,我们必须把这个紧迫而困难的问题当作眼下工作的重点”(Keizai Antei Hombu, [1947]1965:185)。由于1/3的国民收入通过政府财政进行分配,所以政府就不应该在黑市上购买任何商品。正如宫崎义一(MiyazakiYoshikazu, 1985:29)指出的那样:“把黑市利润在分配过程中对价格和收入的影响看作是工资—价格恶性循环的罪魁祸首,并为减轻它的危害而建立工资—价格的同步确定机制,这不仅仅是建立一种简单的分配秩序,而且暗示着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政策方向。它提出了一个制度性问题。”

在都留重人的领导下,1947年6月11日,经济安定本部颁布了《经济紧急对策纲要》。在这份纲要中,政府郑重承诺要通过打压黑市交易以及强化对食品和运输的控制来规范分配体制,并对价格和工资进行重新制定,以提高人们的生活

水平(Tsusanshō, 1954:48-49)。在公共价格体系中,政府规定,月工资的标准为1 800日元。以这一估算为基础,政府对一些基本物资如钢铁、肥料的公共物价指数作出规定,苏打和煤的物价指数比1934—1936年间分别高出65倍和48倍。其他物品的消费价格则依据这些基本物资的价格进行确定。政府还为市场价格高于公共价格的所有商品提供价格补贴。该项补贴在1947年一般账户中占政府支出的21%,1948年则占24%。

都留重人重视经济平等的观点与倾斜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导向发生了矛盾。都留重人的观点受到有泽广巳的严厉批评。有泽广巳指出,追求平等并不能解决日本的问题,主要理由如下:首先,在高通货膨胀时期,要建立新的分配秩序并实现平等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这些目标可以实现,也无法增加可用于平均分配的物资数量。“就算这些方法(比如分配秩序)能够百分之百地做到,它所实现的消费方面的节约也只有5%—7%”(Arisawa, 1948f:90)。在1947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泽广巳进一步指出:

新内阁采用的第一项政策是建立分配新秩序,建立工资和价格的新体系。并要求人们忍耐物资的短缺……依我的理解,政府已经认识到刺激生产的必要。由于严重的物资短缺而无法迅速执行倾斜生产方式,所以政府也放弃了迅速增加生产的所有希望……政府没有选择实施艰难的改变,而是选择了一种简单的自圆其说的方式(1948f:88)。

158

有泽广巳的结论是,即使政府没有完全走错方向,也无法实现其主要目标。

按照都留重人的看法,倾斜生产方式应该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以民众的参与代替政府官员的管制。1947年7月,都留重人在为政府起草的题为《经济实况报告书》(*Keizai Jisshō Hokokusho*)的第一份政府白皮书中,号召全国人民坚持挺过经济困难,同时也呼吁工人阶级、管理阶层与政府之间展开合作,白皮书指出,倾斜生产方式能否成功,取决于广大日本民众是否参与。他还指出:“不论当下形势多么严峻,民主政府都有义务公布当下的形势,而不应该有任何隐瞒。”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得到大众的支持。白皮书还反对政府官员用强制手段管制人们的生活。他指出,日本人民在战争期间已饱受政府的管制。这种管制在战后改革中被废除之后,人们对未来的共识不复存在,人心变得涣散。“在民主的日本,调动分散的公众为经济复兴共同努力的有效工具既非大棒也非胡萝卜——大棒不允许

使用,而在困难情况下,胡萝卜又无处可得。良好的协作要建立在8 000万公民的自发契合的基础上”(Gaimushō, 1947:1)。按照这一逻辑,白皮书指出,“因为日本人民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他们应该是制定对策的人。他们应该支持自己选出来的政府,将对策的成功视作自己的事情加以关注”(KeizaiAntei Honbu, [1947] 1965:178)。白皮书主张,日本人民应该把自己对暂时性物资短缺的忍耐,当作他们为经济复苏大业所必须作出的努力。

阶级利益还是民族利益?

159 白皮书中对全民坚持忍耐的号召,以及对政府、管理者、劳动者之间合作的号召,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究竟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利益:民族的利益还是工人阶级的利益?

当时,日本人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导致了思想权威的真空,旧天皇制度的瓦解大大削弱了日本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国家对思想的控制被逐渐取消;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对人的尊重,被占领当局大力引入日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日本对世界和平不再构成军事威胁(Maruyama in Umenoto, Satō and Maruyama, 1966:10-13)。这种情况下,在政策讨论过程中,将民族国家作为政策讨论的分析单位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作为对战时国家控制公民自由的反弹,要求大众分担国家困难的号召无法轻易获得认同。对战时民族利益主张的主要挑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1946—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日本重新赢得了声望。当时,一群拒绝归顺天皇的政治犯被释放。人们认为,他们才是反法西斯主义的唯一英雄。在自我反省中,许多左翼自由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应该对在1931—1945年间没有组织人们反法西斯负责。他们认为,没能这么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日本知识分子与政府过于亲密,而与普通老百姓却长期疏离。为了像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那样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即代表公民社会的利益——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持一种强烈的反政府立场,与相关的政府政策划清界限。这是防止日本回到黑暗时期的唯一途径(Takeuchi, 1980:88-90)。在这一阶段,许多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又重新信奉马克思主义,这在日本思想史上刮起了一场新的转向风潮。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民族利益观念。他们在政策讨论中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法,强调在倾斜生产方式中首先要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劳资合作。对于信奉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号召政府与社会合作听起来具有战时心理特征。他们指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民总是被告诫说,国家意志和民族利益比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要重要得多。战后民主改革之后,国家放松了对公民生活的控制,国家利益已不再高于社会利益。马克思主义者批评道:“号召全民忍耐和团结,大大扰乱了日本社会和日本经济”;白皮书“仅仅是战时意识形态的一些残渣……当前的问题不是日本民众的忍耐力问题,而是如何在日本人民中间实现物资的公平分配……当务之急是消除不公正,而不是以号召国民忍耐的口号来掩盖不公平的现象”(Kishimoto, 1947:12)。

160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白皮书提出的与政府合作“主要是针对劳动者而设计的”。“通观其内容,白皮书始终强调劳动者要支持冻结工资的政策。而政府仅仅以承诺取消黑市作为交换……尽管白皮书声称,倾斜生产方式将为全体人民服务,但最终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全部成本只能由劳动者承担”(Ōuchi, 1947:2)。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尽管白皮书上罗列了经济危机的许多现象,但却一点也没有触及经济危机的本质(Kawasaki, 1947:4)。战争期间由于军费开支而导致的巨额赤字引发了物价猛涨,“只把注意力放在黑市上而不触及这些重要问题,反映了一种纯自由放任的经济观点或幼稚的均衡理论”(Ōuchi 1947:3)。“如果政府真的打算在保证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复兴,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如何重建资本,而是如何使生产摆脱资本主义模式”(Kawasaki, 1947:5)。马克思主义者对战后首届由日本社会党组成的片山内阁寄予了厚望,他们认为:“社会党应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尽管政治妥协有时是必要的,但自绝于劳动者的立场无异于自杀”(Kishimoto, 1947:12)。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中,倾斜生产方式被认为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生产而设计的。有人认为这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倾斜生产方式是利用“政府的强制力”,通过政府给大企业的补贴、对物资分配的控制以及复兴金融公库给大企业提供信贷的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

这些影响广泛的批评引起了政府政策制定者们的愤慨。对于那些视民族的存亡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的人来说,如果把阶级作为分析单位,在一定程

161

度上就像把一个放大的个人作为分析单位。根据有泽广巳的解释,阶级利益没有经济重建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成功的经济重建,工人阶级仍将不能保障自身利益。他指出,“眼下为阶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必须以努力生产的形式来进行”(1948e:99)。中山伊知郎则批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运动代表的是“集体利己主义”(group egoism)。根据他的分析,工会并不是经济重建大业中的参与者,因为他们总是把罢工作为唯一的策略,他们并不在乎他人的利益是否受损。中山伊知郎(Nakayama, 1948b:14)指出:

由于工会是一个保护群体利益的组织,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不利于劳动者的环境下,工人们采用激进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作为新工人的代表和经济重建大业的主人,这种态度根本不对……在经济由于战争的失败而四分五裂,并且一直都没能重新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情况下,小团体主义是经济重建中最大的人为障碍。

大竹启介(Ōtake Keisuke, 1981:474)曾经注意到,战后初期的经济问题评论家们经常“不负责任”,并且“观点偏颇”。“他们说话尖刻而荒谬。日本大众媒体中这样一种特点的批评是在战后的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都留重人(Tsuro Shigeto, 1965:7)也指出,由于进步势力缺乏一种现实主义的洞察能力,他们丧失了一次可以带来真正改变的机会。

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稳定

到1947年末,日本政府基本上实现了年产煤炭3000万吨的目标。大约在这段时间里,有泽广巳、都留重人以及几位经济安定本部的官员讨论了政府是否要马上采取措施来稳定通货膨胀。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做还为时尚早。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有泽广巳声称,要到产量恢复到战前水平的60%时,政府才有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有泽广巳关注的主要是经济的重建。根据这个逻辑,重建工作是日本自己的事情;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应该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国外。有组织的劳动者必须努力工作。根据有泽广巳的说法(1948e:99),参与这场生产斗争不仅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通过参与这场斗争,工人阶级能够获得影响公司管理的权力。

1947年晚些时候,马克思主义者木村禧八郎(Kimura Kihachirō)对倾斜生产

方式又发动了一次攻击。他要求政府立即抑制通货膨胀。在木村看来,对经济重建来说,稳定比生产更为重要。因为通货膨胀会加速生产的不足,它会迫使人们把更多的钱马上用于消费而不是引导他们把钱省下来用于生产。在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之前,经济是不可能繁荣起来的。因为就算生产得以增加,再生产和最终消费也不会马上增长。

木村禧八郎(Kimura, 1947)还断言,当前政府采取的加强倾斜生产的政策只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他指出,通货膨胀背后的推动力是战争期间形成的流动资本以及在执行倾斜生产方式时所获得的不公平利润,国家很有必要对这笔钱课以重税。换句话说,消除通货膨胀必须以减少公司利润为代价。从这一意义上说,过分强调生产只能为资本家推卸这个负担提供借口罢了。

木村禧八郎还认为,倾斜生产方式中强调的加大劳动强度并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他指出:

1940年,日本的煤炭年产量已经达到5000万吨的高峰。众所周知,使日本在1941、1942、1943年的煤产量一直维持在5000万吨水平的条件,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通过残酷的强制手段雇用国外劳动力。如今,日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劳动力了。外国劳工被那些与我们拥有相同权利和自由、在民主改革中解放了的日本工人所替代。在如此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为了鼓励工人的创造性和提高生产的决心,就要改进那些本来就不太好用,后来又被战争进一步毁坏了的采煤设备。任何一个曾经到过煤矿的日本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谁会愿意在这种工作条件下工作?”(Kimura, 1948:22)

有泽广巳在辩论中仍坚持其以生产为中心的立场。由于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国民经济的重建,而不是某一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他反对立即稳定。尽管他因提倡反通货膨胀政策和强烈反对石桥湛山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而闻名遐迩,但他并不同意日本政府马上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他断言,生产不足才是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根据有泽广巳的说法(Arisawa, 1948d:77-78),日本经济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黑市和经济主体的投机行为正酝酿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不足持续的时间越长,通货膨胀问题就会越严重。黑市越扩张,生产中突发的短期行为就会越来越多……即使通货膨胀和黑市能使经济维持一段时间,

经济彻底崩溃的那一天迟早也会到来。”另一方面，黑市和投机行为的存在至少能“保护企业不致破产，并延缓生产不足爆发的时间”。他说，如果政府此时采取强硬政策来稳定通货膨胀，就会发生“稳定恐慌”，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和黑市的消除可能会导致许多银行破产。即使我们这样做了，生产可能仍会下降，大街小巷将会充斥着失业人群。失业人群对整个经济的破坏力是不堪设想的，而我们在面对这种局面时将只能是束手无策”（1948d:77-78）。为了把稳定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最低水平，有泽广巳坚持认为，在实施货币紧缩政策之前，生产必须至少增加到战前水平的60%。

164

有泽广巳关于倾斜生产的主张中所体现的生产导向，曾是管制经济政策的中心主题。正如很多批评指出的那样，有泽广巳可能在确定战后经济重建和发展的方向上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他没有强调建立一种使收入分配更均等的制度之必要。倾斜生产方式的实施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Hayasaka, Masamura, Takeyama, Hamaguchi, Shibata and Hoshino, 1974:58）。正如本书先前提到过的那样，对倾斜生产方式道义上和道德上的批评，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迅速变化的意识形态环境。由于民主改革的实施，1931—1945年间在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下被压制的经济平等要求以及社会阶级意识重新觉醒，它们使生产和民族利益的言论受到极大的挑战。然而，历史后来证明，这些挑战并不足以阻碍战时意识形态在战后的日本产业政策中继续发挥作用。

要外国资本还是要民族独立？

1948年3月，民主党政治家芦田均成为内阁总理，他打算依靠外资重新发展日本经济，并重建日本的国际信誉。他把引进外资当作倾斜生产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他的理论依据是，消除通货膨胀需要生产的提高，而生产的提高需要资本的积累。外资则是资本的重要来源。这一主张导致了一场新的政策讨论，即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如何界定外资在日本战后经济重建中的作用。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导致其民族主义精神支柱的崩塌，而民族主义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支撑着日本人的世界观。当“皇军天下无敌”的神话被粉碎，天皇也由神变成人之后，日本的民族认同感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国际主义

再一次盛行。人们相信,日本很快会回到国际大家庭中来。按照丸山真男的说法,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无视日本被外国占领的事实,享受着占领当局给予的自由(Maruyama, 1982:113-114)。战败和被占领并没有被看成是对国家的威胁,而被看成是在15年战争中错误的集体奋斗的结果。早在1946年,外务省经济复兴特别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就指出,财政援助将是战后重建的第一步,因为日本经济受战争的破坏实在太严重,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日本是否回到国际经济中来。然而,1948年以前,日本被禁止参与国际贸易,因此这个主意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1947年,美国改变了其对日本的策略,将支持日本民主化转为支持日本复兴,一些日本人相信,日本实施复兴策略的机会来了。

165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国外投资看作稳定经济形势及推动战后重建的关键因素。由于日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殖民地,没有了来自国际市场的资本、技术、市场以及其他物资,日本经济根本无法存活。中山伊知郎是倡导外资的积极分子,他总结了俄国以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经济重建的经验后认为,日本经济的前景之所以取决于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需要通过资本积累及把资源导向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发展,为日本经济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没有贸易和国外投资,这个目标根本无从实现。其次,日本要养活众多的人口,这是当时日本经济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为了实现充分就业,日本必须参与国际贸易,用外部需求解决内部就业问题。中山伊知郎仔细分析了1846年发生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饥荒事件,在这次饥荒中,爱尔兰的人口数减少到只有英格兰的1/10。他得出的结论是,爱尔兰主要依靠国内的粮食,而英格兰则从与其殖民地的国际贸易中受益匪浅,这就是重大区别(Nakayama, 1948c:66-73)。中山伊知郎还相信,外资将有利于稳定外汇汇率,并能保证日本通过国际贸易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封闭条件下的经济稳定永远都不可能为固定汇率创造条件(Nakayama, 1948c)。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是日本产业化的最主要原因;战后重建工作也将如此。

然而,这种国际化视角遭到了那些持有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外资的引进会使日本经济受制于其他国家,日本应该防止外资在国内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名波东一(Nawa Tōich, 1947:26)认为,为了避免因克服通货膨胀而采用紧缩政策,为了应对国内制度改革的要求,引进外

166

资的策略可以启动经济周期。如果在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之前引进了外资,国内生产将会被滚滚而来的廉价外国商品所取代,国内经济将被外资主宰,为维护其市场价值,国内资本将会去往其他国家。这种情况会毁掉日本经济的生产力和出口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进外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事关政治独立问题。有泽广巳指出,“资本并不是慈善的礼物”。大量外资的主导地位和过度外资化[Ueberfremdung]会导致本国丧失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在有泽广巳看来,当时摆在日本工人阶级面前用于经济重建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是,要么靠他们自身的力量,要么靠外资的援助。这是一个权衡的过程。有泽广巳本人更倾向于前者;他说:

我并不主张工人[用尽可能少的国外援助]对独立重建日本经济负主要责任。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然而,我想说的是,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他们会陷入遭受双重剥削的境地……如果经济复苏单靠国外援助,日本的工人阶级将失去自己发言的自由(Ōuchi et al., 1949:266-267)。

有泽广巳断言,日本最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经济复苏。即使需要国外的援助,也应将援助额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在他看来,外资不是一个如何积累资本的技术问题或者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国家主权和劳动者利益的政治问题。

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关于国外投资的争论,反映了日本意识形态领域中内向型和外向型的冲突,内向型源于20世纪30年代与德国、意大利共同实施的管制经济的经验,外向型源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原则。这一争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后日本,许多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知识分子和评论家都相信,维持最低限度的外资是保护民族利益的正确策略。正如本书第6章中所阐述的,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被迫实施资本投资自由化时,外资又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内向型定位的长期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彰显。因为赴日本投资的大潮引发了许多经济摩擦,所以许多国家批评日本为外国企业的进入设立了太多的障碍。

发展重化工业的策略

1948年初,日本政府最终确定了由经济安定本部拟定的经济复兴计划

(*Keizai fukkō keikaku*)。在经济安定本部内部,稻叶秀三负责该项计划的制定。一个由有泽广巳领导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该项计划最终得以完成。尽管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有泽广巳的主张还是获得了胜利。该计划主张,日本应过两年再稳定通货膨胀。

这个计划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宣布日本的战后经济重建将以重化工业为基础。1931—1945年,重化工业的发展曾是准备总体战争的法西斯计划之组成部分。经济复兴计划赋予了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以新的含义。然而,尽管这一计划已将注意力从军事力量转向了国民财富,但重化工业仍然是建立国家力量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制定经济复兴计划背后的初始动机与战争赔款有关。作为一个战败国,日本面临那些曾在战争期间被其侵略和占领过的国家的巨额赔款要求。按照美国政府派出的波利(Pauley)代表团起草的建议(该建议于1945年9月22日公布),日本一半的制造业,陆海军的所有工厂、所有飞机厂、滚珠轴承厂、飞机引擎设备厂,20个造船厂的所有设备和补充设备,以及250万吨的钢铁年产量,一半的电站及日本的许多其他生产要素,都将被没收并用于战争赔偿。建议指出,“那些曾受日本压迫的人民都有优先权,而日本则是最后考虑的对象。”在波利看来,为了削弱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能力,必须限制其经济规模。例如,钢铁的年产量不应超过1.8亿吨,同时,还要禁止化学工业的发展。1945年底,波利的报告发表,日本人将这个报告看作是对日本经济的威胁(Nakamura and Ōmori, 1990:v)。日本外务省、商工省、农林省及大藏省的官员们开始了一项关于日本未来工业化水平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波利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反驳(Keizai Kigakuchō, 1964:79)。1947年,由占领军总部官员起草的关于日本经济前景的政策建议被透露给经济安定本部的日本官员。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和田博雄和本部官房次官稻叶秀三,决定为日本政府制定一个官方计划,以应对占领军总部的建议,并说服占领当局改变其想法(Inaba, 1988:58-59)。为此,经济安定本部成立了一个经济计划科,由稻叶秀三领导,主要目的是起草经济复兴计划。

这份计划确定重化工业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从战略上确定日本经济的地位。重化工业成为日本产业政策主要目标的重要原因是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对日本经济的挑战。这项计划提出,因为自然资源有限、

国内基础设施落后、人口不断膨胀、资本有限且边际生产成本递增、国际竞争压力日显,加上贸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在日本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经济应该遵循已被历史验证过的经济发展趋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Nakamura and Hara, 1990:196)。在国际分工中,亚洲其他国家将很快取代日本在轻工业领域的位置,因为他们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基于这种理解,这项计划坚决主张政府的产业政策应偏向重化工业,将出口结构由棉花、丝绸转向机械和化工产品。同时,日本也应该有效地利用其国内资源而减少进口数量(Nakamura and Hara, 1990:197)。

由于该计划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与道奇计划相矛盾,所以未获正式接受。然而,发展重化工业的观点却被延续下来,并成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政策的中心。

管制经济的结束

倾斜生产方式的实施在刺激重要产业的生产力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果我们把1934年和1936年的生产指数定为100,则该指数很快就从1947年3月的22.6上升到1949年3月的55.2。平均每个煤矿的年产量由1948年4月的5.8吨上升到1949年3月的8吨。但尽管如此,日本经济的基础仍不牢固。

1948年,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日政策。在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旨在“保证日本不再威胁美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SWNCC-150/3, [1945]1982)。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占领军总部对日本实施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当时,占领军总部并没有参与经济重建,而是把这个任务留给日本政府去操作。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不得不每年提供大约4亿美元援助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军参谋长罗亚尔(K. G. Royall)在旧金山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宣称,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永远持续不断地把不计其数的美元投入到占领地区作为救济物资”。他说,美国应该帮助日本“加快复苏,从而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财政负担的那一天早日到来”,并让日本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的强大和安定足以支持自己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成为在远东地区出现的任何其他极权主义威胁的威慑力量”(Royall, [1948]1982:185-186)。当年10月,美国政府采取的对日新政策主要是由乔治·F. 凯南和威廉·H. 德雷珀设计的。新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削

减援助,解除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控制,稳定劳资关系,控制通货膨胀以及实现预算平衡。1948年12月,美国政府派底特律银行行长、美国政府财政顾问约瑟夫·道奇出使日本。道奇认为,当时的日本经济是踩在两个“支柱”上:私营部门严重依赖政府补贴,而日本政府又严重依赖美国政府的援助。为了结束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通货膨胀。道奇为日本政府设计了一个完整的一揽子政策,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道奇计划。道奇计划的实施结束了管制经济的时代。

结论

本章主要揭示了管制经济的许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各种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不仅挺过了民主改革的政治风暴,而且影响到日本1946—1949年间的产业政策,并且在战后继续成为日本发展主义的部分基础。

管制经济的遗产规定了经济行为主体关注自身利益和设计自己策略的方式。设计和实施倾斜生产方式的一些主要人员在1931—1945年间就实践过管制经济,他们的政策倾向对1946—1949年间的日本产业政策影响极大。后来担任吉田茂首相首席顾问的有泽广巳,曾积极参与过近卫内阁经济新秩序的制定。1946—1949年间在政府机构曾担任要职的和田博雄、稻叶秀三及其他几位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也曾在内阁调查局、内阁企划院和内阁企划厅工作过。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日本政府为何严重依赖于战时发展出来的政策工具和制度。如前文所述,这些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曾作为共产主义者而被逮捕过。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人们认为他们是大众中的进步力量。这种印象淡化甚至消除了他们与战时管制经济的密切联系,也为他们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合法性。

171

战后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国际社会的孤立,也有助于发展主义思潮在政府产业政策中的盛行。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物资短缺,生产在产业政策中被赋予了优先地位。对资源配置的严格控制被认为是国家生存的必要措施。同时,人们也确信,国家干预是日本克服经济危机的唯一手段。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亲市场政策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市场被认为是破坏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尽管受到西方个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极大挑战,民族国家仍然是日本经济思想中的分析单位,也是政策讨论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盛

行的原因。日本的民族孤立感和对占领军总部制定的战后重建政策的不信任,使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得到进一步强化。

然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使日本资本主义面临一个转折点。日本资本主义受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极大挑战,并且有机会脱离其战时政策轨道。民主改革深刻改变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结构。处于这种新的环境下,在国家产业政策中强调生产、政府控制及国家利益,遭到了各种社会集团的强烈反对。尽管1931—1945年和1946—1949年这两个阶段都可归为管制经济时期,但这两个时期的政治环境却大为不同。1931—1945年间,政策讨论的分析单位从个人和社会阶级转到了民族—国家,这种转向主要是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相反,1946—1949年间,分析单位由民族—国家开始转向了个人和社会阶级,这一转向主要受到民主改革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尽管战时遗产的发展主义导向仍然存在,但它必须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

172

占领军总部的对日政策是解释1946—1949年间战时遗留政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最重要的结构因素。一方面,占领军总部是改革的主要发起者,占领军总部的民主改革大大改变了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占领军总部的政策也为许多战时体系要素的延续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它确实通过消除军国主义因素使日本经济实现了非军国主义化。但在同时,它也强化了政府官员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使政府得以打破官僚地方主义的障碍。财阀的解体确实大大促进了战后日本民主经济的发展,尽管它并没有像最初计划的那样得以贯彻实行。财阀的解体也毁坏了战前企业体系的基础,在战前的企业体系下,股东握有监督公司的大权。

无论是在1931—1945年还是在1946—1949年的管制经济中,日本的产业政策都强调国家在宏观层面上的资源配置效果,而不强调微观层面上的生产效率。由于日本孤立于国际市场,所以如何通过有效利用有限的国内资源来度过经济难关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在限制市场力量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政府不仅依赖直接的干预,而且也鼓励非市场管理结构的发展。在管制经济的意识形态中,私营企业的盈利动机被认为与国家目标相冲突。政府的重点在于如何使私营企业作为整个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在国家的引导下更好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只关注如何帮助它们盈利。

日本在管制经济时期的经历也表明了其分散的政府管理体制与日本民主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日本,分散的政府管理被看作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标志,而政府的集中领导则通常被看作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都认为经济安定本部的建立只是克服经济危机的权宜之计。双方都未能意识到,从长远看来,这种观念将会给日本政府遗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5章 促进出口

促进出口是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产业政策中的主要范式,这一政策范式对日本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影响。在 1946—1949 年间,战争遗留的政策要么被废除,要么则没做调整就简单地继承下来;与之不同的是,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发展主义在新环境下显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它发动了发展主义由战争期间的军事版向和平时期的贸易版的深刻转变。

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 1992:139-140)写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改革亚洲地区政治组织结构的过程中,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的世界霸权的建立,塑造了日本的战后格局。“日本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美国的]这种特殊关系导致的”(Pyle, 1992:141)。从 20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美国主导下的霸权就从两个关键方面确定了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首先,1949 年道奇计划的实施直接把日本经济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如我们在第 3 章中讨论过的那样,日本战时的经济体制有极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导向,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限制市场竞争及反对利润原则。1946—1949 年间,由于各种结构因素的变化,管制经济不仅得以继续存在,甚至还在加强。当日本在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孤立后被迫再次面对国际竞争时,竞争力和效率就成为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议题。其次,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的大额特别采购和重振军备的压力迫使日本进入了冷战体系。日本当时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以军事生产为基础发展经济,还是寻找一个新的发展战略。

战后民主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结构方面。相反,战时遗产在 20 世纪 50 年代遭到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两大挑战,两个大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首相为了应对冷战的挑

战提出了一项政治策略。他认为,日本在政治上应该站在美国一边,以便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日本也应该把国防开支压缩到最低水平,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于发展经济。这样做,日本不仅能从美国那里得到经济利益,同时又能避免直接卷入两大阵营的军事冲突。20世纪50年代,由于在重整军备和修订宪法两大问题上,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发生冲突,日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商界领袖和退役军官坚持认为,日本应该通过重整军备,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融入冷战体系,并以军事武器的生产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产业结构。这股政治上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日本应采用过去的方式恢复其原来的强国地位。相反,进步力量则主张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保持中立。进步力量强烈反对重整军备,他们认为,这一政策只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但却使整个国家面临被卷入到两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军事冲突中去的风险。尽管重整军备的计划由于商界领袖与政府官员间的冲突受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关于国家目标的争论却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以解决(Pyle, 1992)。

另一策略是为了促进出口,日本必须建立在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日本促进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定义。由于预见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日本经济学家把熊彼特以企业家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变化的理论,转变为国际竞争中的策略。根据日本人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理解,一国能否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性地位,将取决于生产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与属于一国自然禀赋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只有通过有目的的努力才能达到。为了获得这种优势,日本政府不仅应该为私营企业提供可以用于生产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的政府贷款,而且必须支持或发起企业层面上的制度改革,以使日本的管理环境更有利于创新的实现。这种新观点改变了经济行为主体界定自己利益的方式,也使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制定相应的战略措施。一些进步的管理人员受到德国在战后重建过程中靠民族主义稳定劳资关系经验的启发,开始承认劳资之间和谐与合作的传统价值。这种举动一方面削弱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日本工人运动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对进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影响,另一方面也削弱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合理化

运动中复苏的利润原则的影响。不过,这些努力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得到管理层和劳动者的广泛支持。

在促进出口的政策范式下,日本经济体制出现了两种冲突趋势。一方面,政府机构掌控了物价以及物资的分配,日本政府在 1931—1945 年间就实施过这种控制,1946—1949 年间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控制。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由政府控制资源的配置,转移到提高日本企业在战略性产业的竞争力上,并且把否定竞争的原则转变为限制过度竞争的原则。尽管市场已开始显现其作用,但政府仍在通过进口管制、信用证及外汇汇率管制来限制竞争,以更好地实现其政策目标。另一方面,发展主义的一些成分,如企业集团和劳资关系,在受到战后民主改革的极大冲击后,又开始在政府的支持下以新的面貌复出。日本的发展主义开始由军事版向贸易版转换,在管制经济时期盛行的内向型经济被扩张性的外向型经济所取代。正如米泽义卫(Yonezawa Yoshie, 1993:231)指出的那样,这一阶段,日本的产业政策开始变得“极端重商主义、有选择性,并且严格限制自由竞争”。这两项战略决策由于它们自身之间的冲突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然而,它们却为日本经济设计好了未来的发展蓝图。

战时遗产的复活并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其惯例,而是针对新环境做出了相当大的调整。之前的“财阀”企业被重组成“关联”企业,协调劳资关系的努力也不再是受到民族危机(如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才强调合作与团结。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生产技术上的国际竞争力,这就需要劳资之间的合作。由于将比较优势从(通常会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的)廉价劳动力向(需要管理层和劳动者之间协作的)生产技术转移,这种制度安排被视为是日本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竞争的新武器。在这一新的政策范式中,生产的取向不再用企业应该生产多少来衡量,而是用如何生产及生产什么来衡量。换句话说,日本产业政策的取向从生产的数量(这一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管制经济及战后初期倾斜生产方式的主要关注点),转移到了可以使战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增值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技术上。这一转移也意味着经济战略观有了一个新的重大发展。根据许多说法,采用促进出口这一新的政策范式,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分水岭。

经济独立的压力

道奇计划的实施是对管制经济的一个极大挑战,因为该计划强迫日本经济体

制必须适应一种新的环境。

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运行一直由道奇所谓“两根支柱”所支撑:美国对日本政府的财政援助,以及日本政府对私营企业的补贴。在这一“支柱型经济”中,70%的消费品价格靠政府补贴支撑,而日本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大约有4亿美元由美国提供。道奇计划的目的是就要在结束美国对日援助的情况下,为日本经济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1948年12月11日,美国政府陆军部给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关于稳定经济的九项临时性指令》,该指令为日本经济确立了两条主要原则。首先,日本政府应该尽快稳定经济,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消除通货膨胀,以实现财政和货币体系、物价和工资的稳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政府应该“实现统一财政预算的真正平衡”、“实现政府财政总收入最大程度的扩张”以及“严格限制信贷扩张”。其次,日本经济应该通过固定汇率与国际市场相联结,汇率则定为1美元兑360日元。从那时候起,日本就必须通过参与国际贸易来平衡其国际收支。日本的企业不应该再靠政府的补贴维持生存,而应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自己的竞争力。换句话说,日本必须通过促进出口来实现其经济独立(Masamura, 1985:359)。

177

道奇计划的实施为日本经济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它要求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彻底的改变。正如大来佐武郎(Ōkita Saburō, 1949)指出的那样,在管制经济中,产业政策的制定受到物资动员原则的驱动,这一原则视生产为重中之重,而成本是第二位的。对竞争的严格管制及对利润原则的反对,使低效率成为经济的主要问题。现在,微观层面的经济制度必须合理化。如果不提高效率,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将毫无竞争力。由于日本自然资源极为稀缺,必须依靠大量进口。如果不刺激出口,日本经济将永远无法平衡国际收支。

然而,确保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的任务,受到许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首先,与战前阶段相比,日本的海外市场已经急剧缩小,这不仅是因为日本的西方贸易伙伴在战争期间对日本进行了经济封锁,而且还因为日本的战败使日本失去了在亚洲的殖民地和占领地。从出口方面看,日本的世界排名已从1934年的第5位下降到1947年的第33位。如果把1930—1934年间日本出口的平均水平定为100,那么1946年仅为8.8,1947年为11.7,1948年为16.2(Tsusanshō, 1954:93)。此外,国际市场的结构也限制了日本的出口。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在战后

178

重建过程中,都遭遇到美元的短缺。为克服美元短缺,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在鼓励出口的同时,都尽量限制进口。此外,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美元短缺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国家都严格控制消费品的进口。

其次,日本的出口结构过于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为平衡国际收支创造足够的硬通货。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重化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出口仍以纺织品为主。纺织品出口比重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占到全部出口量的75.5%和61.1%。当时,使用廉价劳动力是日本企业增加出口的主要措施。根据一项调查,1949年5月,日本工业的平均小时工资为62.74日元,而这一指标在当时的英美两国分别是221.2日元和494.28日元。也就是说,英美两国的工人工资分别比日本高出3.5倍和7.9倍。这一廉价劳动力政策在纺织业中尤为明显,当时,日本纺织业工人的小时工资仅为21.55日元,而英国为156.24日元,美国则为428.15日元。在精纺业,日本的小时工资仅为13.5日元,而英国为156.24日元,美国则为387.36日元。日本的廉价劳动力政策在国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不仅英美抵制日本的倾销行为,日本的工会也经常发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Ekonomisuto*, 1950b)。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不可能通过出口为日本创造足够的硬通货。因此,日本经济总是受到外汇储备瓶颈的制约。

再次,尽管日本通过鼓励出口来促进经济,但因为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极弱,日本的出口状况并不乐观。妨碍日本企业与国外竞争对手展开竞争的最大障碍,是日本产品的低质量。20世纪50年代早期,日本产品始终以其低廉的价格和极差的品质在国际市场上闻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0年4月,通产省收到634次国外消费者的投诉,其中有327次是投诉日本产品的劣质,有366次投诉来自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政府或某权威机构有权检验所有的出口产品,但这一制度在战后的民主改革中被取消。在新的体制中,政府为出口产品规定等级、标准及条件,私营企业则根据这些标准自行检测产品。20世纪50年代早期,当日本顶着巨大的压力推动出口的时候,由于缺乏竞争而产生的充斥市场的劣质产品成为日本的致命问题(*Ekonomisuto*, 1950a:23)。

促进出口的计划

道奇计划立即得到了执行。1948年末,复兴金融公库停止发放贷款。与此同时,1946年923亿日元、1947年1039亿日元、1948年1419亿日元的财政赤字也戏剧性地消失了。政府预算在1949财政年度实现了“超级平衡”,并实现了1569亿日元的盈余(Masamura, 1985:359)。然而由于通货紧缩政策的影响,产业界普遍资本短缺。为了缓和稳定性恐慌对经济的影响,日本政府决定采用反通货膨胀政策(disinflation),向私营部门提供921亿日元的贷款。

道奇计划和促进出口计划的实施是如何影响日本经济的治理结构的呢?

日本对这一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是:用应对国际竞争的外向型经济取代替管制经济时期采用的内向型经济。促进出口被视为政府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在政府机构中,商工省和贸易局合并,组成了通产省。通产省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产业政策迅速告别了管制经济。为体现其鼓励出口的目的,通产省进行了重组,并在其每一个局的名称前加了“国际贸易”的前缀。正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1982:191—192)指出的那样,政府政策导向的转变,“可能与道奇计划一样,对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80

经济战略观继续对国家的产业政策施加影响。20世纪50年代,战争时期注重发展重化工业的模式仍在继续,但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一政策不再只注重生产武器,而且还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目的是达到国际贸易的收益最大化。这项政策创造性地修正了比较优势的传统定义。它认为,在国际贸易中,一国的比较优势未必一定建立在资源禀赋(如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比较优势可以通过战略建立起来。在民族国家对财富的全球范围的竞争中,日本当时基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未必能在未来获得多少收益。其原因是这一优势将很快被发展中国家所取代。为了建立起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日本政府必须从战略角度分配资源。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日本决定通过建立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这一政策使日本的发展主义明显区别于那些要么专注于自然资源的出口,要么专注于替代进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

为了建立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日本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建立了一个产业扶植体制。该体制主要包括日本银行的低利率政策,政府投融资,以及

减免税收计划等。

181 政府仍然实施控制利率的政策。日本银行不仅支持私人银行为厂商提供贷款,而且还直接给商业银行提供贷款。甚至在政府不得不紧缩货币供给以平衡国际收支的时候,日本银行也不肯提高利率,而只是通过所谓的窗口指导(*Madoguchi kisei*),改变对私人银行某些项目的贷款配额。为了鼓励出口并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受邮政储蓄系统支持的日本政府,在1950年建立了出口银行(1952年,该银行改名为进出口银行),目的是为企业提供长期出口贷款。1951年,政府又建立了发展银行,为电力、造船业等一些重要行业提供资本。减免税收计划和政府补贴也被广泛使用,目的是鼓励重化工业的技术更新和投资(Masamura, 1985: 366-372)。

在钢铁行业,私营部门和通产省一道发起了一项合理化计划,这一计划把钢铁行业的每年资本投资增长率定为10%。由于这一水平远远超过单个企业的融资能力,在企业自有资本不到投资总额的25%的情况下,政府为企业提供了总资本的15%(Arisawa, 1976: 345)。根据通产省1957年的一份报告,20世纪50年代,工业投资“呈现出一种趋势,即强调基础行业的发展,并且通过对新工业领域和新技术的投资紧跟世界技术创新的潮流”(Tsūsanshō, 1957)。对生产设备和技术更新投资的不断增加,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日本和西方国家间的差距,而且是为了占领未来的战略高地。从1950—1966年,日本进口了4 135项专利技术,其中77%是机械和化工技术。在日本企业进口的所有专利中,仅美国——日本最大的技术进口国——卖给日本的就占了2 471项(Arisawa, 1969: 30-33)。

182 在促进出口的政策范式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管制经济中反对竞争的原则被转变为反对过度竞争原则。政府不再取代市场而是起补充完善市场的作用。政府废除了对物资分配及价格的控制,但继续对政府信贷和外汇汇率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由于这种转变,国家开始通过如下两条途径发展日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一,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为一些企业提供市场竞争的优惠条件,而不是用行政手段禁止竞争;第二,通过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阻止其他企业参与竞争。在管制经济条件下,市场功能基本上受到禁止。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政府不仅打算利用市场来激发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还尽量利用市场竞争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换句话说,尽管市场的作用被重新引入,但并非任其发挥。尽管

政府改变了干预的方法,但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质却持续不变。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再相互排斥,而是基本上相互补充。20世纪50年代,在管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一特征使日本的发展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所不同。正如第3章中提到的那样,日本发展主义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阶段,也受到反资本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的双重影响。战后日本所谓的自由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自由放任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

尽管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但在严格控制下的竞争仍然存在。通产省在1957年关于工业合理化的白皮书中指出:

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和市场结构的几种情况可能会限制竞争的作用。在一个资源稀缺而人口众多的国家中,自由经济活动本身就会受到限制,竞争通常会过度。人们有时候并不根据经济理性行事。如果一国经济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受到给经济稳定带来不必要扰乱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强烈影响。此外,一个发展起步相对较晚的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合理化,就需要政府的积极援助。竞争从来就不是最好的办法(Tsūsanshō, 1957:287)。

根据白皮书的观点,放任的竞争确实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然而,当各个企业为投资生产设备争夺资本的时候,日本的国际收支经常会出现危机,并阻碍经济增长。为保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日本经济必须将产业和商业团体组织起来。

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政府开始实施《外汇和外贸法》以加紧对外汇的管制。该法律规定,私营企业出口所赚得的所有外汇都必须上缴给政府,进口或其他用途所需的外币,受到政府设定的配额的限制。政府会根据其政策目标决定外币的配额数量。这一体系一直存续到1964年,日本在这一年最终开放了贸易。这项政策有两个效果:第一,使有限的外汇得到了有效的利用;第二,通过限制进口,保护了国内相关行业,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强化自己的国际竞争力。1951年,日本开始实施有自己特点的关税体系,即对原材料和重要的生产设备实行低关税,对那些与本国同行业竞争的外国产品实行高关税。

1949年和1953年,日本政府先后两次修订了反垄断法,并在1951年7月解

散了持股公司改组委员会。日本的反垄断法是1947年在占领当局的压力下开始实施的,对该法的重新修订意在鼓励先前的财阀集团的重组。通过对反垄断法的几次修订,日本政府不再限制关联公司的合作行为。为了减缓经济萧条的负面影响并使生产过程合理化,卡特尔也得到了首肯。同时,政府还放松了对企业相互控股及相互任命管理人员等先前被认为是垄断行为的管制。与美国的反托拉斯法不同的是,美国反托拉斯的主要目的是为单个企业提供平等的商业机会和保护每个消费者的权益。由于日本认为过度竞争(*kado kyōsō*)只能分散有限的资本和物资,日本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消除过度竞争把物资集中到大企业,培养战略行业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Arisawa, 1976: 351-352; Tsūsanshō, 1989; Yamamura, 1967)。有泽广巳指出(Koizumi and Miyazaki, 1967b: 176-277),大企业在研发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还说,自日本产业化之初,大企业就一直使基础研究的各项成果商业化。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研发一直受到公司规模和财力的严格制约,有泽广巳认为,日本必须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那些大公司以促进技术创新。

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先前的财阀集团也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重组成关联公司集团,大的商业银行成为企业集团的中心。由于日本企业发展他们的重化工业时普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银行就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提供者。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也成了企业的股东。例如,银行在隶属于三井、三菱及住友的公司内持有股份的平均比重,由1952年的7.1%增加到1955年的11.5%。同时,公司间交叉持股现象也迅速发展起来。例如,1954年重组后,三菱集团的持股比重从11.7%增加到33.5%。这些关联公司集团,尤其是三菱和三井,都重组了他们在占领时期被解散的商社。然而,战前的财阀集团和战后的关联公司集团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财阀集团是围绕核心控股公司组织起来的,这些核心控股公司受制于财阀家族。与此相对,关联公司集团是围绕银行组建的,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权威。作为商业整合的主要形式,组织内部著名的总裁会议就成为定期的活动。召开这些会议的银行,就像是每个关联公司的司令部(Arisawa, 1976: 341)一样。

20世纪50年代,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法:1955年的《煤炭产业合理化临时法》,1956年的《促进机械工具业发展临时法》及《纤维行业设备临时法》,1957年的《促进电子业发展临时法》及《生丝生产设备临时法》。所有这些法规都允许私营

企业通过卡特尔的形式组织市场。他们的目标要么是促进有高度发展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么是解散存在结构性问题的夕阳产业,并帮助他们度过难关(Masamura, 1985:375-376)。

关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性质的分析中,存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一致现象。在英文文献中,尽管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典型的扩张期,但是日本经济仍然被认为是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然而,在日文文献中,一直持续到1949年的道奇计划实施时的管制经济,和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自由经济(*jiyū keizai*)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这种不一致来源于概念上的区别。西方学者的概念以政府为中心。尽管政府干预的具体形式发生了变化,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的本质却始终未变。相反的是,许多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在他们看来,两种不同的政府干预形式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政府机构控制物资的分配并管制价格的经济体制叫管制经济;一旦这种管制被废除,经济就成为自由经济。两种观点的精华,为我们分析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经济提供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因为这意味着,尽管政府仍在干预,但这种干预却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或者尽管政府干预的形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政府产业政策的本质却没有改变。

185

反对利润原则也得到了继承并被赋予新的含义。在战争期间,股东追求利润被认为与国家在危难时期的利益相冲突。20世纪50年代,人们仍然认为利润原则与国家增强战略产业的竞争力之目标相冲突。因为要增强战略产业的竞争力,就需要企业在增大投资的同时减少股息支出。按照正村公弘(Masamura Kimihiro, 1985, vol. 1:368)的说法,国家采用的税收政策也因为打击了股票市场的发展而限制了利润原则。当时,股东的股息被认为是企业的利润,利息是要征税的,而付给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被认为是借款成本,是不计税的。因此,对于公司来说,向银行借款比发行股票要便宜得多。这一点以及其他因素进一步削弱了股东掌管公司的能力,但同时也强化了经理人的自主权。结果,利润原则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弱。

由利润原则引发的是效率问题以及效率对于劳资关系的影响。尽管利润原则从来没有使日本企业在战后初期遇到麻烦,但是效率问题在道奇计划实施后就成了企业关注的头等大事。商界领袖们认为:

186

日本经济的重建和独立依赖于促进出口。如果不使公司合理化,要

刺激出口是不可能的……使公司合理化的目标是生产尽可能多的物美价廉的产品……管制经济下的公司合理化被政府的政策和行政管理所控制。结果,不合理和低效率成为公司合理化的最大障碍。为了使日本企业在国际上有更强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削减政府机构的控制并解决其主要问题,比如不现实的平等,并引入自由竞争原则和效率原则(Nikeiren, [1948]1966:183)。

为了解决效率问题,日本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引进美国的管理技术,包括产业工程、质量管理及顶级管理(top management)。产业工程学是由1955年派往美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引进的,为的是提高钢铁行业的生产率。自那以后,产业工程学迅速发展起来。许多美国的产业工程专家被邀请到日本参加研讨会,进行专业指导。1959年,日本产业工程委员会成立,并出版了第一份专刊——《产业工程学》。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质量管理法被引入日本。在其初始阶段,质量管理主要是企业工程师们的一个管理工具。一段时间以后,它就被拓展成一种将所有雇员囊括在内的全面质量管理理念。日本的科技协会在1955年和1957年开始分别为部门经理和总经理组织研讨会。20世纪50年代末期,短频广播和电视也被用来向全国发布关于质量管理的消息。新方法将高层管理权力集中于制定决策,仿照美国模式,公司CEO的权力得到强化。从那时起,企业通常都是由CEO们制定决策,这种决策方式也得到董事会的支持。与此同时,企业还建立了主管管理体系进行内部监督(Tsūsanshō, 1990a, vol. 6:389-391)。

187

在劳资关系方面,日本对低效率问题的应付并不是线形的。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合理化方案最初受到自由资本主义的传统方法——通过裁员来降低生产成本——的影响。从1949年2月到1950年5月,10 375家私营企业共解聘了400 000名雇员,而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则解聘了419 000名工作人员(Rekishigaku Kenkyūkai, 1990:137)。同时,多数企业都停止招聘正式员工,开始使用临时工或非熟练工人,因为支付给这些工人的工资远比正式工的低(Takajima, 1953)。迟至1954年,日本的钢铁、煤炭及化工行业仍然把采用减少雇员人数和延长劳动时间作为合理化生产的主要途径,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当年3月份的失业人数达840 000人,创历史新高(*Ekonomisuto*, 1955年7月9日)。在1947—1956年间,制造业的生产增长了650%,但是雇员人数仅增加了12%。在采矿业,产量增加了

近200%，而雇员人数却减少了30%（Satō, 1958）。在战后初期，由于受到占领当局保护劳工政策的支持，工会在同管理层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工人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由战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维持的相对稳定的劳资关系的结束。然而在道奇计划实施完毕的新形势下，企业又重新获得了管理权，并在合理化过程中采取了十分严厉的劳工政策。

但是，上述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步入困境。日本政府官员和公司管理层开始意识到，他们已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改变目前的经营状态，很难同时做到既调动工人极大的劳动热情，同时又使劳动成本降到最低……一般情况下，一方的最大化必然导致另一方的最小化”（Cole, 1972: 629）。因此，在政府的支持下，管理层改变了对待工人的策略，开始通过开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活动来稳定劳资关系，使双方由对抗转向合作。在美国的援助下，日本政府帮助一些进步的商界领袖创建了日本生产率本部（*Nihon Seisansei Hombu*）。在这一机构里，有来自企业管理层、工会、政府部门、大众媒体以及学术界的一些代表。这一机构的目的是在劳资间建立更加和谐的雇佣关系，它成了生产率运动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该机构派代表团去海外学习，并邀请了许多专家来日本发表演讲，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调查，并通过培训和咨询普及了大量关于生产、营销及人力资源的管理技术。生产率本部还从西方（特别是美国）系统引进了管理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Nihon Seisansei Honbu*, 1985）。为了实现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企业与工会之间还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交易。从短期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他们放弃了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目标（这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最为关注的对象，但是它曾导致了企业大量解雇工人），转而追求在技术创新和质量控制过程中的劳资合作（为了做到这一点，工人们要求公司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安全保证，还要给他们涨工资）。这正是日本企业管理制度化的开端。它是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为特征。最初，这一系列努力并未奏效，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了管理层和劳动层的广泛支持。但是，这种制度的出现显然标志着一种新的趋势，这种趋势扭转了劳资之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对峙局面。

日本产业政策中促进出口的范式在日本发展主义的制度化过程中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它有效地适应了新的环境，并通过多种重要方式增强了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在1931—1949年间的管制经济中，政府增强了在控制资源分配上的权

力。但战时体制更多地体现了政府官员而不是私营企业的自主性。尽管在日本面临着从战争中存活下来的艰巨任务时,这种体制似乎很合理,但它的致命问题却是效率低下;战时体制运作的基础是政府的强制性计划,而不是私营部门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出口的范式着重于微观制度:它强调如何调动私营部门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政府的贸易计划。通过市场的组织来实施计划,使日本政府在一个民主政治的氛围内获得了可实现自己目标的新能力。在管制经济下,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方法是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在这种新的体系下,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被同时调动起来,政府主要侧重推动微观层面上的制度改革并开始利用市场力量。这更适合开展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189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大力实施促进出口的策略,使日本的发展过程与拉丁美洲的经历大不相同。尽管两者经济发展的过程都受到世界经济结构的制约,但日本更着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拉美国家则关注外部条件对自身的限制。正如依附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当一个起步较晚的国家开始融入世界体系之时,它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会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即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程度会加深(Cardoso and Faletto, 1979)。依附理论并不认为核心国与周边国的关系越深,发展就越快,而是认为,依附发达国家只能引发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由于受到这些关于国际秩序的消极观念的影响以及对自己的国家缺乏信心,拉美国家选择的是进口替代战略。

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一直孤立于国际市场。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内向型导向为主,强调的是如何通过政府控制,有效地调动国内资源。日本政府被迫采用的促进出口策略,不可避免地卷入与战时遗留的狭隘心态的冲突。这样,在实施道奇计划后的1949—1950年间,两派不同观点就日本产业政策的总体方向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一派是以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在一个充满威胁的国际环境中,一定要发展国内市场;另一派是以中山伊知郎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他们强调国际贸易在一国发展中的作用。就像在第4章中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三个人,尤其是后来被任命为新建立的通产省顾问的有泽广巳,在当时政府政策的制定中都具有极大的

影响力。

这场辩论于1949年以内部讨论的形式展开。当时,中山伊知郎、有泽广巳、都留重人、大内兵卫和东畑精一都是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Ichimada Naoto)的智囊团成员。他们每月与一万田尚登碰一次面,讨论各种政策问题。日本天皇也对经济问题极感兴趣,并要求一万田尚登为他找一位私人教师讲解相关知识。于是,一万田尚登就推荐了他的这五位顾问。在每次授课时,先有一名经济学家给天皇讲课,接下来便是一场包括所有5位顾问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这些经济学家们在日本经济的未来基础这一议题上发生了分歧,很快,这场辩论就扩展到大众媒体。

190

中山伊知郎指出,日本经济应该向世界经济开放,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家繁荣,因为世界市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援引英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中山伊知郎(Nakayama, 1949)指出,对于像日本这样自然资源稀缺但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鼓励贸易并参与国际分工是积累资本、获得新技术和市场以及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途径。由于日本产业化极度依赖进口,而进口成本又必须由出口所得来支付,中山伊知郎(Nakayama, 1949:3-6)坚持认为,“战后重建的重点必须集中于促进贸易”,“进出口是支撑日本产业化的两个支柱”。他相信,“如果不采用这一措施,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自身问题。只要资本主义还在,这个原则就会一直有效”(Nakayama, [1950]1970:11)。作为一个受古典经济学传统熏陶的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关于世界体系的理解显然单纯强调经济规律的作用而低估了当时许多日本人担心的政治因素的作用。他相信,“有关经济的问题必须用经济逻辑来解释”。根据马歇尔的观点,经济学家必须有“一颗炽热的心和一个冷静的头脑”。中山伊知郎则指出,经济学家面对经济问题时不应该用个人的感情去代替理性的态度,或者对经济形势用一厢情愿的想法去代替客观预测。对中山伊知郎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且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尽管他承认当前国际市场上的形势并不稳定,一些国家也在实施管制贸易,但他仍然相信,这些仅是暂时现象而非长期趋势,国际经济新秩序迟早会因为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条约的签订而确立(Nakayama, 1949:12)。

191

尽管中山伊知郎很重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相信自由放任学说。那时候,关于国内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政策讨论,被一些人理解为是选

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资本主义。因为前者强调的是政府计划的重要性,而后者强调的是国际市场的作用。然而中山伊知郎指出,国际贸易和国内发展并非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格对应。他把二者当作两个分支。中山伊知郎说,“倡导把日本经济的未来建立在与多国贸易的基础上,绝不意味着日本必须固守资本主义体系的老模式……事实上,把新要素融入到受贸易原则引导的全球市场结构和国内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50]1970:13)。根据他的逻辑,把日本经济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并不意味着政府作用将被市场所取代。相反,在管制经济时期所发展起来的政府权力,可以以另外的形式发挥作用,刺激贸易的发展,并强化日本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与之相反,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对国内市场发展的支持建立在如下观点上: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会对日本经济产生消极的影响,并且会损害工人阶层的利益。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在政治经济的框架下看待世界体系。他们之所以对国际贸易的前景持极度怀疑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尽管各国有许多美好的愿望并积极努力重建世界体系的新秩序,但他们预期管制型贸易仍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非是一种应急措施,而是一种“经济动脉硬化”(economic arteriosclerosis),这种状况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发展。尽管一些人梦想回到自由国际市场阶段,但这种梦想仅仅是一种“怀旧之情”(Tsuru, [1950]1970:33-34)。其次,由于冷战将世界分成两大阵营,国际市场的范围和全球贸易量都受到重大限制。因为制造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对东亚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将会减少。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会减少其初级产品的出口,因为他们自身的工业化会使国内更加需要这些产品。最后,因为世界上大部分财富、产品及金钱都集中在美国,美元的短缺将会限制国际贸易量。

受20世纪30年代将国内经济从国际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影响,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声称,如果与国际市场接轨,日本经济可能对来自经济外部的困扰会更加敏感。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严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一旦发生经济萧条,这种经济萧条将会波及与美国经济相关的所有国家。通过与美国结盟而参与国际经济,日本不仅将面临卷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中的危险,而且还要介入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冲突中去(Tsuru, [1950]

1970)。此外,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相信,把日本经济与世界体系相连接,将会降低日本国内的生活水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在,如果日本将自己的经济建立在出口的基础上,国家必须继续实施廉价劳动力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会瓦解战后民主改革的成就,而且还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如果日本被迫采用廉价劳动力政策,政治民主的基础就可能会遇到危险(Tsuru, [1950]1975:100)。基于这些原因,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相信,日本在远离世界体系的条件下情况会更好。

在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中,中山伊知郎的观点获得了胜利。由内向型战略导向转向外向型战略导向,标志着日本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由管制经济转向贸易型经济的开端。

朝鲜战争:机遇和挑战

193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极大地冲击了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个突发事件给日本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

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向日本发出了巨额的军需品与服务的订单。对于正在遭受因实施道奇计划导致的稳定性恐慌的日本经济而言,这笔巨额的硬通货成了一笔额外的横财,为日本经济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它不仅促进了日本用于战后重建所急需的资本积累,而且为日本经济提供了大量的美元来平衡其国际收支。这份特殊订单的数额,若用美元来估算,1950年为1.49亿美元,1951年为5.92亿美元,1952年为8.24亿美元,1953年为8.09亿美元,1954年为5.96亿美元,1955年为5.57亿美元(经济企划厅,1990b:134)。由于这笔特殊订单的帮助,日本的出口猛增,从1949年的5.10亿美元猛增到1950年的8.20亿美元和1951年的13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了60%(Masamura, 1985:359)。经济的繁荣也改善了制造业的资本回报,其增长率由1950年上半年的2.75%跳升到下半年的5.07%,以及1951年上半年的10.56%。就业率也迅速增长(Rekishigaku Kenkyūkai, 1990; vol. 2:140-141)。日本的商界领袖承认,“美国的军事订单不仅使国防工业得以复兴,而且为相关机械行业的复兴提供了立足点”(引自Samuels, 1994:141)。具体而言,这份特殊订单从两条途径为鼓励出口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一,如前所述,它为日本企业提供了大量资本。第二,就像理查德·塞缪尔斯说

的那样(Richard Samuels, 1994:141, 150),“通过生产许可证制度和美国对军用物品的严格生产要求,日本制造者学会了零部件标准化、测试标准和质量管理的的基本原则……日本人充分发挥了其谈判技巧,不仅实现了技术转移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将这些转化为民用的自由。”从这一意义上说,朝鲜战争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许多前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人都来日本参观,学习日本如何成功地实现了从管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经验。显然,这个由朝鲜战争创造的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金森久雄(Kanamori Hisao, 1985)指出,朝鲜战争和道奇计划的实施构成了“一个绝妙的组合”,帮助日本经济从战时的管制经济过渡到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在长期的管制经济之后,道奇计划是微观经济制度合理化的驱动力;而朝鲜战争则为日本度过道奇计划实施后发生的稳定性恐慌输入了血液。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经济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另一方面,因为重整军备成了重大问题,朝鲜战争也为日本发展主义由军事型过渡到贸易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重整军备的压力来自美国。1950年6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访问日本,他与吉田茂会晤,商议旧金山和平条约的最终结果,并强烈敦促日本政府重整军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加急于催促日本重整军备,并要求日本建立一个国民警察预备队。麦克阿瑟将军认为;由于驻扎在日本的4个师已经派往朝鲜半岛,留在日本的25万美军家属需要得到保护。这样,许多在1951年8月6日清洗之后遭到解聘的前军队官员,又加入了国民警察预备队(Rekishigaku Kenkyūkai, 1990, Vol. 2:93)。1952年1月,占领军总部与日本政府官员们举行了几次会议,在会议中进一步要求日本建立一支有325 000名兵员的军队。因为日本的近邻韩国已经陷入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中,出于对日本安全的考虑,日本公众对这一倡议反应热烈。根据1950年9月《朝日新闻》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53.8%的被调查者支持重整军备,27.6%的被调查者反对重整军备,18.6%的被调查者态度不明。1950年12月,由《每日新闻》所做的另一项调查再次肯定了上述意见。这一次,有23.1%的被调查者支持全面重整军备,42.6%的被调查者则支持有条件重整军备。只有16.5%的被调查者希望日本保持现状,15%的被调查者则态度不明朗(Rekish-

gaku Kenkyūkai, 1990, Vol. 2:100)。

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主义

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情势下,日本如何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呢?尤其是,日本应该以重整军备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吗?这些都是关于重整军备讨论中的关键问题。

当时,关于国际贸易和国内发展的讨论仍然较为抽象,涉及的只是经济重建中日本宏大战略的一般性原则。关于重整军备的讨论则有着直接的政策含义。在当时以及整个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一直因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竞争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大伤脑筋。日本全国分为两派,一派考虑如何在世界体系内找到日本的位置,一派考虑如何对待两大集团在东亚的对峙。在政策讨论中,国人不仅分成了保守和进步两派,甚至在保守派阵营中,政治首脑们在国家利益和政治问题上也持不同的观点。虽然当时吉田茂首相已经为日本确立了正统的经济民族主义,但它仍然受到两种不同的政治民族主义(即进步派政治民族主义和保守派政治民族主义)的强烈挑战。进步派政治民族主义主张日本在冷战中完全中立;保守派政治民族主义则支持重修宪法,全面重整军备,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更大的政治独立性(Pyle, 1992)。这一讨论大大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一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发展主义做出了从军事型向贸易型的重大转变。

倾向于重整军备的观点,典型地反映出继续军事型发展主义含义的保守派政治民族主义。按照这一观点,武器和军用品的生产仍然是经济的基础。朝鲜战争带来的经济财富孕育了将日本经济基于国防产业的观点,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某些商界领袖、政府官员和前军官,对日本经济获得的特别效果印象深刻。“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繁荣似乎永远都不会衰退,许多人都相信,军用品的生产将是日本工业发展的核心”(Samuels, 1994:142)。但是,随着美国、中国与朝鲜就缓和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展开谈判,美国政府对日本的特别军购开始逐渐减少。1954年,外汇储备的短缺再次成为日本的主要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经济衰退。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日本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想出了这样一个重建日本经济的主意,即从美国政府转包武器和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然后再将这些武器和产

品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当时,美国正向其亚洲盟国提供建立安全保障体系的大批援助,以制衡这一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这批财政援助采取两种形式:军事援助用于增强这些国家的防卫能力,发展援助则用来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所以,这些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认为,这一冷战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如果从美国转包这批武器和工业品的生产,然后再卖给这些亚洲国家,日本就能获益。人们相信,作为美国与这些亚洲国家的中间人,日本既能获得跟随美国合同而来的硬通货,又能为日本产品开辟市场,因为这些产品就是美国为亚洲国家提供援助的物质形式。与朝鲜战争的特殊订单不同,人们将这种订单称为新特殊订单。1952年8月,由经团联事务局(Keidanren)准备的一份重要提案中说:

197 由于朝鲜战争中的特殊订单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这笔订单是临时的、不固定的,而且具有应急性质。相反,[由于]新的特殊订单主要是与美国领导的东亚自由国家的安全保障计划相关联,所以更为稳定,也不具有应急性质。因此这更便于日本制定计划……并有可能签订长期合同……在日本产业结构中建立一个新的武器装备行业是可能的……这种武器装备行业反映的是每一时代的最高技术水平。通过美国转让的武器生产的设计和标准而获取技术,就可能为日本产业化和合理化扫清道路……另外,武器也可用做新的贸易商品……可以用来帮助改善国际收支,尤其是可以获得美元(Keidanren, 1952)。

1951年11月,日本政府就如何说服占领军当局采用新的计划开始进行内部讨论。1952年2月12日,经济安定本部长官周东英雄(Shūtō Eiyū)致信占领军当局的经济与科学局,正式提交了这一提案。信中特别提到,日本希望在重建国防产业时,得到美国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并希望美国为重整日本军备的计划做出贡献。日本按照这一方式可以保证获得稳定的美元来源。日本希望与美国签订长期合约的最重要领域就是汽车产业,飞机的装配、维修和零部件生产,以及船舶维修等等(Nakamura, 1992:298-299)。

重整军备的提案遭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自由派的强烈批评。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山伊知郎退出了有关国际贸易的争论,而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与其他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则参与了反对重整军备的和平运动。和平运动受到几种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中就有理想反战主义(idealistic pacifism)、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

主义。

理想反战主义主张“绝对和平”。正如安倍能成(Abe Yoshishige, 1950:4)所说,“人类和国家生产出武器来避免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因为他们有了武器,他们就可以向别国开战。对于那些拥有武器的国家,尤其那些拥有大量武器的国家来说,避免战争非常困难。这一点在今天很容易证明,因为当今世界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就是由两个拥有武器最多的国家决定的。”宇佐美诚次郎(Uzami Seijirō, 1952:20)则对重整军备的趋势警告说:“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将会复活。”肯尼思·派尔(Pyle, 1992:44)则指出,日本的国家目标是试图宣布,“日本通过自己的战争经历、原子弹经历和战败经验,已经开始发生转变,正一心一意地找出一条通往新世界的道路。在这一新世界中,国家可以不再拥有武器,不再诉诸战争”。

与此相反,其他人持反对态度是因为重整军备会伤害民族利益,比如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经济学观点认为,重整军备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延迟经济重建。正如有泽广巳(Arisawa, 1953d:3)所指出的,朝鲜战争中通过特殊订单造成的日本繁荣没有内在动力,而是从外部作用于日本经济的。他进而指出,重整军备需要大量的新投资,这些新的投资不可避免地会限制资本的积累。由于日本人口众多且竞争力较弱,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仍然是经济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日本不应为重整军备而牺牲资本积累(Arisawa, 1952a)。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生活水平只有战前水平的70%,重整军备还会进一步降低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按照有泽广巳的计算(Arisawa, 1952a),如果日本将自己国民收入的6%耗费在重整军备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10%;如果日本将国民收入的10%花在重整军备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下降15%。此外,正如都留重人(Tsuru, [1950]1970)所指出的,重整军备还会改变财富在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状况,因为政府会借助重整军备计划,通过税收或通货膨胀政策,进一步降低工人阶级的购买力。由于生产黄油的资源会用来生产大炮,普通老百姓将遭受黄油短缺之苦。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整军备除了对资产阶级有利以外,对工人阶级或国家来说一无是处。有泽广巳声称(Arisawa, 1952a),重整军备计划中内含的对日本经济的威胁,在一开始是难以察觉的,但一旦变成可以察觉,就将是无法掌控了。从经济立场反对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有参与和平运动的经济学家,也有

稍后将讨论的吉田茂的战略。

199 日本的政治独立是进步力量反对重整军备的另一主要原因。有人认为,通过重整军备发展经济会使日本增加对美国的依赖。重整军备会“强化美国的控制和领导”,并“增加日本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困境”,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弱。重整军备是“美国的一个工具,借助这个工具,美国可以在把这些国家更有效地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和战争经济的同时,进一步抑制自己的财政负担”(Ikumi, 1953:4-5; Tsuru, [1953]1976:111-112)。如果日本经济继续依赖军品生产,日本就会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即使在占领结束后,日本也会处于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剥削之下”(Usami, 1952:18)。如果这种局面成为现实,独立就成为幻想。因此,重整军备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正如20世纪30年代,当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被应用于分析国内问题时,人们经常用它来描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被用来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的时候,阶级的概念常常被民族—国家的概念所取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二分法,也常常被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二分法所取代。

吉田原则

支持和反对重整军备的对立观点表明,20世纪50年代日本发展主义面对着痛苦的两难选择。以重整军备和武器生产来建立日本的经济基础,使人联想到1931—1945年间发展起来的军事型经济复活的危险。相反,如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在早些时候就国内发展的主张所显示的那样,和平运动的政策含义是日本可能继续与国际市场脱离。20世纪50年代初期,走向国际市场和参与冷战,对于日本来说似乎是捆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保守派和进步派都只强调了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吉田茂首相提出一个全面解决这一困境的大战略。这一战略就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站在美国一边以换取经济方面的好处;同时,为把所有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国防开支要保持在最低限额。吉田茂(Yoshida, 1951, Vol. 2:160-164)审视了国际环境中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他相信,日本能够在避开不利条件的同时,抓住有利机会。

20世纪50年代;日本人对世界的看法有两个迥异的尺度:世界体系的结构以及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吉田茂对世界的看法是等级的,而且是一元的

(hierarchical yet monistic):他将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描述成是由美国主导的等级结构。同时,他也相信,世界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是统一的,因此,日本必须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选择,不能两者兼顾。吉田茂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半边缘化国家,只能在政治上尽可能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同时,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Pyle, 1992; Yoshida, 1957, Vol. 3)。

200

吉田茂是著名的保守派。他坚信,如果不加入世界体系,日本就不可能繁荣昌盛,因此他主张:“治疗日本经济的最好药方就是向世界经济和国际竞争规则开启大门”(Johnson, 1982:189)。吉田茂按照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认识到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增长的紧密关系。从19世纪末期开始,吉田茂就服务于外交界。根据自己半辈子从事外交的经验,他相信,日本经济的未来将取决于日本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吉田茂认为,从明治维新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由于与美国和英国在政治上的紧密合作,所以注定走向繁荣。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放弃了这一策略,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轻率地向美国开战,日本因之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极大痛苦。按照吉田茂的逻辑:

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仅应该从历史必然性上进行理解,而且应该从日本经济的基本性质上进行理解。日本是一个岛国,一个海洋国家。用世界的标准衡量,日本领土范围较小,人口密度却很大。为了养活这些人口,绝对需要促进国际贸易。为了实施持续的经济增长,必然要从先进国家引入资本和技术。无论从国际贸易还是引入资本上看,日本都应该与世界上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结合在一起。主义和意识形态都不是问题,用最省力的方式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才是问题之所在。从这一方面看,世界上最值得日本尊敬的国家就是美国和英国(Yoshida, 1957, Vol. 4:23-25)。

1930—1934年间,日本进口总额的24%来自于美国,出口总额的23%也销往美国;日本从亚洲的进口占到进口总额的53%,而60%的出口也销往亚洲。战后,这种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47年,日本92%的进口来自于美国,只有6%来自于亚洲;与此同时,销往美国的出口只有12%,销往亚洲的出口达66%(Cohen, 1949:494)。按照这些数据,日本要保证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只有成为美国的盟国。

201

但与此同时,吉田茂坚决反对重整军备的提案。吉田茂说,“考虑重整军备本身是愚蠢的……只是那些不了解国际形势的蠢人的幻想”(Yoshida, 1957, Vol. 2: 160)。吉田茂给出了不支持重整军备的三条理由(Yoshida, 1957, Vol. 2: 160-161)。第一,美国的军事力量得到美国无可比拟的财富的支持,其他国家都无法承受这一财政负担。第二,不存在让日本人民在心理上支持重整军备的理由。第三,战败之后,日本有其他许多需要完成的任务。吉田茂相信(Yoshida, 1957, Vol. 2: 181),“现在当务之急是建立国家的经济力量,安定大众的生活。由于战败,日本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力量,成了一匹瘦马。如果我们让这匹瘦马背负过重的担子,它会被压垮。”

吉田茂敏锐地认识到,重整军备会卷入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之中,从而对日本造成危险。但他相信,如果将财政资源集中于经济重建而不是国防,日本就可以避开这一危险。尽管美国会不断地在重整军备问题上对日本施加压力,但美国也会以市场、资本和技术的形式,给日本经济提供大量支持。只要日本不在国防和重整军备上花费过多的金钱,冷战就不会是日本经济的主要威胁。吉田茂承认,政治独立和经济重建之间存在冲突,但他愿意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告诉日本人(MacArthur, [1947]1982:26):“只要人民的生活依靠别国的赏赐,国家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吉田茂赋予这一逻辑以新解,他认为,如果不能同时拥有两者,就必须为经济振兴而放弃政治独立。他相信,“就像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现在已成为超过英国的强国那样……即使日本真的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日本最终也会成为更强大的国家”(Masamura, 1985:192)。

进步力量认为世界体系由两大对立集团组成,但中间有一个中立区域。他们认为日本应该置身于这个区域。尽管这一看法与吉田茂的一元论视角有共通之处,但它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内涵。进步力量认为,日本为了自身的政治独立和国家安全,必须切断与美国的联系。保守派对世界的看法也从两个方面有别于吉田茂。一方面,他们同意进步力量将世界体系分成三个部分的想法,但他们认为,日本自己也应该成为领导者,至少是亚洲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他们用二元论的视角来看待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日本既可以保证自身政治的独立,也可以获得来自美国的经济利益。整个20世纪50年代,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在1960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续签过程引发的国内骚

乱中,这三种不同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历史表明,日本和拉美国家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同的战略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后果。尽管日本和拉美国家都认为,后发展经济体常常会受到世界体系结构的影响,但日本却认为,这种后发展经济体可以通过依附于经济超级大国而获益。吉田茂认为,在世界体系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地位不平等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日本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在国际政治中,日本也拥有足够的灵活空间来促进自己的经济利益。相反,拉美各国却被不利的外部环境弄得不知所措,并将国际市场看成是对自己政治独立的威胁。因此,他们要脱离全球市场,选择用进口替代作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从这一意义上说,拉美国家的立场与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的观点非常相似。如果日本政府按照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的看法,专注于国内市场的开发,日本经济恐怕就不会具有今天这样的竞争力。如果日本政府在重整军备问题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虽然日本可能会在国际政治方面有更强势的表现,但日本经济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吉田原则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203

重整军备的政治学

重整军备的计划最终破产。这一失败有几个结构性原因。

在从管制经济向自由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制定权再度分散化。吉田茂最初打算取消经济安定本部,但这一意图遭到了强烈反对,于是,吉田茂将经济安定本部改成了经济审议厅(EDA)。虽然经济安定本部还是作为政府部门保留了下来,但EDA的职责只是为政府部门从事经济调查,而原来的计划职能又返回到政府的各个省。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签订之后,占领当局无法再从外部对政府机构中的本位主义进行制衡了,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再次成为政策协调的主要障碍。

大藏省采用的审慎财政政策是发展日本国防产业的最大障碍。从1949年道奇计划的实施到1965年,大藏省受古典经济学的强烈影响,将平衡预算视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当时的看法是,在战前军方的压力下,大藏省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引发了经济危机,而且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因此,大藏省一直对增加政府重整军备开支的要求设置障碍(ōtake, 1984)。正如理查德·塞缪

尔斯所指出的那样(Samuels, 1994:147),“大藏省为‘最低限度的、必要的国防开支’政策进行的斗争取得了成功,它限制了武器的部署和生产,并通过左右其预算和下级官员的人事决策来对国家安全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204

不同政府部门为重整军备而展开的争权夺利是导致重整军备失败的另一原因。发展国防产业的任務涉及三家政府机构:通产省、运输省和防卫厅。一开始,这三个政府部门都支持重整军备和发展国防产业的提案。但是不久,这些政府部门就在谁应该具有监管这一产业的行政权上产生了分歧。通产省将发展国防产业看成是推动出口和支撑重建的战略,竭力争取,并最终获胜。通产省首先在竞争飞机制造业的管理权方面打败了运输省,然后又成功地击退了打算在国防产业中彰显自己权威的防卫厅的挑战。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通产省虽然在这次政府机构的斗争中成了赢家,却失去了在政府部门中支持发展国防产业的主要同盟军。运输省和防卫厅在与通产省的争斗中失利之后,便改变了自己对待这一计划的态度。防卫厅的官员们一开始打算培育国防产业,并将国防产业视为国防的基础。按照他们的观点,军事生产的国家化是一个长期目标,是迈向独立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步骤。当时,美国是日本主要的武器供应国。然而,当防卫厅失去了管理国防产业的机会后,它也失去了支持武器国产化的兴趣。所以,尽管通产省获得了国防生产的监管权,但却失去了产品的重要买家,因为防卫厅已不再有兴趣购买国内生产的武器了(Ōtake, 1984, 1988; Samuels, 1994)。

205

工商界领袖的分歧,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反对,也危害了重整军备计划。重整军备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制造业。1951年1月25日,经团联和7家全国企业联合会发表了致美国政府特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声明,建议美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一份条约加强两国的合作。这项提议建议美国政府给它的亚洲盟国提供财政支持和军事援助,以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加强这些国家的防卫能力。提议接着指出,日本可以转包美国计划中的武器和其他商品的生产,然后将这些武器和商品卖给其他亚洲国家。为完成这一任务,日本敦促美国政府建立一个有双方人员参与的组织,这一组织应包括美国政府、日本政府,以及日本企业界的代表。经团联后来设立了一个内部机构,即防务生产委员会(bōei seisan iinkai)。这个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就国防生产进行调查研究,起草政

府提案,以及协调关联产业和企业。日本许多前军职人员都打算利用这一机会来重建日本的军事力量,他们主张,日本应该更加独立地建立自己的国防。在一份由这批前军职人员起草的雄心勃勃的提案中(他们常常在防务生产委员会的调查局开会),他们建议,日本应该设立一支30万人的陆军(比战前的皇军扩大了30%),一支拥有30万吨级战舰的海军,一支有3000架军用飞机的空军(Kondo and Osanai, 1978, Vol. 3:215)。如果实施这一计划,国防开支就要达到日本国民收入的10%。即使全部国防开支的44%来自于美国政府的财政援助,日本政府仍然要把日本国民收入的5%用于国防。前军职人员提出的这项提议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政府会为日本的重整军备提供1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然而,批评者指出,美国国会同意的双边安全援助(MSA)的年支出只有1亿美元(Sénga, 1978:228-231)。

这份激进的提案在工商业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商界领袖反对将国防产业作为日本经济的基础。不仅是制造商不愿冒此风险,许多商业银行也对重整军备计划持否定态度。这些商界领袖相信,这份提案过于关注军事生产。他们认为,日本经济的独立必须依靠促进贸易,不能依靠特别军购和双边安全援助;他们甚至要求将防务生产委员会与经团联分开。推动军工生产需要对生产设备进行大规模投资,但商业银行却拒绝为国防产业的制造商提供信贷。东京银行副总裁堀江熏雄提出,像日本这样一个没有战争权的国家,要围绕国防来组织产业结构简直就是一种赌博。商业银行对重整军备的反对在那些曾经属于战前财阀集团的企业中尤为明显,这些财阀企业现在已经重组为关联公司集团,它们受到银行的严格控制,银行已经成为每一个关联公司的核心(Ōtake, 1984: 22-23)。正如理查德·塞缪尔斯所指出的(Samuels, 1994:145),“这场大争论在日本产业史和政治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军方公开要求回到战前的水平……而不是回到军事技术民族主义(military technonationalism),日本接下来将花费数十年时间专注于民用品市场,发展出一种替代的技术军事范式(technomilitary paradigm)”。

206

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播

上述结构性因素虽然阻止了日本继续实施军事发展主义,但却没能提出可供

选择的实现经济独立目标的手段。约瑟夫·A.熊彼特的创新理念在日本的传播,导致日本提出了把国家竞争力基于生产技术的大战略。

207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特别军购创造了日本的经济繁荣。日本的出口在1950年从5.01亿美元增加到8.02亿美元,1951年又增长到13亿美元。停战谈判开始后,日本1952年的出口相对于1951年出现了下滑,1953年仍保持在原有水平。很明显,朝鲜战争虽然已经使日本克服了稳定性恐慌,但却无法解决国家经济独立发展以什么为基础的问题。由于出口扩张的动力来自于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而不是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朝鲜战争结束后,如何保证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Masamura, 1985, Vol. 1:359-360)。在鸠山一郎的领导下,日本成立了经济企划厅,负责制定长期经济计划。1955年,日本政府宣布了“经济独立的五年计划”。这一计划为政府产业政策规定了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和特别军购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第二,实现充分就业(Masamura, 1985, Vol. 1:410)。

日本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呢?1956年的政府经济白皮书中,根据熊彼特长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依靠技术创新。创新是熊彼特使用的术语,意指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技术,新的产品、服务和市场,以及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熊彼特将创新视为经济扩张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

早在战前,熊彼特就已经对日本经济学界有影响,在塑造日本“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甚至给熊彼特提供了教职。虽然熊彼特没有接受邀请,但他还是培养了几名日本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了重要的经济学家,并对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人是:德国波恩大学的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的都留重人。熊彼特1931年访问日本时,作了以“经济周期”为题的著名报告,并就如何研究现代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重要建议。熊彼特的著作在日本翻译出版后,进一步增强了熊彼特对日本经济学的影响。1937年,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翻译了《经济发展理论》;1950年熊彼特去世后,日本又开始系统翻译他的著作。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合作,于1950年翻译了《经济学史》,1951—1952年翻译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3年都留重人翻译了《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56—1957年,东畑精一翻译了《经济分析史》。这些译著大大推动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日本的传播。

熊彼特创新理论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因 1956 年政府发表关于经济问题的白皮书而大大增强。经济企划厅调查课课长后藤誉之助在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后藤誉之助在 1954 年受艾森豪威尔基金资助,对美国做过一次调查,他对美国经济中的自动化效果和生产率运动印象深刻。在起草 1956 年政府经济白皮书的时候,他设想用熊彼特创新理论作为框架来解读日本经济。

208

这份文件给日本提供了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全新解释,其政策含义与重整军备的计划截然不同。这份文件指出,第四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尽管全球经济在 1949 年和 1953 年略有衰退,但它正在进入战后的繁荣期。这一强劲增长不能只用战后经济重建和朝鲜战争的影响来进行解释,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过去的三百年中,世界经济经历了三次这样的革命:第一次革命发生于 1788—1815 年之间,主要由蒸汽机的发明推动;第二次革命出现在 1843—1873 年,以铁路的铺设为代表;第三次革命产生于 1897—1920 年,由电力、化工、汽车和飞机产业的出现而引发。这份文件提出,第四次产业革命归因于原子能的运用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而且,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使全球经济经历了长期增长。就算会出现一些短期衰退,那也只是经济周期两波之间的小低谷而已(Keizai Kikakuchō, 1956:33-35)。后藤誉之助认为,随着世界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创新不仅会加强资本投资的竞争,还会扩大消费市场(Gotō, 1956:10)。

1956 年的经济白皮书,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一种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概念,转变为升级日本产业结构和改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之地位的实际策略。后藤誉之助曾经解释过他在 1956 年政府白皮书中引入熊彼特创新思想的意义:“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涉及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企业组织以及新的市场创造。在经济白皮书中,创新的含义进一步拓宽,提出了日本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问题”(Gotō, 1956:14)。后藤誉之助说:“现代化是在特定国家为提高生产力而与其他国家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创造经济资源,包括创造人力资本的过程”(Gotō, 1956:12)。后藤誉之助认为,现代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并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在现代化过程中,投资将是决定就业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后藤誉之助曾在思想上受到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题为《欧洲经济的增长和停滞》的报告的启发。该报告的作者指出,创新改变的不仅是生产技术,还有资本投资方向、消费形式、贸易结构以及各类产业和行业的分工。基于这些看法,1956 年

209

的经济白皮书提出，“现在不再是战后时代。我们面对的是新情况，由重建带来的增长已经结束。从现在起，[经济的]增长必须靠现代化来支持”。

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对日本产业政策影响巨大。白皮书发表之后，后藤誉之助受私营企业和大众媒体之邀，作了50多场关于创新的报告。他的“现在不再是战后时代”和“创新”的说法成了流行语，并变成政治话语中的主要议题，被广泛用来作为战后日本经济新时代之开端的象征。20世纪50年代，由于很少有日本人能够得到描述宏观经济形势的大量数据，所以白皮书提出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工会、学术界及一般大众对经济形势的认识。1957年，通产省以创新框架为基础，公布了著名的文件《产业合理化白皮书》。在这份文件中，通产省将创新主题转换成了详细的产业政策。

210 受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影响，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在日本产业政策中被创造性地重新定义。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日本在贸易方面的经济思想一直受古典学派主导。占领军总部的一位经济顾问向日本政府官员建议，日本应该出口纺织产品，养鸡并出口鸡蛋，开发旅游业，因为这些都代表了日本在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只有这样日本经济才会好起来(Nakamura and Omori, 1990:115-116)。日本银行总裁一万田尚登也指出，日本应该发展轻工业。尽管日本政府并没有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说法，但在思想上仍然受到正统比较优势概念的束缚。正统概念强调的是一国经济的自然禀赋。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上半叶，政府的产业政策仍然将廉价劳动力视为日本的比较优势，主张通过解雇工人和削减工人工资来降低生产成本。这种效益导向战略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发表之后，日本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解读比较优势。他们现在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一定非要基于自然禀赋，比较优势可以有目的地建构起来。一个国家可能会发现，它必须在开始的时候依靠出口纺织品和鸡蛋来积累资本，但是它也必须尽一切努力发展(比如说)重化工业，因为只有这种产业才创造增值产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找到战略位置。遵循这一逻辑，日本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私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根据传统的效率概念，企业应该用最少的投入生产出最大的利润，而效率则通常是以特定的时期如一个季度、半年或一年来进行度量的。这种注重资源配置的思想与提升日本经济产业结构的思想发生了严重冲突。由于技术创新要花费时间和

金钱,投资的成果短期内是不会显现的。在技术创新范式的启发下,日本人用一种全新的战略计划观替代了短期效益。这种观点强调的是企业能否在长期内赢得生产技术的竞争,以及企业能获得多少市场份额,而不是强调企业在一年之内能获得多少利润。对创新的目的而言,西方国家的效率常常意味着无效果。在这一意义上,创新改变了日本经济思维中的时间跨度和目的偏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日本经济学家已经将这些产业视为日本经济的未来方向。1949年,由稻叶秀三领导的经济安定本部提出的五年经济独立计划,就已经再次肯定了这些产业的重要性。这一想法内含的逻辑是,其他亚洲国家不久就会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取代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为了保持自己的国家竞争力,日本必须升级产业结构。主张国内发展或国际贸易的争论双方,尽管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相互冲突,但都认为日本必须升级产业结构,发展重化工业。都留重人(Tsuru, [1950]1975:98)指出,要想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外汇,日本必须出口增值制造产品。中山伊知郎(Nakayama, [1953]1972:78-80)从历史的角度详尽分析了这一立场,他评论说,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有效使用以往对扩张日本在国际市场的地位贡献极大。迄今为止,日本一直受益于后来者效应(latecomer effect)。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来发展现代经济制度、工业机器、工具和设备。日本通过进口这些西方的发明,没有为独立发展的试错成本付费。但从现在起,如果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来改善技术,日本就不能维持资本的效率,因为日本已经达到了与欧洲国家相当的发展水平。有泽广巳(Arisawa, [1950]1970:20-22)在他的分析中甚至将技术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的未来挂钩。他指出,如果只依靠私营部门,日本就不能积累资本。为了发起生产技术革命,为了开发国家资源,必须引入民族资本。由于民族资本的引入,日本甚至可能废除资本主义,导致经济的社会化。

在许多方面,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都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日本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演化的重要一环。第一,它代表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与主要受冷战观念驱使的重整军备计划不同,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提出的创新政策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能够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共存,在各民族—国家之间展开的国际竞争,将从军事冲突转向“和平竞赛”——即“经济增长率和生产力提升的竞争”(Keizai Kikakuchō, 1956:43)。这是日本经济意识形态向贸易型发展主义的重大转变。第二,它是吉田茂政治策略的补充。尽管吉田茂清楚

地界定了日本经济发展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他的政治策略毕竟是为了确保可以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与之相比较,技术创新政策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对日本来说,生产技术才是保证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最可靠的比较优势。第三,对中山伊知郎用国际贸易来设定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大方向的观点进行了补充。技术创新的观点为日本企业推动出口指明了具体策略。第四,赋予强调重化工业发展的战时遗产以新的内涵。20世纪50年代初,尽管日本人也认真地看待技术,在生产设备和技术转换上投资很大,但这些投资更多地受到迫切需要替换损毁机器的需求的支配。从创新角度来看,重化工业的发展就不仅仅是升级产业结构和推动出口,它也反映出能确定日本经济历史趋势的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的二元结构和就业问题

大约在同一时间里,有泽广巳和后藤誉之助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其主旨是通过降低日本经济中二元结构(*Nijū Kōzō*)的差距来实现充分就业。这是一种新思路下的日本产业政策。

有泽广巳首次使用二元结构来描述就业与提升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有泽广巳当时是失业对策委员会(Committee on Unemployment Measures)的成员,失业对策委员会创立于1949年3月,主要任务是处理由于道奇计划的实施而出现的失业危机。1955年,该委员会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呼吁从不同角度采用技术创新。这一思想是有泽广巳在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提出的。有泽广巳提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就业问题会决定日本资本主义的未来。在对日本就业问题最新变化的分析中,有泽广巳指出(Arisawa, 1956b, 1957),20世纪50年代初,就算就业人数因经济增长而增加,但就业结构却更加恶化。其中的原因是:大多数就业机会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在中小企业里,或者是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少于20小时,或者因为工资太低而每周工作时间多于60小时。这类工作不能看作是充分就业。

当二元结构这一术语在20世纪50年代被初次使用时,它代表了三种含义。第一,40%以上有工作的日本人属于独立经营,而英国90%的有工作的人是在为他人工作。第二,在同样规模的企业中,工资水平存在巨大差距。第三,经济中存在以大企业为代表和以小企业及家庭作坊为代表的两类企业群体,中等规模的企

业数量甚少(Masamura, 1991:692)。

有泽广巳指出(Arisawa, 1957, 34-35),“维持和增加就业不能只仰仗经济的扩张”。政府必须改变政策重心,从帮助失业工人的政策转向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改事后反应为事先预防”。有泽广巳相信,就业与经济结构紧密相关。他认为,日本经济的特征就是二元结构:现代结构是以大企业为代表,前现代结构以无数家庭作坊和商店为代表。20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经济中的现代部门过少,无法吸收更多的工人,剩余劳动力仍然要在低工资的前现代部门工作。

为了解决对日本经济至为关键的就业问题,有泽广巳主张,日本必须通过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消除二元结构之间的差距。为做到这一点,日本必须发展能源产业,引入新产业并改革现有产业。有泽广巳认为,这一目标在传统资本主义框架内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传统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他指出:“为了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可能成为可能,必须采用非资本主义措施……我们必须建立一个通过提升产业结构来推动就业的体制”(Arisawa, 1956b, 32)。制造业的发展将是日本解决就业问题的唯一途径(Asisawa, 1989a:128-129)。有的分析家指出,由于将二元经济的问题定位成是可解决的问题,有泽广巳没能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民主上(Hein, 1994:772)。不过,有泽广巳本人的文章已经指出,通过升级产业结构来改善就业,并为民主创建物资基础,是他分析的出发点。

214

基于有泽广巳的理论,后藤誉之助在1957年的经济白皮书中为日本政府勾画了一个政策方案。他指出,为了通过消除二元结构差距来实现充分就业,日本必须维持每年6%—7%的经济年增长率。同时,日本不仅要强调大企业的发展,还要强调中等企业和前现代企业的发展,并且要把小企业发展成中等企业。正如正村公弘(Masamura, 1985, Vol. 1:417-418)所指出的,政府产业政策从实现经济独立到实现充分就业的转移,并将消除二元结构差距作为实现充分就业的具体政策,是日本产业政策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步骤。这一变化为即将到来的高增长政策提供了合法性和理论依据。

生产率运动之争

日本人信奉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和企业家精神之后,如何将这些理念具体体现

在制度改革之中,便成为施政中的头等议题。由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经济增长与宏大的社会分析相联系,所以,要在日本产业政策中采用这一理论,不仅要对生产设备和技术转让进行大规模投资,还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努力实现技术创新时动员劳动力。

215 在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劳资关系以不断冲突为特征,这些冲突是对战时遗产的强烈反动。战后初期,尽管工会由于受到占领军总部的政策支持而较有势力,但工商界领袖不久又在政治斗争中重新掌握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合理化运动中采取了与工人对立的策略,大幅裁减工人以提高效率。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实施著名的“红色清洗”,大批工会领袖遭逮捕,劳资关系一度极为紧张。在这场与工人的斗争中,管理层的力量得到朝鲜战争期间特别军购带来的经济繁荣的极大支持。但战争结束之后,特别军购没有了,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成了紧迫的问题。

当创新被认定是支持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策略之后,劳资关系便格外引人注目。有些集聚在日本经济同友会的工商界领袖,勾画出一个意在依靠稳定劳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新策略。这些在财阀解体之后出现的经理人具有一种进步倾向。与注重企业利润的政府政策和合理化实践相反,他们视工人为企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对人的尊重”。他们主张,日本企业应该防止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对立,促进劳资关系的发展。他们提出,日本的科学管理必须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泰勒式管理。1955年11月,日本经济同友会发表的一份文件指出:

日本企业通常将资本利润最大化视作自己的生命,强调的是短期利润。多数企业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忘记了肩负对社会福祉做出贡献的使命……企业既不只是由资本组成,也不应只对资本利益负责。由于资本和企业都需要持续运行,所以资本和企业都必须满足雇员的福利,必须有益于一般大众。企业是生产的场所……也是就业的场所,企业提供社会福祉。科学地推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减轻雇员工作艰辛、改善其生活水平,并为社会提供价廉物美产品的途径(Nihon Seisansei Honbu, 1985:137)。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由于这种战略得以存留下来。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抬头也因为跨国学习而得到支持。1953年,日本经济同友会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代表团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战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日本很快就消失了,但联邦德国的管理层在战后重建时期却极为依赖承续于民族主义的经理人与工人之间的血缘(blood tie)关系。这种血缘关系不仅使德国经理人和工人在战后重建中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自愿合作,也使德国工人相信,如果不促进生产,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不能改善;它还使德国的经理人高度赞赏工会对20世纪40年代末重建工作的参与。20世纪40年代是现代德国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代表团中的一位经理乡司浩平(Kōshi Kōhei)认为,经理人和工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可能是持续交流的中介,可以用它来构建日本健康劳资关系的基础(Nihon Seisan-Sei Honbu, 1985:30-32)。从联邦德国回来以后,乡司浩平开始强调改善劳资关系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为了增强美国的外援政策,美国驻日大使联络日本经济同友会,劝说日本经理促进生产力。1954年3月,受日本经济同友会的鼓励,四家主要的日本商业组织一起成立了日美促进生产率联合会。

日本通产省热情支持这一动议。通产省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西欧的生产率运动,因为这一运动与通产省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关系紧密。经过考察私营部门所提出的生产率运动的效果,通产省决定将这一运动转变成政府资助的半官方计划。经与美国政府和日本工商界领袖的一系列讨论,通产省提议建立生产率本部。1955年2月14日,生产率本部成立,专职实施生产率运动,中山伊知郎出任本部次官,有泽广巳和稻叶秀三则是理事会成员。根据通产省一份文件的记载,过去的合理化运动只是主张生产设备的现代化,从现在开始,要全面推进生产力,包括生产技术、生产资料、劳资关系、管理技术以及分配体系,要实施总体战略来削减成本,改善质量,推动出口并增加国民收入。为增强生产率运动的效果,生产率运动不仅应获得政府机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支持,还应获得大众的支持,并使之成为全民运动。

但是,生产率运动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率运动不可能超越社会阶级利益而惠及每个人。没有良好的生产关系,强大的生产力也不能自动地发展;只有良好的生产关系才能体现生产率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Horie, 1955)。就算科学和技术能超越阶级斗争,它们也只能应用于资本主

义社会：“自动化本身或许提供了某种利益和福祉，但其资本主义应用却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不幸”（Kanbayashi, 1958:53）。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动化不仅对工人的工作保障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在20世纪50年代人口过剩的压力下，这已经成了关注的焦点），而且，自动化还会减少男性工人的工资，因为自动化简化了工作过程，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妇女和童工（Ōkōchi, 1957）。此外，通过自动化进行技术创新会进一步增加工作负担，造成工人之间更大的差异化。总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技术创新只是增强了阶级斗争中资本的力量，而削弱了劳动的力量（Horie, 1955; Kanbayashi, 1958）。

218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环境下战时遗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复苏。在战前战后两种条件下，劳动者都是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由被要求与资方合作。生产率运动中的合作要求只是为了国家利益，然而，即使从战时遗产的角度看，这种要求也是不平衡的，因此遭到了批评。在重新调整了社会政策立场之后，大河内一男（Ōkōchi, 1957）提出，由创新和促进生产率所创造的利益，肯定会“在社会上公平分配”。政府必须采用最低工资制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充分就业，并扩大国内市场。对于只关注工资和生产成本而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廉价劳动力政策的批评，中山伊知郎（Nakayama, [1956] 1972）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除非工资和就业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就不能提升生产率。什么是生产率呢？中山伊知郎认为（Nakayama, 1956:46-47），生产率是生产要素的创造性结合，这种结合将使这些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好地使用。生产率可以增强生产的能力，刺激经济的增长。合理化概念与生产率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于，前者只强调了生产设备，而后者还包括工人在内。因此，生产率运动不只是设计出来提升企业的利益，而且还要通过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来改善生活水平。如果没有一种产生和维持相互信任的制度架构，那么工人仍然会怀疑经理们在生产率运动中的意图。作为生产率本部的副会长，中山伊知郎提出了著名的生产率运动三原则。第一，促进生产率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增加就业，政府与企业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失业。第二，管理层必须按照每一企业自身的条件，就如何促进生产与工人协商。第三，推动生产率所创造的利益，必须在企业和工人之间公平分配。中山伊知郎说，“除非能从实践上证明生产率运动的成就不仅符合管理层和资本家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劳动者与一般大众的利益，否则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支持生产率运动”（Nakayama,

[1956]1972:337-344)。

在这场争论中,不同的行为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商界领袖用它来要求工人合作,工会用它来要求更多的利益和经济福利。然而,中山伊知郎的三原则将双方的要求联系到了一起,并帮助双方达成妥协。因此,生产率运动不再只是传统和谐价值的一种形式认证,而是管理层与工人关系的实实在在的合理化,目的在于克服查尔斯·撒贝尔(Sabel, 1994:137)所谓“增长的主要悖论”,即学习和监控的悖论。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为市场生产增值产品;监控是指“交易双方决定,从学习中获得的收益按照双方协议的标准和各方的解释,进行分配”。从这方面而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活是在战后环境中应运而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不再用来支持军事冒险,而是用来解决和平时日本经济中面临的当代问题。

219

未落实的解决方案

工人对生产率运动的反应也有分歧。当时拥有 1/3 日本工会成员的总同盟(Sōdōmei, [1955]1966)做了一个有条件的承诺。总同盟向资方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保证不增加失业、不恶化工作条件,保证共享生产率运动的利益。当目睹了道奇计划实施后日本企业如何试图通过解雇工人来降低成本,工会主要考虑的问题就变成了生产率运动在失业和工资问题上的负面影响。日本工会总评议会(Sōhyō)这一最强大的工会拒绝与资方合作([1955]1966),其主要顾虑是,生产率运动会进一步恶化工厂中的工作条件,进一步降低工资,并增强资方制裁工会的能力。不过这些担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工会的抵制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在战后的第一个 10 年,日本的劳资关系以极强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冲突性战略为特征。最初,由于有占领军总部的支持,作为对战时条件的强烈反动,日本的工人运动很快复苏。战后初期,在“工人参与管理”口号下成立的经营协议会(Keiei kyōgikai),成了以实力为基础、集体讨价还价的地方。工会获得的与企业谈判的权力不仅在福利方面,比如工资、奖金、退休金、工作条件、休假以及女工在经期和产期的带薪休假,而且还包括生产、管理、组织事务及提职和解聘(Nishinarita, 1994)。在民主改革期间,资方不得不做出满足工会要求的让步,用西成田丰的话说,管理权力实在“有限”。其结果正如一位工

220

商界领袖所指出的，“股东的利益完全被漠视，企业的经营受雇员的控制。这一点与我在大正时期回到日本时的情况截然不同。如果雇员的利益是第一位的，那股票的红利和价格就成了第二位的東西，没有人会去思考如何增强企业的基础，如何累积资本”（引自 Okazaki, 1993:99）。

但后来，在“夺回管理权”的口号下，资方开始反击了。通过1949年修订《工会法》，股东利益的代表、企业给工会的资助以及劳动合同的自动延长等都被取缔。正如西成田丰所指出的（Nishinarita, 1994:143-144），这种修订标志着劳资关系的“重大变化”，此前的劳资关系一直以强化劳工的权力并限制管理权力为特征。其结果是，企业不再与工会协商人事决定及企业管理的一般原则。

经营协议会的职能也从集体讨价还价转向了集体讨价还价前的准备讨论，而集体讨价还价也常常以罢工的形式出现。尽管在占领初期劳工协议的做法在日本比在德国具有更广泛的基础，但与德国相比，它却未能在日本扎下根来。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在20世纪40年代将权力从劳动者手里转向管理层后，就一直在继续劳动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合作（Nishinarita, 1994）。

在决定这两种状况的因素中，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和日本都实践过受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极大的稳定劳资关系政策。在民主改革过程中，涉及劳资关系的意识形态在日本和德国各以不同的形式发展。在日本，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底层群众中迅速消失，同时，阶级意识得到强化。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复苏的影响，工人运动采取了一种进攻性的姿态。与此不同的是，受到曾在魏玛共和国采用的经济民主理念复苏的支持，德国的社会化（*shakaika*）概念变得极具影响力。按照西成田丰的说法（Nishinarita, 1994:155-156），战后时代存在两种与产业民主有关的意识形态。一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主张，民主反映了作为资方对立面的工会的作用。这一观点在英美非常流行。另一种意识形态则指出，民主是由工会参与管理和决策来实现的。这一观点主要盛行于德国。在1960年的三池罢工（Miike Strike）得到解决之前，日本战后时代的劳资关系基本上受盎格鲁—撒克逊产业民主信念的影响。尽管某些进步的日本工商界领袖已经认识到了德国模式的力量，并尝试推动生产率运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努力才得到工人的广泛支持。

工人对生产率运动产生怀疑也并不让人奇怪。正如《经济学家》报告的

(*Ekonomisuto*, 1955年7月9日:50),“1954年,多数产业内的合理化运动以裁减员工人数、延长劳动时间、增加每一个工人的生产任务为特征……此外,按照官方统计,促进生产率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导致了大批工人失业,仅3月份就有84万人失业。产业合理化运动创造了大量的失业。”生产率本部也指出,“在这一时期,劳资双方为了同一目标进行合作的姿态,并没有得到培育,因为在1955年,劳资关系仍处于对立状态。因此,工人和管理层双方都无法立即将由工会参与的生产率运动视为全民运动,是可以理解的”(Nikon Seisansei Honbu, 1985:5)。

生产率运动也有一些积极成果。与合理化运动不同,生产率运动没有引发大规模失业,其原因在于,生产率运动只是在前沿产业中引入了新的技术。即使之后在许多夕阳产业中,减少工人已成了不可避免之事,许多企业还是将工人转入其他领域,而不是采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根据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一份调查,在409家企业中有91%进行了技术创新,但事实上只有两家企业解雇了工人,这些企业中的71%是通过工作职位转换来避免工人失业的(Nihon Seisansei Honbu, 1960)。

结论

222

本章阐述了20世纪50年代在以自由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环境下,日本发展主义所发生的巨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有两股强大的力量在交互作用。一方面,道奇计划结束了管制经济时代。道奇计划所提出的效益问题,迫使日本产业政策从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直接政府管制的战时形态,转向了一种新的政府干预形式。这一新的形式不仅可以策略地配置资源,而且增强了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赖以生存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不仅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积累资本的机会,使日本度过了由道奇计划引发的稳定性恐慌,而且表明了用其他方式继续实践军事型发展主义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日本在这两种选择之中摇摆不定,这种状况使这10年成了中村正则所谓“政治的十年”。

为了回应诸多的挑战,日本形成了两个大战略。吉田首相提出了一个政治战略。这一战略认为,通过与美国建立联盟,日本不仅可以获取经济利益,还可以得到军事庇护。这就可以使日本最小化自己的国防开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经

济学家则提出了日本的经济战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改变了日本经济学家对长期经济增长动态模型的理解,并使日本根据生产技术重新界定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根据新的界定,战争期间注重重化工业的发展主义在国家产业政策中又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发展主义不再支持军事扩张,而是力争构建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地位。

223 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日本经济体制中出现了两种相反的发展势头。一方面,政府的力量大大增强,并在占领期间达到了顶峰,政府力量的增强大大改变了国家经济干预的方式。为促进出口,政府将政策目标从宏观层次的政府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有效管制,转到了微观层次的私人企业的生产效益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日本产业政策中,政府和市场不再相互排斥。日本政府开始利用市场来促进企业的竞争。同时,日本政府又通过颁布政府规制,通过实施重在信贷和外汇管制的歧视性政策,将市场竞争的范围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尽管日本政府恢复了市场的功能,但这种市场功能迥异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功能。另一方面,其他那些受到战后民主改革强烈冲击的非市场机构,又重新效力于这一新的国家目标。在政府两次修订反垄断法之后,战前的财阀公司将自己重组为关联公司集团,由主银行制度支持的企业集团也再次主导了市场。与此同时,为克服经济衰退、合理化产业结构,卡特尔也再次获得了合法地位。

在劳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以合作替代冲突的新的关系模式。工商业领袖开始借着生产率运动来稳定劳资关系,并策略地提出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张。有些工会也开始参与这一运动,虽然这时大多数有势力的工会仍然反对这一思想,但在一般性策略方面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工会策略的重心已经从诸如重整军备的政治问题,转到了诸如如何通过每年有组织的春季罢工获取更多福利的经济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产业政策的转移过程,表明了日本人在既定环境下对本土价值的强烈依赖。这种转移也显示出,工商界领袖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在意识到他们不能再依靠特别军购获得外汇,而只能依靠劳工合作来提高生产技术才能获得外汇时,肯定了本土的和谐价值观。对这类价值的肯定从来不是因为价值本身,而只是出于功利目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合理化运动中,日本企业解雇了很多工人,那个时候就没提什么本土价值观,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冲突论对工会更有吸引力。只是在各方利益得到表达,各方都能受益之后,回归和

谐与合作才又变成受欢迎的选择。

尽管有这么多变化,但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从军事型发展主义向贸易型发展主义的转换仍未完成。其原因是,整个国家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虽然吉田首相为贸易型发展主义提出了宏大的战略,但这一战略仍然受到打算重整军备和强调在政治上脱离美国而独立的两大保守派的不断挑战。技术创新的主张表明了日本产业政策的远大设想。20世纪50年代,日本劳资双方还没有就实现这一设想的制度性途径达成一致,冲突性策略对双方的影响仍然很强。最后,尽管政府已经改变了干预经济的方式,但对经济仍有很强的控制力。市场力量已经在改善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但外国产品还是没能进入日本国内市场参与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考验仍然未来临。这三个问题继续产生紧张和冲突,直到下一个十年开始时,这些问题才爆发出来并引发了新的变化。

第 6 章 高增长与自由化

高增长与自由化是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产业政策中的重要范式。通过这一范式,日本发展主义完成了向贸易型的转换,并塑造了当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

20 世纪 50 年代仍被认为是日本发展主义向贸易型转变的初期阶段,原因有三。第一,日本在重整军备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吉田战略受到来自于保守派和激进派两个方面的反对。第二,管理者和工人仍然对生产率运动持怀疑态度,技术创新还没有得到充分支持。第三,尽管日本已开始参与国际贸易,但由于日本国内市场仍然受到严密保护,政府官员仍然牢牢控制着经济,日本经济仍然是在一个半开放的国际环境中运行。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发展主义在两个重要方面受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推动。第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政治对立,因而在 1960 年导致了战后日本的一次主要政治危机。然而,这次危机之后,日本即从“政治季节”转到了“经济季节”。正如佐佐木毅(Sasaki Takashi, 1991:2)指出的,从那时起,日本结束了试图在美国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重新确定自身地位的努力;“转而重视国内事务,并以经济增长和富足为第一优先目标”。曾在 20 世纪 50 年代重整军备问题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上与保守派进行的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强大力量的激进派,由于没能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来反对保守的自民党的高增长提案,事实上已经被击败。自民党则一直成功地执掌政权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持暗示着一个深刻的变化。在军事型发展主义中,经济被视为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达到目标的手段,现在,这些手段本身变成了目标。虽然高增长中一些潜在的负面作用已经引起了

人们的注意,然而从国家层面来关注国民生产总值和自由化仍然是重中之重。日本如此一心一意关注经济,以至于西方的观察者们反复质疑“未来这种[经济]力量将运用于什么目的,日本将在国际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Pyle, 1992:3)。

第二,主导正在成型的自由贸易秩序的美国,迫使日本开始了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当时,自由化在日本被认为是第二艘黑船的到来,是对日本产业存亡的有力挑战。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意味着:日本必须结束高关税等保护主义措施,让外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由于日本经济的许多领域一直处于政府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领域的企业效益是国家政策制定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国内产业结构的提升以及物资与人力资源在“新产业体制”下的国家动员,被认为是决定日本经济命运的关键。根据传统理解,既然自由化取消了保护性关税,它就意味着市场力量的进一步释放和竞争的不断增强。然而,日本的战略显示,即使在取消关税之后,通过有组织的竞争仍然能保护国内市场不受外国公司的侵犯。

20世纪50年代的另一个主要矛盾,即劳资之间的矛盾,也在1960年的三池罢工中,通过一场重要的全国范围的冲突获得解决。尽管这场危机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但从那时起,各方都改变了自己的策略。20世纪50年代,自民党在处理劳资冲突时一直把劳工政策视作公共安全问题。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自民党认识到劳资合作在促进生产率方面的重要性,并开始将这个问题作为社会政策来对待。与此同时,资方也意识到了对抗战略的高成本。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也迫使日本企业在高增长范式中努力维持员工的稳定。经过多年的顽抗之后,工会最终被组织进了生产率运动之中。这样,在经过十年多的间断之后,战时遗产开始在新的民主政治环境中扎下根来,并被用于处理当代事务。

227

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战略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意识形态中对国家生产力的阐释,已从战略产业(尽管工业化水平对国家政策仍然非常重要)扩展到了综合国力(*sōgō kokuryoku*)。日本政府开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抵消经济周期的影响,即抵消经济衰退或保持经济增长的总体步伐。政府已成为提升日本经济的产业结构,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强化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工具。1960年12月,在池田勇人内阁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采纳了著名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National Income Doubling Plan, NIDP)。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日本经济设立了一个目标:10年内使实际国

民收入翻一番。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承诺增加公共支出来发展基础设施、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提升人力资本,并消除经济中的二元结构。

通产省官员仿效战时国家动员,开始实施一种新产业体制(*shinsangyō taisei*),新产业体制旨在贸易自由化之后,组织全国的企业与外国企业竞争。为了动员整个国家迎接经济自由化的挑战,日本政府提出了通过建立一个新的产业体制来重组产业(*sangyō saihensei*)的计划。根据通产省的提案,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为国民经济设定一系列产业战略。然后,政府将确保这些产业的金融信贷,并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在制定优先产业结构详细计划的过程中,政府也在监督商业银行发出的每笔贷款。尽管后来国会并没有通过这个提案,但其总的原则却在稍后一系列(*keiretsu*)的发展中得到采纳。与创新政策范式相比较,高增长范式中政府在通过公共部门保持经济增长方面,其作用更为直接。但与管制经济不同的是,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对经济的干预已经超越了对物资分配或设定市场价格的直接行政管制。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私营部门的反抗,以及私营部门的政治力量在战后重建期间得到了增强。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来影响私营部门的行为,其中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行政指导。

反对过度竞争是这一政策范式中的另一主要考虑。在贸易自由化和外汇兑换自由化期间,日本政府机构失去了控制私营企业的最为重要的杠杆。结果,通产省按照其最初的模型(通过颁布《促进指定产业的特别措施》)重振战时体系的努力,也失去了相应的物质基础。而且,日本经团联所提的独立调整(*jijū chōsei*)提案最终战胜了通产省的官民合作(*kanmin chōsei*)提案。然而,贸易与外资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成了主宰。在自由化时代为扩大日本企业的经济规模而设计出的产业重组原则,仍然得到很多非市场治理机制的支持:比如说,通产省并不依赖政府机构的直接管制,而是依赖于行政指导来实施其产业政策;再比如,用垂直整合和横向整合的形式将私营企业整合成企业集团形式的关联公司集团,现在成了日本经济组织市场竞争的主要模式。

在自由化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叶因高增长而造成劳工短缺的压力下,对利润原则的抵制,尤其对利润原则在劳资关系中的抵制,在日本颇为普遍。这造成了日本大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其特征即为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内工

会,诸如和谐之类的传统文化主张成了劳资关系中的主旋律。高增长本身则为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物质基础。高增长创造出对年轻工人的强烈需求,这种需求迫使大企业相互竞争,并只能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来确保劳动力的稳定。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这一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持劳资关系稳定的原则,即为了本民族在总体战争中的生存而动员工人的原则,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现在,这一原则被用来动员日本工人为了日本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中的存亡而进行竞争。

229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传播、管制经济的传统以及欧洲混合经济的经验,在日本战略的形成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下村治、中山伊知郎和大来佐武郎等经济学家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形成中的思想领袖,他们对高增长思想的形成影响巨大,他们的想法也得以具体化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他们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尤其是下村治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因他们与主要政治家池田勇人的紧密关系而得以强化。这也是高增长思想得以在政界流行的关键原因。同时,有泽广巳基于自己管制经济的经验,通产省官员两角良彦基于自己在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期间对欧洲混合经济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建立日本经济新产业体制的提案。通产省以这一提案为基础,起草了《促进指定产业的特别措施》。尽管建立官民合作体制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但他们所提出的原则仍然在独立调整体系中有所保留。

日本战后史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1950—1955年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年均增长率为8.9%,生产设施的私人投资率为10.2%,出口增长率为13.9%(Kōsai, 1989:285)。这时,各项经济指标如195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1955年的工业生产水平,1956年的人均消费水平和195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达到了历史纪录水平。正如我们在第5章所提到的那样,在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企业通过为美国政府提供军需品和服务而积累了大量资本。现在,他们开始对生产设施和技术转换进行大规模投资。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受较高私人投资率的推动,日本经济经历了两次空前的繁荣,第一次是以拥有“三大件”——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为标志的消费革命。

230

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还面临几个结构性问题。第一个就是贸易和货币兑换自由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国际压力。我们知道,西欧和日本的战后重建都极度依赖美元。为平衡自己的国际收支,西欧和日本都继续实施原有的管制贸易政策。然而,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复苏,美国在世界工业产品中的出口份额却从1948年的38%下降到了1959年的22%。随之而来的美元外流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因此,美国政府强烈要求西欧国家和日本废除各自对进口美国产品的歧视性规定。回应这一要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相继废除了进口美国产品的诸多限制;同时,他们又于1958年恢复了美元与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性(Keizai Kikakuchō, 1976)。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的日本,也必须与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兑换相协调。当时,日本的国内市场仍然受到高度保护。1959年8月底,日本只有26%的进口商品没有受到政府的政策性限制(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1990b:102)。1959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在战后第一次超过进口,贸易顺差达1.13亿美元(Arisawa, 1976:440)。在1959年东京召开的关贸总协定大会上,美国代表警告日本,日本若不尽快撤销对美元区的进口限制,美国可能会限制日本产品的进口(Masamura, 1985)。很明显,日本如果不对这些压力做出回应,它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231

第二个问题是不发达的基础设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制约。从1953年起,日本经济就超过了其战前水平。然而,尽管经济在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建设却严重滞后,日本经济的运行主要依赖于战前的设施。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基础设施已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尽管日本已出现了四个产业中心:东京—横滨地区、大阪—神户地区、名古屋地区和北九州地区,但是公路、铁路、下水道、工业用水和城市住宅仍不充足。当时,日本主要大城市的交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差的交通;城市中许多人都住在没有下水道的房子里;每百人拥有的电话只有4.7部;机场和港口根本不能支撑快速扩张的国际贸易。除此之外,日本的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其居住环境、教育机构和娱乐设施都需要有大量投入才能赶上其他工业化国家。

第三个问题是许多经济部门的无效率。在自由化的压力下,国家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增强经济竞争力。根据财政货币委员会(Finance and Monetary Association)所做的一份调查,贸易自由化对以国内资源为基础的产业,比如

煤炭和金属原料的影响极大；对那些国内市场不大，但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与外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进行竞争的产业，影响也非常之大，这一类的产业包括特种钢产品、机械用具、化学机械和建筑机器。更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化也会影响到在国际市场上被称为高附加值的产业，比如汽车业和石化产品（Yoshimura, 1961:81-85）。为了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指出，日本企业必须进一步增加生产设施，为批量生产奠定基础，推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建立工业中心(industrial complex)。其中，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达成这些目标的必要条件(Ōkita, 1960)。如果不能升级产业结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不能带来足够的硬通货，经常出现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将会是制约日本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此外，人口结构的改变也意味着，尽管失业仍然是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的事情，但由于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劳动力的综合性短缺将会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中出现。

232

第四个问题是经济中存在的二元结构和分配的不平等。1955年和1956年，经济状况确实有所改善，就业率以每月增加15万就业职位的速度在增长。然而，这些职位多数是由20人或20人以下的小企业提供的，也就是说，增加的是低工资或兼职的工作。相反，大企业招聘的工人比以前要少。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企业仍然不愿意招聘正规工人，因为招聘正规工人就要给他们提供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工资。有泽广巳指出，“大企业管理者之所以有这种负面态度，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日本经济会高速增长。他们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看成是一个偶然的受外部影响的现象，并认为日本不久就会进入经济周期的低谷。”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二元结构似乎是日本经济的主要劣势，因为人们认为，中小企业会分散有限的资本和物质资源，日本的竞争力会由于经济规模而受创。规模、技术的不同以及资本与劳动密集度的区别，拉大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雇员在收入和经济福利方面的差距。这种不平等不仅是日本国内的忧虑，而且也常常成为国际批评的目标。1958年，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访问日本时，就严厉批评了日本的廉价劳动力政策和落后的社会福利措施(Tanaka, 1959)。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生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社会福利的落后状况的制约，而市场力量本身又不能克服这些难题。在这种环境下，作为日本政府主要顾问之

一的有泽广巳指出，“政府必须为技术创新制订计划和建立国内基础。解决日本的长期就业问题是政府的当务之急”(Arisawa, 1957:42)。

233

高速增长计划和自由化

为了回应这些挑战，日本政府于1959年开始了贸易自由化，并于1961年采纳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高速增长和需求管理超越了以前简单的反周期调整和提高供给能力的做法，成了新的政策目标。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改变了靠关税来保护国内市场的策略，将日本企业纳入一个新的产业体制，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进行竞争。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通过将公众注意力从诸如宪法修订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续约等敏感问题，转移到对高速增长的乐观预期上，转移到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国民团结的紧迫性上，从而成功地缩小了国家的政治分歧。日本发展主义与以自由化形式出现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交融(encounter)，经过战后二十年的进化，为发展主义向贸易型的最终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从具体的制度安排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体系并不是战时模式的简单复制，相反，这一经济体系对原始形态的管制经济在政府干预和政企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再生产。这一经济体系反映出日本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管制经济的基本经济原则也在这一体系中得到升华。

在这一新的政策范式中，对国家生产力的理解，从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转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上，经济战略观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整个国家再次被动员起来集中力量于一个单一目标；这一次，GNP成了最优先目标。为了维持高速增长，日本政府采纳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在这一计划中，政府通过大量增加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由政府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有：道路、港口、铁路、机场、运输设备、电话和电报交换机、居民住房、供水管道、医院、社会福利和教育机构。10年中，投资总额达到了16.1兆日元。

234

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日本政府创新性地运用了凯恩斯学派的政策，通过政府财政将公共支出的功能从对经济状况的调整，扩展到了刺激经济增长。该计划将货币供给作为维持这种增长的手段，并将这些资金的适当分配看成是国家财

政最重要的任务。1965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政府摒弃了自1949年道奇计划完成时就遵循的长期预算平衡方案,开始发行公债来维持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与自己的产业政策联系起来。日本政府的这一创新举措,使公共支出的增长不仅仅成了调整经济周期波动或维持经济增长的工具,而且成了重点支持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制造业和化工产业)来升级日本经济产业结构的手段。20世纪60年代,一般机械工具、电动机、汽车、高分子化学和金属原料产业都被视为主要的战略性产业,日本将在这些产业中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1960年12月,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采纳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和政治影响。在宣布采纳这一计划一天之后,东京股票市场的平均价格即跳升到历史的最高点(Kobayashi, 1989)。政府对高增长的支持刺激了私营部门的大规模投资,日本经济从此进入了以投资带动新投资的时代。随着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实施,20世纪60年代,GN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1.6%的水平,国民收入也按11.5%的比率增长。与20世纪50年代工资平均增长6%—7%相比较,20世纪60年代的工资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1%。出口增长达到了16.8%;重化产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份额,由1955年的38%上升到了1965年的62%。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目标在6年之内就实现了,到1968年,按GNP衡量,日本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同时,人力资本的概念也第一次进入了日本国家生产力的观念中。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日本政府的预期是,未来全球市场的竞争将取决于技术创新,取决于知识密集产业的比较优势,所以,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政府还大大增加了资助战略性产业的研发工作的公共支出,政府承诺,到1970年财政年度,即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最后一年,研究资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从原来的0.9%增加到2%。为了培训新一代劳动力,政府出资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政府还计划将高中的总入学率从1960年的59.8%,提升到1970年的72%。

在自由化的压力下,政府力图将国家纳入新的产业体制的努力也反映了经济战略观。作为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建立新的产业秩序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20世纪60年代,源自1931—1945年间的产业重组概念,获得了进一步

发展。20世纪50年代的前5年提出的是合理化概念,重点发展的是个体企业,而后5年则在战略性产业政策中提出了生产技术概念,重点发展的是个别行业。20世纪60年代则把产业重组概念发展成宏观概念和动态概念。按照产业结构调查委员会中有泽广巳所领导的产业制度小组的界定,新的产业体制是为了协调私营企业行为、企业间关系;以及政府与私营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与责任做出的制度性安排(引自 Tsūsanshō, 1990b, vol. 10:49)。从理论上讲,一旦各方就最适产业结构问题达成共识,这种产业体制就能整合内部的各种成分,并使理论变成现实。

236

产业结构的概念对政府的作用有直接的意义。产业结构问题是一个宏观问题,没有政府的干预将无法推动。事实上,构建新的产业体制的努力引发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激烈争夺。私营部门提议的独立调整最终战胜了通产省提出的政企合作。然而,正如鹤田俊正(Tsuruta Toshimasa, 1984)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独立调整反映出政企合作观点中的三点基本认识。第一,在贸易自由化中,日本经济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规模过小的企业经营及过度竞争。第二,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必须通过鼓励兼并和合作,以及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来强化。第三,政府应放松反垄断法,允许卡特尔和兼并。同样重要的是,就新产业体制的领导权问题尽管通产省在与私营部门的争斗中失利,但这并没有阻碍它为了强化民族资本(*Minzoku Shihon*)而支持大企业获取更为有利的条件。对此我在这里只简略提一下,20世纪60年代末期,为了回应资本投资自由化运动,通产省极力支持大企业之间的兼并。然而,从比较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决定《特振法》(*Tokushinhō*)命运的问题上究竟是政府重要还是私营部门重要,已经无关宏旨:尽管私营部门成功地将新产业体制推向独立调整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企业集团在市场竞争方面与其美国同行的行为方式相同。

反对过度竞争这时也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按照传统的理解,自由化本质上会导致更多的竞争。然而在现实中,有人却提出,正是因为自由化,过度竞争反而不再受人欢迎。其中的原因是,小规模的商业运作被认为是日本企业与西方企业竞争的主要劣势。为了提升日本企业的规模经济,政府试图在促进个体企业(在研究、发展和投资方面)开展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加强政府规制,鼓励卡特尔和系列(*keiretsu*)来限制竞争的范围和程度。

尽管通产省在劝说国会通过《特振法》时失败了,但它却成功地实施了《石油产业法》。1952年,在战时石油分配的配额制废除之后,政府采用控制购买石油所需的外汇的形式来控制石油产业。1961年7月,在筹备石油产业自由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已经承诺1962年10月实施石油产业自由化),通产省设立了能源委员会(Council on Energy),由有泽广巳挑头。后来,有泽广巳带领一个代表团去了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专门调研石油政策,回来后即向通产省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低价能源的供给和能源供给的稳定性作为产业政策中的两个主要原则。为确保能源供给,日本企业必须在国内和国外从事油田的开发。在石油冶炼和销售方面,日本必须至少控股总资本的30%,而且必须用政府补贴和冶炼厂之间的长期交易来保证日本国内石油生产达到一定水平。为确保特种石油的供给,要用民族资本,或是用石油的主要用户比如炼油厂、电力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资金,建立一家国策公司(*Kokusaku kaisha*,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使用过相同的名称)。1962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由通产省根据能源委员会所提原则而起草的《石油产业法》。后来,这一法案成了一个重要的工具,大石油公司依据该法案组成卡特尔,政府则依据该法案成立公共石油公司。由于《石油产业法》严重地制约了竞争,所以该法的颁布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大石油公司迅速提高石油价格,从而成为大众猛烈批评的目标,并致使政府于1977年加大了反垄断法的力度。当能源委员会提出的这一法案仍在实施中时,只有东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胁村义太郎(Wakimura Yoshitarō)反对这一法案。他认为,《石油产业法》“背离全球国际化趋势,它对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严格区别、对外国资本的恐惧、对外国资本的反对,都不合时宜,《石油产业法》的目的就是反对外国资本,而这是一个政府问题”(Tsūsanshō, 1990b, vol. 10:552)。

237

20世纪60年代,对利润原则的否定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20世纪50年代,由一些进步的企业管理者提出的为提升生产力而稳定劳资关系的措施,开始获得广泛认可。三池罢工之后,日本大企业结合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把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做法制度化了。在三池罢工失败后遭受重大打击的工会,也改变了对生产率运动的立场。日本公团主义思想开始出现,这一思想替代了用企业短期利润来衡量效益的主张,注重的是由传统和谐价值观所支持的劳资合作。

238

高速增长的理念

高速增长政策受到这一理念的支持：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代，政府应该通过实施凯恩斯财政政策来支持这一趋势。与正统的经济周期理论直接冲突的这种理念，在日本人的经济思维中引起了一场认知革命。20世纪50年代末期，多数日本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仍然相信，日本经济在经历了50年代后期的两次经济繁荣之后会有一次衰退，因此，政府应该采用紧缩货币政策来放慢经济增长。

在日本产业政策的高速增长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三位经济学家贡献良多。一位是任职于大藏省的经济学家下村治，他是第一位提出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时代观点的人。另一位是中山伊知郎，他主张：收入翻番是日本发展福利国家并维持经济增长的直接手段。第三位是大来佐武郎，他是负责起草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经济企划厅综合政策局局长，是他将下村治和中山伊知郎的想法转化成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从思想传承上而言，下村治关于高速增长的论点来自熊彼特、凯恩斯以及哈罗德—多马的思想，也来源于日本经济的实证数据。按照下村治的说法，有两个因素可以决定经济的增长：一个是供给能力，其中包括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另一个则是按产业投资、政府支出、出口和消费来衡量的有效需求。在刺激和维持经济增长方面，供给能力和有效需求同样重要。下村治认为，日本企业于20世纪50年代在生产设施上的巨额投资，已经强化了日本经济的生产力和进口能力，给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潜力。他主张，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日本政府应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创造有效需求(Shimomura, 1958, 1959a, 1959b, 1962)。

凯恩斯经济学是下村治高速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下村治的理论也吸收了其他理论的成分。下村治思想的基本前提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然后，他吸收了强调有效产出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动态模型，将凯恩斯的短期经济波动理论改变为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下村治主张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又反对通产省或是私营部门通过政企合作或独立调整来抑制市场的主张。下村治看重市场竞争的作用，但却反对自由放任原理。他相信，“在创新开始的过程中，政府和中央银行必须承担起领导责任，为维持经济增长提供合适的环境。这是政府的责

任”(Kanamori, 1985:151)。

1936年,下村治在日本大藏省纽约办事处工作时,买过一本凯恩斯刚出版的《就业、货币和利息通论》,那时他就开始研究凯恩斯经济学了。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之后,下村治于1952年将自己撰写的一篇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文章交给了东北大学的凯恩斯经济学权威安井琢磨(Yasui Takuma)教授,请他给予评论。安井对论文的质量印象深刻,他建议东北大学授予下村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在大藏省是一件大事,下村治因此而成为大藏省次长,后又成为于1960年出任首相的池田勇人的首席顾问。

下村治在论高速增长的论文中倡导的凯恩斯经济学,与当时正统的经济理论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如何增强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实力的问题上,后藤誉之助和都留重人都对下村治的判断持怀疑态度,并警告要注意经济周期的影响(Gotō Yonosuke, 1957; Tsuru Shigeto, 1959)。而下村治则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做了明确的界定(Shimomura, 1958),他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对市场波动作出反应的投资决定的,而经济增长则由企业家的创新性投资所支配。经济周期分析法假定,经济增长之后就是经济衰退;相反,经济增长分析法则预言,尽管存在短期波动,但经济会在长期中持续增长。正是出于这一理由,下村治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极其乐观,他相信,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240

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孰先孰后的哲学差异,是这次争论的主要焦点。下村治信服熊彼特的分析方法,提出经济增长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新会不断地制造出瓶颈,接着又打破瓶颈。因此,繁荣过后的衰退对经济没有威胁,可以置之不理。与其相反,后藤誉之助采用的是狭义的凯恩斯分析方法,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衰退时进行干预,他相信,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缩小经济波动的范围来达成(Kanamori, 1985)。关于政府的政策含义,后藤誉之助强调政府计划的必要性。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后藤相信经济是可控的,政府干预可以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而在深受亚当·斯密经济观点影响的大藏省中长期担任政府官员的下村治,则对经济采用“自然”分析方法,他极力反对由政府来控制人们的经济活动。由于下村治相信“经济的动态增长依赖于企业家的自由创造力”,所以他主张开放的环境,因为这种环境能激发人们的创造力(Sawa, 1984;

Shimomura, 1962:295)。

下村治的理论只是对日本经济的未来作出了一个预测,中山伊知郎(Nakayama Ichirō, 1959)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则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对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标做了进一步确定,从而支持了下村治的理论。中山伊知郎是生产率本部副会长,又是中央劳动审议会(Central Council of Labor)会长,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仲裁来改善劳资关系。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一篇题为《月薪倍增主张》的文章中谈过,日本经济的未来依赖于福利国家的建设,月薪倍增则是朝向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根据他的分析,由于日本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和出口都必须依赖于低生活水平。为提升生产力,企业不仅要寻求与劳工的合作,还应增加工资。由于月工资翻番计划的基础是提升生产力、积累资本、引进新技术并确保国际市场,因此它能使劳资双方实现共赢,应该成为日本未来的国策。

高速增长理论反映了现代主义对日本经济思想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理性主义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在西方社会科学中迅速蔓延(Sawa, 1984: 4-5, 62)。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一样,日本经济学家也信奉经济可以由人类理性控制。他们驾驭自己的想象,认为GNP的增长是人类福祉的唯一基础,梦想着无穷无尽的增长和进步。支持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信念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就是科技万能。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高增长政策强调的是GNP的增长,强调为经济增长而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这种强调却延迟了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如消费品价格的飞涨、土地价格的急剧增高以及环境污染(Masamura, 1974:31)。

政策制定的智囊团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日本经济学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老一辈经济学家如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稻叶秀三,风头不减当年;年轻一辈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在政府工作的经济学家如下村治、大来佐武郎和两角良彦,也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官厅经济学(*kanchō ekonomikusu*)作为日本经济思想中的一个独特流派出现在日本经济学界,这一流派改变了日本产业政策中的思想环境。从方法论上讲,官厅经济学的主张源于实证数据。按照金森久雄(Kanamori

Hasao, 1985)的说法,这种注重实际的方法大大影响了下村治。下村治总是及时从日本经济统计数据中发现问题。他对理论感兴趣,但寻求的是一种有助于解释现实的理论,只要理论架构与现实不相符合,他就改变那种理论,提出新的理论视角。在方法论方面,官厅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一种挑战。尽管当时日本大学中大多数经济学系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占主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应用却不熟悉。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只有约300名古典经济学家或新古典经济学家。按照佐和隆光(Sawa, 1984: 26)的说法,这300名经济学家中大多数人都在忙于学习过分依赖数学的理论,根本没有时间对日本经济开展实证研究。同时,“基于彻底的个人主义和定量分析方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理解西欧和北美可能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然而,对理解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却不过是熊彼特所谓的‘玩具枪’(toy gun)而已”(Schumpeter, 1984:14)。20世纪50年代,只有少许学者如中山伊知郎、都留重人和大川一司,在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日本经济的实证数据。20世纪50年代末期,新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演绎方法发起挑战,主张经济分析中实证数据的重要性。在1959年的日本理论经济学会年会上,东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小宫隆太郎做了一个有轰动效应的发言。根据自己在美国学习的体会,他指出:

多数日本经济学家将注意力放在对纯理论和数学模型的研究上,这一事实反映出日本经济学的落后。没有实证基础,实证科学根本不可能进步。为促进日本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中的多数人都应从事实证研究,解决实际问题(Komiya, [1959]1971:219)。

彼得·A·古勒维奇(Peter A. Gourevitch, 1989:87)曾经评论说,“理论要成为政策,必须与政治——即政策的变动——相联系。”与以前出现的情况一样,20世纪60年代,由于经济学家和主要政治家的关系,经济思想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渗透才得到有力支持。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日本政府官员拿到经济学学位,下村治和大来佐武郎是例外。下村治拿到博士学位后,引起了宏池会(Kōchikai)办公室主任田中郁夫(Tanaka Ikuo)的注意,宏池会是支持政治家池田勇人的联盟。池田勇人当时打算竞争首相之位,田中郁夫热衷于找到能够加强池田勇人政治地位的政策提案。出于这个原因,田中为池田组织了一个有7名成员的私人智囊团,这些人每周会晤一次,听取下村治关于高增长的宏论。

池田本人也是一名凯恩斯主义者,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下村治的观点。池田的政治生涯深受两个人的影响。在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吉田茂。池田是“‘吉田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Kobayashi, 1989:22)。吉田学校是一群从官员转身的政治家,这些人的政治生涯都受过吉田的恩泽。战后初期,许多战前党派政治家由于在战时与军方的关系,都被占领当局清洗出局。因此,吉田首相选拔了一批政府官员来填补这一空缺。后来,这些人成了所谓的保守主义主流。这批政治家全身心致力于吉田茂的宏大战略,主张经济重建是日本的重中之重,日本应该把所有财政资源集中于经济发展。与强调政治事务和意识形态的党派政治家相反,这批政府官员出身的政治家因为有极强的经济管理背景,他们主要关注经济事务。在经济事务上,池田受到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的石桥湛山的强烈影响。池田在战后初期就是大藏省官员,是时任大藏大臣的石桥湛山将他提为次长的。后来,池田当上了大藏大臣,并在第三届吉田内阁中参与执行“道奇路线”,他把道奇的通货紧缩政策(deflation policy)改成了反通货膨胀政策(disinflation policy),并发放了许多贷款以防企业倒闭。1955年,石桥出任首相,池田则担任大藏大臣一职。这两人致力于维持经济增长,一起提出了“千亿日元的公共支出和千亿日元的减税”政策。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在担任首相仅仅4个月后,石桥因为健康原因而辞职(Kobayashi, 1989)。

244

出于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因,池田支持下村治的高增长观点。1958年,作为自民党八大派中第二大派的领袖,池田想角逐首相一职,尽管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相对较弱。池田打算用经济政策作为主要武器参与自民党内的政治角逐。由于对下村治的高增长观点印象深刻,所以池田决定用这一提法来挑战在经济方面缺乏吸引人的政策建议的党派政治家。池田对下村治想法的支持表明,思想要对政策有所影响,必须得到政府内政治代言人的支持。思想只有在符合主要政治家的利益并得到政界领袖支持的条件下,才能有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主要政党的政策倾向是决定经济思想命运的关键因素。

在将高增长的理念转变为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具体政策建议的过程中,经济企划厅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大来佐武郎贡献甚大。与强调高增长可能性的下村治不同,大来佐武郎关注如何弥补日本经济二元结构的不足。大来佐武郎和他在经济企划厅的同事们预测了日本经济高增长的意义,比如改善基础设

施,促进贸易发展,开发人力资本,以及缩小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指出的那样,战后初期,在参与倾斜生产方式时,大来佐武郎就与御三家——有泽广巳、中山伊知郎和东畑精一——建立了紧密联系。他在负责起草政府长期经济计划时不断寻求御三家的启发。1958年,大来佐武郎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走访了20多个国家,就这些国家如何制定长期经济预测和政府计划进行调查。回国后,他受东畑精一所领导的长期预测分会(*Chōki tenbō bukai*)的启发,提出了国民收入计划。隶属于经济审议会(*keizai shingikai*)的这个分会,是反对现行日本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机构,有泽广巳和中山伊知郎也是这个分会的成员。大来佐武郎正式提交计划时,他与经济审议会的四个专门小组紧密合作:中山伊知郎领导的综合政策小组,山田雄三领导的经济计量小组,稻叶秀三领导的公共部门小组,以及高桥龟吉所领导的私营部门小组。共有2000多人参与了整个审议过程(Ōkita, 1981b)。

245

成为一等国家

当时,日本的负面自我形象(negative self-image)是高增长政策的主要障碍。对日本来说,经济增长并不新鲜,阿瑟·刘易斯开启的发展经济学已经被介绍到日本。然而,将高增长作为政府产业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对日本人来说还很陌生,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国家遵循这样的发展策略。20世纪50年代末期,日本仍然被视为经济落后国家。人们普遍认为,由于1948—1958年的年均增长率美国是3.0%,英国是2.4%,法国是5.8%,瑞典是3.5%,所以正常的日本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太高(Ōkita, 1959b:45; Shimomura, 1959b:188)。下村治对日本经济的看法遭到了强烈抵制,在政策讨论中,他几乎是孤军作战。将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的杰出表现视作经济重建结果的政府官员批评他,认为日本过于依赖美国;甚至认为日本已成为美国殖民地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批评他。因此,没有系统的制度改革,高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Masamura, 1985:168)。在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重整军备的辩论中,日本的负面形象又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而被强化。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日本经济对冷战体制的依赖,许多日本知识分子赞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一批评。这种依附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出现的理论极其相似,也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世界体系理论相似。这种主张对日本人如

246 何看待本国经济有着很深的影响：许多日本知识分子都有一种负面的自我形象，认为日本在经济上是落后的，日本经济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下村治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各不相同。根据美国和西欧的经济情况来对日本经济下结论是不合适的(Shimomura, 1959b:188-189)。小宫隆太郎也指出，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家对日本经济的理解，与现实相去甚远，知识分子已经被关于日本经济的悲观评价吓倒了，同时他们也低估了国际经济的发展(Komiya, 1960:6-7)。按照小宫隆太郎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已经使日本人看待经济的观点落伍了。他指出，高增长政策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肯定了日本正在经历的经济高增长的现实。

在更广泛的学术背景中，一种正在成长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帮助克服了对高增长政策的心理障碍。一群学者开始对日本经济的未来提出更为明朗的预测，表明了对自己国家日渐增长的信心。过去的负面自我形象受到了“马经”(Marukei)和“近经”(kinkei)两派学者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小野义彦承认，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强大了很多。他认为，尽管日本严重依赖美国，但这种依赖只是暂时的。日本的垄断资本为了自己的复苏，起初可能需要美国的援助，但是日本正力图通过强制性储蓄，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通过剥削工人阶级来赢得经济独立。一旦日本垄断资本重建了其国内基础，日本就能通过扩大对生产设备的大规模投资，通过提高竞争力而重新获得成为帝国主义的力量，日本与美国的冲突迟早会发生(Kojima, [1976]1978:71-72)。“近经”经济学家坂本二郎(Sakamoto Jirō)则从另一个角度探寻日本经济的国家地位。他认为，在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看来，产业化等同于西方化，他们的参照系要么是英美，要么是苏联。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是使用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来考察日本经济的现实，他们总是强调日本与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异，总是批评日本经济的落后。坂本二郎认为，尽管日本还不是一个先进国家(senshinkoku)，但也不是一个落后国家；就算日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消费水平仍然很低，但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水平(Sakamoto, 1954:24, 41)。

247 即使将西方经济作为参照系，大阪市立大学的历史学家梅棹忠夫(Umezao Tadao)还是对日本经济充满信心。不同于将日本的产业化看成是克服19世纪中叶国际压力之结果的传统观点，他认为，日本的工业化是日本独立发展过程的结

果。在这一独立发展过程中,日本社会积累起了足够的通向工业化的现代因素。即使西方列强在19世纪没有敲开日本的大门,日本也会因为内部因素自然而然地转向工业化。按照梅棹忠夫的说法,日本不仅有一个其亚洲邻邦所没有的与欧洲平行的历史,而且自19世纪以来,日本在平衡传统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冲突方面,做得比英法要好得多。20世纪50年代,在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日本和联邦德国在没有殖民统治的前提下获得了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站在历史的前沿,没有背任何历史包袱,面向着未来(Umezao, Takeyama, Hayashi and Suzugi, 1957)。坂本二郎和梅棹忠夫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经济重建10年之后,日本经济不再脆弱,因此,日本人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从“政治季节”到“经济季节”

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引发的政治危机之后,由自民党推动,政府的产业政策接受了高增长的提法,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经济重建是20世纪50年代初吉田茂为日本设定的首要战略,然而,这一战略却遭到了其他对立方案的有力挑战。吉田的继任者,尤其是鸠山一郎和岸信介,都将重心放在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上。岸信介重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努力,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自民党的政治倾向。《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反映的严重的国家分裂导致了安保运动(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的政治疲软。在这种情况下,池田勇人首相采取了一套新的战略,即利用高速增长将全民的注意力从政治上转移开去。

毫无疑问,经济利益也是扩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重要动机。由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的特别军购计划对日本资本积累和国际收支的贡献,自民党和商界领袖敏感地觉察到了日美之间的军事联系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1951年两国签署的最初条约没有包含经济关系在内,所以自民党打算将重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一个机会,向人们明确表示,可以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加强双边经济关系,以造福日本经济。正如自民党的议案所指出的那样,重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意图是,“阐明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关系”;《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应被看成是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开展更多合作的关键一步”(Jimintō, [1959]1966a:139)。“遵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先例,日美关系将不只限于安全,

还将扩展到政治上民主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以及经济上的大规模交流和相互依赖”(Jimintō, [1959]1966b:140)。

实际上,一部分人反对延长《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在这场争论中,有些社会学家指出,日本经济依附美国经济已经十余年了,在这期间,这种依附关系增加了垄断资本的利益,但却牺牲了人民的利益(Shakaitō undated; Tsuji, 1966:146)。大内兵卫、有泽广巳和都留重人依然继续从经济角度认识这一问题,并坚持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平运动中的立场。他们的看法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会进一步刺激日本的国防开支,其结果是,日本产业的重要部分将会转移到国防产业上,这将会限制日本人民在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和社会安全方面实际福利上的开支。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历史上经常见到的那样,在私营部门中建立国防产业会给日本产业注入危险的因素。因为利益集团特别偏爱国际紧张局势,这将进一步伤害经济(Heiwa Mondai Danwakai, [1959]1966年12月17日:144;参见Hein,1994)。

然而,关于扩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而且多数反对意见考虑的也是日本的政治独立。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一场重大危机。1960年1月16日,当岸信介首相赴美签订条约时,近700名激进的学生试图将他阻止在机场,但5000名警察赶来驱散了学生。1月19日条约签署。5月20日,自民党233名国会议员出席会议投了赞成票,这一数目刚好比国会467名成员的半数少了一名。所有有反对党背景的国会议员,都被警察奉岸信介首相之命从投票场所强行赶了出去。从那时开始,要求岸信介内阁辞职的反岸信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日本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后来,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被迫取消了访问日本的计划。尽管《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得以重新修订,但却使岸信介内阁倒台,自民党陷入危机。

安保运动之后,建立保守主义政党的政治联盟成了自民党政客的当务之急。新当选的首相池田勇人相信,动乱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对贫苦生活环境的失望,这种状况可以用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策来加以改善。按照他的助手大平正芳的说法(大平正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任首相),当日本最终从长期战争和战败后严重的物资匮乏中恢复过来时,人们开始有了精神渴望。他们不满于被视为战后占领遗产的保守政治,甚至排斥这种保守政治,他们的愤怒不是来自对保

守派遗产的反感,就是来自对保守派遗产的厌倦(Yoshimura, 1985:31)。在这种情况下,池田相信,对于自民党来说最明智的政治策略就是回到吉田原则,将国内的政治晴雨表从“政治季节”调到“经济季节”。他还决定利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来吸引大众。与此同时,他还采用了低调的政治口号——“宽容与耐心”。

250

采纳高速增长政策有效地将国民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了经济,这种转变对日本的发展主义具有深远影响。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政治的十年”(Nakamura, 1995b:4)。按照佐佐木(Sasaki, 1991:4)的说法,日本在这10年中面临十分艰难的国际局势,这种国际局势引发了人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意见冲突,这种冲突又使得国内政治形势很不稳定。相当多的保守主义者,包括主要人物鸠山一郎和岸信介,都坚持认为,“日本应当在占领当局监管下修订成文的宪法,发展一种更为独立的国家安全政策。”结果,经济议题受到了政治议题的冲击。安保运动失败之后,自民党的领导权从政治导向的岸信介内阁转到了经济导向的池田内阁。从那时起,日本摒弃了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孤行专断,转而致力于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日本人开始相信,《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尽管有种种缺点,但却有保持国家军事负担最小化的优点,因此它有益于经济增长。他们渐渐接受了国际秩序中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因素共存的局面,即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一个由关税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的国际经济。吉田原则制度化后,就不再是特定时点下的一种选择,而成了日本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政治季节”向“经济季节”的转变分化了进步力量,从而确保了对保守政治的支持。在池田内阁接受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之后,连社会党都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开始鼓吹结构性改革。这与他们以前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质的理论不同,此时他们主张,日本应该从“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20世纪60年代,社会党和共产党双方坚持的结构改革方案,都将重点放在日本资本主义的改良上,而不是将重点放在革命上。他们的主要目标已从美帝国主义转向了日本垄断资本。“生产关系的改良意味着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意味着劳工对管理事务的参与。其目的是控制垄断资本,通过限制利润、价格和投资的方法来改革工厂,通过工人的有效参与使各种经济制度民主化”(Shakaitō, [1961年1月1日] 1966:178)。社会党前委员长胜间田清一(Katsumata Seiichi)曾经承认,社会党对高增长时代的回应并不成熟,这是解释该党衰落的主要原因(引自 Nakamura,

251

1995b:55-56)。毕竟,20世纪60年代,基于吉田原则重建保守政治的两位自民党首相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都是前政府经济官员。通过强调经济优先,自民党迫使进步力量在一个他们并不具有专门技能的政策领域中进行竞争。中村正则等人指出,以保守政党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为特征的所谓1955年体制,在安保运动之前根本不能视为稳定的权力结构。只有在池田将国民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之后,进步力量遭到分化,自民党才成功地将自己的统治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Nakamura, 1995b:17-18)。

政治行动和官僚束缚

查默斯·约翰逊(Johnson, 1982)曾经评论道,由于日本政府的运作依赖于一组广泛认同的目标,一旦这些目标之间出现混乱或冲突,政府就会变得无力把握基本问题。采纳高速增长政策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高速增长政策遭到了政府官员和工商界的强烈反对,正是池田的强力领导,才改变了这些政治行为主体的看法,使高速增长的理念作为政府政策正式确定下来。

1958年12月27日,池田与其他两位大臣一道,辞去了岸信介内阁的政府大臣职位,以此来反对岸信介提交给国会的加强警察权力的提案。1959年1月,池田了解到中山伊知郎的月工资翻番计划后,决定采用这一计划,作为即将到来的6月参议院选举的政治口号。由于下村治关于高速增长的理论对一般大众过于抽象,所以池田借用中山伊知郎“月薪倍增”的通俗性说法来建立自己的政治联盟。1959年2月22日,他在家乡广岛的自民党地区性会议上就这一主题进行了首次公开演讲。一天之后,他又在大阪同关西地区工商界领袖的见面会上重复了这一说法。工商界领袖们的看法是,日本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蛋糕太小,所以日本人必须努力工作把蛋糕做大。工会则提出,在蛋糕做大之前,应该先决定如何更平等地切分这块蛋糕。池田关于月薪倍增的建议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要通过改变切分蛋糕的方式使蛋糕增大。

与池田的预期相反,他的新提案没有找到支持者,却引来了工商界和劳工的诸多批评。工商界领袖的意见是,日本经济的命运取决于制造业和贸易;有效需求只能靠出口来创造;为了改善国际收支,日本必须推动出口、减少成本、积累资本并实行工资管制。池田通过增加工资来创造国内需求的提案,将重心放到了国

内市场上,错估了出口对日本经济的重大意义,忽视出口的经济增长战略无法让人接受。从原则上讲,工会并不反对“月薪倍增”的想法,并认为,相对于日本政府现行的依赖于廉价劳动力政策来促进出口的做法,池田的提议是一个进步。然而,他们认为“月薪倍增”计划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也不大可能实现。颁布一个最低工资法,建立一种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民养老金制度,则是更为现实的政策措施(Tanaka, 1959)。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赢得工商界领袖对自己高速增长政策的支持,池田决定做出妥协。1959年3月9日,他在《日本经济新闻》(*Nihon Keizai Shimbu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在文章中巧妙地转变了立场。他在文中写道,他无意马上实施“月薪倍增”计划,相反,“月薪倍增”是提升生产力、增加GNP和国民收入的自然结果。同时,他再次声称,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未来会受到有效需求短缺的制约,所以政府应当增加公共支出来维持增长(Ikeda, 1959)。池田的这一新的提法与他在2月演说中的提法不同。由于与工商界的提法一致,在政策讨论中池田的高增长提案开始获得了支持(Tanaka, 1959)。

253

池田的提案改变了日本政治中的关注点。1959年5月,岸信介决定接受池田的提案,并将之作为6月参议院选举时自民党的提案。他宣称,政府将着手制定一个长期经济计划来使日本经济规模翻一番。1959年11月,岸信介要求日本政府的主要顾问机构经济委员会构思一份计划。经济委员会设立了4个部门和17个小组,拥有2000多名学者、企业领袖和工会代表及相关政府官员。经济企划厅负责为国会综合事务办公室起草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然而,岸信介的这一举动并未能挽救他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延期后的政治生涯。对高速增长政策的强力支持使池田赢得了自民党内部的竞争。1960年7月,池田出任首相。工商界领袖喜欢池田用积极财政支出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想法,他们捐出大笔金钱以确保池田在竞选中获胜。有调查显示,池田内阁获得了51%的公众支持率,这是战后日本政治中的最高支持率之一,仅次于签订《旧金山和平条约》后吉田内阁所获得的支持率。

然而,在日本政府官员中,高速增长政策的执行仍然面临很大的阻力。在政府经济部门中,通产省是池田的主要支持者。通产省官员认为,由于日本不得不放开贸易,日本企业会在国内市场面临外国企业的极大挑战。为了迎接挑战,通

产省官员急于升级日本的产业结构。反对下村治高速增长政策的两家主要政府机构是大藏省和经济企划厅。下村治为日本经济设定的年增长率为11%，高于经济企划厅预测的7.2%。大藏省尤其是企划局，在平衡政府预算方面有一个极强的被制度化了的信念。“该局倾向于一个与居家理财相似的原则（personalized principle of finance），即量入为出原则。他们全力支持社会公正，避免从税收获取的公共财政的任何浪费。”大藏省则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断反对国民所得倍增计划（Itō Daiichi, 1967）。

池田成为首相之后，大藏省慢慢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原因是，池田有足够的资源引诱大藏省的官员改变自己的想法。池田本人在大藏省工作过27年，一直做到大藏次官，这是日本政府的职业官僚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池田在成为政治家后，还两次出任大藏大臣，因此，池田在大藏省有很庞大的私人网络。这个关系网不仅在大藏省官员的提升方面有很强的影响力，而且在这些官员离开大藏省后的职业安排上也能发挥作用。在日本，如果一位官员不能与他同时参加工作的同事一起升职，他最终一定会离开政府机构。每个省都会照顾自己的“老家伙”（old boys），为这些人在本省的外围组织或私营部门中寻找职位。许多官员在离开政府部门后立刻成为大企业的CEO。就社会地位、经济福利而言，离开政府机构后的生活对日本官员十分重要。因此，池田的影响力给了对手无形的压力，即使在他不再担任大藏大臣之后还是这样。大藏省官员们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来改变他们对国民所得倍增计划的态度。他们对池田的高速增长政策的态度已经从纯经济政策判断转向政治判断（Itō Daiichi, 1967）。

经济企划厅的任务是负责起草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但该机构却支持7.2%年增长率的稳定增长。经济企划厅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由于经济企划厅动用了2000多人参与起草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对EPA的支持不仅来自主流经济学家，还来自商界领袖、工会和大众媒体。下村治则相信，一旦将低增长率设为政府政策目标，高增长率就会受到约束：因为只要真实增长率超过计划增长率，政府就会采用紧缩货币政策，因此，7.2%的增长率会伤害经济（Shimomura, 1981a:84）。尽管池田更倾向于下村治的预见，但他也知道，经济企划厅的观点更容易被大多数日本人，即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所接受。当他的经济信念与他的政治考虑形成对立时，当他利用高速增长重建政治联盟的需要与他稳定大众情感的需要相背离

时,池田决定再来一次妥协。池田没有选择 11% 的年增长率,而是将下村治的 11% 和经济企划厅的 7.2% 做了个折中,选择 9% 作为以后三年的增长目标。池田相信,9% 的增长率足以宣扬自己的高速增长政策了。同时,这也有助于他更容易地改变政府机构内的结构性束缚。而经济企划厅在官僚政治斗争这一大背景下的微妙地位,也使池田最终能够改变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经济企划厅的职员都是从各个机构调过来的官员,日本政府官员体制中有一种临时调动机制,靠着这一机制,每个省都将自己的官员临时调到别的省工作一阵。个人临时调动所取得的职位,取决于他原来所属的省在政府官员系列中的相对势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经济企划厅的许多主要职位都处在通产省控制之下。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经济企划厅都没有产生过自己的次官。经济企划厅因此得了个绰号:通产省的“办事处”。经济企划厅的官员们一直试图依靠自己在经济知识方面的“文化资本”和使用定量分析法制定长期政府计划的技能,在政府官员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因此,经济企划厅不会反对池田提出的 9% 的增长率,因为接受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就会为增强他们的地位提供重要机会。如果经济企划厅顽固地反对这一计划,必然会牺牲自己的利益(Itō Daiichi, 1967)。

高速增长与稳定增长

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显示出极强的生产导向。生产导向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日本发展主义的主要特征。下村治强调要用创造有效需求的方式来提高生产率,他认为生产率的增长会有利于提升经济福利并改善生活水平。在下村治的逻辑中,分析单位就是整体国民经济,他关心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某一社会阶级的利益。与此相应,他强调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他相信,讨论如何达到充分就业、如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及如何增加社会福利,比讨论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分配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利益,要更加容易,也更有意义(Shimomura, Yamamoto, Imai and Aoba, 1960:60)。

256

下村治的高速增长观点不仅反映了当时风靡全球的理性主义,也反映了生产导向的战时遗产。20 世纪 60 年代,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日本的经济思想也关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人们认为,人类能够控制诸如生产率、国际收支和价格这些经济变量,经济增长最终会有助于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许多政府

官员和他们的经济顾问都过分相信宏观经济政策,期望经济增长会给大多数日本人民带来最大福祉(Sawa, 1984)。与战时经济思想相仿,20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政策摒弃了其他考虑:只专注于提高国家生产力,专注于组织所有国家资源来达成这一目的。这显然是战时生产优先政策遗产的延伸。

出于这些原因,下村治的高速增长理论受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长洲一二(Nagasu Kazuji)认为,在高速增长范式中,“(目前政府正在)动员组织一切资源以实现9%的增长率,整个国民经济正在不计成本地被纳入为9%服务的框架。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从这个事先想出来的9%开始,以此来决定其他经济指标,这是非常危险的”(Arisawa, Minobe, Nagasu, Itō and Miyazaki, 1960:26)。批评家们的主要考虑是经济稳定和平等。经济企划厅一直将稳定增长作为与下村治高速增长理论竞争的口号。尽管大来佐武郎以对日本经济潜力的信心而闻名,也支持政府用积极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但他还是担心增长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如果政府采用积极政策来维持经济增长,就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试图控制通货膨胀,增长就会放缓,失业则会成为问题。政府政策如果太过激进,创造出经济吸收不了的过度增长,在经济繁荣之后将会出现强烈的负面影响,许多中小企业将会消失,社会压力将会增加。基于这些考虑,大来佐武郎建议日本政府支持“无波动的稳定经济增长”(Ōkita, 1959b: 46-47)。与此相应,大来佐武郎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将增长率设为7.2%,这是一个远比下村治的11%更为温和的数字。都留重人也支持大来佐武郎的立场,他认为,为了减少由不稳定增长造成的社会冲突,通过政策措施来控制经济波动对日本政府至为重要。

平等是另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知识分子都直接质疑资本主义制度架构内经济增长的本质。有泽广巳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二元结构问题,仍然是60年代高速增长政策争论中的主要问题。伊东光晴认为,高速增长会进一步制造不平等。因为高速增长会给现代产业部门带来高利润和高工资,但在前现代产业部门中将仍然是低利润和低工资(Arisawa, Minobe, Nagasu, Itō and Miyazaki, 1960:26)。有泽广巳也指出,劳动力从前现代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也会产生问题。年轻的大学生进入任何新兴产业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实行年功序列制,中年工人要进入新的就业市场就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会快速增长,但某些社会群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会落在后面(Arisawa, Minobe, Nagasu, Itō and Miyazaki, 1960)。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心平等问题。为刺激和保持高速增长,日本政府应工商界领袖的要求决定减税1 000亿日元。一些经济学家指出,这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并不公平。小宫隆太郎(Komiya, 1960:10)声称,只有1/4到1/3的日本人能从减税中获益。他指出,政府与其减税,不如改善社会保障和公共部门(Imai in Shimomura *et al.*, 1960:62)。小宫隆太郎甚至相信,高增长政策会创造有利于大企业的环境,但是日本的后发展部门——农业和前现代部门都会受到伤害。由于日本的反垄断政策远远谈不上适当,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很有可能被拉大(Komiya, 1960:11)。

258

以江田观点(Eta vision)为代表,重视结构改革的进步势力视经济福利的平等分配为主要问题。1962年7月,社会党总书记江田三郎提出了高速增长时代社会主义运动未来方向的新思想。江田认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主要成就就是美国的高生活水平、苏联的完整的社会福利体系、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日本的和平宪法。因此,社会党应当对政策进行综合评判,融合所有因素来达成日本的社会主义(Kojima, [1976]1978:84)。20年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高桥正雄(Takahashi Masao, 1981:87)指出,保守派和激进派都没有意识到高速增长对日本社会的“有害影响”的可能性。高速增长不仅造成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而且还造成了以环境污染为特征的“日本病”,以及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和乡村人口过分稀少的局面。更有甚者,1961年和1963年间,消费品价格以年均6.5%的速度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居住环境不断恶化,工业污染正成为主要问题。在这些情况下,企业面临来自大众的强烈批评。

高速增长政策促进了日本产业政策中的GNP导向。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时代,增加GNP一直是日本的首要优先任务。尽管下村治在这一问题上的最初立场并没有这么极端,但他的想法制造出的社会氛围却自发地成为一种动力。正是这一动力维持、扩展、强化并再生出了GNP导向(Masamura, 1974:42)。

发行公债

50年代后期与高速增长理论的争斗中败北的稳定增长理论,在20世纪60年

259 代开始吸引了大众的支持。高速增长政策开始遭到强烈的批评。1964年底,佐藤荣作就任总理大臣之后,决定从高速增长政策转向稳定增长政策。但是,这种转向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1965年3月,三洋特殊钢厂因负债500亿日元而宣告破产。同年5月,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也濒临破产,投资者纷纷取消合同。这一事件深深撼动了日本的金融制度。大藏大臣田中角荣召开了一次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日本银行将向私营企业提供特别贷款。这是自1923年大地震和1927年金融危机以来,20世纪日本银行第三次向私营企业贷款(Nakamura, 1995b:54)。

同时,日本还展开了一场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发行国债的热烈讨论。自从实施道奇计划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奉行预算平衡政策。但在这场衰退的压力之下,工商界主张政府应削减税收,发行公债,以调节经济形势。小松制作所会长河合良成(Kawai Yoshinari)则认为,企业资金过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无法积累资本,贷款持续增加的原因是政府对私营企业课税太重。现在,政府应当用削减未来要征收的税额,将过多收缴的税钱返还给企业。同时,政府还应发行国债来满足公共支出的需求(Hayashi, 1965)。

1965年6月,佐藤荣作重组内阁之后,福田越夫当上了大藏大臣。之前,福田越夫一直主张稳定增长理论,但这次却改变了立场。受高桥是清发放国债应付大萧条实践的启发,福田提出,发行国债不仅能弥补银行的过度放贷和企业的过度借贷,还能增加公共支出来改善基础设施。由于私营企业和居民都没有太多的钱,所以新的建设项目、道路和港口都必须依靠政府融资。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不得不削减税收。但结果却是,国内收入不足以支持大的项目,因此政府不得不发行国债(Nakamura, 1995b:54)。

260 下村治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发行国债(Shimomura, [1965]1971:476-478)。他认为,平衡的预算代表的是一种静态观点。按照这一观点,均衡一旦被打破,政府就应实施政策措施使经济回归最初的均衡。一旦国际收支失衡,政府就应通过抑制国内的需求、生产和投资来减少进口。这种政策或许适合那种没有增长的经济,因为这种经济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它最终会回到失衡之前的状态。但是,从日本的情况来看,经济正在动态地快速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一旦国际收支失衡,政

府就不应当减少进口、抑制国内需求,或是削减生产,而应该通过增加出口来平衡进口。通过升级产业结构,日本可以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创造出口。下村治还指出,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政府必须降低利率,削减税收,并发行国债。

最终,日本政府通过1965年普通账户的补充预算发行了2600亿日元的国债,又通过1966年的预算发行了7400亿日元的建设债券来维持经济增长。1965—1970年,通过公共支出的刺激,生产设备的私人投资也以平均21.1%的速度增长。

三池纠纷及后果

20世纪60年代,劳资间的争议也获得了解决。在这一问题上,1960年的三池纠纷是个转折点,在这一纠纷过程中,所有主要的参与者——政府、自民党、保守的工商界领袖及工会,都转变了自己在劳资关系和生产率运动中的立场。这一转变,为日本管理的制度化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池纠纷发生在1960年,是保守派对日本产业从以煤为基础的能源结构转向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结构的反应。当时,三井株式会社打算解雇三池煤矿的6000名工人。这只是大规模解雇的第一步,据估计,整个煤矿业要解雇11万名工人。第一批解雇获得了政府和企业界的大力支持。工会因为得到全国范围的支持,所以奋力反对这一行为,并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当时,这一冲突被称为“劳资双方的总决战”。在历时313天的罢工之后,三池纠纷以工会的失败而告终。正如中村正则所指出的那样,“三池纠纷标志着战后日本冲突型劳工运动的终结”。从那时起,多数工会改变了策略,成了生产率运动的支持者。

尽管政府与资方在这场纠纷中获胜,但他们还是对这一事件的规模及其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感到震惊。保守的自民党过去一直采用亲企业政策(pro-business policy),将劳资纠纷视作公共安全事务来对待。三池纠纷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将夕阳产业中的劳工待遇问题看成是直接关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在劳动省大臣石田广卫与三井总裁协商解决办法时,所有应邀到场的重要工商界领袖都表达了他们对劳资关系的忧虑。1963年,石田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保守派的当务之急是通过采纳劳工宪章而将政策转移到保护雇员利益上来。”作为自民党全国组织委员会主席,石田认为,自民党应该“在涉及劳资关系的

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应该通过调解对立利益来集中体现国家的利益”(Rekishū Kenkyūkai, 1990:13-14)。

1963年,在日本的劳动市场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需求超过供给的现象。从那时起,劳动力短缺成了主要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工人的起点工资以年均超过13%的速度在增长,与1954—1958年低于5%的平均增长率形成了对比。在这种环境下,日本大企业引入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就不仅仅是一种在企业与劳工之间分配经济福利的方式,而成了保存熟练工人的必要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领袖也改变了自己在劳资关系上的观点。1963年日本雇主联合会(Japan Federation of Employers Association)全国大会提出的决议指出:

262

在战后过去的18年中,劳资双方共同经历了阶级冲突、政治斗争,以及对工会的偏见给劳资关系问题和社会秩序带来的混乱……为了履行促进稳定和提高社会福利的使命,我们必须坦诚地重新审视我们已经犯下的过错。劳资双方都应当认识到民主和独立的价值,并承担各自的责任。为了满足时代的需求,我们应当互相协作,寻求劳资之间的和平、企业的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Nikeiren, [1963]1966a:461)。

就在这次大会上,日经联副理事长在主题发言中特别谈到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他认为,只有两条途径能为劳资双方带来和平。一条途径是长期的、稳定的工资政策,另一条途径是企业内部劳资双方保持沟通。他还指出:

在日本,我们已经有了终身雇佣制的实践,也有了辅助终身雇佣制的年功序列制。当然,这两种做法都有一些缺点,但这两种做法是在日本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这是一个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日本的传统。日本的终身雇佣制与欧洲和北美实施的短期合同制全然不同。在终身雇佣制背后,存在着日本企业长期形成的习惯或风格,这是无法用金钱或经济力量分割出去的东西。未来的重要问题是如何使用具有现代风格的以贡献为基础的补贴(service-based allowance),来平衡、安排与组合以终身雇佣为基础的年功序列制的方式、美德和优点。谈到日本式管理,我们必须设计出一种日本式的工资制度和雇佣制度(Nikeiren, [1963]1966b:462)。

正如一位通产省官员指出的那样,生产率运动已经具有了渗入企业日常运营并引导大众参与创新的力量。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引入是生产率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展示出一个广阔视野:生产率运动涉及的不仅仅是企业的利益,也包括劳工的利益(Nihon Seisensei Honbu, 1985:124)。在生产率运动中,抵制股东利润的战时意识形态,以主张雇员主权的一种新型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形式复活了。这一意识形态被日本大公司的资方以制度化方式保持了下来。为刺激工人参与技术创新,占劳动力30%的日本大企业员工获得了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薪金。组织起来的劳动者迫使日本企业的资方重新审视自己的原则,使他们逐渐相信,企业的利益不在于短期利润,而应该是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就算企业在与劳工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胜利,但其所获仍然小于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方必须“遵循新的管理智慧,去除受追逐利润的本能驱动的旧式资本主义的专制”(Nihon Seisensei Honbu, 1985:35)。这种新的智慧主张,经理人必须独立于股东拥有自主权,“资本的专制”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企业的社会功能、社会任务和社会责任应该强化,管理层应当超越自我中心的管理方式,承认劳动是企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对人的尊重。

263

自由化的压力

20世纪60年代,日本发展主义的演进不仅受到高速增长、从国际政治向国内经济的转变以及劳资关系的确立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更为重要的是,还受到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投资自由化的挑战的推动。

到20世纪50年代末,经济自由化已经成了主要工业化国家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战后初期,由于经济形势的动荡和美元短缺,西欧诸国和日本都对进口和外汇施加了许多限制。这种措施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14条款所允许的。自由化过程始于1949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的协议,经合组织是为执行欧洲战后经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而设立的。协议旨在建立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收支体系,消除贸易限制,建立统一的欧洲市场。协议要求经合组织成员国负责在1959年6月底至少使欧洲贸易的90%实现自由化。1955年,这一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但是,美元区的贸易自由化就慢了许多。联邦德国、瑞士等本币汇率兑美元

264

走强的国家先行了一步,但那些本币弱势或美元短缺的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直到1958年底才达到联邦德国和瑞士的水平。在美国的压力下,西欧各国开始恢复本币的可兑换性,并在20世纪50年代末取消了对进口美国产品的限制。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第8条款国地位,该条款禁止任何为平衡国际收支而对外汇施加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末,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框架在国际经济中开始出现。

1959年年中,日本在自由化问题上变成西方国家批评的对象。首相岸信介为重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要求日本实现贸易自由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年会上,美国代表猛烈批评日本对进口的限制。

这种局面在日本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在涉及经济政策的国内讨论中,代表国际派观点的国际金融权威堀江熏雄(Horie Shigeto)认为,日本必须跟上自己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由于日本对贸易的依赖性极强,它担负不起落后的成本。西欧主要工业国家已经获得了第8条款国地位,日本迟早都必须这样做(Imai, 1977:170-171;参见Johnson, 1982:250)。按照堀江的理解,一种新的国际经济体制正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而制度化,这是一套依靠非歧视性政策和多边自由贸易来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制度。堀江相信(Horie, 1967),由于西欧货币的可兑换性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国际市场,比如“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国际经济会出现深刻的变化。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长期繁荣。堀江借用历史论证说,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由20年代许多国家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造成的。战后初期,这些国家又把国内就业和经济增长放在首要位置,所以继续采取控制外汇政策。尽管这些政策有助于经济重建,但也限制了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效益。由于日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群体,日本必须承担维持自由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繁荣的责任。

265

小宫隆太郎为《日本经济新闻》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一个自由而有竞争的市场机制必须靠其自身平缓运行,并能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日本参与贸易与外汇的自由化可以提高日本企业的效益,并有益于日本人民(Komiya, 1986)。小宫隆太郎代表了战后在美国研究过新古典经济学的新一代经济学家。他建议,为了弄清自由化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必须死抠诸如福利

经济学、最优关税理论与次优理论等经济学原则(Komiya, [1959]1971:222)。

堀江和小宫隆太郎支持自由化的立场与时任通产省大臣、不久即成为首相的池田勇人相同。池田勇人相信,堀江把握住了国际趋势,日本必须尽快对这一新的形势做出反应(Johnson, 1982:250)。当时,池田放开贸易的努力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年轻的官员们认为,自由化意味着自己饭碗不保。而各个政府机关的资深官员担心自己行业的结构性弱点,政客们则担心面临的选举”(Johnson, 1982:251)。池田运用自己作为通产省大臣的权力,成功地说服了通产省的官员们,使日本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国地位(Johnson, 1982)。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池田也为自己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动员通产省官员支持自己的高速增长政策,并让他们相信,高速增长是日本抵消自由化后果的唯一途径(Tanaka, 1959)。

尽管有许多利益集团的焦虑、批评和反对,日本政府在池田的领导下,还是决定从1960年起开始放开贸易。1960年6月,日本政府公布了《贸易、外汇自由化计划大纲》(Outline of the Plan for th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and Foreign Currency Exchange)。该文件提出,自由化能“减少由现行管制造成的无效率和非理性,增加海外市场廉价物资的来源,降低生产成本,规范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理性行为,改善生活水平,提高总体经济的利益”(Arisawa and Inaba, 1966:370)。根据这一计划,日本将在三年内放开80%的贸易领域;如果再将煤炭和石油包括进去的话,这一比例将达到90%。1964年,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的压力,日本又放开了对外汇的限制。

266

政企合作与独立调整

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末道奇计划实施之后,日本经济再次与国际市场接轨,但由于50年代日本国内市场受到高度保护,日本企业只在海外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竞争。由于自由化会为日本经济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成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产业政策的关键。在有关新产业体制的讨论中,政企合作和私营部门独立调整这两派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发展主义关于有组织的竞争这一意识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

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建立新型产业体制的必要性,首次从两个方面正式提

267

出。第一,由于日本经济正向重化工业迈进,产业秩序必须进一步合理化。第二,贸易自由化之后,日本企业一定面临与外国企业的竞争,日本企业在日本国内市场上确立支配性份额一定会面临困难。在这种条件下,诸如竞争和垄断这样的传统概念,值得重新思考,而且日本的战略也必须将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作为先决条件。为了采用最新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追求经济规模,日本企业不仅要扩大规模,还需要一种新的产业体制作为强化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基础。

对于通产省的官员们来说,自由化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竞争,新的产业体制应该以政企合作为基础。企业局第一产业课课长两角良彦认为,在任何主要工业国家的历史上,传统的自由放任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那只是一种子虚乌有的经济原则。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试图通过自由竞争来增强经济,只会浪费时间并引起许多摩擦。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化,日本无法等待如此缓慢的过程。在日本被迫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等待会迫使日本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日本经济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在新的产业体制中,政府的功能不能只限于许可证的管理和配额的确定,政府也应该在财政、货币和管理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Morozumi, 1962a:12)。

268

1961年10月,通产省设立了产业结构调查委员会(ICIS),由通产省前次长、现任八幡制铁株式会社总裁的小岛精一领衔。调查委员会由通产省官房产业结构调查课监管,委员会下设的机构则按各自的行政范围由各局直接管理。1961年12月,产业体制分会成立,有泽广巳担任会长。产业体制分会的任务是与通产省企业局的第一产业课一起,起草《促进指定产业的特别措施》(*tokutei sangyō shinkō rinji sōchihō*),为政企合作制定计划。与日本其他的一些为政府政策建议赋予象征性权威的委员会或理事会不同,产业体制分会的作用非常重要。如鹤田俊彦指出的那样,这个分会不仅包括了当时的企业家代表,甚至还包括日本经团联主席(Tsuruta, 1984:63-65)。

过度竞争、规模经济以及国际收支瓶颈是通产省官员着重考虑的三个重点。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过度竞争已经导致了成本的不必要增加和资源的浪费。过度竞争不仅以广告的形式、折扣的形式和降价的形式出现在销售之中,还出现在生产设备投资和技术转移中。过度竞争经常在经济领域中引发混乱。日本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显示出经济规模的不足。在二元结构中,大量的中小企业不仅在国

内市场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表现出无效率,而且在重化工业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也表现出无效率。迄今为止,这些企业的生存极大地依赖于贴近日本市场,依赖于低工资和与金融机构的亲密关系。然而,在自由化过程中,他们会面对来自外国企业的巨大挑战。国际收支瓶颈已经在日本经济中引起了剧烈的动荡,而且还常常影响到日本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政府必须在新产业体制中扮演领导角色。通产省官员反复强调,政府与私营部门间的合作要以意见相互一致为基础,政府官员的参与不会是命令式的。他们指出,合作的目的是维持一种没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没有直接管制的秩序,追求的是不依赖于极权主义的共同目标(Morozumi, 1962a:17)。

政府合作提案有两个思想来源。其中一个战时遗产。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说,企业局局长佐桥滋就将新的产业体制设想成是对战时国家总动员实践的直接继承。有泽广巳也在新产业政策的设计中,将管制经济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许多人都担心战时体制对新产业体制的影响。年轻的通产省官员天谷直弘指出:

现在的产业体制必须追溯到1935年。什么是战时体系?战时体系是对价格机制的完全否定,是一种集权的管制经济……这种体制是在战时完成的,在战后又遗留了下来。尽管盟军最高统帅将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带到了日本,之所以允许这种体制经过组织调整后替代军事体制而继续存在,是因为在现实中千万人会因为食物短缺而死去。正是因为这一原因,管制经济的主要成分被保留了下来。朝鲜战争期间,随着日本经济和私营企业实力的积累,出现了使自由经济意识形态付诸经济实践的运动。1952年,管制经济被废除……只有对外汇和贸易的官方控制被保留下来。然而,从那时起,日本经济就既不是自由经济,也不是管制经济,而是一种折中模式。因此,就算企业界尤其是日本经团联主张自由经济的意识形态,他们也仍然会将政府管制看成为离不开的魔鬼。在通产省,有些过于官僚的官员认为,自由经济是有害的……[他们]甚至抱有日本应通过外汇配额制度来继续管制经济的极端观点,认为自由经济只能在政府计划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接受……在自由化过程中,支

撑经济秩序的基础将会消失：如何寻找新的秩序也是一个大问题……新的产业秩序不应当[基于]传统的政府管制，也不应当基于经团联所主张的乐观的自我放任原则，而应当基于第三种立场（Amaya, Komiya and Sakamoto, 1962:71-72）。

与战时遗产相比较，两角良彦认为应将欧洲混合经济的经验作为模型。两角良彦在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工作过三年半，在法期间，他重点研究了法国式混合经济中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两角良彦认为，法国的政府计划非常独特，它既不是简单的经济预测，又不是社会主义的；相反，法国的计划是一种混合物，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意愿与私营部门判断的混合物。这一混合物将秩序与自由结合到了一起。通过讨论、信息交换和对经济前景的展望，制定这样一种计划的过程在国民经济层次上为政企间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在这一过程中所达成的协议是基于双方的一致性。私营企业会自愿按照这一协议活动，同时，政府会通过税收和财政信贷提供各种优惠来支持他们的活动。换句话说，从私营企业的角度看，协议是联系企业活动和公共目的的自愿保证；从政府的角度看，协议是为私人利益提供有利环境的公共合同。一种动态的相互妥协（give-and-take）的关系会在双方达成一致目标的过程中出现，更进一步说，这一目标通常会从整体国民经济的角度进行设计（Morozumi, 1962b:61）。

尽管多数日本企业领袖都承认贸易与外汇的自由化是必要的，尽管他们也赞成通产省基于自由化而提出的组织市场的必要性，他们还是极力主张独立调整，以防止战时政府管制的复活。

私营部门认为，日本经济是由具有一定规模经济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脆弱得无法与外国企业竞争的产业所共同组成的。私营部门并不反对通产省在汽车和石化产业中建立合作体制的愿望，因为这些产业需要资本积累，需要提高生产力以迎接国际挑战。然而，私营部门强烈反对通产省基于政府指导的覆盖整个经济的产业体制提案，其原因在于，通产省所谓的集体目标或国家利益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们只有在泛泛地讨论日本竞争力时才能被人接受，而一旦讨论适当的规模和生产形式这类具体问题时，就会出现许多冲突。日本经团联认为，通产省为这一合作体系的双方给定的平等地位有些自相矛盾。政企合作的提法本身，就是基于独立调整不起作用的假设。如果通产省相信独立调整不起作用，它将会把

自己当成是这一体制的最终权威。因此,一旦与政府有联系,不论这一体制最初采取什么形式,最终都会成为政府管制。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就像管制经济所揭示的那样,将会导致更多的政府管制,所有的产业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Keizai Dantai Rengōkai, 1978)。

271

企业领袖反对通产省的政企合作提议,他们将私营部门的独立调整视为在日本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竞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建议日本企业应当通过合并和并购来减少过度竞争、增加规模经济。他们也要求修订反垄断法。根据日本经团联事务局长堀越禎三的说法(Horikoshi, 1962),日本的反垄断法使卡特尔在一个存在着无数中小企业亟待整合的国家里听起来像一个魔鬼。反垄断法已经导致了过度竞争,为了改变这一情况,日本必须对反垄断法进行全面修订,选择一个全新的指导方针。按照经团联的提议,独立调整意味着没有政府管制的企业活动的自治,意味着私营企业在没有反垄断法的限制下有权组织他们偏好的模式,比如兼并、卡特尔和谈合[内部人交易]。日本经团联副会长小藤陆藏(Kotō Rikuzō, 1960)认为,日本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反垄断法”。即使经过1949年和1953年的两度修订,日本的反垄断法仍然比欧洲国家的反垄断法严厉。日本反垄断法的设计是为了禁止通过限制竞争来干扰公共利益和危害消费者的行为,一旦放开了贸易和外汇管制,这些担心就都没有必要了。在一个封闭的市场中,就算卡特尔和兼并不与公众利益相悖,担心卡特尔和兼并会限制竞争也至少是合理的。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中,就算国内生产商和交易商组成了卡特尔,也不会出现对竞争的实际限制,因为外国企业总让人感到很强的竞争压力。小藤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要修订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应该在衰退期间放松对卡特尔的要求,允许防止过度竞争的联合行为,扩大合理卡特尔的范围,允许为促进出口而成立卡特尔,放开对相互持股和经理互换的限制,放松对兼并的管制并允许控股公司的存在。

关于促进指定产业特别措施法的斗争

272

1962年8月,有泽广巳领导的产业体制分会开始在企业局建议的基础上起草《特振法》。1963年3月,法案交到国会。这一法案将特殊钢、汽车和石化产业认定为特殊产业,同时也为指定其他产业为特殊产业留下了空间。按照这一提案,一旦某一行业被认定为特殊行业,通产省大臣、相关产业行会以及为这一产业融

资的银行,就会为这类产业的规模、专业化、适度的生产设备投资、设备的有效使用、一般行为、兼并以及企业方向的改变,做出发展指南(大藏大臣也会参与关于税收和财务的讨论)。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也参考这些指南。政府金融机构会保障这些产业的信贷。政府会减免特殊产业的公司税和注册费。另外,这些企业还可以获得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许可,在产品品种、生产方式、产品质量、生产设备、零件购买、生产设施、仓储和运输,以及因经营方向的改变导致的财务调整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获得反垄断法的法外豁免。在决定是否对这些产业实施反垄断法的时候,公平贸易委员会也会征求通产省大臣的意见(Miyasaka, Kaneko and Takahashi, 1979:175-178)。然而,国会却没有对《特振法》进行讨论,而是将之搁置一旁。通产省后来又两次提交了法案,但由于自民党、反对党、私营部门以及通产省在政府各部门中竞争对手的反对,这一法案没能获得通过。

273

经团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反映出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如果独立调整不起作用,它也希望政府能参与到调整过程之中。另一方面,它也担心政府的强势介入会增强政府的官僚控制,这又会终止私营部门在经营活动中的自由。此外,工商界领袖对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信心越来越足,因为生产设备和技術转移方面的大量投资已经大大强化了日本产业。虽然自由化会对汽车、石化产品及特殊钢等产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但在总体上日本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即私营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竞争。因此,经团联企图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放松反垄断法。经团联倾向于在没有更多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有更多组织卡特尔和引导兼并的自由,以防备政府官员削减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的权力(Sahashi, 1977)。为使私营部门免受政府的控制,经团联也要求为新产业体制立法。他们希望法律能够明示政府干预的界限(Tsūsanshō, 1990b, vol. 10:64)。

通产省支持经团联放松反垄断法的初衷,但不希望他们对反垄断法进行全盘修改。由于1958年修订反垄断法的失败,通产省的官员们相信,通过这种修订来推行新的产业体制太过冒险,根本行不通,因为经团联的提案遭到了学术界和大众的强烈批评。他们倾向于用豁免法来绕过反垄断法。通产省不仅愿意在自由化过程中冒丧失自身影响力的风险,而且要为国际竞争动员国家资源。通产省为了升级日本企业的规模经济、消除过度竞争而支持大企业,但与此同时,它又试图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捆绑在一起,以动员更多的资源,维持就业并减少破产。为

新产业体制立法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个是由通产省企业局支持的普通法 (general law), 一个是以产业为单位的特殊产业法, 比如由通产省其他部门支持的《石油产业法》。《石油产业法》因为有政府管制之嫌, 遭到经团联的强烈反对, 通产省因此决定支持《促进指定产业的特别措施法》。

由于通产省的提案涉及公平贸易委员会和大藏省的行政权限, 通产省需要得到这两个部门的支持。起初, 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张: 通产省提出的豁免在现行反垄断法范围内是可行的, 因此没必要再颁布一个新的法律。尽管最后公平贸易局首肯了卡特尔的合理化, 但仍然强烈反对兼并。大藏省在税收减免方面与通产省意见一致, 但是反对通产省给予特定产业优惠关税和确保财政支持的最初提案。大藏省担心, 优惠关税会引起国际批评, 并引发在其他法律上的连锁反应; 大藏省还担心财政支持会使身为重要的政府金融机构的日本发展银行过度放贷。大藏省还反对通产省允许金融机构参与合作的提议, 因为这一步骤会削弱大藏省对这些机构的控制。2月11日, 池田首相在经济大臣会议上提议讨论《特振法》。公平贸易委员会仍然继续反对关于合理化卡特尔和兼并的通产省提案, 然而, 在其他政府部门的压力下, 公平贸易委员会最终接受了通产省提交的《特振法》, 作为获得放行合理化卡特尔许可权的交换。大藏大臣田中角荣要求与通产省联合实施《特振法》, 但遭到通产省的拒绝。接着, 全国银行协会 (National Bank Association) 表示拒绝参与调整。

274

最后, 全国银行协会还是同意了由经济企划厅厅长宫泽喜一提出的折中方案: 通产省大臣与制造业代表会按照通产省大臣、制造业代表、金融机构代表以及大藏大臣的讨论来决定特殊产业的合作纲要, 但纲要确定之后, 应征求大藏大臣的意见; 如果商业银行或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 就有可能在各方协商一致后对纲要进行修改。有意思的是, 20世纪50年代, 通产省通过银行控制信贷和外汇的做法, 强化了商业银行的权力。到20世纪60年代, 银行已经成了通产省为新产业体制制定政策时的强势竞争者。当商业银行作为通产省控制信贷和外汇的工具发挥作用时, 他们也成了各企业集团的核心, 获得了关联公司集团的控制权。日本的银行日渐增长的势力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利益团体, 这个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极具权势。

275

通产省提交的《特振法》从来没有在国会讨论过。然而, 以体制融资 (*taisei*

yūshi)和官民协调恳谈会(*kan-min kyōchō kontankai*)为代表的合作机制,却正式建立了起来。1964年6月29日,通产省大臣福田一在内阁会议上说:

促进指定产业的特别措施不能获得国会立法。但是,这一提案所提出的自由化原则,即通过强化日本战略产业的管理来建立合理产业体制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原则,一定要实现……为支持已有共同方向的企业界的努力,政府应使用政府资本,比如日本发展银行和金融信托的融资,在贷款、寻求商业银行的支持方面,给中小企业以优先权。至于合理化的一般行为,比如标准的整合和生产的专业化,通产省应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这些企业]获得反垄断法的豁免(Tsūsanshō, 1990b, vol. 10:82-83)。

实际上,通产省后来还是实现了体制融资,尽管其规模比《特振法》要小很多。政企合作论坛也在几个行业中得以建立,当然这些行业与石化行业一样,多数都经历过萧条,但商业银行的代表并没有参与。

1967年,有泽广巳领导的产业体制分会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新产业秩序的形成》的报告,这份报告支持稍早时候通产省用重组日本产业的形式建立政企合作的提案,但提出了一种新的战略。报告认为,在资本密集型产业诸如钢铁、石化、化肥和石油等产业中,应该通过企业联合、投资调整、轮流投资或合作投资进行重组,以获得规模经济。最终,通过兼并,将会建立能在国际上开展有效竞争的产业体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应更多地注意开展研发工作,培养研发能力。在消费品产业中,经济规模和生产线上的分工、产品的标准化,以及营销合作等应该引起关注(Arisawa and Tsuchiya, 1967:12-13)。

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治理结构中私管部门秩序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日本发展主义从军事型向贸易型的成功转换。20世纪50年代从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主要是通过促进出口的压力,而不是国内政治的驱动。当时,由于对私营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识,政府自动改变了经济干预的模式。相反,20世纪60年代,尽管竭尽了全力,通产省仍没能争取到对新产业体制的有力控制。这一次,私营部门的秩序是通过政企合作的方式形成的。经过二十余年的经济增长,私营部门已经强盛起来,并成为通产省在管制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经过这一过程,日本发展主义已经进一步远离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同时,它与自由资本

主义的区别也更大了。

结论

本章阐述了日本发展主义向贸易型的转换,展示了战时遗产和自由资本主义在长达 20 年的相互作用之后,当代日本经济体制从双方所吸收的成分。

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将日本的国家目标从军事侵占转向了获取财富。开放的国际经济又迫使日本产业政策要适应市场取向。同时,15 年战争中出现的总的原则仍然保持未变,并重新被用来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正如小宫隆太郎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干预经济的愿望一点都没有改变。唯一的区别在于,“富国强兵”的目标被“重工业化”或“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的冠军”所取代。消费者利益从来没有获得重视。国家政策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保障大企业的利益。

277

作为分析单位的民族—国家在持续的外部压力之下已深深地扎根在日本经济思想中。从 1931—1945 年的总体战争总动员,到 20 世纪 50 年代推动出口的努力,再到 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投资自由化的挑战,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一直是日本产业政策的推动力量。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在重整军备和日美关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然而不久,在自由化压力下对国家利益的强烈关心,就替代了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将国家统一到高速增长目标上来。

20 世纪 50 年代,在战争期间最初被用来保证军备供应的管制经济的生产导向,受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影响,迅速在战略性产业中升级为生产技术导向。20 世纪 60 年代,这一战时遗产又进一步扩展到总体经济的高速增长上,通过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教育和科学等来提升国家竞争力。

管制经济中三个受法西斯思想意识形态强烈影响的一般性原则,也在新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得到了升华。这些原则适应了战后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

经济战略观曾是 1931—1945 年间支撑总体战争的基础。尽管通过战后的民主改革,经济战略观的军事性质消失了,但将经济作为社会工程主体来对待的原则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原则在 40 年代末被用于和经济危机作斗争,50 年代被用于推动出口,60 年代又被用于维持高速增长并迎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挑战。为

了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1931—1949年间的封闭到20世纪50年代的半开放再到20世纪60年代的开放——日本经济的组织形式常常被产业政策加以修正,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权力平衡不断变化。管制经济中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直接政府管制,在20世纪50年代转为对信贷和外汇的管制,接着在60年代又转为行政指导。向开放经济的转变削弱了政府官员的权力。与此同时,也使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变得成熟起来。综观这一过程,政府管制经济的功能依然保留了下来。20世纪60年代末,旨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新产业体制已经成熟,这一体制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与提升产业结构的政策目标结合了起来。尽管日本政府依然比其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对手更积极地干预经济是个事实,但在经济管制中已出现了不断增强的私营部门主导的管理现象。日本经济体制的这一特点使日本发展主义明显地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

但在这一经济中,市场仍然不能依照自己的规律运行。市场规律受到政府管制和非市场治理结构的约束。与市场功能大部分被政府管制所替代的管制经济不同,日本经济的管理权从1950年起就渐渐转到了非政府机构手中。虽然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府的行政指导和政府规制仍然是经济体制中的重要成分,但从60年代的新产业体制开始,维持经济秩序和限制过度竞争的治理功能已被私有化了。卡特尔和产业行会曾经被用来应对大萧条并支持1931—1945年的战争,贸易自由化赋予了这些实践以新的意义:提升国家竞争力。关联公司集团和产业行会正式开始接管由通产省执行的协调功能。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已通过制度联结到了一起。每一方都通过非市场/非政府机制的中介,通过与对方的合作扮演自己的角色。限制过度竞争和扩大规模经济的战略,也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将日本经济与正统的自由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按照20世纪60年代日本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企业组织的含义要在微观层次上才能被理解。由于日本的资本有限,国际收支上又存在瓶颈,合作比自由放任的竞争更为理性。在国家承受着自由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巨大压力之时,人们相信,高度组织起来的市场、更大范围的合作以及更少的竞争,能更有效地迎接挑战。历史证明,日本已完成了他们所寻求的独立调整。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外国企业能在日本的国内市场超过日本企业。同时,正如通产省反复说明的那样,在最近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日本政府可以不再对改变这些有组织的市场负

责了。

截止到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产率的概念已经日渐成熟,并深深扎根于日本的管理体制之中。源自 1931—1945 年的反对利润原则是为了保证战时国家动员。尽管战后利润原则从来没有在日本成为主导思想,但劳资双方却在相关问题上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并常常引发大规模解雇。20 世纪 50 年代,虽然一些进步的管理人员提出通过生产率运动来维持劳资关系,但劳资双方仍然受到战争末期所采取的对抗性策略的强烈影响。道奇计划完成之后,日本的管理思想受到西方经济理论的强烈影响。然而,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反对利润原则的重大意义才不仅与建立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之努力相关,也与迎接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投资自由化的挑战相关。正如三池纠纷所表现的那样,冲突性劳资关系对国内政治和国家竞争力的危害,深深地改变了日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认知的变化导致了日本大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发展主义超越了用阶级来解释劳资关系的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7章 经济理性的制度环境

我的分析从阐述出现于1931—1945年、发展于战后时期的日本发展主义的静态特征开始。通过对形成日本产业政策三个范式的动态过程的审视,我确信,日本的发展主义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断感受到的国际威胁,不论是来自其他民族国家的总体战争,还是来自于贸易和资本投资自由化的外部压力,常常在政策中得到反映。跨国学习一直是新经济思想的主要源泉。由于日本在战前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传统关系,这些思想常常来自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经济思想要对政策产生影响,必须面对三个不同因素。第一,为回应可感知的外部威胁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常常在论战中论证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并博得公众支持的同时,摒弃了低层次的分析单位。第二,政府结构和政企关系强烈影响到贯彻新政策所需选择的工具,因为这些工具直接阐明并影响利益。第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家和主要政治家间的牢固联系,常常能帮助思想获得政治力量。在本章中,我将进一步讨论日本案例的重要意义,借以帮助我们理解若干理论问题。

世界体系、民族主义与日本发展主义

与强调日本经济发展的国内资源的观点相反,本书描述的是与国际环境相关的日本现代产业政策的出现。我在本书中提出,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和日本民族主义对此的回应,是解释日本发展主义兴起的两个主要因素。世界经济的扩张波及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每个国家为了寻求繁荣都必须确定自己在这—体系中的地位。这一点,对于日本这种缺乏自然资源并严重依赖贸易的国家尤其重要。在当代日本历史中,世界体系的每一次重大转变都被视为对民族生存的巨大挑战。日本国内对这些挑战的回应常常伴以影响到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演

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

20世纪30—60年代之间,日本发展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世界体系结构的三次转变,每一次转变都被日本视为是对其民族的巨大挑战。前两次转变出现于两次大战结束之时,而三次转变都是由美国推动的。

第一次转变出现在肯尼思·派尔(Kenneth Pyle, 1992:140)所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亚帝国主义均势的破坏”之后。当卡尔·波兰尼所描述的自规制市场(self-regulated market)的失灵导致国际经济失序的时候,美国打算在亚洲建立一种基于威尔逊自决原则(Wilsonian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的秩序,以多国条约坚持中国门户开放替代英日联盟。然而,日本以另一种方式回应大萧条。由于认为自己在西方主导的民族秩序中受到了不公平限制,所以日本选择用军事对抗来挑战现状。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使日本与西方列强日益紧张的关系发展成一场民族危机。由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尊严都由总体战争决定,所以从国家总动员中产生了发展主义。在管制经济实践过程中,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深刻变化标志着日本经济已经远离了它在30年代前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形成日本经济的外部环境方面,美国主导下世界和平的兴起是一个主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日本要面对朝鲜半岛上爆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军事冲突。尽管日本的重点是在经济重建上,但冷战迫使日本必须处理两个对立的议题。政治上,日本很难适应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整个50年代,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分裂。但在经济上,占领期间已经过改革的战时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如企业集团、卡特尔及劳资关系等),都开始与那些在战后民主改革中没有触及的部分(如政府和金融体制)进行重组,以重新巩固自己的地位。面对以出口来实现经济独立的挑战,日本人相信,经过某种适应之后,这些战时遗产是建立民族生产技术比较优势的基本因素。

第三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时值自由贸易体制在美国的领导下出现于国际经济之中。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市场一直拒绝外国产品和外国资本的进入。由于没有国际市场日本经济就不能生存,所以自由化被视为日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日本主张对这一新的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由于日本将自由化视为第二艘黑船的到来,所以在扩展了双边安全条约、稳定了经过

三池纠纷的劳资关系之后,日本开始着手解决日—美关系问题导致的国内纷争。与此同时,日本还动员整个国家转向新产业体制以应对挑战。截止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体制的所有当代特征都已成形,日本发展主义已从军事型转向了贸易型。

283 为了应对世界体系中的转变,民族主义引导着日本产业政策的每一次内部调整。由于这些转变被视为对国家存亡的挑战,所以,日本经济思想的分析层次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存续,不仅仅是因为管制经济的出现,还因为战后国家总动员的继续。这种形势在压制个人利益和社会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热衷集体福利的环境。在集体的生存压力下,国家生产力的主张不断地否定其他的主张。不断被感知到的国家危机也常常促使日本人必须为了自己的国家作出牺牲;他们认为只有在国家富裕之后个人才能享有更多的物质便利。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才认识到,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富裕国家之后,作为个人他们依然相对贫穷。这一结果使人相信,在一个挑战性环境中,隶属于一个国家的感觉会为个人创造安全感、归属感和舒适感(Degenaar, 1982:12),因此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会压倒对社会阶层的忠诚(Smith, 1971:21)。

日本发展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府干预。按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政府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态”,民族主义是“所有创造性文化精神及经济福利的源泉”(Degenaar, 1982:9-10)。民族主义经常会在经济思想中引发社会主义趋向,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是推动全社会福利的计划(Davis, 1967:xi)。由于日本是一个同质性极强的国家,所以对政府来说,要在民族—国家基础上建立国家稳定非常容易,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之间以及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之间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经常被压制下来。在日本经济发展期间,世界体系与日本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肯定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外部因素(比如国际威胁和竞争)对强势政府机构的建设贡献极大(Thomas and Meyer, 1984; Tilly, 1975)。从日本的情况看,正如查默斯·约翰逊指出的那样,“政府的作用和对权威部门干预的依赖程度,都会由于实际的或预期的危机状况而扩大……一旦危机出现缓和,系统的初始平衡就会再次从公共部门转向私营部门”(Johnson, 1987:145)。

为了回应外部威胁,经济被视为具有战略性。在强烈的生存压力下,以最小

成本为国家谋取最大利益的思想就一直处在基于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思想的中心,并在思想上给日本政府提出了挑战。对于实践派经济学家来说,尽管国际环境充满了威胁,但这种环境既提供了条件,也具有约束性。为了从国际市场获得资本、资源、市场和技术,为了加快采用先进的组织形式,为了避免在技术发展中“先行者面临的巨大成本”(penalty for taking the lead)而通过“仿效”来赶上先发展国家,日本除了策略地在有限的选择中寻求突破外,别无他途(Gerschenkron, [1952]1992; Rostow, [1960]1979; Veblen, [1915]1939:1919)。出于同样的原因,反对竞争是为了在一国范围内更有效地分配资源;生产率概念的使用则与尽可能充分地动员人力资源的努力相关。这两者都意味着要求对“特殊群体的利益做出奉献”(Davis, 1967:x),以及“在一个特殊群体里将人们维系在一起”(Breuilly, 1982:365)。

284

日本发展主义的这一特质使它更接近于其东亚的伙伴,并日渐远离了拉丁美洲各国。尽管日本人一直怀有一种弱势感,但他们很少关心这种弱势的来源,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国家与西方国家生活标准之间的差异。他们渴望赶上西方,而且要快速赶上西方。“差距越大,燃起追赶激情的理论就更激进更全面”(Hirschman, 1971:271)。由于具备了这种赶上西方的强烈愿望,所以日本经济经历了持续的不平衡增长,这种增长是由提高国家生产力的强烈愿望推动的。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赶超是日本面对的最紧迫任务。即使在东亚的冷战局势严重制约了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仍然利用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通过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及军事依赖之间的取舍,换取进入美国市场的通道(Cummings, 1984)。

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日本经济学家并没有接受新古典理论。那些参与了1931—1965年间政策制定的人,流露出玛丽·马托西安(Mary Matossian, 1958, 1971)所谓后发展国家中知识分子的被侵犯者(assaulted)心理。尽管他们慑服于自己国家的发展程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较的反差,支持赶超西方的努力,但他们常常也怨恨西方,并为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而努力确立“一个真实自我”。这种情况常常使他们把“事实与价值混在一起,将事情看成是他们想在经济思想中看到的那样”,把自己当成是集体利益的代表,主张克服由国内阶级冲突和权力斗争所带来的困难。

285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类在现代经济中的行为动机只是工具理性。即使社会准则仍有一些影响,但在经济理论中却被边缘化了,可以忽略不计。相反,日本的情况证明,即使在现代经济中,主观性也不会因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而被毁掉,它仍会决定物质生活的方向(Zelizer, 1988:627-628)。非工具价值体系仍然会通过排斥神圣对象和神圣关系的市场交换而对工具理性设定限制(Granovetter, 1985; Zukin and DiMaggio, 1990)。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分析中以价值和规则形式出现的道德伦理规范,不可能被降低成效用,群体认同感常常激励着个人行为(Etzioni, 1988; Sen, 1987)。在日本这样的东方国家,本土价值观总是与产业化过程关系紧张。此外,本土价值观不仅渗入产业化之中,产业化也选择了一些不能随现代生活日渐增长的复杂性而保持现状的本土价值观。本土价值观的重生并不只是过去的再现,而是一种螺旋式发展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结果,日本现代经济制度中集体分享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含义被提炼了出来。

制度化信念与跨国学习

本书阐明了一个后起国家的制度化信念是如何对日本产业政策与经济制度产生巨大影响的。日本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产业文化,即“构成产业和经济的经济习俗,以及同时……在展现这一习俗的过程中,社会地构建而成的目标指向”(Dobbin, 1993:5; 亦参见 Dyson, 1983)。作为分析单位的民族—国家,强烈的生产导向、经济战略观、有组织的竞争以及生产力概念,桩桩都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大相径庭,它们代表一个直接与西方模式相竞争的产业化模型。

286

日本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后进国家的产业如何制度化与如何应对新环境的挑战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日本的情况再次肯定了赫克洛(Hugh Heclo, 1974:305)的看法,政府不仅行使“权力”,它也制造困惑(puzzle)。政策制定需要决策和认知,说到认知,跨国学习就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旦人们认为经济理论在某些国家成功地指导了产业化后,其他国家或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或出于政治成就的期望,甚或是出于虚礼俗套,会尽力仿效这些经验(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Hall, 1989; Ikenberry, 1990; Mayer and Rowan, 1977)。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工业化国家如日本的经济思想,从一开始就在思想上受到以理性神

话形式出现的西方经济思想的束缚。日本的情况也表明,制度化信念不能以静态方式存在。相反,它只能在一个动态过程中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在新的环境中提炼和超越许多枝节因素,以努力维持根深蒂固的原则。与日本最初的模式相比较,本书阐述的所有重要原则到了20世纪60年代都已发展到了可观的程度。有时候,就像战后初期凯恩斯主义理论渗透在日本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那样,“被错误理解的概念也能像正确的报道那样,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Hecló, 1974:310)。

本书表明,那些适合某一既定国家之产业文化的思想,似乎更容易为该国所接受并传播,其原因在于,内含在现实中的特定产业文化之“逻辑”对未来的选择有一种持续的影响。按照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 1993, 1994)的说法,在一个国家面对一种新政策的两难处境时,他们会根据现存制度的逻辑设计新的制度;由于政府结构提供了政策制定者应用于新问题的因果关系逻辑,所以,政策措施得以重新制定。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 1989:552)称,“理念是渐渐嵌入在具体的话语共同体(communities of discourse)中的,而不是自由地漂浮在投资人的创造性思维中。”正如彼得·霍尔(Peter Hall, 1989:393)所说,这种话语“提供了一种可以在政治领域描述政策的语言,提供了一种可用于政策评判的术语……用以讨论新政策建议的优缺点……[并且]对将被接受的一组新的政策观念可能产生重要影响”。

287

日本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显示其受到德国的强烈影响。虽然早在二十多年前,肯尼斯·派尔(Kenneth Pyle, 1974)就证明了德国对明治政府的影响,但直到最近,这一点才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根据比较资本主义的说法,作为对正统自由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理论选择,德国的经济理论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关注(Fallows, 1994; Williams, 1994)。正如詹姆斯·法洛斯(Fallows, 1994:182)指出的那样,“多数德国哲学都经受了考验,所以德国人值得重视。它们并没有在英国或美国扎根,而是在欧洲大陆部分地区和亚洲,特别是日本,得到了认真研究、变通和应用。德国人用黑格尔替代了卢梭和洛克,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替代了亚当·斯密”。以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依据,戴维·威廉斯(David Williams, 1994:122-123)说,

在将政府转变成一台战争机器的实际问题上,在如何达成官僚理性

和效率的问题上,在种族冲突激烈时代的国家本位原则的问题上,在国家竞争经济的问题上,以及在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实现政策目标的问题上,都有一种长远而深刻的德国式思考。

正是产业化过程中相似的历史经验和国际环境,使日本不仅在明治和大正时代信奉德国历史学派,而且遵循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以国家动员形式体现的总体战争理论。20世纪50年代,德国在战后经济重建中依靠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团结劳资双方的经验,再次为日本劳资关系的转圜提供了智慧。

288 马克思主义对日本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值得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成了日本经济思想的新基石。在德国历史学派受到日本产业化新情况的有力挑战之时,日本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化观念表明,日本经济学家又一次脱离了古典传统:在德国历史学派无法应付因快速产业化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社会冲突之后,日本经济学家在寻求一种古典经济学所不能接受的激进解决方法。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在“转向”运动中经历了一次大的转折。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如阶级斗争和世界大同等,都消失不见了,但计划经济的原则依然保留了下来。大河内一男鼓吹的生产力理论,加上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以及美国的新政和苏联的五年计划,一起来为日本的国家战争动员服务。在战后时期,有泽广巳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仍然保有这些特征。这一观点主张政府计划,但又强调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阶级斗争和世界大同。

在接受外国经济思想的过程中,存在两种独特形式:整体批发和分开零售。在整体批发形式中,思想成了信条,它们的主张更多地起约束作用,而不是起鼓励作用。在零售形式中,思想的接受是有条件的,它们的主张只有在符合现实条件时才具有合法性。通过零售,不同思想的元素可以借用以形成一种新的变体,不同的思想可以根据当地条件得到充分运用。批发形式在日本经济学界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马经学派或近经学派都采用这种方式。然而,实践派经济学家一直采用的是零售形式。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盘接受了德国的总体战争理论。但在同时,马克思主义也经过了改造:虽然一些激进的元素消失了,但计划经济的概念保留了下来。为加强管制经济的政府干预,日本同时向德国、苏联和美国求教。这些不同来源的经济意识形态一起帮助日本资本主义脱离了其自由主义阶段。

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与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的创造性应用,也表明了日本跨国学习的零售形式。日本人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动态理论转变为旨在推动出口的商业战略。而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在日本也获得了创造性运用:从一种讨论短期市场波动的理论,转变成一种在长期内提升日本产业结构的国家产业政策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在日本发展主义的演化过程中,制度化信念没有按线性方式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旧的用途得到改造,并且超出了原有适用范围,但总的原则却保留了下来。本书表明,制度化信念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并不总是简单地以一种遗产的方式出现,而是通过与对立信念的相互作用,以一种再生的形式出现。从日本的情况看,发展主义并不能靠自己无限地长存下去,因为德国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式传统的竞争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战时遗产常常要面对正统自由资本主义的有力挑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挑战都迫使日本发展主义去适应、升级甚或超越自我。然而,1931—1945年间出现的一般性原则却通过战后不断地复制而存留下来。比如说,道奇计划的实施和贸易自由化就迫使日本政府改变了自己干预经济的方式,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却保留了下来。

289

思想与利益

在阐述制度化信念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强烈影响的过程中,我也说明了在制定政府政策时,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命运并不是先天注定的,它也面对来自特殊利益的挑战。尽管“关于生产组织和利益成本分配的经济思想明显带有计划性”,但并不能解释这些计划为什么被人所接受,因为“经济思想永远存在争议,而且永无定论”(Jacobsen, 1995:286-287, 289)。经济思想确实也提出了理性行为,但政府产业政策不只是由对效率的需求来决定。对合法性的要求、政府官员掌握的内部控制的目标与可预计的秩序,以及企业领袖保护自己经济自由的愿望,与市场机制同样重要(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Meyer and Scott, 1983; Weber, 1968)。除非思想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思想的作用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其原因正如朱迪斯·戈德斯坦和罗伯特·基欧汉(Goldstein and Keohane, 1993:26)所说,“从现象上看,思想和利益是分不开的”。

约翰·K. 雅各布森(John K. Jacobsen, 1995)在评述有关政策制定中的思想

290 影响的近期文献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排除为思想辩护的行为主体的利益,思想是否还能对政策产生独立影响?我的答案是,这取决于采用哪种利益作为评判思想的独立影响的参考标准。思想对政策制定的独立影响不仅通过思想战胜行为主体利益而得到反映,而且还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得到反映,即思想有一种力量,“改变一个有自身利益的群体观念”,可能也会改变“新的行为过程”,这种新的行为过程“会改变物质世界本身”(Hall, 1989:369)。如果将行为主体所持有的改变前的利益定义作为参考的话,思想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就是独立的,因为政策结果与这些利益并不一致。相反,一旦我们采用行为主体的新的利益定义作为参考,那么,思想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是无法与利益定义分开的,因为没有政治行为主体的支持,思想就不能在政策制定中产生任何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思想的力量反映在它们成功地获得了想利用其作为武器的行为主体足够的政治支持上。

本书表明,日本的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常常需要重新定义行为主体利益作为成功的前提条件;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重新定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管制经济、技术创新、高速增长和新产业体制,深刻地改变了日本政府官员、产业界领袖和工人定义自身利益、认识形势和形成相应策略的方式。比如说,我在第5章中就阐述过,在20世纪50年代的合理化运动中,效率被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基于这种认识,日本企业用低生产成本和高资本回报来定义自己的利益。这种策略导致了大量解雇,大量解雇工人又造成了劳资关系的紧张。当日本的管理层受到技术创新这一新观念启发的时候,他们就不再用短期利润,而是用长期市场份额和生产技术的比较优势来定义自己企业的利益。结果,他们通过制度化日本管理制度,将他们对劳工的策略,从冲突改变成合作。这是效率和劳资合作的历史性妥协。正如经济思想在改变日本企业定义自己利益的这一事实中所反映的那样,它确实具有政治力量。

291 进而言之,在特殊利益约束下,经济思想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常常是作为一种改变先前所持观念的驱动力而出现的,而不是专断地决定未来的行为过程。在政治行为主体拒绝接受思想所提出的新的利益定义时,这一点尤其如此。在这种条件下,除非支持思想的行为主体愿意妥协,否则思想将无法对政策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从日本的情况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行为主体一般而言很容易在

经济思想所阐述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很难就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达成共识。如我先前所述,民族主义在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中非常关键。在外部压力下,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和工人都认为建立国家生产力是当务之急。然而,所有主要的政治行为主体却都在考虑如何通过自己所建议的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的方式,来保护甚至是提升自己的利益。因此,“多数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冲突、矛盾、对话和政治妥协的复杂过程中做出的”(Martinelli and Smelser, 1990:31)。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连企业领袖都支持政府的管制经济方案,他们一致认为,在既有的有限资源条件下,如果不在宏观层面上更有效地分配资源,日本就不能保证在军事冲突中生存。然而,当革新派官员打算将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打算赋予经理人以官方身份时,却遭到企业领袖的极力反对,最终,政府只能修改了这一方案。日本的情况再一次确认了玛格丽特·威尔和瑟达·斯科波尔(Margaret Weir and Theda Skocpol, 1985:118)的论断,“如果一个既定的政府结构不能为完成一个既定的行为提供一种既有的或可预测的‘政策工具’的话,政府官员就无法从事这件事,热衷官职的政治家也不会就此提出议案。”

本书还阐明,在利益发生相互冲突时,“界定协商解决或联盟行为”的思想,更有机会影响政治结果。当对立的利益成为达成简单解决方法的主要障碍时,“行为主体就可能为了实现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利益……集体行为主体也可能让特殊利益从属于共同利益”(Windhoff-Heritier, 1991:31)。尤其当国际环境存在威胁的时候,行为主体的自利动机更能导致合作和对集体福利的追求(Elster, [1979]1984)。由中山伊知郎所提议的生产率运动三原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在创新计划中表达了劳资双方的利益,所以生产率运动三原则渐渐赢得了双方的政治支持。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是另一个例证。在美国,政府政策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一视同仁,如果单纯采用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一定会违反反托拉斯法。然而在日本,尽管反垄断政策有利于大企业,但系列的发展也鼓励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垂直合作。简而言之,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不是减少中小企业,而是让他们在一种不平等的条件下生存。政府同时达成了这两个目标。

由于在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上思想不能与利益分离,所以政界精英与学界精英之间的联系在解释具体经济思想方面,如管制经济、优先生产战略、高增长以及获得政治交换权等,是重要的因素。如约翰·埃肯伯里(John Ikenberry, 1990)所指

出的那样,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即外国思想的传播——与政策模仿(policy wagoning)——即政策制定者吸收外国经验,是不同的。前者并不一定会引致后者的出现。本书阐明,从社会学习到政策工具的转换,常常因为学界和政界之间的关系而获得支持。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昭和研究会与近卫文麿首相之间的紧密联系,有泽广巳和吉田茂首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下村治和池田勇人首相之间的关系,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的新秩序、20世纪40年代末的倾斜生产计划以及60年代的高速增长提案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石桥湛山、都留重人和稻叶秀三对政府事务的直接参与,也能解释他们的思想对政策产生影响的条件。另外,中山伊知郎于20世纪50年代帮助政府建立日本式管理时,他不仅是日本政府的高级顾问,还是生产率本部的副理事长,直接负责劳资关系。通过学界与政界之间的这些特殊渠道,少数经济学家的思想获得了政治力量,并使自己的学术主张影响了政策制定过程。

发展主义的冲突与制度一致性

本书认为,为了更清楚地揭示日本发展主义的本质,在研究日本产业政策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制度分析法来辅助冲突分析法。我在本书中不仅分析了产业政策政治主张中的冲突,还阐明了经济制度是如何在这些冲突中逐步形成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冲突分析法一直是日本政治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这种研究方法的出现是对日本政治学的早期解释的一种反映。这种早期解释把日本的政治解释为由社会和谐所支撑的双方共同决策的过程。冲突分析法对阐明变化的过程和变化的动力很有说服力。它致力于超越“日本公司”(JAPAN, Inc)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日本政治经济状况的理解。但同时,冲突分析法也忽略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对解决冲突的影响,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制度是如何尽力减少冲突的。

从冲突方法中衍生出来的两种典型的二分法也在20世纪90年代因日本政治经济的现实而遭到质疑。

第一种二分法是指1955年体系中对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划分。1955年体制与日本战后的政治结构相关,在这一体制中,受大企业、中小企业和农民支持的自民党,统治了这个国家差不多四十年。这种一党制政府遭到日本社会党(JSP)的反

对。正如福永博(Fukunaga Hiroshi, 1995:3)所指出的那样:

迄今为止,我们对1955年体制的分析重在这一关系[关于国际外交和国防政策问题]的冲突方面,但没有对两党之间的审慎合作作充分的阐述……对今日联合政府进行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两党在日本许多基本政策上(比如说保护弱小产业,政府规制的持续性以及生产者优先而非消费者优先等),实际上是意见一致的……这一体制一直是过去40年来日本政治结构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产业政策、政府管制和对进步的普遍看法的来源。后者的这些来源于一个旧有的管制经济基本体系的发展。它至少在1955年体制形成之前15年就已成形了。

294

第二种二分法是指政策制定分析中对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划分。自从查默斯·约翰逊于1982年提出了发展型政府观点以来,这种二分法就受到广泛采用,人们或者是提出修正,或者是挑战他的观点。其结果,约翰逊最初所提出的日本发展型政府和美国规制型政府间的区分,被日本的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所取代,而争论则集中在约翰逊发展型政府这一命题中的一个亚命题(subthemes)上,即在政策制定中,是官员主导还是官员自治。一方面,许多分析都表明,日本的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行政精英相互之间关系密切,而且政府政策还要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Calder, 1988; Samuels, 1987);其后果是我们加深了对日本政治复杂层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有极少数的研究成功地修正了约翰逊的主要观点:即日本政府是个发展型政府。如果我们忽视了约翰逊的这一主要观点,就很难用冲突观来解释日本的几个主要经济现象。比如说,尽管日本有世界上最高的消费价格,但日本并不存在强有力的消费者运动;再比如,尽管政府官员、政客和大企业家常常发生冲突,但他们也构成政治中的铁三角(iron triangle),或者经常官商勾结(kanzai yuchaku);按照西方的标准,日本工人年轻的时候工作时间太长,而收入又太少,但在日本却没有发生冲突性的工人运动。

正如丹尼尔·冲本(Daniel Okimoto, 1989:230)所指出的那样,“日本成功的秘密显然在于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整个体制中,这一体制是各种因素的动态组合,各种因素在一个整合体制结构中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日本产业政策有目共睹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的新著都持有这种制度化视角。这些研究集中于“制度的互补”,并且提出,日本的经济体制是由多重制度组成的,其

295 中包括政府、企业集团、产业协会和日本管理体制,这些制度中的每一种都与另一种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从分析上讲,我们在考察一种制度时,必须考虑到另一种制度的影响(Noguchi, 1995; Okazaki and Okuno, 1993b)。

从比较资本主义的角度看,日本政府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官员是否起主导作用(在很多事情上他们确实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有些事情也不行;不过比起他们的美国同行来,他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在于经济体系是否是发展型的,以及计划是怎样实施的。发展型政府可以很好地嵌入社会(Evans, 1995),日本政府也可以通过非政府机制达成其政策目标(Tilton, 1996)。本书表明,许多通常贴有私人标签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事实上都是由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的。发展型政府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产业政策的形成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在于创建了一种由多重机制(许多是非政府机制)组成的经济体制方面,其目的在于通过确立相互独立的利益为国家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动员全国的力量。

发展主义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得以维持。民族主义在解决冲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冲突分析假设,不同行为主体的利益和目标是不兼容的,因而成了冲突的主要来源。然而,在日本发展主义政治中,经济行为主体的冲突更多发生在维持经济增长的手段上(这直接暗示着经济福利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而不是发生在目标本身。基本上,对冲突的考虑主要是如何平衡对立的利益以实现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国家面临外部的有力挑战,比如面临总体战争、经济存亡或自由化挑战之时,民族利益就被人从战略高度提出,用以减少国内冲突。共同的国家危机感也是对立各方在解决国内冲突问题上的重要政治基础。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有些社会学家在分析自由资本主义政治时使用的二分法在发展主义政治中的表现完全不同。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战争的压力下,私营部门一般而言并没有反对管制经济,但却反对政府官员的极端控制。同样,20世纪50年代初期,政府官员在倾斜生产方式大大强化了控制经济的能力后,在没有政治力量挑战其权力的情况下,废除了自己对物资分配和价格的管制。如果认识不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我们就无法对发展主义政治主张进行充分解释。

296 在平等这一问题上,发展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重要区别在于,发展主义强调结果,而自由资本主义强调机会。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看法,社会成员应该按

照既定的分享经济福利的规则相互竞争。这种做法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并产生更多的社会冲突。发展主义的根基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如果处理不了平等问题就无法发挥作用,因为公民之间经济福利分配的巨大差距会削弱他们对民族目标的热情。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压力下,在急剧产业化和动员全国力量回应外部挑战的过程中,在日本当代史上的若干关键时期,日本产业政策的政治主张常常依赖于发展出一套旨在减少国内冲突的管理机制,以保证主要经济主体之间对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其结果是,尽管生产导向令国内消费物价太高而使日本人有所损失,但也让日本人拥有了国际生产厂商的地位,这一地位增加了日本人的就业和收入,为维持高价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关联公司集团的发展不仅对竞争有所约束,而且还减少了大企业的生产成本。虽然关联公司集团依靠牺牲自己从属企业的利益,才使产品更具竞争性,但是这也为中小企业带来了商业机会,否则,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难以生存。日本的管理体制不仅有益于企业的利益,还为日本工人提供了更好的工作保障和稳定的工资提升。实际上,这些关系是不平等的,但对双方都有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做法才能有效地消除政治上的反对意见。在经济发展中总是会出现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会在同一层次上反复出现,因为经济行为主体能够发展出一套解决冲突的制度。因此,尽管在某一特定时期日本也存在弱势群体,在成本大于收益时会有个别日本人表示不满,但日本发展主义的反对者一直未能强大到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297

像我们用日本的情况反复表明的那样,这种制度发展更多地是在危机时刻才能实现。为了团结一致应对外部挑战,日本的经济主体常常在国内问题上进行妥协。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这一特征并不是偶然的。为了动员全国参与总体战争,所有工业化国家采用的是促进平等的政策手段(Yamanouchi, 1955a)。使法西斯主义与众不同的,正是它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原则,在经济上实施强制平等的政策。国家面临的危机,比如急需推动出口以及贸易和资本投资自由化,一直是日本经济治理体制产生转变的主要动力。正如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日本应对每次外部挑战那样,日本的经济体制越来越紧地将整个国家捆绑到了同一驾马车上。这种体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和谐(如日本商社),它也充满了冲突。然而,这一体制内的经济主体在国内问题上继续保持差异的同时,却能在与国际竞

争相关的问题上找到共同基础(这就经常会导致体制内的权力和利益的新的平衡)。

我并不反对冲突分析法。相反,我认为为了揭示日本发展主义的前后一致性,我们需要注意产生于产业政策的政治冲突中的制度性后果。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谁制定了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是否成功。20世纪90年代,争论的焦点又转移到从产业政策的政治主张中产生了什么样的管制结构,这一结构又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护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这一结构近来为日本带来了什么问题(Kobayashi et al., 1995; Noguchi, 1995; Okazaki and Okumo, 1993b)。冲突和争论一直存在于产业政策的政治中,但冲突和争论带来的制度发展却减少了产业政策中的冲突。对现在有直接影响的正是这些制度,而不是过去的冲突。如果我们能将充分证明动态变化的冲突分析法与充分解释这些冲突走向的制度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对日本产业政策的政治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跋：历史视角中的日本发展主义

1931—1945 年间为应对大萧条和支持总体战争而产生的日本发展主义，战后经过几次与包括民主改革、道奇计划的实施及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在内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碰撞，从军事型转向了贸易型。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当代日本经济体制已经基本成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战时遗产的许多成分被改变、升级甚至超越。但是，注重国民经济、强烈的生产导向、经济战略观、对市场力量的约束以及拒斥利润原则，仍然是日本产业政策的基本思想架构，并在经济治理结构中得以制度化。

后来的历史对我们理解本书所记载的 1931—1965 年的争论有何种新的启示呢？

这些争论所代表的日本发展主义，在从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 1989 年冷战结束的这段时间内，不仅使日本成功地应对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还有效地应对了由于 1985 年广场协议而导致的日元快速升值，并在国际竞争中显示出强大实力。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 1967 年超过英国和法国，1968 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1975 年，日本在战后第一次应邀参加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首脑峰会。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自身强大的经济竞争力，日本不仅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且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投资者、最大的债权人以及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国。通过集中建设国家财富，贸易型发展主义让日本实现了它在 1931—1945 年间用军事型未能达到的目标。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发展主义经历了一次艰巨的考验，但它生存了下来，并进一步强化了复制自身的能力。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后，欧佩克成员国利用石油为武器，惩罚支持

以色列的工业化国家。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猛涨了近400%。当时,石油占日本能源构成的70%,日本石油消费的99.7%依靠进口,而且大部分石油来自中东。

石油危机对日本以重化工业为最佳产业结构的认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通产省随即开始了旨在减少日本经济依赖于石油的两个重要项目。1974年开始的阳光计划(Sunshine Plan)重在开发石油替代品,1978年启动的月光计划(Moonlight Plan)旨在开发节能技术。与此同时,日本迅速将自己的产业结构转向了高新技术。因此,日本经济对石油的能源依赖从1973年的77%降低到1985年的56%(Hara, 1995a:101)。日本经济通过能源节约、污染控制、高绩效以及高密度信息和技术来维持它的竞争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汽车和家用电器开始主导国际市场(Mitsubishi and Uchida, 1994:87)。尽管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由于日本企业的经济活动已超越了一国界限,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有所削弱,但行政指导和政府规制仍然是1973—1989年间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

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经济的私人治理秩序(private ordering)遭遇了一次大的危机。当时,石油企业将石油危机当成一次赚钱的黄金机会,他们通过黑市卡特尔一起抬升石油价格。这一行为的滚雪球效应引发了所有产业的价格上涨,家庭主妇蜂拥至商店抢购卫生纸、食盐、肥皂和灯油。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新产业体制的讨论中,人们相信私人治理秩序在提高国际竞争中的国家利益方面极为有效。但这一次它却事与愿违,危害到整个经济的稳定。甚至连总是维护企业界的通产省官员,也把石油企业的这种投机行为称为“众恶之源”。日本政府甚至讨论了一个恢复战时政府控制消费价格的提案。尽管这一提案未被采纳,但田中角荣首相还是警告商界领袖,如果私营部门不与政府合作,继续不恰当地提高石油价格,政府除了回到直接管制别无其他选择。公平贸易委员会也宣布,12家石油企业组成的价格卡特尔违反了反垄断法,必须取缔。为了控制经济形势,政府制定了一个价格体系,对每一种主要产品都制定了建议价格。这次冲突之后,私人治理秩序受到了政府的有力监督(Mitsubishi and Uchida, 1994:22-29)。

与拒绝接受利润原则相关的效率也再次成为一个焦点问题。1975年第一季度,有75%的企业在调查中说,为应对石油危机,他们通过削减招聘人数、减少临时工和非全日制工人、重新分配和调换工作、提前退休以及指定除名等办法,对就

业政策进行调整(Dore, 1986:95-99)。与此同时,工会也在努力为提高工资而斗争,以应对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急剧上涨的消费价格。尽管1974年生产力的年增长率已成了负数,但当年的平均工资上涨率还是达到了26.1%。工资上涨刺激了通货膨胀。为稳定形势,日本政府努力控制批发价格和食品价格,同时,政府还要求工会降低对工资年增长率的要求。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政府、商界领袖和工会都得到一次很好的教训。因此,当第二次石油危机在70年代末到来时,日本经济体制应对自如。日本企业没有解雇工人,工会也降低了对年均工资增长的要求。因此,日本经济的增长率比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都要高。当1985年日元快速升值的时候,日本企业的就业政策只有些微变化。

应运而生的“日本人论”(Nihobjin-ron)反映了日本经济实力的扩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被视为前现代的日本经济体制在这一理论中获得了广泛的赞赏,日本当代的成功常常被追溯到镰仓时代和江户时代的传统,即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以及家庭和乡村体制。这一观点的隐含假设是,日本社会的经济主体无意识地内在化了本土价值观,并自愿服从制度化了的道德准则。换句话说,本土价值观不知不觉地渗入进了每个日本人的身心,无意识地铸就了日本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但这种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表明,在何种条件下并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这一和谐与协作的取向最终在日本的经济体制中得以制度化。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研究者发现了比如内部劳动市场和X-效率之类的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与把导致日本经济体制制度化的历史偶然事件概念化的方法不同,这一分析方法的重点集中在日本经济体制制度化之后的合理因素,集中在现存制度一定是有效制度这一假设上。这一分析方法从不讨论诸如日本企业为什么并在什么条件下偏好X-效率,以及日本企业为什么不以与美国企业相同的方式追求效率这样的问题。这两种观点在解释制度再造的合理性方面非常可取,但却很难解释制度首次出现的动态理由,以及这些制度为什么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的原因。

302

历史充满了讽刺。日本在15年战争中失败,但却在接下来的冷战中作为最大的赢家站了起来。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经济立即面临了战后最严重的停滞。经济体制曾为日本带来了繁荣和胜利。包含在这一体制中的许多问题都已经被眼花缭乱的成就所掩盖,但这些问题现在模糊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很显

然,日本经济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303 日本经济思想中的民族—国家观点已经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碰到越来越多的难题。用牛尾治郎(Ushio Jirō, 1995:31)的话来说,日本过去的产业政策是为了“一国的经济繁荣”、“一国的和平”、“一国的安全”和“一国的价值”。发展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取决于一个发展型政府的存在,这个政府努力通过产业政策以及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平均经济福利的方法来保障经济增长期间的政治稳定。然而,从国际视角来看,这样的政府不能存续。发展主义在一国或几国的实践不可避免地会创造出跨国界的经济不平等,引发紧张和冲突(Murakami, 1992)。冷战期间,日本发展主义的成功依赖于美国吸收日本庞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能力和意愿,同时并没有因此强烈要求贸易平衡以换取日本对钳制共产主义的支持。今天,美国不再愿意在贸易不平衡的条件下吸收日本的巨额出口了。另外,工业化国家从重化工业向信息产业的转变也改变了经济结构,导致了跨国合作的迅速发展。这种改变正在挑战在所有制造业中强调国家竞争力的民族—国家观点(Yamanouchi, Narita and Ōuchi, 1996:18)。日本产业政策的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可选择的产业化模式引入发展中国家之后,日本也尝到了苦果,比如说,巴西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就采用了直接威胁日本汽车生产商利益的“民族汽车”政策。

304 经济战略观现在也需要升级。日本逐步形成的经济体制最初是为了应对大规模生产,其特点是制造技术、同质性和熟练劳动力的大生产。新的信息革命时代,要求日本经济在开发制造产品技术和利用产品技术之间进行“第二次产业分工”,采用具有高密集度信息和知识特点的技术,其功能不是生产最终产品,而是使利用者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制造产品的技术可以举日本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汽车业和家用电器业为例。利用产品的技术则以美国借以主宰全球竞争的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利用产品的技术不仅重新阐释了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且还对经济制度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Imai, 1993; Uchihashi and Yakushiji, 1993)。利用产品的技术在竞争上要求单个企业的灵活性和雇员的高度创新能力,这一点又和市场的动态发展、个人主义、高度工作流动性以及绩优工资体制紧密相关。在这种条件下,过去制度化了的政府干预不仅保护了一批产业,而且在这些产业耗尽了因边际成本下降带来的增长潜力后,还在继续保护这些产业。制

度化的政府干预还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最近由住房贷款引发的日本金融体系的危机。这表明,经济的动态发展受到了政府规制的制约,在最近这次衰退中,日本政府反应迟缓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通过非市场治理结构限制竞争的做法也面临重大危机。强势的政府规制不仅延迟了经济从衰退中复苏的步伐,也造成了日本与其他国家的高度紧张。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扩张能力加深了国际贸易中的摩擦,关联公司集团和反垄断问题成了美国政策制定者主要考虑的两大问题。在《结构性障碍动议》中,反垄断法的改进和强化不仅被视为消除排他性企业活动的措施,还被视为促进日本进口并改善日本外国企业投资环境的工具。在1995年日美关于汽车问题的双边谈判中,日本汽车厂商只从自己的下属企业购买部件的关联做法就是一个主要问题。在日本,减少政府规制和强化反垄断法被视为细川内阁的两大政策目标。按照平岩委员会(Hiraiwa commission)的提案,严厉的反垄断法有助于加强解除管制的效果,有助于打破政企联合体,有助于更有效地处理公平竞争和经济平等问题。由于缺乏竞争,日本消费者承受的消费价格要比所有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消费者都高。尽管这时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名列世界第一,但日本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却不成比例地低。加之私营企业受政府规制的限制,根本不能进行创新性竞争。在需要有企业家精神才能将经济从萧条中拯救出来的时刻,这一问题尤为明显。如果不撤销管制,日本企业就只能将公司总部设在东京,这种人口的过度集中又引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

305

与拒斥利润原则紧密相关的效率问题也再度变得亟待解决。由于过去维持日本管理体制的两个主要因素已经消失,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两个因素中的一个就是汇率。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是约瑟夫·道奇于1949年确立的,这一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从那以后,日元一直在升值,到1995年,汇率甚至升至1美元兑换79日元。过去,有利的汇率一直是支撑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低估汇率,日本企业才能吸收隐藏于规模过大的劳动力背后的无效率。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员过剩而引发的高生产成本问题已成为日本企业的主要关注点。比如说,1992年,在1美元兑换110日元的汇率条件下,在员工超过1000人的企业中工作、年龄在50—54岁之间的大学毕业白领雇员,在制造业、批发(或零售)业以及金融业中,其

平均年收入(包括工资和红利)分别是 109 700 美元、102 000 美元和 122 200 美元。1992 年在同一企业工作且同一年龄段的男性蓝领工人的平均收入则是 64 222 美元。在 55 岁退休时,白领员工可以领到的一次性退休津贴平均为 245 454 美元,蓝领员工则可以领到 181 818 美元(Kamiyo, 1994:23)。

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力结构问题。按照年功序列制,雇员越年轻,尽管生产率高,但是工资收入却很少,相反那些年龄更大但生产效率较低的雇员,工资收入却更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项制度在将收入从年轻人手上转到年老人手上的再分配过程中,在减少日本企业的全部劳动成本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几十年前日本大企业实行这种工资制度时,日本劳动力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的一代,所以他们获得的是较低的工资收入。现在,日本的劳动力进入了一个低增长的老龄化时代,生产成本就成了日本企业的沉重负担(Shimada, 1994a)。此外,现在的年轻人更注重当前收入而不是未来收入,这与年功序列制的原则正好相反。306 这些年轻人也喜欢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不是更多的收入,他们更倾向于按能力提升并确定工资的工资制度。在公司的增长前景和经济增长前景看好的情况下,年轻的雇员也会接受年功序列制,因为在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公司能够付给他们更高的工资。但现在的公司前景和经济前景都不太看好,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雇员们宁愿选择绩优工资制,这样才能使他们从为公司所做工作中得到好处(Keizai Kikakuchō, 1994:246-247)。

正是由于这些巨大的挑战,所以在近期有关日本经济体制的讨论中,日本发展主义的历史偶然性已经引起了很多关注。正如野口悠纪雄(Noguchi Yukio, 1995)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日本经济体制的起源并不像日本人所设想的那么久远,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家动员。这一体制是创造出来应对总体战争的,它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产物,是可以改变的。

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变阶段。它会转向何方呢?会转变成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类型吗?本书中所阐述的战时遗产和战后日本面临的新挑战的相互作用模式对理解未来极具启发性。这一模式意味着,在日本经济面临重大挑战之时,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经常被用来应对改革的迫切需要。但最终解决方法却常常是经过改革的旧时遗产。这种应对模式看来还会继续下去。正如山内之靖(Yamanouchi *et al.*, 1996:11, 18-19)所说的那样,日本经济体制将

转向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的说法没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日本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中现代资本主义大转变的一种类型。

西蒙·赖克(Simon Reich)在就法西斯主义对德国战后繁荣之影响的分析中指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上，这种研究忽视了法西斯主义的后果问题。在冷战时期，西方联盟想要这个世界相信，他们的胜利是完整的，而且是决定性的。因此，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作为新极权主义威胁的共产主义替代了法西斯主义(1990:303-304)。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和美国之间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差别，也有意无意地遭到忽略。冷战的结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历史的机会。面对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相同的自我规制市场的失灵和国际经济的失序，工业化国家采用了三种明显不同的模式予以应对，这三种模式不仅改变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且也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打下了意识形态的和制度性的基础。在适应了民主政治体制和自由贸易体制之后，德国与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遗产导致了另一种战后资本主义模式的产生。随着冷战的结束，再次抬头的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又引发了冲突和紧张，自由资本主义和发展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挑战。正因此，日本发展主义才值得认真研究。

英文参考文献

- Abegglen, James C. 1958. *The Japanese Factor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Albert, Michel. 1993. *Capitalism versus Capitalism: How America's Obsession with Individual Achievement and Short-Term Profit Has Led It to the Brink*. New York: Four Walls Eight Windows.
- The Advisory Group on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for International Harmony. 1986. "The Report of the Advisory Group on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for International Harmony." I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earings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Ninety-Nin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December 11 and 12, 1986*.
- Anesaki, Masaharu. 1921. "The War's Effect upon the Japanese Mind." In K. K. Kawakami, ed., *What Japan Thinks*. London: Macmillan, pp. 143-159.
- Aoki, Masahiko. 1989. "The Japanese Firm in Transition." In Kozo Yamamura and Yasukichi Yasuba,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1: The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63-288.
- Apter, David E.,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93-127.
- Ayusawa, Iwao F. 1940. "The New World Order: A Japanese View." *Contemporary Japan* 9(7): 791-810.
- Barkai, Avraham. 1990. *Nazi Economics: Ideology, Theory, and Policy*. Oxford: Berg.
- Barnhart, Michael A. 1987.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endix, Reinhard. 1960.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Berger, Gordon Mark. 1977. *Parties Out of Power in Japan, 1931—194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rger, Peter, and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Biggart, Nicole Woolsey. 1991. "Explaining Asi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20: 199-232.
- Blaug, Mark. 1992.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inder, Alan S. 1990. "There Are Capitalists, Then There Are the Japanese." *Business Week*, Oct. 8:21.
- Block, Fred. 1990. *Postindustrial Possibil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ock, Fred. 1994.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691-710.
- Blomstrom, Magnus, and Bjorn Hettne. 1984. *Development Theory in Transition*. Lon-

- don: Zed Books.
- Breuilly, John. 1982.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rinkly, Alan. 1989. "The New Deal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In Steve Fraser and Gary Gerstle,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w Deal Order: 1930—19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85-121.
- Brown, Delmer M. 1955. *Nationalism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ns, James M. 1978. *Leadership*. New York: Harper & Row.
- Burstein, Paul. 1991. "Policy Domains: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Policy Outcom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327-350.
- Business Week*. 1994. Special Issue: 32.
- Calder, Kent E. 1988. *Crisis and Compens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lder, Kent E. 1994. *Strategic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ldwell, Bruce J. 1982. *Beyond Positivism: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 Unwin.
- Campbell, John 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eds. 1991.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John L., and Leon N. Lindberg. 1991. "The Evolution of Governance Regimes." In John L. Campbel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eds.,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19-355.
- 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and Enzo Faletto.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Jerome B. 1949. *Japan's Economy in War and Reconstr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ole, Robert E. 1972. "Permanent Employment in Japan: Facts and Fantasies."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26:615-630.
- Crowley, James B. 1966. *Japan's Quest for Aut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umings, Bruce. 1984.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Industrial Sectors, Product Cycles,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1):1-40.
- Davis, Horace B. 1967.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Degenaar, J. J. 1982. *The Roots of Nationalism*.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cademica Pretoria.
- DiMaggio, Paul. 1988. "Interest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Lynne G. Zucker, ed., *Institutional Patterns and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Ballinger, pp. 3-21.
- DiMaggio, Paul. 1990. "Cultural Aspects of Economic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eds.,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p. 113-136.
- DiMaggio, Paul, and Walter R.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47-160.
- DiMaggio, Paul J., and Walter W. Powell. 1991. "Introduction." In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

- 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38.
- Dimock, Marshal E. 1968. *The Japanese Technocracy: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in Japan*. New York: John Weatherhill.
- Dobbin, Frank. 1993.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ory and Society* 22:1-56.
- Dobbin, Frank. 1994. *Forging Industrial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11 Dore, Ronald. 1973. *British Factory, Japanese Factory: The Origins of National Diversity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ore, Ronald. 1983. "Goodwill and the Spirit of Market Capit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4:459-482.
- Dore, Ronald. 1986. *Flexible Rigid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re, Ronald. 1987. *Taking Japan Seriously*. London: Athlone Press.
- Dower, John W. 1988. *Empire and Aftermath*.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Duus, Peter, and Daniel I. Okimoto. 1979. "Fascism and the History of Pre-war Japan: The Failure of a Coucep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xix: pp. 39-64.
- Dyson, Kenneth. 1983. "The 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Structural Context." In Kenneth Dyson and Stephen Wilks, eds., *Industrial Cri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ate and Industry*. Oxford: Martin Robinson, pp. 26-66.
- Eccleston, Bernard. 1989. *State and Society in Post-War Japan*. Cambridge, U. K. : Polity Press.
-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1990a. *The Japanese Economy, 1945—1955*. Tokyo: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Government of Japan.
-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1990b. *The Japanese Economy, 1955—1965*. Tokyo: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Government of Japan.
- The Economist. 1994. "Oriental Renaissance: A Survey of Japan." *The Economist* July 9: 3-18.
- Elster, Jon. [1979]1984. *Ulysses and the Sir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ster, Jon. 1990a.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In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7-118.
- Elster, Jon. 1990b. "Jon Elster."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33-248.
- Entwestle, Basil. 1985. *Japan's Decisive Decade*. London: Grosvenor Books.
- Erhard, Ludwig. 1963. *The Economics of Success*. Princeton: D. Van Nostrand.
- Etzioni, Amitai. 1988. *The Moral Dimension: Toward a New Economic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Evans, Peter B.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Peter B., and John D. Stephens. 1988.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Neil J. 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pp. 739-773.

- Fallows, James. 1994. *Looking at the Su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alt, Olavi K. 1985. *Fascism, Militarism or Japanism?* Rovaniemi, Finland: Pohjois-Suomen Historiallinen Yhdistys, Societas Historica Finlandiae Septentrionalis.
- Fine, Sherwood M. 1952. "Japan's Postwar Industrial Recovery." *Contemporary Japan* 21 (4-6):165-216.
- Flanagan, Scott C. 1983.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In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Vol. 6*. Tokyo: Kodansha, pp. 240-244.
- Fletcher, William Miles, III. 1975. "Ideologie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 Ryū Shintarō Rōyama Masamichi, and the Shōwa Research Association."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Fletcher, William Miles, III. 1982.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Prewar Jap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Fligstein, Neil. 1990.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rancks, Penelope. 1992. *Jap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312
- Friedland, Roger, and A. F. Robertson, eds. 1990. *Beyond the Marketplac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Friedman, Milton. [1953] 1984.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Daniel M. Hausman, ed.,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10-244.
- Friedman, David. 1988.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ukunaga, Hiroshi. 1995. "Reform Is Possible." *Tokyo Business Today* 63(9) Sept. : 3.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3-19.
- Fujisawa, Chikao. 1932. "Japan versus Marxism." *Contemporary Japan* 1(3):441-452.
- Fujisawa Rikitaro. 1921.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K. K. Kawakami, ed., *What Japan Thinks*. New York: Macmillan, pp. 21-48.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3-18.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ao, Bai. 1994. "Arisawa Hiromi and His Theory for a Managed Economy."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0(1):115-153.
- Garon, Sheldon. 1987. *The State and Labor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reffi, Gary. 1990a.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 Overview." In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31.
- Gereffi, Gary. 1990b.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omestic Policies." In Alberto Martinielli and Neil J. Smelser, eds., *Economy and Society: Overviews in Economic Sociology*. London: Sage, pp. 231-258.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6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erschenkron, Alexander. [1952] 199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

- tive."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111-132.
- Giersch, Herbert, Karl-Heinz Paque, and Holger Schmieding. 1992. *The Fading Miracle: Four Decades of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sli, Palsson. 1991. *Coastal Economies, Cultural Accoun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luck, Carol. 1985.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Judith. 1993. *Ideas,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Judith,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1993.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Andrew. 1985. *The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 Heavy Industry, 1853—1955*.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Gordon, Andrew. 1991.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tō, Fumihiko, Kazutomo Irie, and Akihiko Soyama. 1990.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f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ia-Pacific Free Trade Area Proposals and Japan's Choice*.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 313 Gourevitch, Peter A. 1987. *Politics in Hard T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ourevitch, Peter A. 1989. "Keynesian Politics: The Political Sources of Economic Policy Choices." In P. A.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87-106.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81-510.
- Granovetter, Mark. 1990. "Mark Granovetter."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96-115.
- Gudeman, Stephen. 1986. *Economics as Culture: Models and Metaphors of Livelihoo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Hadley, Eleanor M. 1989. "The Diffusion of Keynesian Ideas in Japan." In Peter A.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ey, John O. 1988. *Law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Japan*. Dubuque: Kendall Hunt.
- Haley, John O. 1991. *Authority without Power: Law and the Japanese Parado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1989.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milton, Gary G., and Nicole Woolsey Biggart. 1988. "Market, Culture, and Author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Far Ea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52-94.
- Harding, Thomas G., David Kaplan, Marshall D. Sahlins, and Elman R. Service, eds. 1970.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Hausman, Daniel M. , ed. 1984.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clo, Hugh. 1974.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in, Laura E. 1990. *Fueling Growth*.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Hein, Laura E. 1994. "In Search of Peace and Democracy: Japanese Economic Debate in Political Contex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3(3):752-778.
- Hicks, John. 1969.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58.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71. *A Bias for Hop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80. *Moralit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 Durable Tension*. Memphis, Tennessee: P. K. Seidman Foundation.
- Hirschman, Albert O. 1986. *Riv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 Hirschman, Albert O. 1989. "How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Was Ex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mments." In Peter A. Hall, ed. ,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irschman, Albert O. 1990. "Albert O. Hirschman." In Richard Swedberg, ed. ,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52-166.
- Hoston, Germaine A. 1983. "Tenkō & Marxism in Prewar Japan." *Polity* 16(1):96-118.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22-49.
- Huppes, T. 1976.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owards an Integration*.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 Hampden-Turner, Charles. 1993. *The Seven Cultures of Capitalism: Value Systems for Creating Wealth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France, Britain, Weden, and Holland*. New York: Doubleday.
- Ikenberry, John. 1990.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Privatization Policies: Inducements, Learning, and 'Policy Bandwagoning.'" In Ezra N. Suleiman and John Waterbury, eds. ,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Sector Reform and Privatiz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pp. 88-110.
- Isaac, Larry W. , and Larry J. Griffin. "Ahistoricism in Time-Series Analyses of Historical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6):873-890.
- Ishihara, Shintaro. 1989.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Ishii Ryōsuke. 1980. *A Hist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Japan*.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 Itō, Monoshige, Kiyono Kazuharu, Ōkuno Masahiro, and Suzumura Kōtarō, eds. 1991. *Economic Analysis of Industrial Policy*.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Jacobsen, John K. 1995. "Much Ado About Ideas: The Cognitive Factor in Economic Policy." *World Politics* 47(2):283-310.
- Johnson, Chalmers. 1977. "MITI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In Robert Scalapino, ed. , *The Foreign Policy of Moder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

- nia Press, pp. 227-279.
- Johnson, Chalmers. 1982.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8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36-164.
- Johnson, Chalmers. 1988. "Study of Japanese Political Economy: A Crisis in Theory." In The Japan Foundation, ed.,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 Tokyo: Japan Foundation, pp. 95-113.
- Johnson, Chalmers. 1990[1964]. *An Instance of Treason: Ozaki Hotsumi and the Sorge Spy R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Chalmers. 1993. "Comparative Capitalism: The Japanese Difference."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5(4) Summer: 51-67.
- Johnson, Chalmers. 1995. *Japan: Who Governs? The Rise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New York: W. W. Norton.
- Kaplan, Eugene J. 1972. *Japan: The Government — Business Relationship*. Washington, D. C. :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Keynes, John Neville. [1917] 1984.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Daniel M. Hausman, ed.,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An Ant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0-98.
- Kinzley, William D. 1991. *Industrial Harmony in Modern Japan: The Invention of a Tra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ohli, Atul. 1994. "Where do High Growth Political Economics Come From? The Japanese Lineage of Korea's 'Developmental State'." *World Development* 22(9) Sept. : 1269-1293.
- Kohn, Hans. 1985.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Malabar, Florida: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
- Komiya, Ryūtarō. 1986. "Industrial Policy's Generation Gap." *Economic Eye* 7:22-24.
- 315 Komiya, Ryūtarō, ed. 1988.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Orlando, Florida: Academic Press.
- Komiya, Ryutaro and Kozo Yamamura. 1981. "Japan: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Economic Affairs." In A. W. Coats, ed., *Economists in Government,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262-290.
- Krasner, Stephen D.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16:223-246.
- Krauss, Ellis S., Thomas P. Rohlen, and Patricia G. Steinhoff, eds. 1984. *Conflict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e, Robert E. 1991. *The Market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zonick, William. 1991.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coln, James R. , Hanada Mitruyo, and Kerry McBride. 1986.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n Japanese and U. S. Manufacturing."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338-364.
- Lincoln, James R. , and Kerry McBride. 1987. "Japanese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289-312.
- Lindberg, Leon N. , and John L. Campbell. 1991. "The Stat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John L. Campbel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eds. ,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56-390.
- Lindberg, Leon N. , John L. Campbell, and J. Rogers Hollingsworth. 1991.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John L. Campbell,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Leon N. Lindberg, eds. , *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34.
- List, Friedrich. [1841] 1985.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MacArthur, Douglas. [1947] 1982. "General MacArthur's Letter on the Food Situ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zation." In Ōkurashō Zaiseishitsu, ed. , *Shōwa zaiseishi: shūsen kara kōwa made*. Tokyo: Keizai Shinpōsha, Vol. 20 pp. 518-519.
- Marshall, Byron K. 1967. *Capit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Prewar Japa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elli, Alberto, and Neil J. Smelser, eds. 1990. *Economy and Society: Overviews in Economic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ornia: Sage.
- Matossian, Mary. 1971. "Ideology of Delayed Industrialization." In Jason L. Finkle and Richard W. Gable, eds. ,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Wiley, pp. 113-122.
- McCloskey, Donald N. 1985.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McClosky, Donald N. 1990. *If You're So Sma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Millan, Charles J. 1988. *The Japanese Industrial Syste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Meyer, John W. , and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340-363.
- Meyer, John W. , and W. Richard Scott. 1983.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Sage.
- 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 of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 Morris-Suzuki, Tessa. 1989. *A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 Morris-Suzuki, Tessa, and Seiyama Takuro. 1989. *Japanese Capitalism Since 1945*.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 Murakami, Yasusuke. 1987. "The Japanese Model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ozo Yamamura and Yasukichi Yasuba, eds.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1 The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kane, Chie. 1970. *Japa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eff, Robert. 1993. "Well, It's a Start: Japan Talks Deregulation at Last and More Chan-

- ges May Be Coming." *Business Week*, 13 September:48-49.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berschall, Anthony, and Eric M. Leifer. 1986. "Efficiency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Uses and Misuses of Economic Reasoning i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2: 233-253.
- Okada, Tadahiko, 1940. "On Japan's Position." *Contemporary Japan* IX(8): 968-971.
- Okimoto, Daniel I. 1989. *Between MITI and the Market: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for High Tech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Ōkita, Saburō. 1982. *Japan's Challenging Years: Reflections on My Lifetime*.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Ōkita, Saburō. 1990. "The Role of the Economist in Government: Japan." In Ōkita Saburō, *Approaching the 21st Century: Japan's Role*. Tokyo: The Japan Times.
- Okuma, Shigenobu. 1921. "Illusions of the White Race." In K. K. Kawakami, ed., *What Japan Thinks*. London: Macmillan, pp. 160-170.
- Olson, Mancur. [1965]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ancur.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Orru, Marco, Nicole Woolsey Biggart, and Gary G. Hamilton. 1991. "Organizational Isomorphism in East Asia: Broadening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Walter Powell and Paul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uchi, William. 1981. *Theory Z*.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 Ouchi, William. 1984. *The M-form Society*.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 Ozaki, Robert S. 1988. "The Humanistic Enterprise System in Japan." *Asian Survey* 28(8): 830-848.
- Patrick, Hugh. 1977. "The Future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Output and Labor Productivity."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Summer: 239.
- Peacock, Alan, and Hans Willgerodt, eds. 1989. *German Neo-Liberals and 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 Peacock, Alan, and Hans Willgerodt, eds. 1989. *Germany's Social Market Economy: Origins and 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 Peattie, Mark R. 1975. *Ish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empel, T. J. 1982. *Policy and Politics in Japan: Creative Conservat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ittau, Joseph. 1983. "Meiji Constitution." In *Kodansha Encyclopedia of Japan, Vol. 2*. Tokyo: Kodansha, pp. 1-3.
- Polanyi, Karl. [1944]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Popper, Karl R.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of London.
- Powell, Walter, and Paul DiMaggio, eds.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reston, Nathaniel Stone. 1967.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ower: Ideology and Practice under Capitalism, Socialism, Communism, and Fascism*. New York: Macmillan.
- Pyle, Kenneth B. 1974. "Advantages of Followership: German Economics and Japanese Bureaucrats, 1890—1925."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1):127-164.
- Pyle, Kenneth B. 1989. "Meiji Conservatism." In Marius Janse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yle, Kenneth B. 1990. "Japan, the World, an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akashi Inoguchi and Danial I. Okimoto,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 Vol. 2: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Contex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46-486.
- Pyle, Kenneth B. 1992. *The Japanese Question*. Washington, D. C. : AEI Press.
- Quadagno, Jill, and Stan J. Knapp. 1992. "Have Historical Sociologists Forsaken Theory?" *Sociological Method & Research*, 20(4):481-507.
- Reddy, William M. 1984. *The Rise of Market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ich, Simon. 1990. *The Fruits of Fascism: Postwar Prosper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Reisman, Davis A. 1976. *Adam Smith's Sociological Economics*. London: Croom Helm.
- Robbins, Lionel. 1935.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 Rogers, Everett M. 198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Rohlen, Thomas P. 1974. *For Harmony and Streng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sovsky, Henry, ed. 1966.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Essays in Honor of Alexander Gerschenkron*. New York: Wiley.
- Rostow, Walter. [1960] 1970.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yall, K. C. [1948] 1982. "Royall's Speech on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Japan." In Ōkurashō Zaiseishitsu, eds., *Shōwa zaiseishi: shūsen kara kōwa made (The History of Finance of the Showa Period: From the End of the War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Treaty)*. Tokyo: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Vol. 20, pp. 183-186.
- Sabel, Charles. 1994. "Learning by Monitoring: The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eil J. Smels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137-165.
- Sahlins, Marshall.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hlins, Marshall, and Elman R. Service. 1970.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akakibara, Eisuke. 1993. *Beyond Capitalism: The Japanese Model of Market Economies*. Lanham,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Samuels, Richard J. 1987. *The Business of the Japanese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muels, Richard J. 1994.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saki, Takeshi. 1991. "Postwar Japanese Politics at a Turning Point." *The Japan Foundation Newsletter* 18(5—6):1-7.
- 318 Sasaki, Takeshi, Burumi Shunsuke, Tominaga Kenichi, Nakamura Masanori, Masamura Kimihiro, and Murakami Yōichirō, eds. 1991. *Encyclopedia of Postwar Japan, 1945—1990*. Tokyo: Sanseido.
- Scalapino, Robert A. 1964. "Ideology and Modernization: The Japanese Case." In Davi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93-127.
- Schneider, H. K. 1974. *Economic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en, Amartya. 1987.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asic Blackwell.
- Sen, Amartya. 1990. "Amartya Sen."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49-267.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1.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himada, Haruo. 1983. "Japanese Industrial Relations — A New General Model? A Survey of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In T. Shirai, ed.,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Japa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 3-27.
- Smith, Anthony D. 1971.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 Steinhoff, Patricia. 1993.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Loss of Irrelevance." In 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 ed., *The Postwar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 A Historical Review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Tokyo: International House, pp. 19-35.
- Stepan, Alfred. 1978. *The State and Society: 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83. *Economic Soci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90a.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90b. "Arthur L. Stinchcombe." In Richard Swedberg, ed.,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85-302.
- Sugimori, Kōjirō. 1940. "The European War and Its Effects." *Contemporary Japan* 9(7): 964-974.
- Swedberg, Richard. 1987. "Economic Sociology: Past and Present." *Current Sociology* 35(1):1-221.
- Swedberg, Richard. 1990.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1991a.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251-276.
- Swedberg, Richard. 1991b.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and Mark Granovetter. 1992a.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Swedberg, Richard, and Mark Granovetter. 1992b. "Introduction." In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pp. 1-26.
- Swedberg, Richard, Ulf Himmelstrand, and Goran Brulin. 1990. "The Paradigm of Economic Sociology." In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7-86.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s: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273-286.
- SWNCC 150/3. [1945]1982. "United States Initial Post-Defeat Policy Relating to Japan: SWNCC 150/3." In Ōkurashō Zaiseishitsu, ed., *Shōwa zaiseishi: vol. 20: Shūsen kara kōwa made*. Tokyo: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63-67.
- Tachi, Sabutarō. 1934. "The Open Door in China and Manchuria." *Contemporary Japan* 2(4):571-587.
- Tai, Hung-chao, ed. 1989. *Confuc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 Tanaka, Tokichi. 1933. "Japan and America: Questions to Be Solved." *Contemporary Japan* 2(3):375-381.
- Thomas, George M., and John Meyer. 1984. "The Expansion of the Stat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461-482.
- Thurow, Lester. 1980. *The Zero-Sum Society: Distribution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Economic Change*. New York: Basic Books.
- Thurow, Lester. 1983. *Dangerous Currents: The State of Econom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Thurow, Lester. 1991. "Competing Games: Profit Maximization versus Strategic Conquest." In Richard M. Coughlin, ed., *Morality,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pp. 119-132.
- Thurow, Lester. 1992.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Tilly, Charles. 1975. "Western State-Making and Theori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p. 601-639.
- Tilton, Mark. 1996. *Restrained Trade: Cartels in Japan's Basic Materials Indus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surumi, Shunsuke. 1982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 1931—1945*. London: KPI.
- U. S. Government. 1982. "United States Initial Post-Defeat Policy Relating to Japan: SWNCC 150/3." In Ōkurashō Zaiseishitsu, ed., *Shōwa zaiseishi: shūsen kara kōwa made*. Tokyo: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Vol. 20.
- Veblen, Thorstein. [1899]193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Viking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1915]1939.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1919]1942.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 Vogel, Ezra F., ed. 1975. *Modern Japanese Organiz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ogel, Ezra F. 1979. *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de, Robert. 1989. "What Can Economics Learn from East Asian Success?" In Peter A. Gourevitch, e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05: The Pacific Region: Challenges to Policy and Theory*, Newbury Park, New York: Sage.
- Wade, Robert. 1990a. "Industrial Policy in East Asia: Does It Lead or Follow the Market?" In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31-266.
- Wade, Robert. 1990b.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eber, Max.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320 Weber, Max. [1921]1950.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Weber, Max. [1930]195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 Weick, Karl. 1979.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ing*.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 Weir, Margaret. 1989. "Ideas and Politics: The Acceptance of Keynesian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eter A.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3-86.
- Weir, Margaret, and Theda Skocpol. 1985. "State Structure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Keynesian'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Swede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eter B.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3-167.
- Williams, David. 1994. *Japan: Beyond the End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81. "The Economie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3):548-577.
- Windhoff-Heritier, Adrienne. 1991. "Institutions,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Choice." In Roland M. Czada and Adrienne Windhoff-Heritier, eds., *Political Choice: Institutions, Rules, and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pp. 27-52.
- Wolferen, Karel Van. 1989.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London: Macmillan.
- Wolf, S. J., ed. 1968. *The Nature of Fasc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Wrong, Dennis. 1961,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2):183-193.

- Wuthnow, Robert. 1989. *Communities of Discour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amamura, Kozo. 1967. *Economic Policy in Postwar Japan: Growth versus Economic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Yanaga, Chitoshi. 1968. *Big Business in Japanese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Zelizer, Viviana A. 1988. "Beyond the Polemics on the Market: 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genda." *Sociological Forum* 3(4):614-634.
- Zelizer, Viviana A. 1989.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Special Mon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2):342-377.
- Zink, Harold. 1974. *The United States in Germany: 1944—1945*.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 Zukin, Sharon, and DiMaggio, Paul. 1990. "Introduction." In Sharon Zukin and Paul DiMaggio, eds., *Structures of Capit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日文参考文献

- Abe Yoshishige. 1950. "Nihon no saigunbi ni tsuite" (On the Japanese rearmament). *Asahi Hyōron* Nov.:2-9.
- Akimaru Jirō. 1989. "Akimaru kikan no tenmatsu" (The Whole Story of the Akimaru Agency).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nkaï,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61-68.
- Amaya Naoyasu, Komiya Ryūtarō, and Sakamoto Jirō. 1962. "Atarashii sangyō taisei to keizai seisaku" (New Industrial System and Economic Policy). *Keizai Hyōron* Aug. : 71-87.
- Andō Yoshio, ed. 1966. *Shōwa keizaishi e no shōgen* (The Testimony of Showa Economic History).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 Andō Yoshio. 1987. *Taiheiyō sensō no keizaishiteki kenkyū* (Studi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Pacific War).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Arisawa Hiromi. 1934. *Sangyō dōin keikaku* (Planning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Tōkyō: Kaizōsha.
- Arisawa Hiromi. 1937a. *Keizai tōseika no nihon* (Japan Under the Managed Economy). Tōkyō: Kaizōsha.
- Arisawa Hiromi. 1937b. *Sensō to keizai* (War and Economy).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Arisawa Hiromi. 1937c. *Nihon kōgyō tōsei-ron* (The Industrial Control in Japan). Tōkyō: Arikai Kaku.
- Arisawa Hiromi. 1948a. "Fukahitekina mono" (An Inevitable Thing). In Arisawa Hiromi, *Infureishon to shakaika*.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3-30.
- Arisawa Hiromi. 1948b. "Nihon infureishon no mondai"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 in Japan). In Arisawa Hiromi, *Infureishon to shakaika*.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33-51.
- Arisawa Hiromi. 1948c. "Nihon keizai no hakkyoku o sukū mono" (The Strategy That Can Save Japan from Economic Collapse). In Arisawa Hiromi, *Infureishon to shakaika*.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53-69.
- Arisawa Hiromi. 1948d. "Kiki toppa no shōten" (The Focal Point of Tiding Over the Crisis). In Arisawa Hiromi, *Infureishon to shakaika*.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70-79.
- Arisawa Hiromi. 1948e. "Hitosuji no michi" (A Road). In Arisawa Hiromi, *Infureishon to shakaika*.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80-99.
- Arisawa Hiromi. 1948f. "Shakaika no riron no tame ni" (For a Theory of Socialization). In Arisawa Hiromi, *Infureishon to shakaika*.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125-150.
- Arisawa Hiromi. 1949a. "Genka no keizai jōsei ni tsuite" (On the Present Economic Situation). *Asahi hyōron* Oct. : 27-34.
- Arisawa Hiromi. 1949b. "Kyūgensoku no jisshi wa bukka chingin ni dō hibiku ka" (How Do the Nine Principles Influence the Salary and the Price)? *Jitsugyō no nihon* Mar. 15:2-5.

- Arisawa Hiromi. 1949c. "Senji Sengo no Kōgyō oyobi Kōgyō Seisaku (Industrie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In Yanai Haratadao, ed., *Sengo nihon keizai no shomondai*. Tōkyō: Yūhikaku, pp. 57-139. 322
- Arisawa Hiromi. 1949d. *Keizai seisaku no nōto* (Notes on Economic Policy). Tōkyō: Gakufū Shoin.
- Arisawa Hiromi. 1951a. "Nihon keizai no saikentō" (A Reexamination of Japanese Economy). *Chūō kōron* Aug. : 4-12.
- Arisawa Hiromi. 1951b. "Nihon Shihonshugi to saigunbi" (The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the Rearmament). *Sekai* Mar. : 26-36.
- Arisawa Hiromi. 1952a. "Saigunbi no keizaigaku" (Economics of Rearmament). *Sekai* 78(June): 18-30.
- Arisawa Hiromi. 1952b. "Sekaiteki gunkaku no naka ni aru nihon keizai no mujun" (The Contradiction of Japan's Economy in the Worldwide Military Expansion). *Shakaishugi* 1(June): 4-6.
- Arisawa Hiromi. 1953a. "Heiwa no keizaiteki kiso"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Peace). *Fuebian kenkyū* 4(May): 1-6.
- Arisawa Hiromi. 1953b. "Heiki seisan to nihon keizai"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Chūō Kōron* Jan. : 14-22.
- Arisawa Hiromi. 1953c. "Tenki ni chokumen suru nihon keizai"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ransition). *Fuebian kenkyū* June: 1-36.
- Arisawa Hiromi. 1953d. "Nihon keizai to saigunbi ni mondai"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the Issue of Rearmament). *Fuebian kenkyū* Nov. : 1-11.
- Arisawa Hiromi. 1956a. "Shihonshugi no kunō" (The Trouble with Capitalism). *Fuebian kenkyū* 7(1): 1-13.
- Arisawa Hiromi. 1956b. "Nihon shihonshugi to koyō" (The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Employment). *Sekai* Jan. : 23-34.
- Arisawa Hiromi. 1957. "Keizai kakudai wa koyō mondai o kaiketsu shiuru ka" (Is It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by Economic Expansion?). *Sekai* Mar. : 34-44.
- Arisawa Hiromi. 1960. *Gendai nihon sangyō kōza* (Lectures on Modern Japanese Industry). Tōkyō: Iwanami Shoten, Vol. 8.
- Arisawa Hiromi. 1967. "Shakaishugi no rinen to keizai seisaku ni okeru riarizumu" (The Ideal of Socialism and the Realism in Economic Policies).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67-300.
- Arisawa Hiromi. 1969. *Seisansei to nihon keizai* (Productivity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Tōkyō: Nihon Seisansei Honbu.
- Arisawa Hiromi. [1950] 1970. "Nihon shihonshugi no unmei" (The Fate of Japanese Capitalism). In Kanamori Hisao, ed., *Bōeki to kokusai shūshi*.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20-22.
- Arisawa Hiromi, ed. 1976. *Shōwa keizaishi* (The History of the Shōwa Economy).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Arisawa Hiromi. 1978. "Seisaku to genjitsu no tanima" (In the Valley between Policy and Reality). In Kondō Kanichi and Osanai Hiroshi, eds.,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

-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Vol. 3, pp. 12-29.
- Arisawa Hiromi. 1988. "Intabiū" (Interview). In Keizai Kikakuchō, ed.,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pp. 79-99.
- Arisawa Hiromi. [1957] 1989. *Gakumon to shisō to ningen to — wasurenu hitobito* (Scholarship, Theories, and Personalities — Unforgettable People).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323 Arisawa Hiromi. 1989a. *Arisawa Hiromi sengo o kataru: Shōwashi e no shōgen* (Arisawa Hiromi's Talk on the Postwar Era: The Testimony of Showa History).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Arisawa Hiromi. 1989b. *Rekishi no naka ni ikiru* (Living in History).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Arisawa Hiromi. 1989c. "Ryakunenpo" (A Brief Resume).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nkaï, ed., *Rekishi no naka ni ikir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295-316.
- Arisawa Hiromi. 1989d. *Arisawa Hiromi kataru sengo keizai shi* (The History of the Showa Economy Told by Arisawa Hirom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Arisawa Hiromi, Aihara Shigeru, and Ōkawa Kazushi. 1959. "Atarashii Furoncha: kijutsu kakushin" (New Fronti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konomisuto* Feb. 7:54-59.
- Arisawa Hiromi and Inaba Hidezō. 1966. *Shiryō sengo nijunenshi* (Literature on Twenty Years' Postwar History).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Vol. 2.
- Arisawa Hiromi, Minobe Ryōkichi, Nagasu Kazuji, Itō Mitsuharu, and Miyazaki Isamu. 1960. "Kōseichō wa kokumin seikatsū o yūdaka ni suru ka?" (Does the High Growth Enrich the Japanese Life?). *Sekai* Nov.:19-35.
- Arisawa Hiromi and Ōkita Saburō. 1966. "Keizai saiken to keisha seisan" (Economic Recovery and Priority Production). In Andō Yoshio, ed., *Shōwa keizai shi e no shōge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Vol. 3, pp. 274-293.
- Arisawa Hiromi, Ōuchi Hyōe, Naitō Katsu, and Minobe Ryōkichi. 1965. "Kōsai hakkōron o hihan suru" (Criticism of the Pro-Public Debt Approach). *Sekai* 241 (Dec.): 53-73.
- Arisawa Hiromi, Ōuchi Hyōe, Wakimura Yoshitarō, Takahashi Masao, and Minobe Ryōkichi. 1946. *Nihon infureishon no kenkyū* (The Elimination of Inflation in Japan). Tōkyō: Kōdosha.
- Arisawa Hiromi and Tamanoi Yoshirō. 1973. *Kindai nihon o kangaeru* (Thinking about Modern Jap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 Arisawa Hiromi, Tōbata Seiichi, and Nakayama Ichirō, eds. 1960. *Keizai shutaisei kōza* (On Economic Subjectivity).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Vol. 7, *History* 2, pp. 248-284.
- Arisawa Hiromi, Tōbata Seiichi, Nakayama Ichirō, Wakimura Yoshitarō, and Ōkita Saburō. 1960. "Keizai shutai kara mita nihon shihonishugi" (The Japanese Capitalism Seen in Economic Subjectivity). In Arisawa Hiromi, Tōbata Seiichi, and Nakayama Ichirō, eds., *Keizai shutaisei kōza*.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Vol. 7, *History* 2, pp. 248-284.
- Arisawa Hiromi and Tsuchiya Hiyoshi, eds. 1967. *Shihon jiyūka*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Tōkyō: Shakai Shisōsha.
- Arisawa Hiromi, Watanabe Takeshi, Tsuchiya Kiyoshi, Hotta Shōzō, and Wakimura Yoshitarō. 1949. "Keizai saiken no shomondai" (The Problems in the Economic Recon-

- struction). *Chūō kōron* Mar. : 4-15.
-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inkai, ed. , 1989. *Kaisō* (Recollectio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Asahi Shinbunsha. 1967. *Nihon no hōei to keizai* (The Defense and the Economy in Japan). Tōkyō: Asahi Shinbunsha.
- Baba Keinosuke. 1967. "Yutaka no chokkanryoku" (The Great Power of Intuition).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23-232.
- Baba Shūichi. 1969. "1930 nendai ni okeru nihon chishikijin no dōkō" (The Orientation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in 1930s). *Shakai kagaku kenkyū* , 21(1) :67-207.
- Chō Yukio. 1974a. *Ishibashi: hito to shisō* (Ishibashi: The Man and His theory).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324
- Chō Yukio. 1974b. *Shōwa Kyōkō* (The Showa Depression). Tōkyō: Iwanami Shoten.
- Chō Yukio and Sumiya Kazuhiko, eds. 1971. *Kindai nihon keizai shisōshi* (The Modern History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Tōkyō: Yūhikaku.
- Ebata Kiyoshi, ed. 1969. *Kaisō Ryū Shintarō* (In Memory of Ryū Shintarō). Tōkyō: Asahi Shinbunsha.
- Ekonomisuto*. 1950a. "Yūshutsu sōshin o naigai yō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Prevent Exports). July 21:19-26.
- Ekonomisuto*. 1950b. "Nihon teichingin to kokusai hikaku" (Japan's Low Wage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une 21:31-32.
- Ekonomisuto*. 1955. "Seisansei undō no teikō to kyōryoku" (The Re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in Productivity Movements), July 9:50-52.
- Ekonomisuto*. 1961. "Kindai keizai gakkai no nūberu bagu" (The Nobel Bag Among Modern Economists). Jan. 3:108-112.
- Ekonomisuto*. 1965. "Fukyō taisaku, yatō wa dō kaneru?" (Countermeasures to Depression, What Do the Nongovernment Parties Think?). Aug. 31:40-44.
- Fukuda Takeo. 1965. "Keizai fukyō to kōsai hakkō" (Economic Depression and the Issue of Public Debts). *Gendai no gan* 6(9):45-52.
- Gaimushō. 1947. *Seifu hakusho no hitsuyōsei* (The Necessity of the Government White Paper).
- Gaimushō. [1946] 1990. "Kaitei nihon keizai saiken no kihon mondai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Basic Problems of th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Nakamura Takafusa and Ōmori Tokuko, eds. , *Nihon keizai saiken no kihon mond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sha, pp. 143-263.
- Gotō Ryūnosuke. [1966] 1993. "Konoe shintaisei" (Konoe's New Order). In Andō Yoshio, ed. , *Shōwa keizaishi e no shōgen*. Tōkyō: Hara Shobō, Vol. 3, pp. 169-197.
- Gotō Yōnosuke. 1956. "Gijutsu kakushin to wa nani zo ya?" (What I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konomisuto*, Betsusatsu (separate volume) (Autumn):9-24.
- Gotō Yōnosuke. 1957. "Keiki dōkō to junkan kyokumen no rikai no tame ni"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Trend and Cycle). In Shimomura Osamu, ed. , *Keizai seichō jitsugen no tame ni*. Tōkyō: Kōchikai, pp. 251-268.
- Gotō Yonosuke and Shishido Toshio. 1958. "Gijutsu kakushin to nihon keizai" (Technologi-

- cal Innovation and Japanese Economy). *Ekonomisuto* Feb. 1:52-55.
- Hall, Ivan. 1990. "Nihon no chishikijin yo, motto yūki o" (Japanese Intellectuals, Be More Brave). *Chūō kōron* Apr. :288-303.
- Hara Akira. 1972. "Keisai shintaisei" (New Economic Order). In Nihon Seijigakukai, ed., "*Konoe shintaisei*" no kenkyū.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71-133.
- Hara Akira. 1982. "Mondai teiki" (Introduction of the Issues). In Shakai Keizaishi Gakkai, ed., *1930 nendai no nihon keiz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3-22.
- Hara Akira. 1990. "Kaitai" (Introduction). In Nakamura Takafusa and Hara Akira, eds., *Keizai fukkō keikak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3-15.
- Hara Akira. 1995a. "Sengo gojūnen to nihon keizai" (The Fifty Years in the Postwar Era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Nenpō nihon gendaishi 1995 — sengo gojūnen no shiteki kenshō*. Tōkyō: Higashi Shuppan, pp. 79-111.
- Hara Akira, ed. 1995b. *Nihon no senji keizai* (Japan's Wartime Economy).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325 Hara Akira. 1995c. "Nihon no senji keizai-kokusai hikaku no shiten kara" (Japan's Wartime Economy — Wit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ara Akira, ed., *Nihon no senji keiz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3-44.
- Hara Akira and Miwa Ryōichi. 1992. "Keizai kaikaku-higunjika to keizai minshuka" (Economic Reforms — Demilitarization and Economic Democratization). In Sodei Rinjirō and Takemae Eiji, eds., *Sengo nihon no genten*. Tōkyō: Yūshisha, Vol. 1, pp. 355-426.
- Hara Yūzō. 1940. *Nihon tōsei keizai-ron* (On Japanese Managed Economy). Tōkyō: Chikura Shobō.
- Hata Ikuhiko. 1981. *Senzenki nihon kanryōsei no seido, sōshiki, jinji*. (The Institution of Bureaucracy in Prewar Japan,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Hata Ikuhiko. 1982. *Shōwashi no gunjin tachi* (The Military Men in the Showa History). Tōkyō: Bungei Shunjū.
- Hata Ikuhiko. 1983. *Kanryō no kenkyū* (Studies on Bureaucrats). Tōkyō: Kōdansha.
- Hayasaka Tadashi, Masamura Kimihiro, Takeyama Morio, Hamaguchi Haruhiko, Shibata Toshio, and Hoshino Akiyoshi. 1974. *Sengo nihon no keizaigaku* (Economics in Postwar Japan).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Hayashi Yoshinori. 1965. "Hanazakari ni kōsai hakkōron" (The Boom of the ProNational Debt Argument). *Ekonomisuto* June 22:30-34.
- Heiwa Mondai Danwakai. [1959] 1966. "Heiwa mondai danwakai seimei" (The Public Statement of the Forum of Peace). In Tsuji Kiyooki,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142-144.
- Hiwatari Nobuhiro. 1991. *Sengo nihon no shijō to seiji* (Postwar Japanese Market and Politics).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Hooks, Gregory, and Raymond A. Jussaume, Jr. 1995. "Sensō kōi to kokka no hen'yō: daijiji sekai taisen ni okeru nihon to amerika" (The War and the Changes of the Stat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I). In Yamanouchi Yasushi, ed., *Sōryokusen to gendaika*. Tōkyō: Kashiwa Shobō, pp. 79-116.
- Horie Masaki. 1952. "Jūzoku-teki gunju sangyō no honkakuka"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 the Dependent Munitions Industries). *Keizai hyōron* Dec. :61-71.
- Horie Masaki. 1955. "Seisansei kōjō undō hihan" (Criticism on the Movement of Promoting Productivity). *Chūō kōron* Oct. : 144-155.
- Horie Shigeo. 1967. "Sekaiteki kinritaka to shihonjiyūka e no taiōsaku" (Worldwide High Interest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the Capitalist Liberalization).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84-122.
- Horikotshi Teizō. 1962. "Shinsangyō taisei wa dō aru beki ka" (What Kind of New Industrial System?). In Tōyō Keizai, ed. , *Nihon keizai to shinsangyō taisei*.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3-32.
- Hoshino Yoshirō. 1957. "Shinsangyō kakumei no tenbō" (The Outlook of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Sekai* 135 (Mar.): 63-77.
- Ide Yoshinori. 1982. *Nihon kanryōsei to gyōsei bunka* (The Japanese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the Culture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Igarashi Takeshi. 1979. "Tainichi senryō seisaku no tenkan to reisen" (The Transition of the Occupation Policies Towards Japan and the Cold War). In Nakamura Takafusa, ed. , *Senryōki nihon no keizai to seij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25-57.
- Iijima Banshi, 1941. *Shōwa Ishin* (The Showa Restoration). Tōkyō: Asahi Shinbunsha.
- Iijima Tadashi, Arai Noriko, and Kawabata Hisashi, 1983. *Keizai bunseki no rekishi to riron* (History and The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Tōkyō: Bunka Shobō Hatsubunsha.
- Ikeda Hayato. 1949. "Ikeda zaisei no hōkō" (The Direction of Ikeda Finance). *Jitsugyō no nihon* Mar. 15. :18-19.
- Ikeda Hayato. 1959. "Ikeda Hayato shi no gekkyū nibairon" (Ikeda Hayato's View on the Doubling of Income). *Ekonomisuto* Mar. 21:6.
- Ikuda, Tadakide. 1992. *Nippon kanryō yo doko e iku?* (Where Are Japanese Bureaucrats Heading?). Tōkyō: NHK Shuppan.
- Ikumi Tashiichi. 1953. "Sensō keizai-ka ni okeru kyōkō" (The Recession in the War Economy). *Keizai Hyōron* Aug. :2-12.
- Imai Kenichi. 1993. "Nihon sangyō, saikōchiku shir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Japanese Industries)." *Ekonomisuto*, Nov. 16:40-49.
- Imai Seiichi and Itō Takashi. 1974. *Gendaishi shiryō: kokka sōdōin*, 2 (Literature on Modern History: The National General Mobilization, 2). Tōkyō: Misuzu Shobō, Vol. 44.
- Imai Zen'ei. 1977. "Jiyūka no suishin" (Promoting Liberalization). In Itō Mitsuharu, ed. ,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 Vol. 1: *Sangyō seisaku*.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pp. 159-179.
- Inaba Hidezō. 1949. "Kyūgensoku wa ika ni susumerareru ka" (How to Carry Out the Nine Principles). *Ekonomisuto* Feb. 11:146-151.
- Inaba Hidezō. 1956. "Seisansei kōjō undō hihan" (Criticism of the Movement of Promoting Productivity). *Fuebian kenkyū* 7 (Dec.):6-24.
- Inaba Hidezō. 1965. *Gekidō sanjūnen no nihon keizai* (The Exciting Thirty Years of Japanese Economy). Tōkyō: Jitsugyō no nihonsha.
- Inaba Hidezō. 1975. "Keizai antei honbu no risō to keizai kikakuchō no 'genjitsu'" (The Ideal of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and the Reality of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ESP*

Sept.—Oct. :52-68.

Inaba Hidezō. 1988. "Intabiū" (Interview). In Keizai kikakuchō, ed.,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pp. 45-75.

Inaba Hidezō. 1989. "Hyūmanisuchikku na shisō" (Humanistic Thought).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nkaikai,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Inaba Hidezō, Aihara Shigeru, Ōuchi Tsutomu, Komiya Ryūtarō, Uchida Tatao, Ōuchiyama Kiyoshi, and Miyashita Buhei. 1960. "Shinpojiaumu" (Symposium). *Ekonomisuto* Nov. 15:16-32.

Inaba Hidezō, Hirata Keiichirō, Mutō Seiichirō, and Yano Tomoo. 1985. "Sengo nihon keizai no genten o kaerimiru: (1) Keizai antei honbu sōsetsu zengo" (A Re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1)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ESP* Aug. :8-17.

Inaba Hidezō, Kojima Masaoki, Saeki Kiichi, and Yano Tomoo. 1986. "Sengo nihon keizai no genten o kaerimiru: (4) keizai fukkō keikaku no shūhe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4) the Circumference Around the Plan of Economic Recovery). *ESP* Feb. :82-91.

Iriye Tokurō, Furutani Anamasa, Yamazaki Hideo, and Takagi Keno. 1984. "Sano to katoyama no tenkō" (The Conversion of Sano and Katoyama). In Iriye Tokurō, Furutani Anamasa, Yamazaki Hideo, and Takagi Keno, eds., 1984. *Shinbun shūsei shōwashi shōgen*. Tōkyō: Honbō Shoseki Kabushiki Kaisha, Vol. 7, pp. 538-540.

327 Ishibashi Tanzan. [1946] 1970. "Shōwa nijūichi nendo shūgin zaisei enjitsu" (The Speech on the Finance of 1946 at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Ishibashi Tanzan zenshū*.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Vol. 13, pp. 176-198.

Ishibashi Tanzan. [1951] 1972. *Tanzan kaisō* (Recollections of Tanza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Ishino Shinichi. 1981. "Zaisei kin'yū seisaku no yakuwari" (The Function of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Ekonomisuto* June 2:92-99.

Itō Daiichi. 1967. "Keizai kanryō no kōdō yōshiki" (The Behavioral Pattern of Economic Bureaucrats). In Nihon Seiji Gakkai, ed., *Gendai nihon no seido to kanryō*.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78-104.

Itō Mitsuharu. 1967. "Wagamichi o iku 'kokō no hito': Tsuru Shigeto kyōjū (The Erudite Person Who Goes His Own Way: Professor Tsuru Shigeto).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55-265.

Itō Mitsuharu. [1966] 1970. *Hoshū to kukushin no nihonteki kōzō* (The Structure of Japanese Conservatism and Progressivism). Tōkyō: Tsukuma Shobō.

Itō Mitsuharu and Chō Yūkiō. 1971. "Sengo keizai no shisō" (The Economic Theories in the Postwar Era). In Itō Mitsuharu and Chō Yūkiō, eds., *Keizai no shisō*. Tōkyō: Tsukuma Shobō, pp. 3-36.

Itō Mitsuharu and Chō Yūkiō, eds. 1971. *Keizai no shisō* (Economic Thought). Tōkyō: Tsukuma Shobō.

Itō Monoshige, Kiyono Kazuharu, Okuno Masahiro, and Suzumura Kōtarō. 1988. *Sangyō seisaku no keizai bunseki*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Industrial Policy). Tōkyō: Tōkyō

- Daigaku Shuppankai.
- Itō Takashi. 1974a. "Kyōkoku icchi' naikakuki no seikai saihensei mondai" (The Re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Circl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abinet Supported by the Whole Nation). *Shakai kagaku kenkyū* 25(4):59-147.
- Itō Takashi. 1974b. "Shintaisei towa nanika?" (What Is the New Order Movement?). *Rekishi to jinbutsu* Apr. :38-39.
- Itō Takashi. 1974c. *Shōwa jūnenshi danshō* (The Episode of Ten Years' History of Showa).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Itō Takashi. 1976. *Jūgonen sensō* (Fifty Years of War). Tōkyō: Shōgakukan.
- Itō Zenichi. 1972. "Kōki" (Postscript).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odansha, Vol. 11, pp. 512-521.
- Jimintō. [1959] 1966a. "Jimintō kaitei yōkō" (The Outline of the Revision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In Tsuji Kiyooki,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139-140.
- Jimintō. [1959] 1966b. "Jimintō shōinikai ketsur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Subcommittee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In Tsuji Kiyooki,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140-141.
- Kamada Isao and Takamura Juichi, eds. 1988. *Shōgen sengo keizaishi* (The Testimony of the Postwar Economic History).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Kaminishi Akio. 1985. *Burein Seiji* (Brain Politics). Tōkyō: Kōdansha.
- Kamiyo Wayoshi. 1994. "Nihonteki koyō kankō no merito to demeritto" (The Merit and Demerit of the Japanese Employment Custom). *Rōdōjipō* June:20-23.
- Kanamori Hisao. 1985. *Taiken sengo keizai* (Experiencing the Postwar Economy).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 Kanbayashi Teijirō. 1958. "Gijutsu kakushin no hyōka" (The Evalu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konomisuto* Jan. 25:50-54.
- Katō Toshihiko. 1979. "Gunbu no keizai tōsei shisō" (The Military's Theory of Managed Economy). In Tōkyō Daigaku Shakai Kagaku Kenkyusho, ed., *Senji nihon keiz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67-110.
- Katsumata Seiichi. 1981. "Fujūbun datta shakaitō no taiō" (The Incomplete Response of the Socialist Party). *Ekonomisuto* June 9:82-89.
- Kawahara Hiroshi and Asanuma Kazunori. 1979. *Nihon no fuashizumu* (Japan's Fascism). Tōkyō: Yūhikaku.
- Kawai Saburō. 1989. "Tōkei kaizen no Arisawa sensei" (Professor Arisawa Who Has Improved Statistics).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 shi* Hensan Inkai,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Kawasaki Misaburō. 1947. "Sōron ni tsuite (On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Sekai* Sept. : 4-8.
- Kazami Akira. 1951. *Konoe naikaku* (The Konoe Cabinet). Tōkyō: Nihon Shuppan Kyōdō Kabushiki Kaisha.
- Keidanren Jimukyoku. 1953. "Shintokuju no igi to keizai kyōryoku no kōsō ni tsui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New Special Procurements and the Proposal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Keizai Rengō* 2:22-26.

- Keizai Antei Honbu. [1947] 1965. "Keizai jitsusō hōkokusho" (The Report of Actual Economic Situation). *Keizai hyōron* Oct. :178-204.
- Keizai Dantai Rengōkai. 1978. *Keizai dantai rengōkai sanjūnenshi*. Tōkyō: Keizai Dantai Rengōkai.
- Keizai Kikakuchō, ed. 1956. *Keizai hakusho; nihon keizai no seichō to kindaika* (The Economic White Paper: Japan's Economic Growth and Modernization). Tōkyō: Shiseidō.
- Keizai Kikakuchō. 1960. "Kokumin shotoku baisō keikaku" (The National Income Doubling Plan). In Ōkita Saburō, ed., *Shotoku baisō keikaku no kaisetsu*.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167-244.
- Keizai Kikakuchō. 1964. *Sengo keizaishi; keizai antei honbushi* (The History of Postwar Economy: The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Tōkyō: Ōkurashō Insatsukyoku.
- Keizai Kikakuchō. 1966. *Keizai kikakuchō nijūnen shōshi* (A Brief Twenty-year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Tōkyō: Ōkurashō Insatsukyoku.
- Keizai Kikakuchō. 1976. *Gendai nihon keizai no tenkai; keizai kikakuchō sanjūnenshi*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Japanese Economy: A Thirty Year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Tōkyō: Ōkurashō Insatsukyoku.
- Keizai kikakuchō, ed. 1988.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he Postwar Economic Recovery and the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 Keizai Kikakuchō. 1994. *1994 nendo nenji keizai hōkoku; kibishii chōseio koete aratana furontia e* (The 1994 Annual Report of the Economy: Toward a New Frontier After a Difficult Adjustment). *Shūkan Tōyō Keizai* Aug. 13-20;164-425.
- Kimura Kihachirō. 1947. "Keizai saiken no zentei" (The Precondition of Economic Recovery). *Asahi hyōron* Nov. : 12-20.
- Kimura Kihachirō. 1948. "Infureishon no shūsoku ni tsuite" (On the Elimination of Inflation). *Zenshin* Jan. : 20-25.
- Kindai Nihon Kenkyū-kai, ed. 1982. *Taiheiyō sensō* (The Pacific War). Tōkyō: Yamakawa Shuppansha.
- Kishimoto Seijirō. 1947. "'Keizai jitsusō hōkokusho' hihan" (A Critique on 'The Report on Economic Reality'). *Jiron* Aug. : 9-15.
- Kita Iki. 1959. *Kita Iki chōsakushū, Vol. 1; Kokutairon oyobi junsui shakaishugi* (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and Pure Socialism). Tōkyō: Misuzu Shobō.
- Kiuchi Nobutane. 1948. "Arisawa, Kimura ronsō saihihan" (Further Criticism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Arisawa and Kimura). *Ekonomisuto* May 21;164-166.
- 329 Kobayashi Hideo. 1984. *Showa fuashisuto no gunzō* (A Group of Showa Fascists). Tōkyō: Kōsō Shobō.
- Kobayashi Hideo. 1995. "Nihon kabushiki kaisha" o tsukutta otoko-miyazaki masayoshi no shōgai (The Man who Created the "Japan Inc." —Miyazaki Masayoshi's Career). Tōkyō: Shōgakukan.
- Kobayashi Hideo, Okazaki Tetsuji, Yonekura Seiichirō, and NHK. 1995. "Nihon kabushiki kaisha" no showashi (The Showa History of Japan Inc.). Tōkyō: Sōgensha.
- Kobayashi Kichiya. 1989. *Hana mo arashi mo* (Flower and Thunderstorm). Tōkyō: Kōdansha.

-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1967a.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no kōzō" (The Structure of "The Eye on Japanese Economy").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302-318.
-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1967b.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he Eye on Japanese Economy).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 Kojima Seiichi. 1938. *Nachisushintōsei keizai dokuhon* (Readings on Nazi's New Managed Economy). Tōkyō: Chikura Shobō.
- Kojima Tsunehisa. [1976] 1978. *Nihon shihonsugi ronrōshi* (The History of the Debates on Japanese Capitalism). Tōkyō: Ariesu Shobō.
- Komiya Ryūtarō. [1959] 1971. "Nihon ni okeru keizaigaku kenkyū ni tsuite" (On Economic Studies in Japan). In Itō Mitsuharu and Chō Yūkiō, eds., *Keizai no shisō*. Tōkyō: Tsukuma Shobō, pp. 217-228.
- Komiya Ryūtarō. 1960. "Yōsureba munaiyō" (In Short, It Is Meaningless). *Ekonomisuto* Nov. 15:6-12.
- Komiya, Ryūtarō, Ōkuno Masahiro, and Suzumura Kōtarō, eds. 1984. *Nihon no sangyo seisak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Kondō Kanichi and Osanai Hiroshi, eds. 1978. *Sengo sangyōshi no shōgen, Vol. 3: Enerugi kakumei bōei seisan no kiseki* (The Testimony of the History of Postwar Industry, vol. 3: The Path Toward the Energy Revolution of Defense Productio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 Kōsai Yotaka. 1989. "Kōdo seichō e no shuppatsu"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gh Growth). In Nakamura Takafusa, ed., "Keikakuka" to "Minshuka."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283-321.
- Kotō Rikuzō. 1963. "Sangyō taiseiron" (On Industrial System). In Morozumi Yoshihiko, Minosō Hitoshi, Shōda. *Sangyō taisei no saihensei*. Tōkyō: Shumjūsha, pp. 107-136.
- Kurokawa Toshio and Satake Gosaku. 1970. *Nihon seisansei honbu: sono jittai to yakuwari* (The Headquarters of Productivity: Its Entity and Function). Tōkyō: Aomi Shoten.
- Kusayanagi Ōkura. 1975. *Kanryō ōkokuron* (On the Bureaucrats Who Harm the Country). Tōkyō: Bungeishunjū.
- Maruyama Masao. 1951. "Sengo nihon no nashonarizumu no ippanteki kōsatsu" (General Examination on the Postwar Nationalism). In *Nihon Taiheiyō Mondai Chōsakai*, ed., *Ajia no minzokushug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168-187.
- Maruyama Masao. 1972. *Gendai seiji no shisō to kōdō* (Theory and Behavior of Modern Politics). Tōkyō: Miraisha.
- Maruyama Masao. 1982. "Gendai nihon no chishikijin"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Japan). In Maruyama Masao, *Goei no ichi kara: "gendai seiji no shisō to kōdō" suihō*. Tōkyō: Miraisha, pp. 73-133.
- Masamura Kimihiro. 1974. *Gendai nihon no keizai seisaku* (The Economic Policy in Modern Japan). Tōkyō: Tsukuma Shobō.
- Masamura Kimihiro. 1985. *Sengoshi* (Postwar History). Tōkyō: Tsukuma Shobō, Vol. 1.
- Masamura Kimihiro. 1991a. "Nijū kōzōron" (The Theory of Dual Structure). In Sasaki Takeshi, Tsurumi Shunsuke, Tominaga Ken'ichi, Nakamura Masanori, Masamura Kimihiro, and Murakami Yōichirō, eds. *Sengoshi daijiten*. Tōkyō: Sanseitō, p. 692.

- Masamura Kimihiro. 1991b. "Sengo nihon no seiji gyōsei shisutarnu"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System in Postwar Japan). *Tōyō Keizai* June 8:182-191.
- Masuda Hiroshi. 1988. *Ishibashi Tanzan: Senryō Seisaku e no Teikō* (Ishibashi Tanzan: The Resistance to the Occupation Policy). Tōkyō: Sōshisha.
- Masumi Junnosuke. 1988. *Nihon seijishi*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litics).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Vols. 1, 2, 3.
- Matsuda Michio. 1965. "Sensō to interigencha" (War and Intelligentsia). In Matsuda Michio, *Nihon chishikijin no shisō*. Tōkyō: Tsukuma Shobō, pp. 144-159.
- Matsui Haruo, 1934. *Keizai sanbō honbunon* (On the Economic General Staff).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Matsui Haruo. 1938. *Nihon shigen seisaku* (The Japanese Policies of Resources). Tōkyō: Chikura Shobō.
- Mikami Ryūzō. 1967. "Nihon ni okeru Keinzu keizaigaku no tōnyū" (The Diffusion of Keynesian Economics in Japan). In Itō Mitsuharu, ed., *Keinzu keizaigaku*.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195-220.
- Misonō Hitoshi. 1987. *Nihon no dokusen kinshi seisaku to sangyō soshiki* (Japanese Antitrust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ōkyō: Kawade Shobō Shinsha.
- Mitsubishi Tadahihiro and Uchida Shigeo. 1994. *Shōwa keizaishi*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Shōwa Era).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Miwa Yoshirō. 1993. "Shūchū haijō seisaku no keizai kōka" (The Economic Effect of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In Kōsai Yutaka and Teranishi Jurō, eds., *Sengo nihon no keizai kaikak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09-130.
- Miyajima Hideaki. 1987. "Senji tōsei keizai e no ikō to sangyō no soshikika" (Controlled Carteliz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Wartime Economy). In Nihon Kindaishi Kenkyūkai, ed., *Senji keizai*. Tōkyō: Yamakawa Shuppansha, pp. 103-127.
- Miyajima Hideaki. 1988. "Senji keizai tōsei no tenkai no sangyō soshiki hen'yō(1)" (The Development of Wartime Economic Control and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Shakai kagaku kenkyū* 39(6):1-44.
- Miyasaka Tominosuke, Kaneko Akira, and Takahashi Iwakazu, eds. 1979. *Dokusen kinshi hōrei shiryōshū* (Materials on Antimonopoly Law). Tōkyō: Seibuntō.
- Miyazaki Masayasu. 1990. "Kaitai" (Introduction). In Nakamura Takafusa and Miyazaki Masayasu, eds., *Keisha Seisan Hōshiki to Sekitan Shōiinkai* (The Priority Production Program and the Coal Committee).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Miyazaki Yoshikazu. 1985. *Nihon keizai no kōzō to kōdō*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Tōkyō: Chikuma Shobō, Vol. 1.
- Miyazawa Kiichi. 1981. "Anpo kara keizai e" (From the Security Treaty to the Economy). *Ekonomisuto* May 12:130-137.
- Mori Takeo. 1933. *Senji keizai tōseiron* (On the Wartime Economic Control).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Morikawa Hidemasa, ed. 1977.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 Vol. 2: Kyōdaika no jidai* (The Era of Giant Organizatio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 Morozumi Yoshihiko. 1962a. "Sangyō seisaku no kyōchōteki tenkai"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Policy). *Tōyō Keizai*. Bessatsu, No. 3 Summer: 112-119.

- Morozumi Yoshihiko. 1962b. "Furansu keizai ni okeru keikaku" (Planning In the French Economy). *Keizai Hyōron* Aug. :53-62.
- Morozumi Yoshihiko. 1966. *Sangyō seisaku no riron*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Policy).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Murakami Yasusuke. 1989. "Ikōki ni okeru chishikijin no yakuwari"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Chūō Kōron* Mar. :188-207.
- Murakami Yasusuke. 1992. *Hankoten no seiji keizaigaku* (Anti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Vols. 1-2.
- Murakami Yasusuke. 1994. *Hankoten no seiji keizaigaku yōkō* (An Outline for Anti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 Murobuji Tetsurō. 1983. *Kōkyū kanryō* (High-Ranking Bureaucrats). Tōkyō: Sckai Shoin.
- Muroga Sadanobu. 1978. *Shōwa juku* (The Showa School).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Nagano Takeshi. 1993. "Kaisha ga abunaku nareba jinin seiri wa totsuzen da" (Layoff Is Inevitable When Companies Are in Trouble). *Ekonomisuto*, Apr. 24:12.
- Nagata Sadashi. 1957. "Gijutsu kakushin to nihon keizai no shinro" (The Cours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Japan's Economy). *Chūō kōron* Nov. : 48-57.
- Nakamura Masanori. 1994. "Nihon senryō no shodankai"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In Yui Daizaburō, Nakamura Masanori, and Toyoshita Narahiko, eds., *Senryō kaikaku no kokusai hikaku: nihon, ajia, yōroppa*. Tōkyō: Sanseitō, pp. 87-97.
- Nakamura Masanori. 1995a. "Daikyōkō to dasshutsu e no mosaku"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Search for Escape). In Rekishigaku Kenkyūkai, ed., *Hisshi no daian: kitai to kiki no nijūne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203-238.
- Nakamura Masanori. 1995b. "1950—1960 nendai no nihon" (Japan in the 1950s and 1960s). In Asano Naohiro, Amino Yoshihiko, Ishii Susumu, Kano Masanao, and Hayakawa Shōichi, *Iwanami kōza: nihon Tsūshi. Vol. 20. gidai 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3-68.
- Nakamura Masanori. 1995c. "Sengo 50 nen to nihon gendaishi kenkyū" (Postwar 50 Years and the Studies on Modern Japanese History). *Shinnō*, 47(55, Dec.):885-908.
- Nakamura Seiji. 1959. "Sengo nihon no gijutsuteki hatten to sono seikaku" (Japan's Postwa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Ekonomisuto* Mar. 28:44-50.
- Nakamura Takafusa. 1967. "Tetteishita Jisshō Seishin: Arisawa Sensei" (A Strong Empirical Orientation: Professor Arisawa).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90-300.
- Nakamura Takafusa. 1974a. *Nihon no keizai tōsei* (The Japanese Managed Economy).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Nakamura Takafusa. 1974b. "Ryū Shintarō to Tōsei Keizai" (Ryū Shintarō and the Managed Economy). *Rekishi to Jinbutsu* Apr. :66-74.
- Nakamura Takafusa. 1979a. "SCAP to nihon" (SCAP and Japan). In Nakamura Takafusa, ed., *Senryōki nihon no keizai to seij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3-23.
- Nakamura Takafusa. 1979b. *Senryōki nihon no keizai to seiji*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Occupatio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Nakamura Takafusa. 1982. "Nichibei 'keizai kyōryoku' kankei no keisei" (The Formation of Japan-U. S.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Kindai Nihon Kenkyūkai, ed., *Taihei'yō sensō*. Tōkyō: Yamakawa Shuppansha, pp. 279-302.
- 332 Nakamura Takafusa. 1988. "Keizai keikaku no seikaku to igi"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Planning). In Nihon Keizai Seisaku Gakkai, ed., *Keizai seisakugaku no tanjō*. Tōkyō: Keisō Shobō, pp. 228-243.
- Nakamura Takafusa. 1989. "Arisawa Sensei no gakufū" (The Scholarship of Professor Arisawa).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nkaï,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56-163.
- Nakamura Takafusa. 1990. "Shiryō: sengo nihon no keizai seisaku kōsō to sono jidai no haikai" (Materials: The Economic Policy Proposal in Postwar Japan and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In Nakamura Takafusa and Ōmori Tokuko, eds., *Nihon keizai saiken no kihon mond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i-xxi.
- Nakamura Takafusa. [1978] 1993. *Nihon keizai: sono seichō to kōzō* (The Japanes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3rd ed.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Nakamura Takafusa and Hara Akira. 1972. "Keizai shintaisei" (The Economic New Order). In Nihon Seiji Gakkai, ed., "*Konoe shintaisei*" no kenkyū.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71-133.
- Nakamura Takafusa and Hara Akira, eds. 1990. *Keizai fukkō keikaku* (The Plan of Economic Recovery).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Nakamura Takafusa and Miyazaki Masayasu, eds. 1990. *Keisha Seisan Hōshiki to Sekitan Shōiinkai* (The Priority Production Program and the Coal Committee).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Nakamura Takafusa and Ōmori Tokuko, eds. 1990. *Nihon keizai saiken no kihon mondai* (The Basic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Nakamura Tetsu. 1948. "Tōsui to seiji to no kōsō"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upreme Command and Politics). *Chōryū* Jan. : 5-16.
- Nakasone Yasuhiro, Murakami Yasusuke, Satō Seisaburō, and Nishibe Susumu. 1992. *Kyōdō kenkyū: "reisen igo"* ("After the Cold War": A Joint Study). Tōkyō: Bungei Shunjū.
- Nakayama Ichirō. 1948a. "Tōsei to jiyū to no aida" (Between Control and Freedom). *Asahi Hyōron* Dec. : 15-21.
- Nakayama Ichirō. 1948b. "Sekai keizai e no sankā" (Particip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Nakayama Ichirō, *Nihon saiken no kadai*. Tōkyō: Kamakura Shobō, pp. 66-83.
- Nakayama Ichirō. 1948c. "Gaishi tōnyū to keizai no saike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Nakayama Ichirō, *Nihon saiken no kadai*. Tōkyō: Kamakura Shobō, pp. 84-99.
- Nakayama Ichirō. 1949. "Nihon keizai no kao" (The Look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Hyōron*, Dec. : 1-9.
- Nakayama Ichirō. 1955. *Seisansei no riron to jissai* (The Theory of Productivity and Reality). Tōkyō: Nihon Seisansei Honbu.
- Nakayama Ichirō. 1956. "Sensansei kōjō undō hihan o hanhihan suru" (A Reply to the Criti-

- cism on the Productivity Movement). *Chūō kōron* Jan. : 46-52.
- Nakayama Ichirō. 1959. "Chingin nibai o teishō" (Doubling the Salary). *Yomiuri Shinbun* Jan. 3. :1.
- Nakayama Ichirō. 1967. "Nihon no kōgyōka to dentō shakai"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Japan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6-40.
- Nakayama Ichirō. 1969. "Wagamichi; keizaigaku" (My Journey: Economics). *Wagamichi*. Tōkyō: Asahi Shinbunsha. 333
- Nakayama Ichirō. [1950] 1970. "Sekai shijō to nihon keizai"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Japanese Economy). In Kanamori Hisao, ed. , *Bōeki to kokusai shūshi*.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3-14.
- Nakayama Ichirō. 1972a. "Keizai antei to jiritsu (Economic St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11, pp. 423-474."
- Nakayama Ichirō. 1972b. "Seisansei no riron to jissai" (The Theory of Productivity and Reality). *Seisansei kōjō shirizu*. Tōkyō: Seisansei Honbu, pp. 331-444.
- Nakayama Ichirō. 1972c. "Bōeki to nihon keizai" (Japanese Economy and Trade).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12, pp. 53-111.
- Nakayama Ichirō. [1953] 1972. "Sekai keizai no naka no Nihon keizai"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12, pp. 78-80.
- Nakayama Ichirō. [1956] 1972. "Seisansei o meguru shomondai" (The Issues Concerning Productivity).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14. pp. 253-382.
- Nakayama Ichirō. 1973b. *Nakayama Ichirō zenshu* (The Complete Works of Nakayama Ichirō). Tōkyō: Kōdansha, Vols. 18, 19, 21.
- Nakayama Ichirō. 1973a. "Watashi no nenpo" (My Resume).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ōdansha, bekken, pp. 3-19.
- Nakayama Ichirō. 1978. "Nihon ni okeru kindai keizaigaku no shuppatsuten"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dern Economics in Japan). In Minoguchi Takeo and Hayasaka Tadashi, eds. , *Kindai keizaigaku to nihon*.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23-57.
- Nakayama Ichirō, Tōbata Seiichi, Yasui Takama , and Yamada Yūzō. 1973. "Kindai keizaigaku no tenkai to haikai" (The Development and Background of Modern Economics).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odansha, bekken, pp. 24-49.
- Namiki Nobuyoshi. 1993. "Keizai gakusha no tsumi to batsu" (Economists' Guilt and Punishment). *shogun* 25 (Jan.) :66-78.
- Nawa Tōichi. 1947. "Shihonshugiteki antei tō gaikoku shihon" (The Capitalist Stabilization and Foreign Capital). *Jiron* Sept. : 11-30.
- Nihon Keizai Seisaku Gakkai, ed. 1988. *Keizai seisakugaku no tanjō* (The Birth of the Study of Economic Policy). Tōkyō: Keisō Shobō.
- Nihon Seisansei Honbu, ed. 1960. *Gijutsu kakushin to nihon keizai*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Japan's Economy). Tōkyō: Nihon Seisan Honbu.
- Nihon Seisansei Honbu. 1985. *Sensansei undō 30 nēn shi* (A Thirty Year History of the Pro-

- ductivity Movement). Tōkyō: Nihon Seisansei Honbu.
- Nihon Seisansei Honbu, ed. 1990. *Seisansei undō to wa nani ka?* (What Is the Productivity Movement?). Tōkyō: Nihon Seisansei Honbu.
- Nikeiren. [1948] 1966. "Keieiken kakuhō ni kansuru ikensho" (A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nagement Authority). In Ōkōchi Kazuo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 shi*. Tokyo: Nihon Hyōronsha, pp. 102-104.
- Nikeiren. [1963] 1966a. "Kongo no rōshi kankei to keieisha no kenkai" (Labor Relations from Now On and the Managers' Perspective). In Ōkōchi Kazuo,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 shi*. Tokyo: Nihon Hyōronsha, p. 461.
- 334 Nikeiren. [1963] 1966b. "Maeda senmu riji rōdō jōsei hōkoku 'nihonteki rōmu kanri o sodateyō'" (The Deputy Director Maeda's Keynote Report "Let's Foster the Japanese Style of Management"). In Ōkōchi Kazuo,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 shi*.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461-462.
- Nishimura Tetsujirō. 1989. "Arisawa sensei to nihachikai" (Professor Arisawa and the 28th Meeting).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 shi* Hensan Inkaï,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68-172.
- Nishinarita Yutaka. 1994. "Sengo kiki to shihonshugi saiken katei no rōshi kankei: nihon to nishidoitsu no hikakushi" (The Postwar Crisis and Labor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Reconstruc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y Between Japan and West Germany). In Yui Daizaburō, Nakamura Masanori, and Toyoshita Narahiko, eds., *Senryō kaikaku no kokusai hikaku: nihon, ajia, yōroppa*. Tōkyō: Sanseitō, pp. 132-161.
- Noguchi Yukio. 1995. *1940-nen taisei* (The 1940 System).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 Ogata Sadako. 1969. "Gaiko to seron" (Diplomacy and Public Opinion). In Nihon Kokusai Seiji Gakkai, ed., *Nihon gaikōshi kenkyū*. Tōkyō: Yūhikaku, pp. 40-55.
- Ōishi Kaiichirō. 1974. "Sengo kaikaku to nihon shihonshugi no kōzō henka: sono renzoku-seitsu to danzetsuseitsu" (The Postwar Reforms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Japanese Capitalism: The Continuity Argument and the Discontinuity Argument). In Tōkyō Daigaku Shakai Kagaku Kenkyūsho, ed., *Sengo kaikaku: kadai to shikak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63-97.
- Okazaki Tetsuji. 1988. "Dainiji sekai taisenki no nihon ni okeru senji keikaku keizai no kōzō to unkō" (The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of the Wartime Planned Economy i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Shakai kagaku kenkyū*, 40(4):1-132.
- Okazaki Tetsuji. 1993. "Kigyō shisutemu" (The Company System).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97-144.
- Okazaki Tetsuji. 1995a. "Dainiji sekai taisenki no kin'yū seido kaikaku to kin'yū shisutemu no henka" (The Reform and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During World War II). In Hara Akira, ed., *Nihon no senji keiz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07-140.
- Okazaki Tetsuji. 1995b. "Nihon no senji keizai to seifu-kigyōkan kankei no hatte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Wartime Japan). In Yamanouchi Yasushi, ed., *Sōryokusen to gendaika* Tōkyō: Kashiwa Shobō, pp. 267-285.
-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1993a. "Gendai nihon no keizai shisutemu to sono rek-

- ishiteki genryū”(Contemporary Japanese Economic System and Its Historical Origin).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pp. 1-34.
-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1993b.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he Origin of Japan's Contemporary Economic System).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 Ōkita Saburō. 1949. “Kawase reito settei igo”(After Fixing the Exchange Rate). *Asahi hyōron* Apr. : 64-69.
- Ōkita Saburō. 1959a. “Keizai seichōryoku to seichō jitsugen no seisakuron.” (The Growth Power of the Economy and Policy to Realize Growth). In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ed., *Nihon keizai no seichōryoku: Shimomura riron to sono hihan* Tōkyō: Kin'yu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pp. 75-94.
- Ōkita Saburō. 1959b. “Nihon keizai no seichōryoku to ‘shinchōki keizai keikaku’”(The Growth Power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the “New Long-term Economic Plan”). In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ed., *Nihon Keizai no Seichōryoku: Shimomura riron to sono hihan* Tōkyō: Kin'yu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pp. 31-47.
- Ōkita Saburō. 1960. *Shotoku baisō keikaku no kaisatsu*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Income Doubling Plan).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Ōkita Saburō. 1961. *Keizai keikaku* (Economic Planning). Tōkyō: Shiseidō.
- Ōkita Saburō. 1976. *Watashi no rirekisho* (My Resume).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Ōkita Saburō. 1981a. *Tōbun seisō* (The Challenging Years of Japan).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Ōkita Saburō. 1981b. “Itsutsu no seisaku mokuhyō ni chūten”(Emphasizing Five Policy Targets). *Ekonomisuto* Apr. : 84-91.
- Ōkita Saburō. 1983. *Ekonomisto no yakuwari* (The Role of Economists).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Ōkita Saburō. 1984. *Nihon kanryō jijō* (The Circumstances of Japanese Bureaucrats). Tōkyō: TBS Buridanika.
- Ōkita Saburō. 1988. “Intabiū”(Interview). In Keizai Kikakuchō, ed.,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pp. 1-41.
- Ōkita Saburō. 1989. “Keisha seisan kōsō”(The Idea of Priority Production).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 shi* Hensan Inkaikai,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83-86.
- Ōkita Saburō, Tokunaga Hisatsugu, Mutō Seiichirō, and Yano Tomoo. 1985. “Sengonihon keizai no genten o kaerimiru: (2) kunimo akaji, kigyōmo, akaji, kakeimo akaji”(A Re-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All the Government, Firms and Household Are Having a Deficit). *ESP* Oct. : 94-103.
- Ōkōchi Kazuo. 1941. *Senji shakai seisakuron* (On Wartime Social Policies). Tōkyō: Jichōsha.
- Ōkōchi Kazuo. 1949. “Rōdō seisaku ni okeru senji to heiji”(Labor Policy in Wartime and Peace). In Yanai Haratadao, ed., *Sengo nihon keizai no shomondai*. Tōkyō: Yūhikaku, pp. 185-229.
- Ōkōchi Kazuo. 1957. “Gijutsu kakushin to rōdō kaikyū”(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 Working Class). *Sekai* 136(Mar.): 86-92.
- Ōkōchi Kazuo. [1942] 1969a. *Sumisu to risuto* (Smith and List). Tōkyō: Aohayashi Shoinsha.
- Ōkōchi Kazuo. 1969b. *Ōkōchi Kazuo chōsakushū* (Ōkōchi Kazuo's Works). Tōkyō: Aohayashi Shoin Shinsha.
- Ōkōchi Kazuo. 1970. *Shakai seisaku yonjūnen* (Forty Years' Social Policies).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Ōkōchi Kazuo. 1971. "Sangyō hōkokukai no zen to go to" (The Industrial Patriotic Associ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n Chō Yukio and Sumiya Kazuhiko, eds., *Nihon kindai keizai shisō daikei*. Tokyo: Yūhikaku, Vol. 2, pp. 73-108.
- Okumura Hiroshi and Ronald Dore. 1993. "Nihon no 'hōjin shihonshugi' wa hokorobi hajimetaka (Has Japanese Corporate Capitalism Begun to Collapse?). *Ekonomisuto* May 25:28-33.
- Okumura Kiwao. 1966. "Denryoku kokukan mondai" (The Issue of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nagement of the Electric Industry). In Andō Yoshio, ed., *Shōwa keizai shi e no shōge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Vol. 2, pp. 198-209.
- Okuno Masahiro. 1993. "Gendai nihon no keizai shisutemu; sono kōzō to kaikaku no kanōsei"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Economic System: Its Structur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form).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pp. 273-291.
- 336 Ōkura Yukio. 1952. "Chōsen sensōka ni okeru kyōkō no shinka" (The Deepening Recess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 *Keizai Hyōron* Dec. : 51-59.
- Omae Kin'ichi. 1992. *Heisei ishin* (The Heisei Restoration). Tōkyō. Kōdansha.
- Ōnishi Gongichi. 1975. *Keizai kikakuchō* (The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Tōkyō: Kyōikusha.
- Ōta Kaoru. 1953. "Gōrika tōsō o ikani kakatai ka" (How to Fight the Battle of Rationalization). *Shakaishugi* 27(Sept.):2-5.
- Otake Kōnosuke. 1993. "'Nihonteki' rōshi kankei" ("The Japanese-type" Labor Relations).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pp. 145-182.
- Ōtake Hideo, 1984. "Nihon ni okeru 'gunsankan fukugō' keisei no zassetsu"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ing a Military-Business Circles-Bureaucracy System in Japan). In Ōtake Hideo, ed., *Nihon seiji no sōten*. Tōkyō: Sanichi Shobō, pp. 13-69.
- Ōtake Hideo. 1988. *Saigunbi to nashonarizumu* (The Rearmament and Nationalism).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 Ōtake Hideo. 1992. *Futatsu no sengo: doitsu to nihon* (Two Postwar Experiences: Germany and Japan). Tōkyō: Nihon Hōsō Shuppan Kyōkai.
- Ōtake Keisuke. 1981. *Maboroshi no Hana* (The Phantom of Flowers). Tōkyō: Rakuyū Shobō, Vol. 1.
- Ōuchi Hyōe. 1947. "Keizai hakusho no ig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hite Paper). *Sekai* Sept. : 1-4.
- Ōuchi Hyōe. 1949. "Dojji rain wa antei o motarasu ka?" (Does the Dodge Line Bring About Stability?). *Hyōron* June: 2-13.

- Ōuchi Hyōe. 1959. *Keizaigaku gojūnen* (The Fifty Years of Economics).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Ōuchi Hyōe. 1967. "Infureishon no imashime" (A Lesson from Inflation).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124-161.
- Ōuchi Hyōe. [1952] 1975. "Kore kara no keizai kore kara no kyōiku" (The Economy and Education from Now On). In Ōuchi Hyōe, *Ōuchi Hyōe chōsakushū*. Tōkyō: Iwanami Shoten, Vol. 7, pp. 380-394.
- Ōuchi Hyōe. [1953] 1975. "Nihon no zaisei" (Japanese Finance). In Ōuchi Hyōe, *Ōuchi Hyōe chōsakushū*. Tōkyō: Iwanami Shoten, Vol. 7, pp. 415-433.
- Ōuchi Hyōe. [1965] 1975. "Nihon no zaisei" (Japanese Finance). In Ōuchi Hyōe, *Ōuchi Hyōe chōsakushū*. Tōkyō: Iwanami Shoten, Vol. 7, pp. 169-220.
- Ōuchi Hyōe, Arisawa Hiromi, Wada, Hiroo, and Takahashi Masao. 1954. "MSA to nihon" (MSA and Japan). *Shakaishugi* Mar.: 9-19.
- Ōuchi Hyōe, Arisawa Hiromi, Wakimura Yoshitarō, Takahashi Masao, and Minobe Ryōkichi. 1946. *Nihon infureishon no kenkyū* (A Study on Japan's Inflation). Tōkyō: Kōdosha.
- Ōuchi Hyōe, Arisawa Hiromi, Wakimura Yoshitarō, Takahashi, Masao, and Minobe Ryōkichi. 1949. *Nihon keizai wa dō naru ka?* (Where Is the Japanese Economy Heading?). Tōkyō: Kōdosha.
- Ōuchi Hyōe, Kawasaki, Misaburō, Arisawa Hiromi, Kimura Kihachirō, Ōkita Saburō, and Tsuru Shigeto. 1947. "Keizai hakusho no ig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conomic White Paper). *Sekai* Sept.: 1-18.
- Peattie, Mark R. [1975] 1992. *Nichibe taiketsu to ishiwara kanji* (Ishiwara Kanji and Japan's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est). Translated by Ōtsuka Takehiro, Seki Shizuo, Ōtsuka Yūko, and David Askew. Daiwa, Shinagawa: Tamairabo.
- Prinz, Michael. 1995. "Nachizumu to kindaika: doitsu ni okeru saikin no tōron" (Nazism and Modernization: Recent Discussions in Germany). In Yamanouchi Yasushi, ed., *Sōryokusen to gendaika*. Tōkyō: Kashiwa Shobō, pp. 57-77.
- Rekishigaku Kenkyukai. 1990. *Nihon Dōjidaishi: Senryō Seisaku no Tenkan to Kōwa*.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Japan: The Transition of Occupation Policy and the Conclusion of Peace Treaty). p. 137. Tōkyō: Aoki Shoten.
- Rengo Jōhōsha Henshūkyoku, ed. 1938. *Sensō keizai no zenshin*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Economy). Tōkyō: Rengo Jōhōsha.
- Rōyama Masamichi. [1934] 1965. "Kakoku ni okeru keizai, kaigi no hikaku seido kenkyū"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s of Economic Council in Various Countries). In Rōyama Masamichi, *Gyōseigaku kenkyū ronbunshū*. Tōkyō: Keisō Shobō, pp. 56-96.
- Rōyama Masamichi. [1936] 1965. "Dajōkan seido to naikaku seido" (The Dajōkan System and the Cabinet System). In Rōyama Masamichi, *Gyōseigaku kenkyū ronbunshū*. Tōkyō: Keisō Shobō, pp. 111-133.
- Ryū Shintarō. 1939. *Nihon keizai no saihensei*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 Saguchi Kazarō. 1995. "Sangyō hōkōkukai no rekishiteki ichi: sōryokusen to nihon no rōshi kankei"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Industrial Patriotic Association: The Total War and Japanese Labor Relations). In Yamanouchi Yasushi, ed., *Sōryokusen to gendaika*. Tōkyō: Kashiwa Shobō, pp. 287-313.
- Sahashi Shigeru. 1977. "Tokushinhō no ryūsan" (The Abortion of the Special Measures Law for the Promotion of Designated Industries). In Itō Mitsuharu, ed.,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sangyō seisaku*.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pp. 123-158.
- Sahashi Shigeru. 1988. "Jiūka taisaku ni fushin" (Working Hard on Countermeasures to the Liberalization). In Kamada Isao and Takamura Juichi, eds., *Shōgen sengo keizaishi*.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95-101.
- Saitō Seiichirō. 1980. *Keizai Kanryō no Fukken* (The Rehabilitation of Economic Bureaucrats). Tōkyō: PHP Kenkyūsho.
- Saitō Seiichirō. 1981. *Keizaigaku wa gendai o sueru ka?* (Can Economics Save Modernity?). Tōkyō: Bungei Shunjū.
- Sakai Saburō. 1979. *Shōwa Kenkyūkai* (The Showa Research Association). Tōkyō: TBS Buritanika.
- Sakakibara Eisuke. 1990. *Shihonsugi o koeta nihon* (Japan That Transcended Capitalism).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 Sakakibara, Eisuke. 1995. "Nihon ishitsuron no ihenshū: 40-nen taiseiron wa ideorogiteki rekishikan" (A Variant of Japanese Uniqueness Argument: The 1940 System Argument Is an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of History). *Shūkan tō yō keizai*. July 8. pp. 40-43.
- Sakamoto Jirō. 1954. "Nihon keizai no chūshinkokuteki tokushitsu"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s Economy as Late-Developed Country). In Nakayama Ichirō, ed., *Nihon keizai no kōzō bunseki*.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3-139.
- Sakamoto Jirō. 1967. "Shōhansuru mono o tōitsusuru sainō: Nakayama Hakashi"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the Opposite: Dr. Nakayama).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7-37.
- Sakurada Takeshi. 1981. "Megumareta shōjōken" (Various Advantages). *Ekonomisuto* May 19:82-89.
- Sakurada Takeshi and Shikanai Nobutaka. 1983. *Ima akirakasu sengo hishi* (The Newly Revealed Postwar Secret History). Tokyo: Sankei Shuppan, Vol. 1.
- 338 Sakurai Tsuneji. 1947. "Shikyōjū gurūpu no seikaku" (The Nature of New Professor Group). *Asahi Hyōron* Dec. : 38-43.
- Satō Noboru. 1958. "Seisansēi kōjō to chingin, koyō" (The Promotion of Productivity and Salary and Employment). *Ekonomisuto* Feb. 22:50-55.
- Sawa Takamitsu. 1984. *Kōdo seichō: rinen to seisaku no dōjidaishi* (High Growth: Histories of Both Ideology and Policy). Tōkyō: Nihon Hōsō Shuppankai.
- Sawa Takamitsu. [1982] 1989. *Keizaigaku to wa nani darō ka?* (What Is Economics?). Tōkyō: Nihon Hōsō Shuppankai.
- Sawa Takamitsu. 1991. *Kore kara no keizaigaku* (Economics in the Future). Tōkyō: Iwanami Shoten.
- Sekitan Shōinkai. [1946] 1990a. "Sekitan zōsan tokubetsu taisaku" (The Special Measures for Promoting Coal Production). In Nakamura Takafusa and Miyazaki Masayasu, eds.,

- Keisha seisan hōshiki to sekitan shōiink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87-90.
- Sekitan Shōiinkai. [1946] 1990b. "Sekitan shōiinkai daiikkai gijirōku" (The Memorandum of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oal Committee). In Nakamura Takafusa and Miyazaki Masayasu, eds., *Keisha seisan hōshiki to sekitan shōiink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59-161.
- Sekiya Reiji. 1989. "Kaisetsu" (Introduction). In Arisawa Hiromi, *Arisawa Hiromi sengo o kataru: Shōwashi e no shōgen*.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268-277.
- Senga Tetsuya. 1978. "Yomigaeru gunju sangyō" (The Reviving Munitions Industries). In Kondō Kanichi and Osanai Hiroshi, eds.,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Vol. 3, pp. 205-241.
- Shakai Keizaishi Gakkai, ed. 1982. *1930 nendai no nihon keizai*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1930s).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sha.
- Shakaitō. [1959] 1966. "Hata kokumu chōkan e no kōkai shitsumonshō" (The Public Inquiry to the State Secretary Parter). In Tsuji Kiyooki,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141-142.
- Shakaitō. [undated] 1966. "Anpo iinkai ni okeru shingi jōkyō to kongo no wagatō no shitsumon yōkō" (The Hearing at the Security Committee and the Outline of Questioning by Our Party). In Tsuji Kiyooki,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Vol. 1, Seiji*. Tokyo: Nihon Hyōronsha, pp. 146-147.
- Shakaitō. [1961] 1966. "Kōzō kaikaku no tataikai" (The Struggle of Structural Reform). In Tsuji Kiyooki,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Vol. 1, Seiji*. Tokyo: Nihon Hyōronsha, pp. 178-181.
- Shakaishugi*. 1953. "Teichingin sangyō no jittai" (The Reality of the Low Wage Industries). 27(Sept.): 58-61.
- Shikagui Seiichi. 1979. "Fukkin to keisha seisan"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Bank and Priority Production). In Shimura Kaichi, ed.,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 Vol. 5: Kigyō shūdan no keisei*.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pp. 150-169.
- Shimada Haruo. 1993a. "'Senshinkoku koyō' ni shifuto o isoge" (Pushing the Transition Toward the Advanced Countries' Style of Employment). *Ekonomisuto* Apr.: 22-4.
- Shimada Haruo. 1993b. "'Senshinkoku gata koyō ni shifuto o isoge' (Accelerating the Shift Toward the Employment Pattern of Advanced Countries)." *Shūkan Tōyō Keizai* Apr. 24: 22-24.
- Shimada Haruo. 1994a. "'Shinsangyō, koyō sōshutsu kigaku' o isoge (Making Plans Quickly for the Creation of Employment; New Industries)." *Chūō Kōron* Jan.: 48-62.
- Shimada Haruo. 1994b. "Kisei kanwa de shinkoyō no sōshutsu o (Creating New Employment by Deregulation)." *Shūkan Tōyō Keizai* Aug.: 13-20.
- Shimazaki Miyoko. 1971. "Keisha seisan hōshiki" (The Priority Production). In Chō Yukio and Sumiya Kazuhiko, eds., *Nihon kindai keizai, shisō daikei*. Tōkyō: Yūhikaku, Vol. 2, pp. 297-320.
- Shimomura Osamu. 1958. *Keizai seichō jitsugen no tame ni*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Tōkyō: Kōchikai.
- Shimomura Osamu. 1959a. "Nihon keizai no kichō to sono seichōryoku" (The Basic Condition

-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Its Growth Power). In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ed., *Shimomura riron to sono hihan*. Tōkyō: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pp. 3-30.
- Shimomura Osamu. 1959b. "Nihon keizai no seichōryoku to seichō riron" (The Growth Power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the Growth Theory). In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ed., *Shimomura riron to sono hihan*. Tōkyō: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pp. 187-272.
- Shimomura Osamu. 1962. *Nihon keizai seichōron* (On the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Tōkyō: Kin'yū Jijō Kenkyūkai.
- Shimomura Osamu. 1967. "Naze seichō ni jishin o motsuka?" (Why Do I Have Confidence in Economic Growth?).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164-202.
- Shimomura Osamu. [1965] 1971. "Antei seichō ronsha wa yaburetari" (The Failure of Those who Asserted Stable Growth). In Shimomura Osamu, *Keizai taikoku nihon no sentaku*.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440-507.
- Shimomura Osamu. 1981a. "Seichō riron e no āporōchi" (The Approach to Growth Theory). *Ekonomisuto* Apr. : 80-87.
- Shimomura Osamu. 1981b. "Rekishiteki bokkōki no imi" (The Impl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ise). *Ekonomisuto* Apr. : 80-87.
- Shimomura Osamu. 1981c. "Seichō seisaku no seika" (The Outcome of the Growth Policy). *Ekonomisuto* Apr. : 82-91.
- Shimomura Osamu, Yamamoto Masao, Imai Ichio, and Aoba Fumio. 1960. "Kōseichō seisaku no ronri" (The Logic of the High Growth Policy). *Ekonomisuto* Oct. 10:58-64.
- Shimura Kaichi. 1976. "Fukkō Kin'yū kōko" (The Reconstruction Bank). In Ōkurashō Zai-seishishitsu; ed., *Showa zaiseishi; kyūsen kara shūsen made; Vol. 12*.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623-854.
- Shimura Kaichi, ed. 1979. *Sengo sangyōshi e no shōgen, Vol. 5: Kigyō shūdan no keisei* (The Formation of Business Groups).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 Shioda Shio. 1991. "Shimomura Osamu to kōdō keizai seichō seisaku" (Shimomura Osamu and the High Growth Policy). *Purejidentō* Aug. : 158-167.
- Shishidō Toshio. 1971. "Kanchō ekonomisuto nanatsu no kairitsu" (Seven Commandments of Government Economists). *Ekonomisuto* Apr. 25:126-129.
- Shisō no Kagaku Kenkyūkai, ed. 1959. *Tenkō* (The Conversion). Tōkyō: Heibonsha, Vol. 1.
- Shisō no Kagaku Kenkyūkai, ed. 1960. *Tenkō* (The Conversion). Tōkyō: Heibonsha, Vol. 2.
- Shōkō Gyōsei Kenkyūkai. 1942. *Senjika no shōkō gyōsei* (The Administration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during the War). Tōkyō: Eiga Shuppansha.
- Shōwa Dōjinkai. 1968. *Shōwa kenkyūkai* (The Showa Research Association). Tōkyō: Keizai Ōraisha.
- 340 Shōwa Dōjinkai, ed. 1968. "Nihon keizai no saihensei to Ryū Shintarō"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Ryū Shintarō). Tōkyō: Keizai Ōraisha, pp. 225-250.
- Shōwa Kenkyūkai. 1939. *Burokku keizai ni kansuru kenkyū* (Study on the Bloc Economy). Tōkyō: Seikatsusha.

- Shōwa Kenkyūkai. Jimukyoku. 1974. "Seiji kikō kaishin taikō" (The Outline of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Imai Seiichi and Itō Takashi, eds., *Gendaishi shiryō, kokka sōdōin 2*. Tōkyō: Misuzu Shobō, Vol. 44, pp. 161-173.
- Sōdōmei. [1955] 1966. "Dainikai chūō iinkai kettei: seisansei kōjō undō ni taisuru sōdōmei no taido" (The Decision by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ōdōmei's Attitude Toward the Productivity Movement). In Ōkōchi Kazuo,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Vol. 4, *Rōdō*.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 308.
- Sōhyō. [1955] 1966. "Seisansei zōkyō ni taisuru kihonteki taido" (The Basic Position on the Promotion of Productivity). In Ōkōchi Kazuo, ed.,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Vol. 4, *Rōdō*.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pp. 306-308.
- Suetaka Shin. 1936. "Shinsangyō seisaku to tōseishugi" (New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Control). In Keizai Jōhōsha, ed., *Nihon keizai no saibensei, 3: sangyō oyobi bōekihen*. Tokyo: Keizai Jōhōsha, pp. 25-29.
- Sugihara, Shirō. 1984. *Nihon no Ekonomisuto* (Japan's Economists).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Sugihara Shirō. 1990. *Nihon no keizai shisōka tachi* (Japan's Economic Theorists). Tōkyō: Nihon Keizai Hyōronsha.
- Sugihara Shirō and Chō Yūkiō. 1979. *Nihon keizai shisōshi dokuhon*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ies in Jap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bunsha.
- Sugihara Shirō, Sakasai Takahito, Fujiwara Akio, and Fujii Takashi. 1990. *Nihon no keizai shisō yonbyakunen* (Four Hundred Years of Japanese Economic Thought). Tōkyō: Nihon Keizai Hyōronsha.
- Sugita Hiroaki. 1989. *Shōwa no ekonomisuto* (Showa Economists). Tōkyō: Chūō Keizaisha.
- Sumitani Mikio. 1986. "Sōron: keizaigaku kakubunya no hatt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Various Fields). In Tōkyō Daigaku Keizai Gakubu, ed., *Tōkyō daigaku keizai gakubu gojūnensh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11-142.
- Suzuki Hideo. 1988. "IMF hachijōkoku ikō no koro" (When Moving Toward IMF Article 8 Country). In Kamada Isao and Takamura Juichi, eds., *Shōgen sengo keizaishi*.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101-110.
- Suzuki Kōichirō. "Shihonron no hōyaku shōshi"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apital"). In Suzuki Kōichirō, *Shihonron to nihon*. Tōkyō: Kōbundū, pp. 8-39.
- Suzuki Takeo. 1948a. "Arisawa, Kimura ronsō saihihan" (Further Criticism on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Arisawa and Kimura). *Ekonomisuto* Mar. 1:226-229.
- Suzuki Takeo. 1948b. "Chūkan anteiron hihan" (A Critique on Midway Stabilization). *Asahi hyōron* Aug. :32-45.
- Suzuki Takeo. 1949. "Keizai kyūgensoku to tanichi kawase reito" (Nine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Single Exchange Rate). *Hyōron* Apr. :32-36.
- Suzuki Takeo, Kimura Kihachirō, and Tsuru Shigeto. 1950. "Nihon keizai no hyōjō" (The Situation of Japan's Economy). *Hyōron* Jan. : 33-44.
- Takabatake Michitoshi. 1960. "Seisanryoku rir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Force). In Shisō no Kagaku Kenkyūkai, ed., *Tenkō*. Tōkyō: Heibonsha, Vol. 2, pp. 201-247.
- Takahashi Kamekichi. 1933. *Nihon keizai tōseiron* (On Japanese Economic Control). Tōkyō: Kaizōsha.

- 341 Takahashi Kamekichi. 1967. "Naze teikinri seisaku o shucchōsuru ka" (Why do I Suggest a Low Interest Rate Policy?).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41-73.
- Takahashi Makoto and Katō Saburō. 1974. "Kaizai fukkō to Ishibashi zaisei" (Economic Recovery and Ishibashi Finance). In Suzuki Takeo Kanrei Kinen Bunshū Inkaï, ed., *Keizai seichō to zaisei kin'yū*. Tōkyō: Shiseitō, pp. 31-45.
- Takahashi Masao. 1981. "Keizai seichō wa mayaku datta" (Economic Growth as Poison). *Ekonomisuto* June 16:80-87.
- Takahashi Masao. 1989. "Daigaku no Uchi to Soto"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of the University).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nkaï,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36-43.
- Takajima Kikuo. 1953. "Mujun no shūchūteki hyōgen-gōrika" (The Intensive Reflection of Contradiction-Rationalization). *Keizai hyōron* Aug. : 50-57.
- Takana Shin'ichi. 1975. *Nihon sensō keizai hishi* (The Secret History of Japan's Wartime Economy). Tōkyō: Konpūtaeijisha.
- Takawa Yawao. 1970. *Sengo nihon kakumei undōshi* (The Postwar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Tōkyō: Gendai shichōsha, Vol. 1.
- Takemi Tarō. 1968. *Takemi Tarō kaisōroku* (Takemi Tarō's Recollection).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 Takeuchi Konomi. 1980. "Interiron" (On Intellectuals). In Takeuchi Konomi, *Takeuchi Konomi zenshū*. Tōkyō: Tsukuma Shobō, pp. 86-105.
- Takita Minoru, Nagano Shigeru, Nakajima Tetsuzō, and Nakayama Ichirō. 1972. "Sengo nihon no rōshi kankei" (Labor Relations in Postwar Japan). In Nakayama Ichirō, *Nakayama Ichirō zenshū*. Tōkyō: Kodansha, pp. 82-106.
- Tamanoi Yoshirō. 1971. *Nihon no keizaigaku* (Japan's Economics). Tōkyō: Chūō Kōronsha.
- Tamanoi Yoshirō. 1975. *Tenkansuru keizaigaku* (Economics at a Turning Point).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Tanaka Yonosuke. 1959. "Chingin nibairon o megutte" (Around the Issue of Doubling Salaries). *Ekonomisuto* Mar. 21:6-11.
- Teranishi Jūrō. 1993a. "Meinbanku shisutemu" (The Main Bank System).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pp. 61-96.
- Teranishi Jūrō. 1993b. "Shūsen chokugo ni okeru kinyū seido kaikaku" (The Reform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In Kōsai Yutaka and Teranishi Jūrō, eds., *Sengo nihon no keizai kaikak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31-152.
- Tōa Keizai Chōsakyoku. 1935. *Nachisu no keizai seisaku* (Nazi's economic policy). Tokyo: Tōa Keizai Chōsakyoku.
- Tōbata Seiichi. 1967. "Keizai no shinpo to sono niraite" (The Progress of Economy and Its Agents).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Nihon keizai o miru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04-232.
- Tōbata Seiichi. 1984. *Tōbata Seiichi wagashi wagatomo wagagakumon* (Tōbata Seiichi: My

- Teachers, My Friends and My Academic Career). Tōkyō: Kashiwa Shobō.
- Tokunaga Hisatsugu. 1988. "Intabiu"(Interview). In Keizai kikakuchō, ed. ,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pp. 125-145.
- Tokyo Shōkō Kaigisho. 1941. *Gyōsei kikō kaikaku mondai ni kansuru shiryō*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ōkyō: Tokyo Shōkō Kaigisho.
- Tōyō Keizai. 1991. "Ronsōshi de tsūzuru sengo nihon keizai no rekishi"(The History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Seen from Debates). June 8:40-55. 342
- Tsuji Kiyooki. 1966. *Shiryō sengo nijūnenshi* (Literature on Twenty Years' Postwar History).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Tsuji Kiyooki. [1969] 1981. *Nihon kam'yōsei no kenkyū* (Studies on the Japanese Bureaucratic System).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 Tsujimura Kōtarō. 1984. *Nihon no keizai gakusha tachi* (The Japanese Economists).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Tsuru Shigeto. 1947a. "Sonogo no shiunpeita" (Schumepter Since Then). *Sekai* May: 19-28.
- Tsuru Shigeto. 1947b. "Kisōsha toshite"(As the Drafter of the Document). *Sekai* Sept. : 16-18.
- Tsuru Shigeto. 1950. *Amerika Ryūgakuki* (Studying in America). Tōkyō: Iwanami Shoten.
- Tsuru Shigeto. 1951. "Ichi keizai gakuto no hansei"(The Self-examination of a Student of Economics). *Sekai* Jan. : 9-18.
- Tsuru Shigeto. 1959. "Nihon keizai no seichōryoku to keiki junkan"(The Growth Power and Business Cycle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Kin'yū Zaisei Jijō Kenkyūkai, ed. , *Shimomura riron to sono hihan*. Tōkyō: Kin'yū Zaisei Jijō, pp. 97-136.
- Tsuru Shigeto. 1965. "Nihon keizai no sengo nijūnen"(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War). *Keizai hyōron, Nihon keizai-sengo nijūnen*, Oct., supplementary issue.
- Tsuru Shigeto. 1967. "Ningen no fukushi to seiji keizaigaku no ninmu"(Human Welfare and the Task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Koizumi Akira and Miyazaki Yoshikazu, eds. , *Nihon keizai o miru gan*.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pp. 234-265.
- Tsuru Shigeto. [1950] 1970. "Kokusai keizai to nihon"(Japa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Kanamori Hisao, ed. , *Bōeki to kokusai shūshi*.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26-45.
- Tsuru Shigeto. [1950] 1975. "Nihon keizai no bunkiten"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In Tsuru Shigeto, *Tsuru Shigeto Chōsaku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5, pp. 78-104.
- Tsuru Shigeto. [1954] 1975. "Nihon no keizai jiritsu to kokusai kankyō"(The 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Jap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Tsuru Shigeto, *Tsuru Shigeto Chōsaku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5, pp. 42-62.
- Tsuru Shigeto. [1955] 1975. "Nihon keizai to saigunbi"(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the Re-armament). In Tsuru Shigeto, *Tsuru Shigeto Chōsaku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5, pp. 31-41.
- Tsuru Shigeto. 1976. "Keizaigaku no hitori aruki wa abunai" (The Danger of Going Alone in Economics). In Tsuru Shigeto, *Tsuru Shigeto chōsaku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8,

pp. 59-104.

Tsuru Shigeto. [1953] 1976. "MSA to nihon" (MSA and Japan). In Tsuru Shigeto, *Tsuru Shigeto Chōsaku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6, pp. 103-121.

Tsuru Shigeto. [1954] 1976. "Sekai jōsei to nihon no shinrō" (The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Course of Japan). In Tsuru Shigeto, *Tsuru Shigeto Chōsakushū*. Tōkyō: Kōdansha, Vol. 8, pp. 273-300.

Tsuru Shigeto. 1978. "Senkyūhyaku sanjūnendai igo no keizaigaku no hatte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fter the 1930s). In Minoguchi Takeo and Hayasaka Tadashi, eds., *Kindai keizaigaku to nihon*.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pp. 119-147.

343 Tsuru Shigeto. 1983a. "Keizaigaku no sankyosei" (Three Superstars in Economics). *Asahi shinbun* Feb. 6:1.

Tsuru Shigeto. 1983b. "Atarashii paradaimu no sōzōsha" (The Creators of New Paradigms). *Ekonomisuto*, Apr. 5:112-122.

Tsuru Shigeto. 1983c. *Taisei henkaku no seiji keizaigak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Tōkyō: Shinhyōron.

Tsuru Shigeto. 1988a. "Intabiu" (Interview). In Keizai kikakuchō, ed.,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pp. 103-122.

Tsuru Shigeto. 1988b. "Tsuru Shigeto nisshi" (Tsuru Shigeto's Diary). In Keizai kikakuchō, ed., *Sengo keizai fukkō to keizai antei honbu*. Tōkyō: Keizai Kikakuchō, pp. 209-410.

Tsurumi Shunsuke. 1960. "Yokusan undō no sekkeisha" (The Designer of the Movement of Imperial Assistance). In Shisō no Kagaku Kenkyūkai, ed., *Tenkō*. Tōkyō: Heibonsha, Vol. 2, pp. 53-120.

Tsurumi Shunsuke. 1976. *Tenkō kenkyū* (Studies on Conversion). Tōkyō: Tsukuma Shobō.

Tsurumi Shunsuke. 1982. *Senjiki nihon no seishinshi*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Wartime Japan: 1931—1945). Tōkyō: Iwanami Shoten.

Tsurumi Shunsuke, Hidaka Rokurō, Hariu Ichirō, and Kan Takaki. 1985. *Sengo towa nani ka?* (What Is the Postwar Era?). Tōkyō: Seikyōsha.

Tsuruta Toshimasa. 1984. "Kōdo seichōki" (The Period of High Growth). In Komiya Ryūtarō, Okuno Masahiro, and Suzumura Kōtarō, eds., *Nihon no sangyō seisaku*.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pp. 45-76.

Tsūsanshō. 1954. *Sengo keizai jūnenshi* (Ten Years' History of the Postwar Economy). Tokyo: Shōkō Kaikan Shuppanbu.

Tsūsanshō, ed. 1957. *Sangyō gōrika hakusho* (The White Paper of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Tōkyō: Nikkan Kōgyō Shinbunsha.

Tsūsanshō. 1989. *Tsūshō sangyō seisakushi, Vol. 5: Jiritsu kiban kakuritsuki (1)*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Trade and Industry, Vol. 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1). Tōkyō: Tsūshō Sangyō Chōsakai.

Tsūsanshō. 1990a. *Tsūshō sangyō seisakushi, Vol. 6: Jiritsu kiban kakuritsuki (2)*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Trade and Industry, Vol. 5: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2). Tōkyō: Tsūshō Sangyō Chōsakai.

Tsūsanshō. 1990b. *Tsūshō sangyō seisakushi, Vol. 10: daisanki, kōdō seichōki (3)*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Trade and Industry, Vol. 10: the Period of High Growth, 3).

- Tōkyō: Tsūshō Sangyō Chōsakai.)
- Uchida Jōkichi. 1949. *Nihon shihonshugi ronsō* (The Debate on Japanese Capitalism). Tōkyō: Shinkō Shuppansha.
- Uchida Yoshihiko. 1948. "Senji keizaigaku no mujun teki tenkai to keizai riron" (The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During the War and Economic Theories). *Chōryū* Jan. : 37-42.
- Uchihashi Katsuto. 1993. "Nihon kei koyō chōsei no yūgami o tadase" (Fix the Problems in the Japanese Style of Employment Adjustment). *Ekonomisuto* Apr. 24:18-20.
- Uchihashi Katsuto and Yakushiji Taizō. 1993. "Mono zukuri ni shimei to hokoru o torimodose (Taking Back the Mission and the Pride in Making Things)." *Ekonomisuto* Nov. 16: 34-38.
- Uchino Tatsurō. 1975. "Sengo keizai seisaku sanjōnen shōshi" (A Brief Thirty Year History of Postwar Economic Policy). *ESP* July: 10-16.
- Uchino Tatsurō. 1978. *Sengo nihon keizaishi* (Postwar Japanese Economic History). Tōkyō: Kōdansha.
- Ueda Hirofumi. 1987. "Senji tōsei keizai to shitaukesei no tenkai" (Development of the Sub-contract System Under the Wartime Controlled Economy). In Nihon Kindaishi Kenkyūkai, ed., *Senji keizai*. Tōkyō: Yamakawa Shuppansha, pp. 199-229.
- Ueda Hirofumi. 1995. "Senji keizai ka no shitauke kyōryoku kōgyō seisaku no keisei" (Sub-contracting in the Wartime Economy-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ve Industrial Policy). In Hara Akira, ed., *Nihon no senji keiz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201-236.
- Ueda Kezuo. 1993. "Kin'yū shisutemu-kisei" (The Financial System-Regulations).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pp. 35-60.
- Uemae Junichirō. 1985a. "Ikeda Burein Hajimeugokasu" (Initiated by 'Ikeda's Brain Trust'). *Gendai* July: 310-334
- Uemae Junichirō. 1985b. "'Jinmu Keiki' no shikakarijin hashiru" (The Action of the Initiator of Jinmu Boom). *Gendai* Aug. : 334-357.
- Uemae Junichirō. 1985c. "Shotoku baisō o jitsugen seyo" (Let's Double the National Income). *Gendai* Sept. : 312-336.
- Uemae Junichirō. 1985d. "Nihon ga moeta hi" (The Day That Excited Japan). *Gendai* Oct. : 330-353.
- Umemoto Katsu, Sato Noboru, and Maruyama Masao. 1966. *Gendai nihon no kakushin shisō* (Progressive Ideas in Modern Japan). Tōkyō: Kawade Shobō.
- Umezao Tadao, Takeyama Michio, Hayashi Kentarō, and Suzuki Shigetaka. 1957. "Rekishi no okeru nihon no senshinsei" (The Advanced Nature of Japan in History). *Chūō Kōron* Nov. : 266-277.
- Usami Seijirō. 1952. "Jūzoku taiseika ni okeru sangyō kōzō to dokus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Monopoly in a System of Dependence). *Keizai hyōron* Aug. : 17-29.
- Ushikubo Hiroshi. 1988. "Sengo ni okeru rōdō kumiai no 'minshuka, kindaika'"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Labor Unions in the Postwar Period). In Maeda Ai, Najita Tetsuo, and Kamishima Jirō, eds., *Sengo nihon seishinshi*.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468-483.

Wakimura Yoshitarō. 1970. "Kore de ii no ka; sekiyū seisaku" (Is the Present Policy on Oil OK?). *Tōyō Keizai* Jan. 17:46-48.

Wakimura Yoshitarō. 1989. "Waimaru kyōwakoku jidai no Arisawa sensei" (Professor Arisawa in the Era of the Weimar Republic).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Iinkai, ed.,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9-36.

Watanabe Takeshi. 1983. *Watanabe Takeshi nikki* (The Diary of Watanabe Takeshi). Tōkyō: Tōyō Keizai Shinpōsha.

Wolferen, van Karel. 1990. "Naze nihon no chishikijin wa hitasura genryoku ni sui-ju suru ka?" (Why Do Japanese Intellectuals Follow Political Power So Earnestly?). *Chūō Kōron* Jan: 68-98.

Yamaguchi Yasushi. 1979. *Fuashizumu* (Fascism). Tokyo: Yūkikaku.

Yamakishi Akira. 1993. "21 seiki wa ōberyū no rōshi kankei ni tenkan" (The Transition Toward the European-American Style of Labor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Ekonomisuto* Apr. 24:13.

Yamamoto Yoshihito. 1989. *Senkanki nihon shihonshugi to keizai seisaku* (The Wartime Japanese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Policies). Tōkyō: Haku Shobō Kabushiki Kaisha.

Yamanouchi Yasushi. 1995a. "Hōhōteki joron; sōryokusen to shisutemu tōgō" (On Methodology: The Total War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 In Yamanouchi Yasushi, ed., *Sōryokusen to gendaika*. Tōkyō: Kashiwa Shobō, pp. 9-56.

Yamanouchi Yasushi, ed. 1995b. *Sōryokusen to gendaika* (The Total War and Modernization). Tōkyō: Kashiwa Shobō.

345 Yamanouchi Yasushi, Narita Ryūichi, and Ōuchi Hirokazu. 1996. "Sōryokusen, kokumin kokka, shisutemu shakai" (The Total War, Civil State, System Society). *Gendai shisō* 24(7):8-33.

Yamazaki Hiroaki. 1995. "Gaisetsu" (Introduction). In Yamazaki Hiroaki and Kikkawa Takeo, eds., *"Nihonteki" keiei no renzoku to danzetsu*. Tōkyō: Iwanami Shoten, pp. 1-71.

Yamazaki Shirō. 1995. "Senji kōgyō dōin taisei" (The Industrial Mobilization System During the War). In Hara Akira, ed., *Nihon no senji keizai*.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45-106.

Yamazaki Tanshō. 1948. *Naikakuron* (On the Cabinet System). Tōkyō: Gakuyō Shobō.

Yano Tomoo, Shinohara Miyohai, and Yoda Susumu. 1975. "Nihon keizai sanjūnen no kaiko to hyōka" (Retro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irty Year Japanese Economy). *ESP* July: 17-38.

Yasui Takuma. 1979. *Keizaigaku to sono shūhen* (Economics and Its Environment). Tōkyō: Kitakusha.

Yasui Takuma. 1980. *Kindai keizaigaku to watashi* (Modern Economics and I). Tōkyō: Kitakusha.

Yatsugi Kazuo. 1971. *Shōwa dōran shishi* (The Heroes in the Showa Crisis). Tōkyō: Keizai Ōraisha.

Yatsugi Kazuo. 1981 *Shōwa seikai hiwa* (The Secret Story of Political Circles in the Showa Period). Tōkyō: Hara Shobō.

- Yokoda Kisaburō. 1989. "Kyūjūnen kuraku no michi" (Ninety Years of Bitterness and Happiness). In *Arisawa Hiromi no Shōwashi Hensan linkai*, ed. , *Kaisō*.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3-8.
- Yomiuri Shinbunsha. 1971—1972. *Shōwashi no temō* (The Emperor in the Showa History). Tōkyō: Yomiuri Shinbunsha, Vols. 16, 17, 18, 19.
- Yonekura Seiichirō. 1993. "Gyōkai dantai no kinō" (The Role of Trade Associations). In Okazaki Tetsuji and Okuno Masahiro, eds. , *Gendai nihon keizai shisutemu no genryū*.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bunsha, pp. 183-210.
- Yonezawa Yoshie. 1993. "Keizaiteki jiritsu to sangyō gōrika seisaku"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Policy). In Kōsai Yutaka and Teranishi Jūrō, eds. , *Sengo nihon no kaikak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211-236.
- Yoshida Shigeru. 1957. *Kaisō jūnen* (Ten Years' Recollection). Tōkyō: Shinchōsha, Vols. 1, 2, 3, 4.
- Yoshikawa Hiroshi and Okazaki Tetsuji. 1990. "Keizaigaku ni okeru riron to rekishi" (Theory and History in Economics). In Yoshikawa Hiroshi and Okazaki Tetsuji, eds. , *Keizai riron e no rekishiteki paasupekuterbu*. Tōkyō: Tōkyō Daigaku Shuppankai, pp. 1-12.
- Yoshimura Katsumi. 1985. *Ikeda seiken: 1575 nichi* (The 1575 Days of the Ikeda Administration). Tōkyō: Gyōsei Mondai Kenkyūsho.
- Yoshimura Masaharu. 1961. *Jiyūka to nihon keizai* (Liberalization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Tokyo: Iwanami Shoten.
- Yoshino Shinji. 1930. *Wagakuni kōgyō no gōrika* (The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of Our Country). Tōkyō: Nihon Hyōronsha.
- Yoshino Shinji. 1966. "Sangyō gōrika" (Industrial Rationalization). In Andō Yoshio, ed. , *Shōwa keizai shi e no shōgen*. Tōkyō: Mainichi Shinbunsha, Vol. 1, pp. 116-129.
- Yoshino Toshihiko. 1965. *Watashi no sengo keizaishi* (My Postwar Economic History). Tōkyō: Jiseidō.
- Yoshino Toshihiko. 1975. *Sengo kin'yū-shi no omoide*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Postwar Monetary History). Tōkyō: Nihon Keizai Shinbunsha.

索引

注:人名、主题词后面的页码表示本书的英文版页码。在本书中,英文版页码列在页边空白处。

- Abe, Yoshishige, 安倍能成, 197
 agricultural sector, 农业部门, 战后的土地改革, 128;
 战后的物资短缺, 129
 Amaya, Naohiro, 天谷直弘, ~论新工业秩序的重点, 269; ~论战前的传统, 37-38
 Andō Yoshio, 安藤良雄, 71, 76, 80, 81, 112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87
 Anpo movement, 安保运动, 248-250
 Anticommunism, 反共思想, 促进出口时期的~, 32; 日本管制经济意识形态中的~, 27-28
 antimonopoly law, 反垄断法, 政策与~的冲突, 35; 对~的批评及修改~的提议, 271; ~的执行与修改, 30-31, 183; 经团联在~上的立场, 273
 antimonopoly principle, 反垄断原则, 战后盟军占领军总部的~, 132
 Aoba Fumio, 青叶文雄, 256
 Aoki, Masahiko, 青木昌彦, 57
 Arisawa Hiromi, 有泽广巳, ~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 150, 189; ~研究贸易与国际市场的方法, 191-192; ~作为倾斜生产方式的设计者, 20; ~在理论上与石桥的差异, 148-150; ~论经济独立, 43; 论非常时期有效援助率(ERA), 71-72; ~关于消除二元结构经济的思想, 212-214; ~提出国家利益高于消费者利益的理由, 5-6; ~的管制经济理论, 268; ~论通产省产业结构分委员会, 267; 反对重整军备(20世纪50年代), 197-198; ~反对鹤成人计划, 157-158; ~关于通货膨胀政策的观点, 163; ~的优先生产方法, 141-145, 163; ~论生产, 46; ~论产业结构升级, 50-51; ~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18-19; ~论政府在管制经济中的角色, 74-75; ~的经济计划的理论, 63
 Asanuma Kazunori, 浅沼和范, 119
 Ashida Hitoshi, 芦田均, ~担任首相, 164
 Association of Social Policy(1897), 社会政策协会(1897), 61
 Associations, 协会, 产业报国会, 27, 58, 70, 81; 日本管制经济中的产业~, 79-80; 战后转变为贸易~, 132
 Automation, 自动化, 马克思主义反对~, 217
 Baba Shūichi, 马场修一, 106
 balance of payments, 国际收支, 对外汇的控制, 182-183; 日本经济中的硬通货(20世纪50年代), 193
 banking system, 银行体系, ~的演变(1930年代末), 26; ~的破产(1927), 72; ~与“关联”公司的关系, 80, 184; 管制经济时代的~, 80; 战后的商业银行, 184; ~的权力, 27-25; 政府对~的干预, 116-117
 Bank Law(1928), 《银行法》(1928), 72
 Bank of Japan, 日本银行, ~作为最后手段的贷款者, 259; 战后通货的发行, 151; 战后为关键产业提供资金, 132; 战后的产业救助体系, 180
 Barkai, Avraham, 阿伏拉汉·巴凯, 96

- Bendix, Reinhard, 莱因哈德·本迪克斯, 54
- Berger, Gordon Mark, 戈登·马克·伯格, 76, 94, 111-112
- Berger, Peter, 彼得·伯格, 11
- black markets, 黑市, 115
- Blinder, Alan, 艾伦·布林德, 3
- Block, Fred, 弗雷德·布洛克, 8, 10, 23, 64
- brain trusts, 智囊团, 池田的~, 243; 战后的~, 138; 20世纪30年代政治斗争中的~, 103-107; 吉田政府的~, 141, 154
- Breuilly, John, 约翰·布鲁伊利, 284
- Brinkley, Alan, 艾伦·布林克利, 82
- Buchner, Hans, 汉斯·巴克纳, 96-97
- Bureaucracy, 政府机构, 盟军占领军总部治下的~, 124-125, 130-131; 明治维新时期~中的竞争, 112; 政府~的衰落, 36; 《大日本帝国宪法》对~的界定, 111; ~的建立与巩固(1935—1937年), 76-77; ~与经济管制相关的立法(1938年), 114; 满洲国的~, 105; 战后~对经济的控制, 124, 130-131; 战后~权力, 32-33; 向管制经济过渡中~的作用, 94-95, 102; ~中的派系之争, 103-104
- bureaucrats, 文官, 智囊团中的~, 105; 内阁调查局(CSB)的~, 94-95
- business groups, *See* associations, *keiretsu* companies, 商业团体, 见“协会”; “‘关联’公司”
- Cabinet Planning Board (CPB), 内阁计划署(CPB), ~设计管制经济, 105; ~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108
- Calder, Kent E., 肯特·E. 考尔德, 36, 51, 294
- Campbell, John L., 约翰·L. 坎贝尔, 8, 11
- Capital, 资本, 关于外国~的争论, 164-167; 战后的物资短缺, 51, 179; 政府对~供应的控制, 116-117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与发展主义的区别, 7-8;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 65; 波兰尼关于~的观点, 23-24; 战后日本的~, 68; 比较~研究取代比较共产主义研究, 5
- Capitalism,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 ~的金融市场, 57
- Capitalism, Japanese, 日本资本主义, ~对自由主义传统的偏离, 1-2; ~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差异, 15; ~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差异, 12; ~的金融市场, 57; 战时经济对~的影响, 119-120; ~的实践, 6; 20世纪30年代前~的结构, 75; 法西斯主义在~转型中的作用, 69-71; 市场在~中的作用, 57; 用非资本主义措施建立~, 214
- Capitalism, laissez-faire,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在国家改革运动中受到的批评, 93-9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
- Capitalism, liberal, 自由资本主义, ~对竞争的界定, 51-52; 法西斯主义作为对~的修正, 12; 被发展主义所超越, 279
- Cardoso, Fernando H., 费尔南多·H. 卡多索, 189
- cartels, 卡特尔, 大萧条时期~的建立, 26; 促进出口时期的~, 31, 183; 允许~的产业法, 184; 日本管制经济中的~, 54, 79
- centralization, 集中化, 明治政府官员体系的~, 111-112; 战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 131, 145
- China, 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势力范围的扩大, 86; 日本对~的入侵(1937), 22, 73, 77, 114; 1921年后日本的对华政策, 73
- Chō Yukio, 长幸男, 148
- Clark, Rodney, 罗德尼·克拉克, 75
- Class, 阶级, ~作为战后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重点, 160-161; ~作为分析单位, 161
- Coal, 煤炭, ~生产目标(1947), 161
- Coal Committee, 煤炭生产委员会, 经济学家论战后时期的~, 138, 143; 建立~的逻辑, 144-145
- Cohen, Jerome B., 杰罗姆·B. 科恩, 128, 130, 201
- Cold War, 冷战, ~对美国在日政策的影响, 126; 日本被纳入~体系, 173-174; 美国对亚洲盟国的

- 援助,196;吉田对~的挑战所作的反应,174
- Cole, Robert E., 罗伯特·E. 科尔,187
- Communism, 共产主义, 参见 anticommunism; 资本主义取代~, 5; 战后重新转向马克思主义, 159-160; 美国战后为遏制~而进行的援助, 196;
-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优势, 廉价劳动力理论, 210-211; 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体现的~, 29-30, 209-210; 生产技术中的~, 174-176, 180, 188
- Competition, 竞争, 日本企业间的~, 54-55; 过度~的概念, 30-31, 51-54, 181, 183, 228, 236; 鼓励~的因素(20世纪40年代后期), 30-31; 制约~的因素, 53-55, 132, 175; 日本式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中的~, 2; 有组织的~, 51; 规制型国家的~, 53; 对~的拒绝, 68; 政府促进~(20世纪50年代), 32-34
-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国际竞争, 日本的比较优势, 174-176, 180; 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174-175
- constitution, postwar Japan, 战后日本宪法, 经济目标的变化, 29, 123; 在~下的变化, 126-127
- coordination, state-private sector, 政府与私有部门间的合作, ~的建立, 275; 通产省关于~的提议, 36-37, 268-269
- corporations, private, 私营企业, 政府对~融资的控制(1943), 117
- corporations, public, 公营企业, 战后对物资的分配, 132
- corporatism, Japanese, 日本社团主义, 238
- cosmopolitanism, 世界主义, 164-166
- CPB, 内阁计划署, 参见 Cabinet Planning Board
- Crowley, James B., 詹姆斯·B. 克劳莱, 73, 87
- Cummings, Bruce, 布鲁斯·卡明斯, 284
- Currency, 通货, 日本经济中的硬~(20世纪50年代), 193, 196; 战后~的发行, 151; 外汇配额, 182-183
- Dan Takuma, 团琢磨, 94
- Davis, Horace B., 霍拉斯·B. 戴维斯, 283, 284
- Debt, public, 国债, 战后清除~, 179; 为支持全面战争而发行的~, 129; 为维持经济增长而发行的~(20世纪60年代), 234
- decentralization, 分散化, 明治文官体系~, 111
- Degenaar, J. J., J. J. 德根纳尔, 283
- Delbruck, Hans, 汉斯·德尔布鲁克, 107
- democratic reforms, 民主改革, ~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126-12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21-125; 促进经济领域的~, 133; 政府官僚体制在~中得以保存, 130-131
- developmentalism, 发展主义, 2; 参见 industrial policy; 基于市场经济的~, 5; 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差异, 21;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歧, 38-40; ~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 7-8; ~的经济学假设, 13-14; ~的促进出口范式, 188; 影响战后~的演变的因素, 13-14; 促使形成~的因素, 280-282; ~的目标和以工业化为重点, 38, 65; 意识形态对~的影响, 14-15 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对~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 225; 西方思想对~的影响, 14-15; ~所体现的实践派经济学, 19; 管制经济作为~的军事化版本, 22-28; ~的民族主义性质, 283; 1931—1945年间的~, 22-28; ~中的政府干预原则, 50-56; ~的原理(1931—1945), 14; 生产作为~的重点, 44-48; ~的拒绝利润原则, 56-60; 德国历史学派作为~的思想来源, 60; ~以战略的观点看待经济, 48-50; ~概念中的外国投资的威胁, 55; ~超越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279; 从军事化~到贸易化~的转型, 15-16, 37, 175, 276; 世界体系对日本~的影响, 281-282
- DiMaggio, Paul, 保罗·迪马吉奥, 11, 285, 286, 289
- Discrimination, racial, 种族歧视, 日本关于~的观念, 86-89
- Dobbin, Frank, 弗兰克·道宾, 10, 11, 21, 285, 286
- Dodge, Joseph M., 约瑟夫·M. 道奇, 170

Dodge Plan, 道奇计划, ~的影响与朝鲜战争结合在一起, 194; 实施~产生的效果, 170, 176; ~的目标, 177; ~在战后日本的实施(1949), 13, 30, 33, 122, 134, 212, 266; ~使日本与国际市场接轨, 173; ~的劳工政策, 187

Domar, Evsey, 艾维西·多马, 238, 239

Dore, Ronald, 罗纳德·多尔, 53-54, 57, 301

Draper, William H. Jr., 小威廉·H. 德雷珀, 170

Dulles,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94, 204

Duus, Peter, 彼得·杜厄斯, 12, 69

Dyson, Kenneth, 肯尼斯·戴森, 10, 285

economic bloc, regional, 区域经济集团, 日本提倡~, 85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 参见 developmentalism; 法西斯主义对日本~的影响, 12-13; 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对~的影响, 13; 日本的~模式, 6; 从日本的视角看~, 10-11; 用~来组织市场, 9

economic general staff, 经济参谋本部, 76, 102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 ~在日本产业政策中的地位, 39; 朝鲜战争时期的~, 193-194;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下的~, 234; 20世纪50年代的~, 229-231; ~的政策范式(20世纪60年代), 33-38; 政府为刺激~而采取的干预, 39; 吉田的~战略, 29

economic growth theory, 经济增长理论, 对~的接受, 247;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206-212; 对~的支持与反对, 245-251

economic ideology, Japanese, 日本的经济意识形态, 参见 *Jissen-ha* economics; ~中的比较优势概念, 29-30; 发展主义的~, 16; 对产业政策的启示, 60-66; 现代~, 15; 技术在~中的地位, 30; 总体战争理论(20世纪30年代), 49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经济企划厅, 206-207

Economic policy, 经济政策, 高增长的~, 34; ~

中高增长与稳定增长的论战, 255-258;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1), 48, 227, 231, 233-234

economics, 经济学, 参见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作为一个学科在日本的情况, 60-61; 经济学家在战后的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 135-139; 日本的政府~学派, 241; 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在日本的情况, 40-44

economics, neoclassical, 新古典经济学, 资本主义作为~研究的重点, 65; ~与日本发展主义的比较, 40-44, 64-66; 经济学法则的派生, 65; ~把经济作为一种自然体系, 48; 小宫对~的研究, 265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经济安定本部, ~成为经济企划厅, 203; 政策整顿综合委员会, 155; 经济企划部, 168; ~的建立(1946), 124; 经济恢复五年计划, 138; 和田领导~时的人事决定, 154-155; ~的经济复兴计划(1948), 167; ~的权力, 131, 153; ~的倾斜生产方式, 130, 145; ~的资源分配计划, 132-133; 和田博雄领导下的~, 153-154

economic system, contemporary, 当代经济体制, 关于~的起源的争论, 122-123

economic system, Japan, 日本经济体制, 当前的战争取向的~, 68; ~的发展(1931—1945), 67-68, 83; 促进出口政策对战后~的影响, 173; 非常时期的~, 71-72; 20世纪30年代前的~, 68

economic theory, 经济学理论, ~被引入日本, 61; 德国历史学派对~的影响, 60-61, 97; 德国总体战争理论对~的影响, 71; 马克思、凯恩斯与熊彼特对~的影响, 61-64; 国家生产能力在日本~中的地位, 44; 战后~中的国家危机概念, 47; 西方主流~中的效用最大化概念, 44

economists, Japanese, 日本经济学家, ~作为吉田的顾问, 137-138, 146-147; ~对产业政策的贡献, 238-245; ~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 135-139; 实践派, 19-20, 283; “近经”, 18-19, 207, 246; “马经”, 18; ~的观点, 63

economy, international, 国际经济, 自由资本主

- 义对~的定义,35;日本的军事扩张,86-8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83-84
- economy, Japanese, 日本经济体制, 参见 economy, managed; ~的变化(1931—1945), 2; ~的双重结构, 212-214, 232; 战时~得以持续的原因, 125-126; 朝鲜战争对~的影响, 193-194; 战后民主改革对~的影响, 126-128; 战时~的影响, 119-120; ~按1940年的体系运行, 1; 战后的经济民主化, 13; 战后的经济增长, 229-230; 战后的物资稀缺与需求, 128-129; ~的结构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后期), 230-232; 战时的制度在战后经济体制中的体现, 124
- economy, managed, 管制经济, 与美国和苏联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 82; ~的加强(1946—1949), 173; ~在日本的演变, 74-83; ~思想中的法西斯意识形态, 27-28, 58, 108; ~国外经济思想的影响, 103; 马克思主义对~的影响, 108; 美国新政经验对~的影响, 109-110; 苏联经验对~的影响, 108-109; 日本的~(1946—1949), 121; 日本产业政策中的~, 67; 军事化的~, 22; 1931后~在日本的发展, 70-71; ~在战后的延续, 122; ~下的产权, 101-103; 倾斜生产方式在~中的作用, 135; 政府在~中的作用, 99-103; 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控制(1931—1949), 188; 向~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 89-99
- economy, market, 市场经济, 参见 market forces; 基于~的东亚发展主义, 5; 从管制经济到~的转变, 276
- efficiency, 效率, 关于~思想的争论, 279; 对~思想的反应, 185-186; 用技术创新思想提高~, 210-211
- Eisenhower, Dwight D.,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249
- Elster, Jon, 乔恩·埃尔斯特, 292
- Employment, 就业, 英国的~, 57; 日本战争动员政策, 58-59; 实现充分就业的各种方案, 212-214
- employment, permanent, 终身雇佣制, ~的制度化, 36; ~的起源, 58; ~的作用, 60
- enterprise system,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式企业制度, 57
- entrepreneurship(Schumpeter), 企业家精神(熊彼特), 62
- ESB, 见 Economic Stabilization Board
- Eta Saburō, 江田三郎, 258
- Etzioni, Amitai, 阿米台·埃特锡安尼, 285
- Eucken, Walter, 瓦尔特·欧肯, 135
- Evans, Peter B., 彼得·B. 埃文斯, 295
- excessive competition concept, 过度竞争的概念, 30-31, 51-54, 181, 228, 236, 268
- Export Bank, 输出银行, 181
- Export-Import Bank, 输出输入银行, 181
- export promotion, 促进出口, 基于创新思想的~, 212; 发展主义演化过程中的~, 188-189; ~的产业政策(20世纪50年代), 28-35, 173; 熊彼特创新理论用于~, 174-175
- exports, 出口, 战后初期~的质量, 178-179; 朝鲜战争时期的~, 206
- Fatetto, Enzo, 恩佐·法特托, 189
- Fallows, James, 詹姆斯·法洛斯, 48, 52, 121, 287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日本~与德、意~的比较, 69; ~的强制性平等概念, 58-59; ~击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89; ~的经济意义, 12; ~的意识形态, 25; ~对日本发展主义的影响, 14, 24; 管制经济中的~, 27-28, 58, 108; 波兰尼对~的阐释, 23-24; 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 12; ~在日本经济体制中的作用, 12-13; 民族国家在~中的作用, 42; ~的总体战争思想, 68
- Fawcett, Henry, 亨利·福西特, 61
- financial system, 金融体系, 西方~与日本~的差异, 57; 衰退时期(1965)的~, 259
- Fine, Sherwood M., 舍伍德·M. 法因, 152
- Firms, 企业, 限制外国~的竞争的效果, 55; 复兴金融金库战后向私营~发放的贷款, 151
- fiscal policy, 财政政策, 参见 tax policy; 战后为私

- 营部门提供的信贷,179
- Five Year Plan for Economic Independence,经济独立的五年计划,207, 211
- Five Year Plan for Economic Recovery,经济复兴的五年计划,138
- Fletcher, William Miles III,威廉·迈尔斯·弗莱彻,三世,95-96
- foreign exchange,外汇,~受到政府的控制,182-183;~限制的终止(1964), 266
- Fujisawa, Chikao,藤泽近雄,93, 95, 96
- Fukuda Hamakazu,福田越夫,~在佐藤内阁供职,259
- Fukunaga Hiroshi,福永博,293-294
- Fukuta Hajime,福田一,~论特别产业法提案,275
- Fukuyama, Francis,弗兰西斯·福山,4, 42
- Furutani Anamasa,古谷穴正,91
- Gao, Bai,高柏,107, 119, 124, 125, 135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33
- 353 General Headquarters(GHQ),盟军占领军总部(GHQ),石桥与~的冲突,140, 150;~的劳工政策,134, 215;~在日本重整军备(20世纪50年代)问题上的立场,194;~施加压力要求放弃自由放任思想,152-153 改革的目标与方向,125-126;~的角色与权威,124-125, 130-131, 155;~在建立经济安定本部上的作用,145-146
- General National Mobilization Law(1938),《全国总动员法》(1938年),25
- Genkyōku system,主管部门体制,53
-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战时经济体制的基础,97;~对J. N. 凯恩斯理论的描述,66;李斯特的生产者经济学,45-46;李斯特关于~的观点,39-40;日本发展主义根源于~,60-61
- Germany,德国,日本对~取得的胜利(1941年)的反应,115;战后~的管制理论,216
- Gerschenkron, Alexander,亚历山大·格申克隆,284
- GHQ,见 General Headquarters (GHQ)
- Giersch, Herbert,赫伯特·吉尔希,135
- Gluck, Carol,卡萝尔·格拉克,41
- Goldstein, Judith,朱迪思·戈德斯坦,9, 289
- Gordon, Andrew,安德鲁·戈登,58, 69
- Gotō Ryūnosuke,后藤隆之助,105-106
- Gotō Yōnosuke,后藤誉之助,208-209, 239;~在政府的供职,19;~引进创新思想,64;~用凯恩斯经济学研究增长,240;~提倡创新政策,207-209;~提出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214;~在昭和研究会的创立上扮演的角色,105-106
- Gourevitch, Peter A.,彼得·A. 古勒维奇,242;治理结构,8
- government regulations,政府规制,~的滥觞(20世纪30年代),26;为控制竞争而实行的~,53;战后促进出口时期的~,31
- Granovetter, Mark,马克·格拉诺维特,11, 285
- 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各国对~的反应,67;~对各国经济政策的影响,74;~对日本的影响,72;日本对~的反应,68-70, 281
-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1941),大东亚共荣圈(1941), 85-86
- Gudeman, Stephen,斯蒂芬·古德曼,10, 65
- Haley, John,约翰·哈利,29
- Hall, Peter,彼得·霍尔,9, 286, 290
- Hamaguchi Haruhiko,浜口春彦,19, 164
- Hara Akira,原朗,28-29, 31, 68, 75, 122-123, 126-127, 138, 168-169
- Harrod, Roy,罗伊·哈罗德,238, 239
- Hata Ikuhiko,羽田几彦,93, 94, 130
- Hatoyama Ichirō,鸠山一郎,206
- Hayasaka Tadashi,早坂忠,19, 164
- Hayashi Kentaro,林健太郎,247
- Hayashi Yoshinori,林义则,259
- Hayek,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哈耶克,62-63

- Headquarters of Productivity, 生产率本部, 187-188, 216
- heavy-chemical industries, 重化工业, 发展~的计划, 50, 167-169; 利用技术创新的思想, 212; ~在战时与战后的发展, 29, 178
- Heclo, Hugh, 休·赫克洛, 286
- Hein, Laura E, 劳拉·E. 海因, 214, 249
- Hicks, John, 约翰·希克斯, 10
- Hirschman, Albert, 阿尔伯特·赫希曼, 44, 144, 284
- Hollingsworth, J. Rogers; J. 罗杰斯·霍林斯沃思, 8, 11
- Hooks, Gregory, 格雷戈里·胡克斯, 68
- Horie Masaki, 堀江正木, 217
- Horie Shigeto, 堀江熏雄, ~论产业结构的组织, 206; ~论贸易自由化, 264-265
- Horikoshi Teizō, 堀越楨三, 271
- Hoshino Akiyoshi, 星野明义, 19, 164
- Hoston, Germaine A., 杰曼·A. 霍斯顿, 91
- human capital concept, 人力资本的概念, 234-235
- Huntington, Samuel, 塞缪尔·亨廷顿, 5
- Hyperinflation, postwar, 战后恶性通货膨胀, 124, 129
- Ichimada Naoto, 一万田尚登, 190, 210
- Ideology, 意识形态, 日本管制经济的~, 25; 战时~在战后的延续, 2-3
- Ide Yoshinori, 井手义则, 111-112
- Iijima Banshi, 饭岛伴士, 43
- 354 Ikeda Hayato, 池田勇人, ~受到的影响, 243; ~在石桥政府供职, 151, 239, 243; ~担任首相, 34, 151, 227, 239, 249, 253-254; ~对高增长政策的支持, 244, 248, 251-253, 265-266; ~在吉田内阁供职, 243
- Ikenberry, John, 约翰·埃肯伯里, 286
- Ikumi Tashiichi, 井汲太七, 198
- Imai Ichio, 今井一雄, 256, 257, 264
- Imai Kenichi, 今井贤一, 303
- Important Industry Law(1931), 《重要产业统制法》(1931), 26, 79
- import substitution polic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政策, 189
- Inaba Hidezō, 稻叶秀三, ~在政府的供职, 19; ~推行管制经济, 116; ~制定经济独立计划, 211; ~作为战后官僚的权力, 125, 154, 168; 制定贸易自由化计划, 266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在日本发展主义思想中被否定, 40-44; 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中的~, 42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产业工程, 186
-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 ~与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差异, 40-44; 日本~的目标, 41; 快速~(1894—1918), 42
- industrial policy, 产业政策, ~中的管制经济思想, 67-71, 99-103; ~中的全面战争思想, 61-62, 70, 76; 法西斯主义对~的影响, 70-71; 产业结构的概念, 48-50; 西方经济学对~的影响, 60-64; ~下的市场组织, 7-8; 民族国家作为~的分析单位, 40-44; ~的范式, 20-22; ~的政治, 119; 民族主义在~中的作用, 86
- industrial policy, postwar, 战后产业政策, 有泽的倾斜生产方式, 141-145; 对~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238-245; 优先生产政策对~的影响, 163-164; 促进出口的~, 173; 影响~的因素, 126-127; ~的重点, 124; ~对重化工业的重视, 167-169; ~与重化工业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 29; 朝鲜战争对~的影响, 193-194; 产业部门的重组(20世纪60年代), 235; 管制经济的~, 121; 走向经济独立的~, 207; 与国际竞争相关的~(20世纪60年代), 48, 229; ~重心的转移, 176; ~的战略性质, 181-182; 战略计划, 131; 战时~的延续, 3; 创新的主题, 209
-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cept, 产业结构的概念, ~的逻辑及其含义, 48-50; 政府为管制经济干预产业结构, 50
- industrial system, 产业体制, 主张发展与改革~的观点, 213-214; ~的概念, 235-236; 建立新的

- ~的需要, 34-37, 266-267
- industries, strategic, 战略性产业, 参见 heavy-chemical industries; ~的发展, 181-182; 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的管理, 82; 对~的规制, 31
- inflation, 通货膨胀, 有泽关于持续性~的观点, 163; 与~相关的货币政策, 161-162; 战后降低~的计划, 142
- infrastructure, underdeveloped (1950s), 欠发达的基础设施(20世纪50年代), 230-231
- innovation theory (Schumpeter), 创新理论(熊彼特), 62-64, 174-175, 206-212, 277
- Inukai Tsuyoshi, 犬养毅, 94
- Inoue Junnosuke, 井上准之助, 94
- Institutions, 制度, ~的演变, 11; 战时~在战后的延续, 2-3
- interest rates, 利率, 战后受日本银行控制, 180
- 35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6, 33
- Intervention, state, 政府干预, 参见 nationalization; ~策略的变化, 276; ~作为发展主义的政策, 3, 283; 促进出口政策范式下的~, 30; 为侵华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 116-117; 日本的~(1931—1945), 24-25; 日本法西斯意识形态下的~, 77-78, 102; 凯恩斯经济学的~, 64; 战后的~(1946—1949), 1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 1; 20世纪60年代经济中的~, 228; 西方对日本~的看法, 51
- Investment, 投资, 感觉到的外国~的威胁, 55; 战后的合作性~, 132; 私有资本(20世纪50年代), 229-220
- Iriye Tokurō, 入谷德郎, 91
- Ishibashi Tanzan, 石桥湛山, ~与盟军占领军总部的冲突, 140; ~与有泽的理论分歧, 148-150; ~担任经济稳定署主任, 147-148; ~在政府供职, 19; ~在优先生产政策上的思想, 151; ~作为凯恩斯经济学家, 148, 151-152, 243; 战后的放松银根政策, 125; ~担任首相, 151, 243-244; ~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金融政策, 138
- Ishida Hiroe, 石田广卫, 261
- Ishiwara Kanji, 石原莞尔, ~的留德经历(20世纪20年代), 107; 作为军事战略家的~, 104
- Itō Mitsuharu, 伊东光晴, 256, 257
- Itō Monoshige, 伊藤元重, 47, 49, 52
- Itō Takashi, 伊藤隆, 67, 96
- Iwao Ayasawa, 鮎沢严, 84, 88
- Jacobsen, John, 约翰·雅各布森, 21, 289-290
- Japan Development Bank, 日本开发银行, 181, 274
-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Industrywide Labor Unions, 日本全产业工会协会, 127
- Japan Federation of Labor Unions, 日本工会联合会, 127
- Japan-U. S. security treaty,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受到的反对, 248; 初订~(1951), 248; 续订~(1960), 248-250
- Jissen-ha economics, 实践派经济学, 18-19; 实行~的经济学家, 19-20, 283; 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对~的影响, 62-63; ~的理论命题, 65
- Johnson, Chalmers, 查默斯·约翰逊, 3, 7, 15, 40, 41, 48, 51-53, 67, 75-76, 81, 105, 130, 131, 180, 200, 251, 264, 265, 283
- Jussaume, Raymond A., 雷蒙德·A. 贾索姆, 68
- Kamiyo, Wayoshi, 神代和吉, 305
- Kanamori Hisao, 金森久雄, 18, 194, 239, 240, 241
- Kanbayashi, Teijirō, 上林贞治郎, 217
- Katayama Tetsu, 片山哲, ~担任首相, 153-154
- Kawahara Hiroshi, 川原宏, 94, 119
- Kawasaki Misaburō, 川崎巳三郎, 160
- Keidanren (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 ~反对《石油产业法》, 273; ~对特别产业法案的立场, 272-273; ~的作用, 273
- keiretsu companies, “关联”公司, ~与财阀公司

- 的差异, 184; 随着财阀解散而形成的~, 127, 176, 184; 原财阀公司组建成~, 31; ~与银行体系的联系, 80, 184; 关系合同, 53-54; 在国际竞争中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 35, 37
- Kennan, George F., 乔治·F. 凯南, 170
- Keohane, Robert, 罗伯特·科哈纳, 289
- Keynes, John Neville,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 66
- 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经济学, 发展主义与~的区别, 38; ~在经济安定本部政策中的体现, 148, 151-152; ~在高增长理论中的体现, 238-239; ~对日本经济学的影响, 61-64, 68; ~在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中的体现, 234; ~在战后的影响, 34
- Kimura Kihachirō, 木村禧八郎, 162-163
- kinkei* economics, “近经”, 18-19, 207, 246
- Kishimoto Seijirō, 岸本诚二郎, 160
- Kishi Nobusuke, 岸信介, 105, 247-249, 253; 管制经济, 105; ~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 264
- Kita Ikki, 北一辉, 95
- Kobayashi Hideo, 小林英夫, 25, 27, 30, 32, 103-105, 109, 234, 243-244, 297
- Kohli, Atul, 阿塔尔·科里, 9
- Koiso Kuniaki, 小矶国昭, 100
- Koizumi Akira, 小泉明, 63, 183
- Koizumi Shinzō, 小泉信三, 91
- Kojima Seiichi, 小島精一, 实现社会主义, 258; ~论管制经济, 103; ~论通产省产业结构委员会, 267; ~论产权, 102; 国家革新运动, 93-96
- Komiya Ryūtarō, 小宮隆太郎, 19, 20, 37-38, 53, 67, 242, 246, 257, 258
- Kondō Kanichi, 今藤干一, 205
- Konoe Fumimaro, 近卫文麿, 经济新秩序, 113-117; ~与昭和研究会的关系, 105-106
- Kono Yoshihiko, 小野义彦, 246-247
- Konozuka Kiheiji, 近塚喜平治, 100
- Korea, 朝鲜, 日本对~的殖民化(1910), 86
- Korean War, 朝鲜战争, ~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173-174, 206; ~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影响, 193-194
- Kōsai Yotaka, 江西与隆, 229
- Kōshi Kōhei, 乡司浩平, 216
- Kotō Rikuzō, 小藤陆藏, 271
- Krasner, Stephen, 斯蒂芬·克拉斯纳, 11
- labor movement, 工会运动; ~兴起带来的影响, 187; “转向”运动对~的影响, 92; ~的太田薰-岩井章路线, 32; 战后日本的~, 59; 战后对~的政策, 127-128; ~的高野实路线, 32
- labor relations, 劳资关系, 管制经济体制下的~, 81; 与~相关的管理理念, 215-216; 三池罢工(1960), 32, 36, 226, 237-238, 260-263; 战后的~, 214-215; 对赤党的清洗(20世纪50年代), 215; ~作为对效率的反应, 185-187; 工会运动兴起后的~, 187
- labor unions, 工会, ~的发展, 133-134; 三池罢工中的~, 261-263; 盟军占领军当局治下的~, 127-128; 战后~跟管理层的合作, 32; 战后~的力量, 187, 215; 战后的罢工, 178; ~对生产效率运动的抗拒, 219-221; 战争动员时期的~, 58
- laissez-faire concept, 自由放任的概念, 战争动员时期对~的压制(20世纪30年代), 46-47
- land reform, postwar Japan, 战后日本土地改革, 121-123, 128
- Lazonick, William, 威廉·拉宗尼克, 60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拒绝承认日本的满洲里傀儡政府, 73; ~运用民族自决原则, 87-88
- Legislation, 立法, 新劳动法的采用, 127-128; 产业法(20世纪50年代), 184; 战后资源分配方面的~, 131-132; 战后劳工法的复兴, 127; 为促进特别产业的~提案, 272-276; 与全国动员相关的~(1938), 114
- Lewis, Arthur, 阿瑟·刘易斯, 245, ~的生命线理论, 84
- Lindberg, Leon N., 利昂·N. 林德伯格, 8, 11

- List,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39, 45-46, 97
- livelihood wage, 生计工资, 58
- loan syndications, 贷款辛迪加, 战后的~, 132; 全面战争时期的~(1937—1941), 117
- Luckmann, Thomas, 托马斯·拉克曼, 1
- MacArthur, Douglas,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53, 201
- Makino Nobuaki, 牧野伸显, 137
- Management, 管理层, ~稳定劳资关系的努力, 187; ~制度化的开始, 188; ~体系的制度化, 35-36; 战后工会与~的合作, 32; ~与所有权的分离, 32
- management theory, 管理理论, 德国战后的~, 216; 美国~的引进, 186; ~中的生产效率概念, 279; 泰罗制, 215; ~为生产率本部所利用, 188
- Manchuria, 满洲, 日本对~的占领(1931), 22; ~的自然资源, 85; 管理~的策略, 104-105
- Manchuria Incident (1931), “九·一八事变”(1931), 67, 70, 73, 85-87
- market forces, 市场力量, 有泽优先生产思想提倡的对~的制约, 144-145; 促进出口政策下的~, 88-189; ~作为一种治理结构, 8; 非市场性治理结构对~的影响, 26; 管制经济体制对~的限制, 70, 78
- Marshall, Alfred,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190
- Marshall, Byron K., 拜伦·K. 马歇尔, 93
- Martinelli, Alberto, 阿尔贝托·马蒂内利, 291
- marukei economics, “马经”, 18
- Maruyama Masao, 丸山真男, 69, 91, 139, 159, 164
- Marxists, 马克思主义者,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批评, 245-246, 257; 前共产主义者作为~, 159-160
- Marxist theory, 马克思主义理论, 参见 tenkō (conversion) movement; ~与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共存, 118-119; ~对日本经济学的影响, 61-63; ~反对生产效率运动, 217; 战后共产主义者再度转向~, 159-16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 90-93; 在优先生产思想中的体现, 143; 关于生产力的~, 58, 61-63, 97-98
- Masagi Chifuyu, 正木千冬, 94
- Masamura Kimihiro, 正村公弘, 19, 164, 177, 179, 181, 184, 185, 193, 202, 206-207, 213, 214, 230, 241, 245, 258
- Masuda Hiroshi, 增田裕, 140, 141
- Matossian, Mary, 玛丽·马托西安, 284
- Matsui Haruo, 松井春雄, ~对各国国防机构的比较, 107-108; ~担任内阁资源局局长, 84-85, 100; ~论政府的重要性, 102
- Meiji Constitution (1889), 《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 71; ~下天皇的权力, 76, 111; ~下首相的权力, 111; ~对政府官僚机制的界定, 111
- Meyer, John, 约翰·迈耶, 10, 283, 286, 289
- Miike strike (1960), 三池罢工(1960), 32, 36, 226, 237-238, 260-263
- Militarism, Japanese (1931—1945), 日本军国主义(1931—1945), 22-28
- military sector, 军工部门, 盟军占领军当局治下的~, 126;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张, 86-87; 对德国军事胜利(1941)的反应, 115; ~在“九·一八事变”中扮演的角色, 73; 官僚机构对~的支持(20世纪30年代), 76
-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 通商产业省(通产省), 战后时期发出全国动员的号召, 35, 227, 268-269; 资本投资计划, 181; 新产业体制委员会, 267-268; ~的形成, 179-180; 约翰逊对~的研究, 7; 新产业体制(20世纪60年代), 227; 特别产业立法的提议, 273-276; ~在改善劳资关系中的作用, 216; ~对大企业的支持, 273; ~对兼并的支持, 236
- Minobe Ryōkichi, 美浓部亮吉, 150, 256, 257
- Mitsubishi, Tadahiro, 三桥规宏, 300, 301
- Miwa Ryōichi, 三和良一, 29, 126
- Miyajima Hideaki, 宫岛英昭, 79

- Miyazaki Isamu, 宫崎勇, 256, 257
- Miyazaki Masayasu, 宫崎正康, 147
- 358 Miyazaki Masayoshi, 宫崎正义, ~作为俄国与苏联问题专家, 108-109; ~关于伪“满洲国”经济管理思想, 104; ~为日本提出的战略性计划, 105
- Miyazaki Yoshikazu, 宫崎义一, 143, 146-147, 156, 157, 183; ~论经济独立, 140; 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 63
- Miyazawa Kiichi, 宫泽喜一, ~在特别产业立法提案上的妥协, 274
- Mobilization, national, 国家总动员, ~在战后的延续, 2, 35
- Modernization, 现代化, 后藤的~思想, 209; 要求经济体制~, 213-214
-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 有泽的战后~, 141-142; 石桥的放松银根政策, 152; 与通货膨胀相关的~, 161-162
- Moore, Barrington, 巴林顿·摩尔, 13
- Mori Takeo, 森丈夫, 99
- Morozumi Yoshihiko, 两角良彦, 40; 作为通产省官员的~, 43, 52; ~关于欧洲混合型经济的观点, 269-270; ~论保护主义, 55; ~论政府角色, 267
- Muller-Armack, Alfred, 阿尔弗雷德·缪勒-阿马克, 135
- Munitions Industry Law (1943), 《军火工业法》(1943), 117
- Murakami Yasusuke, 村上泰亮, 5, 54, 60, 86, 303; ~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理论, 65; ~论日本发展主义的起源, 40; ~论西方经济学理论, 38
- Nabeyama Sadachika, 锅山贞亲, 90-91
- Nagasu Kazuji, 长洲一二, 256, 257
- Nakamura Masanori, 中村正则, 75, 123, 250, 251, 259, 261
- Nakamura Takafusa, 中村隆英, 25, 26, 32, 67, 78, 80, 82, 105, 122, 143, 146-147, 168-169, 197, 210
- Nakasone Yasuhiro, 中曾根康弘, ~论发展主义, 5, 39
- Nakayama Ichirō, 中山伊知郎, ~对发展采取的方法, 191; ~对日本经济增长政策的贡献, 240-241; ~对工会运动的批评, 161; 国际贸易的取向, 189-192, 212; ~论爱尔兰饥荒, 165; ~论民族国家, 40; ~论生产效率, 56-57, 59; ~提出生产效率运动的原则, 218; ~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 18-20; 贸易政策, 190-191, 211
- Narita Ryūichi, 成田龙一, 303
- National Bank Association, 全国银行协会, 274
- National General Mobilization Law (1938), 《全国总动员法》(1938), 114
- National Income Doubling Plan (NIDP), 国民所得倍增计划(NIDP), 20, 48, 227, 231, 233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 124, 127, 139-140, 164; 对欧洲~的批评, 84; 促进出口政策中的~, 29-30; 面对冷战威胁时的~, 174; 战后德国的~, 175; ~在产业政策中的体现, 86; ~在日本经济思想中的体现, 42, 86; 朝鲜战争时期的~, 195; 战时意识形态与~一起得以保存, 2; ~与战后时期生产效率运动的联系, 214-219; 从资本主义向管制经济转型中的~, 118; 贸易自由化后的~, 35; 发展主义转型中的~, 282;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93-96
- nationalist movement, Japan, 日本民族主义运动, “转向”运动, 70, 89-93, 159; 国家革新运动, 70, 90
- nationalization, 国有化, 日本企业管理的~(20世纪30年代), 78, 82-83; 苏联的~, 82
-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ion (NPRA), 国策研究会(NPRA), 105
- nation-state, 民族—国家, ~在日本被作为分析单位, 7, 40-44, 70, 91-93, 118-119, 159, 277
- Nawa Tōichi, 名波东一, 166
- Neff, Robert, 罗伯特·内夫, 5
- New Deal, 新政, ~的出现, 1; ~对盟军占领军当

- 局的影响,126, 127, 155;全面战争思想在~中的体现,68-69
 NIDP,见 National Income Doubling Plan.
 1940 system, Japanese economy, 1940 年日本经济体制,1-2
 Nishinarita Yutaka,西成田丰,134, 219-221
 Noguchi Yukio,野口悠纪雄,1, 25, 27, 68, 121, 122-123, 126, 295, 297, 306
 nonmarket governance structures,非市场性治理机制,为控制竞争而采取的~,53, 228;~的发展(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26;产业政策对政府与~的影响,7-8;~的作用及其发展,7-8
 Occupation Authority,盟军占领当局,参见 General Headquarters(GHQ);~推行的民主改革,121-123;民主改革的影响,126-128;日本对~缺乏信任,124, 140;政治改革,125, 130;战后德国的~,134;~的亲工会政策,187
 Ogata Sadako,绪方贞子,87
 Ōhira Masayoshi,大平正芳,249
 oil industry,石油产业,战后政府对~的控制,236
 Oil Industry Law(1962),《石油产业法》(1962),236-237, 273
 Oishi, Kaichirō,大石嘉一郎,121-122, 123
 Okada Tadahiko,冈田忠彦,85
 Okazaki Tetsuji,冈崎哲二,11, 25, 26, 27, 68, 117, 125, 132-133, 220, 295, 297
 Okimoto, Daniel I.,丹尼尔·I. 冲本,12, 69, 294
 Ōkita Saburō,大来佐武郎,139, 140, 146;~对高增长政策的贡献,241, 243-245;~论竞争力要素,231;~论产业政策,177;~担任外务省大臣,19;~对高增长政策的观点,256-257;~论稳定的经济增长,257
 Ōkōchi Kazuo,大河内一男,58-59, 81, 92, 97-98, 119, 217
 Ōkubo Toshimichi,大久保利通,137
 Ōkuma Shigenobu,大隈重信,87
 Okumura Kiwao,奥村喜和男,78, 110
 Okuno Masahiro,奥野正宽,25, 47, 49, 52, 68, 122, 295, 297
 Olson, Mancur,曼库尔·奥尔森,60
 Ōmori Tokuko,大森德子,168, 210
 Osanai Hiroshi,小山内宏,205
 Otaka Konosuke,大鹰此助,27
 Ōtake Hideo,大竹英雄,86, 95, 102, 203, 204, 206
 Ōtake Keisuke,大竹启介,108, 156, 161
 Ouchi, William,威廉·大内,54, 57
 Ōuchi Hirokazu,大内裕和,303
 Ōuchi Hyōe,大内兵卫,160
 Ōuchi Tsutomu,大内力,121-123
 Ozaki, Robert S.,罗伯特·S. 尾崎,57
 Paque, Karl-Heinz,卡尔-海因茨·帕克,135
 Patriotism, postwar,战后的爱国主义,139-140
 Pauley delegation,波利代表团,167-168
 Pax Americana,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参见 Dodge Plan;自由贸易的概念,33-38;美国霸权,33;~对发展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的影响,225-226;~对日本经济的影响,13;~对日本战后秩序的形塑,173
 Peattie, Mark R.,马克·R. 皮蒂,107
 Polanyi, Karl,卡尔·波兰尼,11-12, 23, 24, 67, 74
 Policy,政策,基于民族主义的~,2-3;战争动员时期的社会~,98-99
 policy, postwar,战后政策,~对市场竞争的制约,132;
 经济学家的作用,135-139
 policy proposals,政策提案,与管制经济相关的~,114-116
 politics,政治,~中的智囊团(20 世纪 30 年代),103-107;产业政策的~,119;盟军占领军当局的~改革,130;思想与意识形态在~运作中的作

- 用,9-10
- postal saving system, 邮政储蓄制度,181
- Powell, Walter R., 沃尔特·R. 鲍威尔,286,289
- Preston, Nathaniel Stone, 纳撒尼尔·斯通·普雷斯顿,25-26
- Prinz, Michael, 迈克尔·普林兹,68
- priority production program, 倾斜生产方式,20,121,132-135;~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43;实施~产生的效果,163-164,169;~思想的出现,141-145;木村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162-163;~下的资源分配,156;凯恩斯主义的金融政策的使用,138
- private sector, 私营部门,发展政治中~与政府的冲突,8-9;统制会(20世纪30年代晚期),26;~在促进出口中的表现,188;~力量的增强,276;经团联对~的保护,273;管制经济中的~,28;关于通产省对日本经济的提案,270-271;~对管制经济的抵制,113-116;政府针对~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228;~采用非市场结构,8-9
- producer economics, 生产者经济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45-46;日本的~,45-46
- production, 生产,官僚机构对~的控制,115;对~的强调,68;~作为日本发展主义的重点,46;战后经济政策,124;战后全国的~能力,47-48;战后的倾斜生产方式,20,121,130-135;促进全国的~能力,48-56;战争动员时期的~,46-47
- production force, Marxist theory, 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理论),58,61-63,97-98
- productivity, 生产性,~本部,187-188,216-217;~概念的制度化,279;中山的~观,218;战后农业的~,128;战后~的表现,169;战后日本提出的~原则,59-60;战时的~观,56-59
- productivity movement, 生产率运动,~对劳资关系的影响,32;~的制度化,57-60;工会对~的反应,219-221;工会对~的参与,36;战后的~,187-188,216-219
- profit principle, 利润原则,对~的否定,27,31-32,80,133-134,185,228,237,279;~的复兴(20世纪50年代),44,175
- property rights, 产权,101-103
- protectionism, 保护主义,面对自由贸易秩序对国内市场采取的~,266,282;采取~的理由,31,33,35
- Pyle, Kenneth B., 肯尼思·B. 派尔,18,29,39,41,60,61,173,174,195,197,200,226,281,287
-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186
- quotas for foreign currencies, 外汇配额,182-183
- rearmament, Japan's, 日本重整军备,关于~的争论,195-199;朝鲜战争时期的~,194-195;~的政治,203-206;吉田反对~,201
- reconstruction, postwar, 战后重建,以重化产业为基础的~,167;经济复兴计划(1948),167;~的优先性,142,161-162;优先生产思想的运用,143
- Reconstruction Finance Bank(RFB), 复兴金融金库(RFB),~停止发放贷款,179;~的建立,132,150-151;~进行优先资助,156;~在战后恢复中的作用,151
- Regulation, state, 政府规制,为控制竞争而进行的~,54-55;过度~,53-54,78;约翰逊对~的定义,53
- Reich, Simon, 西门·赖克,42,69,76,77,121,306
- resource allocation (1931—1949), 资源配置(1931—1949),为战争动员而对劳动力实行分配,58;政府对~的控制,188
- resource allocation, postwar, 战后资源配置,有沢的~计划,144-145;倾斜生产方式下的~,156;政府对~的控制,132-133
- RFB, 见 Reconstruction Finance Bank
- Robbins, Lionel, 莱昂内尔·罗宾斯,40
- Robinson, Joan, 琼·罗宾逊,39

- Rohlen, Thomas, 托马斯·罗伦, 40
- Romer, Paul, 保罗·罗默尔, 39
- Rostow, W. W., W. W. 罗斯托, 284
- Rowan, Brian, 布赖恩·罗恩, 10, 286
- Royall, K. C., K. C. 罗亚尔, 169
- Royama Masamichi, 蜡山政道, 110-111
- Russia, 俄国, 日本击败~(1905), 86
- Ryū Shintarō, 笠信太郎, 46, 101, 133
- Sabel, Charles, 查尔斯·萨贝尔, 59, 218
- Sahashi Shigeru, 佐桥滋, ~的新产业体制观, 268; ~担任通产省企业局局长, 43
- Saitō Seiichirō, 斋藤精一郎, 18
- Sakai Saburō, 坂井三郎, 47, 102, 106, 107, 113, 115, 119
- Sakakibara Eisuke, 榊原英资, 1, 5, 32
- Sakamoto Jirō, 坂本二郎, 37-38, 146-147
- Sakurada Takeshi, 樱田武, 134
- Samuels, Richard, 理查德·塞缪尔斯, 21, 39, 41, 43, 46, 51, 193, 196, 203, 204, 206, 294
- Sano Manabu, 佐野学, 90
- Sasaki Takashi, 佐佐木毅, 225, 250
- Satō Eisaku, 佐藤荣作, ~担任首相, 258-259
- Satō Noboru, 佐藤升, 5, 159, 187
- Satō Seisaburō, 佐藤诚三郎, 5
- Sawa Takamitsu, 佐和隆光, 21, 65, 240, 241, 242, 256
- SCAP, 盟军最高统帅①, 152
- Scarcity, postwar Japan, 战后日本物资稀缺, 128
- Schmieding, Holger, 霍尔格·施密丁, 135
- Schneider, H. K., H. K. 施奈德, 65
- Schumpeter, Joseph, 约瑟夫·熊彼特, ~论分析模型的运用, 10, 242; ~高速增长理论, 238-239; ~关于创新的思想, 277; ~对日本经济学的影响, 61-63, 207
- Scott, W. Richard, 理查德·W. 斯科特, 289
- self-determination principle, 民族自决原则, 87-89
- Sen, Amartya, 阿玛蒂亚·森, 285
- Senga Tetsuya, 三我哲也, 205
- Shareholders, 股东, 银行作为~, 184; 公司互为~, 184; ~有限的权力, 133, 185
- Shibata Toshio, 柴田敏夫, 19, 164
- Shikagui Seiichi, 鹿食圣一, 151
- Shikanai Nobutaka, 鹿内信隆, 134
- Shimazaki Miyoko, 岛崎美代子, 143, 145
- Shimomura Osamu, 下村治, ~作为经济顾问, 19; ~论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 64; ~论高速增长时期, 238-243; ~论高速增长政策, 48, 254-257; ~论贸易政策, 239, 257; ~强调促进生产力, 255-256; ~提出经济增长方案, 20, 245-246, 253-256; 经济理想, 245-246
- Shimura Kaichi, 志村嘉一, 151
- Showa crisis(1929), 昭和危机(1929), 72
- Showa Research Association(SRA), 昭和研究会, ~提出的经济政策方案(20世纪30年代), 107; ~的成员构成, 106
- Shūtō Eiyū, 周东英雄, 197
- Sino-Japanese War(1895), 中日甲午战争(1895), 86
- Skocpol, Theda, 瑟达·斯科奇波, 11, 291
- Smelser, Neil, 尼尔·斯梅尔策, 291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97
- Smith, Anthony D., 安东尼·D. 史密斯, 283
- social engineering, 社会工程, 经济作为~的目标, 277; 工业化作为一种~, 48-50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发展主义对~的超越, 279; 民主~的出现, 1; 国家~的出现, 1; 日本的~, 42
- society, 社会, 日本的“社会”概念, 41-42; 全面战争计划对~的影响, 122

① 盟军最高统帅: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日本的盟军的最高指挥官(Supreme Commander of Allied Powers)。

- Special Survey Committee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SCMFA),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SSCMFA), 136, 164-165
- Spending, public,政府开支,高增长时期的~(20世纪60年代),34;基础设施上的~(20世纪60年代),233;用于军事的~(20世纪30年代),74;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下的~,227, 233-234;衰退期(1965)的~,260;用于战略性产业的~,235
- 362 SSCMFA,见 Special Survey Committee at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SSCMFA)
- State, the,政府,见 bureaucracy, intervention, state;~干预策略上的变化,276;发展政治中~与私有部门的冲突,8-9;~对资本的控制,116-117;发展主义中的~,16,产业政策中的~,21;~经济对治理的影响,8;约翰逊对规制型~的定义,53;通产省对~角色的观念,268;波兰尼对~角色的阐释,23-24;战后~对经济的控制,129-13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权力,71;“九·一八事变”(1931)后~的角色,70;~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23-24;~在发展非市场结构中的作用,8;~在管制经济中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78-79, 102;~在发展战略性产业中的作用,181-182;国家改革运动中的~,95-96
- Steinhoff, Patricia,帕特丽夏·斯坦霍夫,3
- Stepan, Alfred,阿尔弗雷德·斯特潘,8
- stock market,股市,~的衰落(1940—1941),117;战后的发展,185
- strategic planning,战略计划,为提高效率而进行的~,210
- strategic view of the economy,经济的战略观,14, 48-51, 76-77, 99-103, 131, 180, 227, 233
- Suetaka Shin,尾高慎,101, 103
- Sugihara Shirō,杉原四郎,60-61
- Sugimori, Kōjirō,杉森广次郎,84
- Sugita Hiroaki,杉田伦明,154, 208
- Sumitani Mikio,澄谷三木男,61
- Suzuki Shigetaka,铃木茂乔,247
- Suzumura Kōtarō,铃木兴太郎,47, 49, 52
- Swedberg, Richard,理查德·斯威德伯格,10, 11
- Swidler, Ann,安·斯维德勒,10
- Tachi Sakutarō,立作太郎,88
- Taiwan,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895),86
- Takabatake Michitoshi,高田通敏,58, 98
- Takagi Keno,高木见夫,91
- Takahashi Kamekichi,高桥龟吉,26
- Takahashi Masao,高桥正雄,150, 258
- Takajima Kikuo,高岛菊男,187
- Takemi Tarō,武见太郎,137
- Takeuchi Konomi,竹内此见,159
- Takeyama Michio,竹山道雄,247
- Takeyama Morio,竹山守男,19, 164
- Tamanoi Yoshirō,玉野井芳郎,42, 63
- Tanaka Ikuo,田中郁夫,243
- Tanaka Tokichi,田中都吉,8, 22
- Tanaka Yonosuke,田中与之助,78, 252, 253, 265
- tax policy,税收政策,战后~的效果,185;战后的财产税,133
- technology,技术,~在日本产业政策中的地位,44-45
- tenkō (conversion) movement,“转向”运动,70, 89-93, 159
- Teranishi Jurō,寺西重郎,26, 80, 117
- Thomas, George M.,乔治·M.托马斯,283
- Thurow, Lester,莱斯特·瑟罗,45, 57
- Tilly, Charles,查尔斯·蒂利,283
- Tilton, Mark,马克·蒂尔顿,54, 295
- Tōbata Seiichi,东畑精一,18, 40;~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作用,18-19
- Totalitarianism, Japan,日本的极权主义,115
- total war program,总体战争计划,日本~的基础,107;~对社会结构的影响,122
- total war theory,总体战争理论,24-25, 49;德国~在日本产生的影响,61-62, 71

- trade policy, 贸易政策, 参见 protectionism; 进口壁垒(20 世纪 50 年代), 31, 35; 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 174-176; 促进出口, 28-33, 173-175; 生产技术比较优势的思想, 174-176, 180; 产业结构概念下的~, 49; 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对~的影响, 33-38; 拉美国家的~, 189; ~的自由化, 183, 233, 263-266; 要求~自由化的压力(20 世纪 60 年代), 47-48; 外汇配额, 182-183; 限制竞争的~, 175-176; 发展主义转型中的~, 175-176; 美国对~自由化的影响, 226
- trade policy, international, 国际贸易政策, ~的自由化(20 世纪 50 年代), 33
- Tsuji Kiyooki, 辻清昭, 248
- Tsurumi Shunsuke, 鹤见俊辅, 90, 91, 92
- Tsuru Shigeto, 都留重人, ~研究贸易与国际市场的方法, 191-192; ~的经济政策, 125, 189; ~在政府的供职, 19; ~受到凯恩斯、马克思和熊彼特的影响, 62; ~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155-158; ~反对重整军备(20 世纪 50 年代), 197-198; ~在吉田政府任职, 138; ~论进步力量, 161; ~关于战后分配政策重点的提议, 156-158; ~论重整军备, 198-199; ~论贸易政策, 211; 经济白皮书, 158-160
- Tsuruta Toshimasa, 鹤田俊正, 236, 267-268
- Uchida Shigeo, 内田茂雄, 300, 301
- Uchida Yoshihiko, 内田善彦, 98
- Uchihashi Katsuto, 内桥克人, 303
- Ueda Hirofumi, 植田宏文, 81
- Umemoto Katsu, 梅元胜, 159
- Umesao Tadao, 梅棹忠夫, 247
- Unemployment, 失业, 中山关于防止~的思想, 218
- United States, 美国, 援助亚洲国家以遏制共产主义(20 世纪 50 年代), 196; 日本与~的军事对抗(1941), 22, 73; 日本在经济上走向独立于~, 207-212; ~支持日本的政策, 126, 165, 169-170; ~战后对日本的援助, 169-170; ~敦促日本重整军备(20 世纪 50 年代), 194; 吉田关于日美关系的看法, 199-203
- Usami Seijirō, 宇佐美诚次郎, 197, 199
- Ushio Jirō, 牛尾治郎, 302
- van Wolferen, Karel, 卡列尔·范·沃尔夫伦, 113
- Veblen, Thorstein, 索尔斯坦·凡伯伦, 65, 284
- Vogel, Ezra F., 艾兹拉·F. 沃格尔, 57
- Wada Hiroo, 和田博雄, ~担任经济安定本部长官, 153-154; ~对共产主义的兴趣, 108; 作为战后官僚的权力, 125; ~论政府干预, 102
- Wakimura Yoshitarō, 胁村义太郎, 150, 237
- War mobilization, 战争动员, 日本经济领域的~(1931—1945), 25; 民族国家作为~的单位, 42-43; 认为种族歧视是~的动力的观念, 88-89; ~时期的生产效率概念, 57-58; 政府对私有企业施加的压力, 46
- war reparations, 战争赔款, 前敌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 167; 为~而没收日本资产的提议, 167-168
- war theory, 战争理论,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的~, 49-50
- war with China, 对华战争, 为~提供资金, 116-117
- Washington Conference (1921), 华盛顿会议(1921), 72-73
- Weir, Margaret, 玛格丽特·威尔, 11, 291
- Williams, David, 戴维·威廉斯, 5, 7, 22, 41, 287
- Wilson, Woodrow, 伍德罗·威尔逊, 87
- Windhoff-Heritier, Adrienne, 阿德里安娜·温德霍夫-赫利提尔, 291
- Woolf, S. J., S. J. 伍尔夫, 12, 25, 27-28, 33
- world system, 世界体系, ~结构的转型, 281
- Wuthnow, Robert, 罗伯特·伍斯诺, 286

- Yakushiji Taizō, 药师寺泰藏, 303
- Yamada Moritarō, 山田盛太郎, 121, 123
- Yamaguchi Yasushi, 山口靖, 89
- Yamamoto Masao, 山本正男, 256
- Yamamoto Michiru, 山本满, 126
- Yamamura Kozo, 山村耕造, 19
- Yamanouchi Yasushi, 山内之靖, 59, 68-69, 98, 122, 303, 306
- Yamazaki Hideo, 山崎秀夫, 91
- Yamazaki Hiroaki, 山崎广明, 75
- 364 Yasui Takuma, 安井琢磨, 239
- Yomiuri Shinbunsha, 《读卖新闻》, 77
- Yonekura Seiichirō, 米仓诚一郎, 25, 27
- Yonezawa Yoshie, 米泽义卫, 176
- Yoshida doctrine, 吉田原则, 29, 249-251.
- Yoshida Shigeru, 吉田茂, 冷战策略, 174; ~原则 (20世纪50年代), 29, 199-203, 212, 225; ~的
经济民族主义, 34, 195; 经济学家担任~的顾问, 137-138, 146-147; ~担任外务大臣, 137; ~担任首相, 137, 147-148; 吉田学派, 243
- Yoshimura Masaharu, 吉村昌光, 231, 249
- Yoshino Shinji, 吉野信次, 52, 79, 83-84, 99, 101
- Yoshino Toshihiko, 吉野俊彦, 150
- zaibatsu* companies, 财阀公司, ~与“关联”公司的差异, 184; ~战后被解散, 30, 32, 122-123, 125, 127; 重新组织成“系列”公司, 176, 184; 在日本资本主义体制中扮演的角色(20世纪30年代前), 75
- Zelizer, Viviana A., 维维安娜·A. 泽利泽, 285
- Zen Keinosuke, 胜桂之助, 146-147, 152
- Zukin, Sharon, 莎伦·祖金, 285

译 后 记

2006年春天接到高柏博士的电话,让我接手刘耳先生,翻译他的《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因为我当时手上另有两部书稿,加上又在学校里为研究生开设国际经济英文原著选读课程,所以我将书稿分给了选修我课程的三位学生翻译,算是课外实践。她们是:张新(第二和第三章),宋杏(第四及第五章前半部分),邹鑫(第六、第七章以及跋)。当时刘耳先生已经将索引初稿翻译完毕,我交给自己的任务则是翻译第一章导论并通校全文。

学生交来的译稿不尽如人意,除个别章节外,基本上难以采用。为对作者和读者负责,除了对第二和第三章进行了大幅修改外,我在译完第五章后半部分后,又索性将第六、第七章以及跋重译了一遍。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感谢上述同学,尤其是张新同学,她又将后来的定稿打印了一遍。当然,译文仍或有错,责任自由我负。

安 佳

2008年1月